

1978年创刊

1991年

近代史研究

4

(双月刊)

总第64期 7月出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杨奎松 (1)

• 近代城市史研究 •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

……………张仲礼 熊月之 潘君祥 宋一雷 (19)

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近代化进程中的

上海总商会……………徐鼎新 (39)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隗瀛涛 (69)

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格局的形成…皮明麻 李 策 (99)

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罗澍伟 (111)

• • •

试论列强在中法战争中的“调停”活动……………方 堃 (135)

罗素访华平议……………冯崇义 (153)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肖 娃 (180)

爱国何所罪 青史有定评

——张学良爱国获罪略析……………张友坤 (197)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对蒋政策的演变……………鹿锡俊 (210)

• • •

中国近代史译事五难举例……………黄光域 (238)

求疵一束——关于《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

的译释问题……………刘岳斌 (254)

§ 读史 § 俄罗斯首次对清政府赠书始末……………羽离子 (26)
§ 札记 § 《热河密札》中“宫灯”一词新解……………徐 物 (273)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李时岳 (279)

对帝国主义侵华本质的分析——评《八

国联军侵华史》……………茅家琦 (281)

书评 辛勤拓荒 扎实求真——《辛亥人物

文集丛书》评介……………山 屈 (285)

评《民生公司史》……………聂宝璋 (288)

近代台湾商业的发展——《台湾商业史评价》

……………徐秀丽 (295)

1987—1989年台湾、香港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近代史所图书馆 (29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杨 奎 松

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的却是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能不经历许多极其复杂和曲折的情况。本文即试图对此作一初步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开始了。

众所周知，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而那些在维经斯基等人协助之下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进而又在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之下建立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最初自然不能不以俄国共产党人为榜样。随着中国共产党很快成为同样依照俄国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

下级支部，它所处的地位更加复杂。因为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不仅中国共产党必须“无条件地遵守最严格的国际纪律”和“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而且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派出的具有“最广泛的权力”的全权代表的监督和指导^①。这样一来，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理论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人，其头脑当中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充满了俄国的味道”^②。在他们这时所起草的文件当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中的浓厚的俄国色彩。这时的共产党人不仅几乎完全沉浸在对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之中，而且明确认为：“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征，也是全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征”，俄国革命的方法，必然也是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俄国的革命靠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产业组合”实行“总同盟罢工”，中国的革命也只能是一样，因为“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世界上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式的”。进而，他们甚至几乎一致认为，中国革命也只有象俄国一样实行社会革命才有出路，即必须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为最直接的斗争目标^③。

但是，中国是否具有与俄国同样的发展条件和革命条件呢？在那些明显地留有俄国人笔迹的中共最初的历史文献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早期共产党人把中国和俄国等量齐观的情况，他们显然认为中俄两国都处于大致相等的发展水平上，即两国都是“农业国”，只是“大”、“小”有别罢了。既然并不比中国发达多少的俄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条件相近的中国不能如此呢？何况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俄国革命的成功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入穷途末路。当然，人们未必不了解中国还远比俄

① 道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643—6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178，389—390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

的社会现实，未必不了解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产业无产阶级在中国还处于极不发展的状况之中，但他们却因此更加重视自己与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以致一些人竟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助”，即中国革命“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①。

“一切均借俄助”，这句话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心理和中国革命的初期特点。历史本身并没有为中国提供足够的实行社会主义运动的阶级条件与物质条件，然而时代和环境客观上却促使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作为自己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毗邻俄国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及其援助，无疑大大地满足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需要。不过，“一切均借俄助”也是一种缺陷。它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不能完全按照俄国人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他们在理论、经验与物质条件上的缺乏，以致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以俄为师”的心理，并因此使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最初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使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很大程度上竟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

由俄国人和共产国际中管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这不可避免地要妨碍中国共产党人自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及运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这是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最初只是在一种纯粹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最初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呢？当然不是。实际上，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一些人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注意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了。他们早就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的本身下一番切实的研究

^①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13日。

工夫”，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底现状连起来研究-的任务^①。甚至在中共“一大”召开之际，人们还明确地谈到，必须首先在中国联合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推翻“封建老爷”和军阀统治，进而再“推翻那个获得了政权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比较切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政治主张^②。显然，到了1922年初，人们已经能够进一步提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的观点，反对做“一定公式的奴隶”了^③。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际地运用它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只是，由于人们最初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及其革命经验的欠缺，特别是由于最初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并直接受到共产国际代表监督和指导的局限，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最初不能不是相对缓慢的。

最初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重大实际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不能不是列宁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当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能够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切合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任务之际，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革命党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进而促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改变他们一度所高举的社会革命大旗，转而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并提出了第一步实行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步走的革命方针^④。同样，也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率先提出了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并具体实行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策略主张。毫无疑问，运用马克思

① 《实行社会主义与发展实业》，《新青年》，第8卷第5号。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

③ 《先驱》创刊号，1922年1月15日。

④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先驱》第4号，1922年6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

主义关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一次成功的范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切实实行了这样的方针和主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20年代中期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当然，要使纯粹产生于欧洲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适应经济上极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实际，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要使作为一种典型的以产业无产阶级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一种必须适合于以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基本群众，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基本条件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更不可能是那些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外国人所能够完成的。然而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他们这时还极端缺乏革命的具体实践，因而明显地缺少对中国革命本身的发言权，这使得他们只能紧紧地依赖于马克思主义书本上那些现成的结论和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甚至，就在共产国际已经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苏联并全力支持国民党实行军事革命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并不相信在中国就可以有与俄国不同的革命道路存在。十分明显，注重意识形态的指导意义的共产党人，这时更习惯于从现成的结论和经验出发来认识问题。为此，他们明确批评致力于军事革命的国民党不该“占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搞什么军事革命。他们断言：“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实际上广州革命政府并不是照着这个理论成立的”。在中国也和俄国一样，只有一条道路好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轰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而要实现这样一种工农兵联合的大暴动，国民党就必须立即放弃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政府及其军队，

全党动员“到民间去”^①。

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机械地套用到中国革命当中来，这在中国革命的最初阶段一般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涉及如何争取革命胜利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共产党人最初所表现出来的对以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欧洲社会革命方式的迷信，就更加典型。因为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实践，都没有提供过除了群众性的总同盟罢工和总暴动以外的任何一种革命的形式。能不能设想另外一种革命的方式呢？在这方面，斯大林多少表现出某种远见卓识。他明确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②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欧洲社会革命的特殊的武装革命方式，这在斯大林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共产党人应当为实现十月革命方式的群众起义而努力的思想，他在承认了中国革命的这种重要特点之后，只是要求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比如加强其政治工作，研究军事，直至逐渐担任某些军事领导职务等等。显然，他还没有意识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未来的革命多半也只能是武装的革命。因此，当国民党公开实行分裂之后，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人们所能够想到的革命方式，多半也只是群众性的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而由此出发，人们甚至迅速地开始把中国革命的程度与俄国革命的历史相类比，并且公开树起典型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的旗帜，寄希望于它能够一举成就俄国革命所成就过的一切。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那些现成结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那些现成经验，在人们的头脑中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589—591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266—267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与矛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不依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却又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人们有意无意地干挠和阻碍。这是因为，一方面，人们为了推动中国革命的进展，不能不尽力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需要；而另一方面，人们为了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又不能不设法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以使之不被庸俗化。尽管事实上这时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实际上早已被俄国化，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上级领导机关的共产国际更是直接受命于苏联党的指挥，但人们显然相信：这种马克思主义恰恰是最纯粹、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经过苏联共产党解释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使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从理想变成了现实。

由于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事实上日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一种特殊权利，而世界上又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并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就成为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到1927年前后，苏联党的领导人及共产国际不仅公开地要求各国党必须使自己国家的共产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而且明确要求他们必须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①。这样一来，用俄国党的标准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指导与衡量各国共产党和各国革命的情况，自然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要严重地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尽管共产国际事实上制订着中国革命的具体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问题上毕竟开始取得了一些进

^① 贝拉·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121页。

展。他们这时已经开始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具体考察和区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毛泽东等人已经能够从具体的实际出发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及土地革命的独立见解。特别是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毛泽东甚至开始注意到组织和保持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为此并提出了“上山”的思想。而大革命刚一失败，他就尖锐地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断言共产党的失败正是失败在没有掌握革命武装上^①。不难看出，通过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中已经开始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强烈愿望，人们并开始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但大革命的失败，毕竟把共产党人引上了武装起义的革命道路，从而使共产党人骤然置身于一种从未经历过的严峻局面之中。这种情况不能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渴望借助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俄国革命的经验，而这恰恰适应了共产国际这时强化俄国革命模式和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需要，因而极大地助长了党内那种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的依赖倾向。随着斯大林开始拿中国革命的失败与俄国1917年7月的失败相类比，人们很快就开始相信，中国革命必将迅速走向自己的“十月”。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进入苏维埃阶段的说法，无疑更加助长了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情绪。一时间，不论条件成熟与否，到处是一片暴动之声。直到一系列暴动先后失败，由共产国际代表乃至苏联外交人员亲自出马的广州起义也迅速失败之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这种简单的模仿和类比是不适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最先注意到有必要实行区别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游击战争和武装割据方式以保存实力的，并不是俄国人，却是最早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因为，当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军事上出现不利局面时，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除了带领部队撤上井冈山实行武装割

^① 《八七会议》，第58页。

据以外，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考虑到这个时候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在试图把中国革命引上纯粹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道路，毛泽东把革命的基地建立到偏僻的山乡里去，建立到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农村当中去，这不能不使得那些格外注意苏维埃革命的无产阶级形式的中共领导人感到严重不安。为此，他们立即给了毛泽东以严厉的处分。然而，事物发展的逻辑很快就证明毛泽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就连共产国际也不能不注意到应当把握暴动条件和时机，因而提出了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妨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的问题。这种情况至少说明，中国革命多半并不是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7月，而且“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①。

当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最初采取这种“游击式斗争与农民割据”方式的斗争形式的时候，显然还并没有把问题的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上去，他们这时多半还只是从策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在城市中的起义统统失败，而农村中武装割据却明显地容易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那些习惯于从意识形态考虑问题的人们没有理由不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个策略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提议，一方面却明白告诉共产国际：许多同志相信“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很显然，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未免距离俄国革命模式太远，它怎么可能引导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呢？当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开始相信中国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中心城市的暴动一举夺取全国政权了，他们甚至第一次注意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地域上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和中国社会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经济生活上是许多半

^① 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0期，1927年12月10日。

独立的区域”，各地的军阀统治也有强有弱这样一些事实。可是，他们依旧相信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在“一省或几省夺取政权是可能的”^①。这也就是说，人们在观念上多半还是在用俄国革命的模式考虑问题，即相信除了在中心城市实行暴动夺取政权的这种俄国式的革命方式以外，任何别的革命方式都只能是非无产阶级的。这也就难怪中共“六大”召开时，当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明确肯定暴动政策是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的最后斗争形式之后，一些人立即开始公开指责“割据”是非无产阶级的，并宣称所谓一省数省、一县数县首先胜利的观念，也都是革命的阶级性所不相容的“农民割据”的观念，是以农民游击战争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旧式农民革命的观念来指导今天的中国革命，结果只能使革命失去城市工人的领导，最终使苏维埃的暴动政策失去其实际价值。

先有成套的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念，后有党的生长和革命，这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由于语言文化、知识结构、理论素养的种种差异，以及研究时间、研究条件的极度匮乏，特别是两国社会结构、历史传统和革命内容有着极大的不同，使得必须按照这种已经被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念行事的中国共产党人，往往在重要的历史事变关头，难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付诸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不能不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在以典型的俄国式的“苏维埃”作为自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目标之后，人们就始终在革命的性质、阶段、形势、任务、对象、动力等等概念上纠缠不清，因为中国革命的一切实际条件都明显地与俄国当年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必须尽可能严格地把它们统统捏合在一起。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并不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共中央有人仅仅是出于通俗的考虑提出应当改“苏维埃政权”为“人民

^① 秋白给国际的报告，1928年2月8日。

政权”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就大为光火。在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则宁愿花上“十倍的时间”去向那些在他看来简直象“在街上散步的中国小姑娘们”一样幼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通俗地解释“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也不愿去认真考虑如何使俄国的革命形式转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①。事情很清楚，在共产国际的字典当中，“苏维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俄国特有名词，它已经成为一种包含着具体的革命内容，标志着具体的革命阶段和革命形式，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成功范例的革命模式。人们绝不能怀疑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同样也绝不能拒绝把它作为自己国家乃至世界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根本目标。因此，尽管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革命已经出现的割据苏区和工农红军存在的合理性，结果却仍旧不能想象它们存在的具体方式。布哈林声称，红军在一个地方长期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必然会把当地的母鸡都吃光。因此，他仍旧相信，革命的成功终究还要靠群众暴动解决问题^②。而在他们主持下制定的政治决议案中，他们照样机械地仿照俄国1917年7月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样子，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苏维埃形式，并明确限定共产党人只能以工人、农民中的贫农作为革命的动力，而以城镇下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中农为可能的却多半是动摇的同盟者，同时则必须把其它一切社会阶级看成是自己的敌人^③。

把阶级政策极端化并把革命手段模式化，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左倾盲动主义。但是，就在以李立三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倾向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农民割据和工农红军的游击战争，也显示出其特有的生命力。这种情况不能

①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②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6月29日。

③ 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9日。

不渐渐改变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的设想。毛泽东首先认识到中国存在这种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奇怪现象”的特殊原因，并注意到它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能具有的特殊意义^①。而1930年，斯大林也终于开始肯定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不同，不仅不存在象俄国革命一样一举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而且只能从敌人统治最薄弱而党的工作最发达的地域开始，首先创立和扩大红军，建立和扩张革命的根据地，然后一步一步有力地向外发展，最终夺取中心城市。据此，共产国际终于开始重视中国的红军及其农村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承认中国革命“必须在暂时还不是苏区的地方，发展农民运动，发展游击战争，用农民风潮底铁围来包围当地的城市，以及大城市和最大的城市，在军阀军队里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②。

应当肯定，从一味强调以城市工作和工人工作为重心，坚持以中心城市的起义为革命根本出路的俄国模式，到承认中国革命具有不同特点，主张中共中央应当把工作重心转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工作上来，甚至日益把红军和根据地视为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③，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值得肯定的重要进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前此那种僵化的思想方法，因而能够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和制定自己的政策了呢？事情却并非如此。与此相反，由于共产国际仍旧固执地相信只有它才具有最准确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因此它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从这种变化中发现它所存在的严重脱离实际的倾向。不仅如此，它甚至为了使中国党更忠实和更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竟不惜亲自出面干预中共党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页。

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的信，1930年10月。

③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119页。

内的组织事宜，以便把它认为信得过的大批留苏学生安插到中共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这确实是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注意到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需要，修正了僵化的革命模式；一方面却又生怕中国革命脱离俄国式的革命轨道，以致强行使之“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这毫无疑问只能促使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倾向进一步极端化，从而使它全力加强根据地和红军工作的大胆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恰恰是由于共产国际所信任的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在中国各地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才迅速导致了中共在几年之后的严重失败。因为正是这些只习惯于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教科书及有关决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的“布尔什维克”们，把一切适足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僵化的阶级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军事战略以及党内倾向斗争等等，全面引向了极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实现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过程。而与此同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不自觉向自觉转变的过程。十分明显，苏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原则上其实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具体结合。由上所述，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也曾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能够适应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毕竟缺乏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需要的条件与可能，可是他们坚持以他们的经验和看法来作为评判一切是非黑白的基本依据，又导致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某种宗教裁判所的角色。这自然会妨碍他们理智地了解自己的能力，以致促使他们往往盲目地反对任何一种试图脱离俄国的书本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事实上只能由中国人

自己来完成。

要在共产国际还直接决定着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而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多半不仅不敢越雷池半步，并且对党内一切不同见解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下标新立异，这无论如何是难以设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之所以直到30年代中叶以后才得以明确提出，当然是同这种情况有密切关系的。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共产国际逐渐开始根据中国国内情势发展的实际需要重新提出统一战线政策，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迟迟不能理解，以致失去了挫败国民党围剿的机会这一情况看，可以知道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比那些制造教条的人头脑还要僵化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当共产党人由于教条主义领导而造成的惨重失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酷的事实之后，中国党内出现要求反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愿望，并且通过更换领导人的方式来达到摆脱盲目的教条主义统治，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必须指出，在1935年以后，一方面中共领导层的改变和第一次远离共产国际的指导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实践的经历，为人们最终走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而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关于“不要机械地把一国的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①，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地进行独立的革命实践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毫无疑问，中共这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就是在传达共产国际“七大”这一决定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应当把共产国际有关决议“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的思

^①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莫斯科1939年版，第4—5页。

想的^①。

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其实质就是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尽管张闻天这时关于“民族化”的提法主要还是鉴于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很少涉及中国问题这一具体情况而言的，但是，要把国际指示“民族化”，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格外重视中国的“具体环境”了。当1936年中共中央经历了从统一战线问题的提出而导致的一系列基本政策的重大调整，甚至不能不完全放弃了俄国式的苏维埃革命方针之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经验必须适合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的体会，无疑变得更加深刻了。因此，在1937年5月中共党代会上，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形势，张闻天不能不更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具体环境”。他明确表示：“现在严重问题就是如何灵活的应用马列主义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来”，必须“要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因为实践已经证明，“现成的到处适用的药方是没有的”。显然，在共产国际也已经特别注意到必须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and 特点进行具体分析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必然会更加迅速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首先，共产国际提出必须对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反对公式化的问题，其实主要还并不是对各国党自身的要求，而是对自己本身工作的一种原则规定。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还并没有放弃它在政治上对各国党的领导 and 监控地位，各国党自然还必须执行它“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and 特点”而为这些国家共产党制定的“基本政治路线 and 策略路线”^②。因此，共产国际这时不仅仍旧对中国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明确指示，而且还特别派回它所信任的长期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的王明等人

^① 《张闻天文选》，第82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第4—5页。

来贯彻它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其次，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具有极高的威信，而长期以来人们还不习惯为自己标新立异，加上党内王明等相当一批带有教条主义倾向的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思想方法存在着与中国革命实际严重脱节的情况，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方法和敢于实事求是的政治勇气，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显然，这一工作只是当毛泽东与王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并一度取得了共产国际的好感，因而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才变得容易了一些。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正式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开始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他突出强调“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特别是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问题。他公开号召：“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首先强调的并不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是使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的问题，这是有着特别的政治意义的。

早在30年代初，毛泽东就已经注意到党内存在某种轻视实际，唯书唯上的倾向，因而提出过反对“本本主义”的观点^②。现在，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问题，其核心明显地仍旧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问题。很显然，由于王明等人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又在苏联学习、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工作多年，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较多，因此，他们明显地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更容易影响党内大批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11页。

在教条主义盛行期间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和多数出身于农民的普通党员，从而妨碍毛泽东等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提出有别于俄国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的独立政治理论见解，甚至妨碍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独立的工作。因此，毛泽东这时不能不急迫地提出了反对洋八股以及教条主义，而代之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使之具有一定的民族形式的艰巨任务。可以肯定，在毛泽东看来，只有首先使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民族化，才真正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想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则又必须深入地了解和熟悉中国社会，即必须首先做到立足于中国实际。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毛泽东的看法，最主要的显然就是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即必须时时处处地站在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后来曾经直接了当地指出王明教条主义问题的要害，就是想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了，而替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不难看出，这正是毛泽东以及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各种教条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之所在。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成为一个带有尖锐的针对性的问题。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这一问题的性质自然已经超出张闻天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来的内容，而渐渐开始走向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相对立了。这是因为，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中心的共产国际，早已是一个以苏联利益为基本政策出发点的国际主义政治组织了。长期以来，它所制定的各种政策和策略，几乎都是以苏联的现实需要为转移的。它从来主张，各国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都应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安全。它的理由是，世界上只有苏联才是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然而，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恰恰是要求人们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作为自己一切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

发点，反对任何以苏联为中心来考虑问题的倾向。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正是向那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原则提出的强有力的挑战。

究竟是应当以中国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还是应当以苏联为中心来制定政策，这个问题终于在1940—1941年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对国共关系的不同考虑，和德苏战争爆发后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在援助苏联问题上的分歧，尖锐地反映出来了。十分明显，中共中央坚持只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客观可能出发来考虑一切问题，把中国革命的利益放在一切关系的首要地位。这种情况的出现，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实践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原则了。当然，也是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中共中央迅速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进一步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需要，来具体地和全面地制定和完善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了。与此同时，真正彻底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从1941年9月，毛泽东开始在党的最高层展开对党内教条主义领导人王明等人的思想斗争，到1942年2月，他又趁热打铁地展开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肯定。至此，马克思主义真正被赋予了一种鲜明的中国民族形式，即毛泽东思想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开始正式承认以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最高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终于达到了它的基本目的。

（责任编辑：李林）

（作者杨奎松，195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特点和研究理论

张仲礼 熊月之

潘君祥 宋一雷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远东巨埠、世界名城。既有“东方明珠”的美称，也有“藏污纳垢”的恶溢；有“文明窗口”的令誉，也有“罪恶渊藪”的臭名。

下面就上海近代城市的历史发展、特点及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概括的论述。

一、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阶段与关节点

上海城市历史并不悠久，宋代成镇，元代设署，明代筑城。开埠以前，在中国地位并不显赫，甚至在长江下游地区地位也不是很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在苏州、杭州、南京之下。在海上贸易繁盛以前，或在闭关自守的年代里，“襟江带海”、“腹地广阔”的优越地理位置并没有赋予上海多少优惠。只有在近代海运发达以后，襟江才有经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命运是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1843年到1911年；（二）1912年到1927年；（三）1927年到1949年。每一阶段，都有一些影响城市变化和发展的重要关节点。综合100余年近代上海城市发展史，这些关节点主要有以下内容。

1. 租界设立。1840年至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一页，

影响了上海此后的命运。《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上海为其中之一。1843年中英双方签订的《虎门条约》更具体规定，英商可在上海等五口通商，中国地方官应根据当地情况，定一地方，准英人租房或建房居住。这成为殖民主义者在上海开辟租界的主要依据。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订立。这个章程具体规定了租地方法、范围、使用范围以及租地市政管理原则，日后被视为租界根本法。这个章程的颁布，也宣布了英租界的辟设。以后，美租界、法租界相继辟设。租界的设立，对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对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都十分广泛深远。

2. 华洋杂居。按照《上海土地章程》，租界本系租与西人的居留地，华人不得租赁居住。1853年，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城中富家竞相逃入租界，以求庇护。清政府为了切断城厢附近居民与小刀会的联系，强令居民迁徙，并放火焚烧十六浦一带民宅商铺，逼迫大批难民流入租界。于是，租界里中国居民激增，造成事实上的华洋杂居。1854年7月通过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去了先前关于华洋分居的有关条款，认可了华洋杂居的事实。华洋杂居促进了租界的繁荣和中西文化的交流。

3. 会审公廨的设置。《南京条约》附约之一《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英人与华民发生交涉词讼，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以中国之法治之，简言之，华洋分治。照此章程，英人在中国境内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就是所谓领事裁判权。以后，美、法、俄等国均取得这一特权。各国领事为行使这一权力而建立的法庭叫领事法庭。按上述规定，华人在租界内犯罪，仍应由中国惩治。但是，租界由华洋分居变为华洋杂居以后，英、美领事乘机夺取了华官在租界的司法权，擅自在领事法庭上审讯租界内的中国公民。1865年，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设立，是为会审公廨的前身。1869年4月20日，《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公

布，正式成立会审公廨。这个机构确立了外国领事观审会审制度，规定凡涉及洋人的案件，必须由领事或领事派人会审。按照这个章程，纯属华人之间的案件，领事不得干涉。但在以后的实际过程中，领事仍不断加以干扰，而且陪审官的权力往往超过中国职员。英美租界会审公廨设立以后，法租界也设立同样的机构，其陪审官的权力之大更甚于英美租界。会审公廨的设立，是领事裁判权的扩大，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夺。它对上海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复杂的影响。近代上海所以会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藏污纳垢之所，与此大有关系。另一方面，上海租界有时也会被进步人士利用，“苏报案”之类事件所以会发生，与此也有直接关系。

4.《马关条约》的签订。1895年的《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依据片面最优惠国待遇，其他国家也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上海于是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理想之地。因此，1895年以后，各国在上海投资猛增。据统计，1895年到1911年，外商在中国共投资开办91家企业，其中41家在上海，占总数的45%、开办资本总额的45%。这种情况，既扩大了西方列强对上海的掠夺范围，也刺激了上海的经济的发展。另外，它对增强上海的经济实力，密切上海与国际的联系，提高上海的国际地位，对城市的发展，都带来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

5.东南互保。1899年到1900年，北部中国燃起义和团反帝烈火，英、德、俄、法等组成八国联军进行镇压，华北一带陷入严重战乱状态。管理长江流域（包括上海在内）的清政府封疆大员张之洞、刘坤一等，与英国驻沪领事及有关人员磋商，议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实行东南互保。这一举动阻止了北方战火向南方蔓延，对义和团爱国运动来说，是一种反动，但对上海城市来说，则使其免去一场兵燹，对上海的

稳定、增强上海的对内和对外的吸引力，都有一定影响。

6. 地方自治。从1905年到1911年，上海地方士绅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地方自治运动，其组织先是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后是城厢内外自治公所，其实质是努力推进租界以外上海市区的市政近代化进程。6年间，自治组织共辟建、修筑道路100余条（段），修理、拆建桥梁60余座，新辟、改建城门9座，建筑口岸10个，修造码头6个，平均每年裁决民刑诉讼及违警事件1700多起。上海地方自治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向租界市政看齐为主要内容的市政近代化运动，所办桩桩实事，对于改变华界旧貌、缩小华界与租界差距、提高整个上海城市近代化水平，都有积极作用。

7. 辛亥起义。1911年11月上海反清起义成功，对于上海城市影响甚巨。它结束了清政府在上海统治的历史，也极大提高了上海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对于日后上海在中国政治上特殊地位的奠定关系很大。民国成立以前，酝酿成立民国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在上海召开的。民国临时政府所以设在南京，在一定程度上与上海的地位及沪军都督陈其美等人的意见有关系。1927年以后，南京成为民国首都，上海成为首都门户，追根求源，与上海辛亥起义不无关系。

8. 拆除城墙。上海城墙有300多年历史，开埠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骤增，租界的繁荣，城墙的防卫功能不但已失去，而且日益成为上海进一步发展的障碍。1900年以后上海士绅不断有拆城之议，但到1912年才获批准。1914年冬，拆城完毕。城墙的拆除，使城内城外连成一体，改变了先前互相分隔的状况，为上海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便。

9. 一次大战。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争斗，无暇东顾，上海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迅速发展的机会，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业发展尤为迅速。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这

一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等，这种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20年代初。

10. 特别市的设置。1927年7月，上海被南京国民政府定为特别市，划定了上海特别市管辖的范围，包括上海县、宝山县的吴淞、江湾等乡，加上七宝、莘庄、周浦等乡的一部分。其后，特别市制定了“大上海计划”，进行了建设上海新区的一些实际努力。这些努力，对上海城市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11. “一·二八”与“八·一三”事变的发生。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都给上海城市带来了巨大灾难。“一·二八”事变中，上海著名的东方图书馆所藏数十万册图书，万余家商店、数百家工厂、数十所大中小学校，均毁于日军的战火。“八·一三”事变中，上海更有2200多家工厂被毁。至于在战争中丧生的上海人就更难计其数。这两次战争，给上海城市带来的巨创，久久不能平复。“八·一三”以后，上海被日军占领，租界沦为孤岛，再后来，孤岛亦不复存在。大批上海工厂、学校内迁，文化人离去。上海城市元气大丧。

12. 日军占领租界和租界收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日军开进公共租界，接着占领租界（当时法国维希政府已向德国投降，与日本属同一营垒，故日军没有占领法租界）。日军将租界外侨按国籍划分为敌性与非敌性两种，英、美等交战国侨民皆属敌性。日军对敌性侨民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歧视政策，并将大批英、美男性侨民囚禁起来。英、美等国在事实上已经失去对上海租界管辖权的情况下，于1942年10月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签署一项条约，废止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1943年1月9日，日本玩弄外交骗局，与汪伪政权签订交还上海租界的协定。1月11日，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分别在中美、中英关于取消两国在华治外法权、收回有关租界的文件上签字。2月23日，法国

维希政府也发表内容类似的声明。至此，历时98年的上海租界从法律意义上结束了。当然，此时的收回租界还只是名义上的，这些地方仍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13.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结束日军占领状态，工厂、学校纷纷回迁，企业家、艺术家竞相回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长来上海接收，上海一片欢腾，高悬“建设新上海”的标语。上海人民以为战乱、黑暗从此过去，和平、光明已经来临。上海城市一度生机勃勃。然而，接收大员们并不把国家的前途、上海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而是忙着“五子登科”（即抢房子、车子、金子、女子、位子）。国民政府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上海物价飞腾，民不聊生。上海人民的满腔热望又变成泡影。

14.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腐败之快，出乎人民意料，其倒台之快，也出乎国民党当局的意料。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的历史掀开了新一页。

以上所述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三个阶段，14个关节点，只是影响这个城市变化、发展的大者、要者，至于引起这个城市结构和功能变化的因素还有很多，诸如越界筑路、铁路建设、航运发展、人口流动等，都可作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此不细述。

二、近代上海城市的特点

城市研究，自然要研究城市的结构，城市的功能，城市的变迁规律，但仅此还不够，还必须研究此一城市不同于彼一城市的地方，就是说，要研究城市的特点，找出城市的个性。近代上海城市的特点何在？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典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上海并不是在传统城市基础上自然成长的，而主要是在近代崛起的。开埠以前，上海城在全国来讲，最多算中等城市，人口20多万，除了海运、贸易，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近代100多年间，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都

市，人口猛增到500多万。从城市格局上看，在近代一个多世纪中，除了开头一小段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至迟从19世纪60年代起，城市的中心区域在两个租界及其周围地区。商店、工厂、银行、文化事业乃至最现代化的建筑物，大多不在老城区，而在新城区。这种特点，使得上海较之那种在老城市基础上放射式地向外扩展的模式，更少一点传统气习，现代化色彩也更强烈。很多涉及上海的图片、电影，都以海关钟楼、外滩大厦、浦江巨轮为上海标志，很少有人以南市区街巷为上海象征，很有道理。

第二、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在近代中国所有城市中，上海可以说是最西方化的城市。有人称上海是两个世界中间的城市，其实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上海简直就是西方。且不说在两个租界中，建造着西方式的房屋，开办着西人的工厂和学校，进行着西方的教育，实行的是西方的制度，就是在华界，在一般上海人身上，西方的影响也可以说是无处无之。从市政建设与管理，上海士绅自治运动，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的变化，多有西方影响；编制门牌号码、人车分道、文明婚礼、实行夏时制、选举市花、选举上海小姐……，不是仿造租界，就是学自泰西。上一世纪60—70年代，当北京等地士大夫耻与洋人交接、反对学习洋文、竭力阻挠京师同文馆开设时，上海已悄悄兴起外语热。70年代初，上海开办的各式外语学校就有20多所，以实用英语（教授口语、写英文书信、记帐单）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外语培训班最受欢迎。先前还是地位较低下的人或商家的子弟学外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富庶士宦人家也竞相让自己的子弟接受西洋教育。1881年，中西书院招收的首届200多名学生，大多数出身于上海富庶之家。上海人学习西文，连自己的语言，也打上了明显的西方印记，洋泾浜英语是上海的特产，更是海（上海）洋（西洋）融会的象征，从今日上海人的语言中，仍可看出昔日的影响，从器物到精神，从行为方式到价值观念，乃至语言风习，上海都受到西方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三、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近代上海由于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带动，城市设施的近代化起步堪称全国第一。随着租界的发展，一个不同于旧城镇街巷的新区——北市由此而兴。宽阔的街路替代了旧式狭窄的巷道，西式的洋楼拔地而起，江边林立的码头堆栈取代了昔日泥滩纤道。1865年，中国第一家煤气厂在上海投产供气；1882年，中国最早的电力厂在上海正式供电；1885年，上海的自来水厂也开始向居民供水，代表着西方物质文明的电话、电报也相继出现，逐步地完善了近代城市的最基本设施。在经济方面，上海迅速打破广州的对外贸易垄断地位，以连接广阔内地和国外市场的中介地位发展起数量巨大的对内和对外贸易。在工业和交通方面，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1865年近代中国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军械和造船企业——江南制造总局诞生。1872年，中国最早的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也在上海成立试办。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正式投产，它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企业。这些规模巨大的新式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取代了封建社会旧式作坊的简单协作生产和旧式经营方式，标志着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生产社会化的开端。经济近代化的步伐也带动了城市科技和教育的近代化。1863年，上海的广方言馆设立，1869年移入江南制造总局，成为企业附属的新式学堂。一些旧式学堂也纷纷开设西式课程，以适应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需要。一大批有近代意识的科学家也活跃在上海的科技和教育舞台上。1897年，南洋公学（即交通大学的前身）创立。1898年，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经正女塾也创办了。同时，上海的近代政治民主思想也广泛传播。1872年，中国历史最久的中文报刊《申报》创办。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创办的众多报刊中有60%以上都在上海发行，特别是象《时务报》的维新思想宣传，不仅对上海，甚至对全国的思想界都有强烈的辐射作用。20世纪以后，上海城市近代化的步伐更加迅速，其城市设施、工业和交通的规模、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民主政治思想的传播诸方面，均居

全国首位，成为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第四、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长江出海口。它通过黄浦江及其支流吴淞江同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湖泊水网相连，通过长江及运河可以跟国内的大部分省市进行贸易，同时又是我国沿海南北贸易的中心枢纽。这种以内河和长江、沿海航运为基础的优越水运条件乃是近代以前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进入近代以后，沿海和外洋航运发展更为迅速。由于上海地处太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发展同世界各地的航运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同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港口的距离几乎相等，象上海至伦敦、安特卫普、鹿特丹、汉堡和纽约的距离都是1万海里左右。如果经太平洋与美国的旧金山和西雅图相连，则距离只有5000海里左右。上海和日本等亚洲地区的海上联系则更加便捷。19世纪中期以后，上海同欧洲、美洲、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相继开辟。1905年设立的黄浦河道局（即以后的浚浦局）开始对黄浦江河道进行整治，增加了港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线，兴建了一批近代的码头、仓库和堆栈。本世纪20年代末，上海港的进口净吨位数已经跻身于伦敦等14个世界大港口之列。1930年，上海港的进出口船只数占全国的1/7，总吨位数占1/4左右，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城市。

第五、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近代由商而兴的上海城市，带动了上海的金融、交通、工业和其它与之相关行业的发展。早在19世纪，近代中国最早的外资银行和本国银行都首先在上海开设。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最主要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上海，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在交通运输方面，迅速发展的新式轮运业使上海在20世纪初就形成了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等四大航线，出入上海的商船和吨位数都占全国总数的20%以上。1908年和1909年沪杭铁路通车后，上海更有了联结内地的铁路干道。1929年以后，上海还先后开辟了联结国内各大埠的航空线路。由此，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枢

纽。近代工业的勃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标志。在30年代，上海30人以上的工厂数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额占12个城市总数的60%，其产值更达12个城市总数的66%。在解放前，上海还始终是中国棉纺织业、面粉加工业等多种轻工业行业的中心。由于工商、金融企业的集中，近代上海成为万商云集之地。他们既带来了产地的生产信息，也带来了销地的需求信息。这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市场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也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工商、金融各业的信息中心。为了及时地取得这种经营上的信息，不少内地大企业都专门在沪设立常驻机构以了解商情，指挥和安排生产。上海以其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地位，影响着沿海城市直至内地的经济发展。

第六、全国文化中心。开埠以前，上海在全国的文化地位本不显眼，除出了几个文化人，文化事业在全国并没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开埠以后，西学东渐，海派崛起，云蒸霞蔚，日趋突出。本世纪初，已成为全国文化中心。以后更日增月长，到30年代达到极盛。上海首先是以西学传播中心起步的。近代前半个世纪中，中国有10个较为著名的传播西学的译书机构，即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格致汇编社、益智书局、广州博济医院、天津水师学堂、广学会、译书公会。其中7家均在上海。译书机构不但数量多，起步早，而且译书最多、影响最大。据统计，从1840年到1898年，中国共出版西书561种，上海出版的至少有434种，占总数的近80%。就质量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应用科学的造船、制炮、冶矿、筑桥，还是社会科学的公法、历史、教育，凡带有开创意义的，影响很大的，多出自上海。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中心，其内涵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是报刊出版中心。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共收期刊40种，其中25种是上海出版的；1895年至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各地共创报刊40种，其中27种是上海创办的。从1890年到1911年，共出现

224种中文期刊，除去在日本出版的59种，在法国、美国出版的各1种，在国内出版的共155种（含香港），其中69种在上海出版，占41.8%。至于出版，近代前半世纪上文已经述及。本世纪初，上海出版业蓬勃发展。辛亥以前，上海的出版机构至少有44家，除了人们熟知的商务印书馆，还有作新社、广智书局、启文社、会文堂、富强斋等等。民国以后，全国第一流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多集中在上海。它是教育中心，拥有资格很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一部分），拥有国人自办的老资格大学南洋公学；拥有一批知名度甚高的中等学校，如徐汇中学、中西书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学等。上海的职业教育、女子教育更是自有特色。上海是近代中国文学艺术中心，有风格独特的海派绘画，千姿百态的戏剧曲艺，《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上海福尔摩斯探案集》、《子夜》等小说。至于电影，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电影史，几乎就是上海电影史。上海作为文化中心，也是多层次的。它是进步文化中心，《新青年》、左联、鲁迅……。也是一般文化中心，许多文化产品，既非进步，也非反动。同时也是反动文化中心，被进步文化人批评为“嫖界指南”的妓院文学、色情文化，上海出版最多，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文化“围剿”时，也以上海为基地。上海是精英文化、雅文化中心，也是通俗文化、市民文化中心，连载小说、侦探小说，还有五花八门的小说，上海出版最多，可以说上海是多方面、多层次、又是综合性的文化中心。

第七、移民城市。上海自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城市。上海公共租界自1885年至1935年的人口统计表明，非上海籍人口平均占上海总人口80%以上。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占15%，非本地籍占85%。上海移民人口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云南、东三省等全国18个省区；二是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波兰、捷克、印度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有15万多。进

入上海的国内移民，从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有组织的集团性移民。一个多世纪中，共有三次国内移民潮涌上海。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争频仍，富户、穷人一起涌向上海。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净增11万人。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主要是孤岛时期。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发动侵华战争，在1938年至1941年间，上海租界比较平静，各城巨商、地主、官僚及上海周围地区的难民，大批涌入租界，连同租界、华界一起计算，整个上海在此期间净增10多万人。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3年左右的时间里，上海人口净增208万，移民势头之猛，世所罕见。国际移民在开埠初期很少，以1900年为界标，上一世纪的50多年中，平均每年增加国际移民130人，本世纪的40多年，平均每年增加3000人。有一些是短期移民，他们经商办企业，发了财便席卷而去，也有相当一些人是长期移民，定居在上海。如此众多而又广泛的中外移民，密切了上海与国际国内各地的联系，有利于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融合，丰富了上海社会文化的色彩，这种人口特点，也加大了世界各地对上海的注意力。

第八、富有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上海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从揭开近代史帷幕的鸦片战争开始，到上海解放跨出近代为止100多年间，上海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慷慨悲壮。1842年6月，提督陈化成率部在吴淞抗英，打出了上海人民抵抗外国侵略、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以后有小刀会起义、四明公所事件、苏报案、辛亥起义、五四时期的上海三罢、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卅运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二八”抗战、“八·一三”抗战及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直到上海解放。一桩桩、一件件，都凝结着上海人民的浩然正气。需要强调或研究的是，上海在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常常走在前列，与这座城市特点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以为，除了上海工人阶级人数较多、相对集中，中国共产党又非常重视在这里

活动外，与这座城市现代化程度较高，有密切关系。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信息灵捷、文化事业繁荣，这些都是现代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条件。另外，人口来自五湖四海，与全国各地联系千丝万缕，这也促使上海人产生以天下为己任的义务观念。

第九、畸型发展的城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市政建设，局部有序，全局无序。近代大部分时间，上海是在三家（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二方（中、外方）的特殊格局中度过的。三家在各自管辖的范围里，市政建设基本上是有秩序的，道路、桥梁、地下系统、工厂区、居民区的安排，都自成系统。但从整个上海来看，各自为政便造成全局无序。道路宽狭不统一，疏密不规则，厂房、民宅交错，路名、门牌号码更是各行其事，给城市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很大的不利。（二）社会控制系统不健全。三家各司其政，各行其事，由于法律、是非、伦理、价值观念互有歧异，致使社会控制机制不健全，矛盾横生，漏洞百出。在华界犯了法，跑到租界便平安无事；在法租界犯了法，躲到公共租界也可逍遥法外。在三家交界处，往往还会出现三不管地段。这为帮会活动、黑社会势力的滋长提供了温床，也为各种各样地下活动提供了方便。下野官僚、不法绅商、巨奸大亨、流氓盗贼可以到租界栖身，革命党人、进步人士也可以利用租界活动。（三）“孤岛效应”常使上海获得意外发展。通常所说“孤岛”，是指1937年至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尚未占领租界时的上海租界地区。其实，在战乱不断的近代史上，上海时常充当这种相对无战事的“孤岛”角色。这种人乱我静的特殊态势，常使上海在外地发生战乱时，获得超常发展。这种发展，也是一种畸型发展。畸形发展给上海城市埋下很多病根，也给上海抹上一层令人高深莫测的神秘色彩。

三、研究上海城市发展的理论和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来就十分重视城市发生、发展历史和城

市作用的研究，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作用作过十分准确的分析。这些分析和论述至今在城市研究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人类的最初分工是城市产生的早期动因。因为，“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①。恩格斯并给这些人类最早城市的进步作用以高度评价。他说：“它们（指早期城市）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②对于在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城市，恩格斯还认为：“随着农业不再成为国家的决定性生产部门，随着（农业阶级之外）从事工业的阶级的形成和（乡村之外）城市的产生，封建制度到处趋于衰落。”^③这里，新兴的城市正是新兴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的象征，也是一种在完全经济意义上得到了充分发展的城市。恩格斯还把城市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他认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同工商业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工商大都市的出现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他把乡村城市化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经济规律，认为城市的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④。“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少而增加，不仅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的普遍现象”^⑤。列宁还肯定现代城市的作用：“大家知道，在现代各个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比乡村迅速得多，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⑥“首都或一般大工商业中心”，“在颇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⑦。同时还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1页。

④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2页。

⑤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2页。

⑥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⑦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6页。

出：“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①

人们把城市看成是以人为主体的，以空间利用为特点，以聚集经济效益和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技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人们可以从不同侧面去观察和概括城市的种种特征，但是空间上的聚集性总是城市的一种最本质的特征。因为城市就意味着人类经济活动、社会财富、人类的智力、社会生活在一定空间上的聚集。它是同乡村相对而言的。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过：“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都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②在这种空间聚集的基础上，城市也就必然地带有结构的完整性、对外的开放性、功能的高效性等等一系列城市所拥有的优势和特点。

城市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发展长河中一个不可避免和不可逾越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总是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或迟或早地总有一天要经历。实践已经证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差异，会对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它不会从根本上中止这种运动发展的进程。正因为如此，所以城市化和城市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史学、经济、社会学等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分析和展示城市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总结城市过程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无疑会进一步帮助人们提高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能力。所以城市史研究中开拓出的新领域和新课题必然地也会引起现实中人们的关注。

上海的城市的发展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孤立的发展过程。在

^①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近代化问题上它有同传统的关系问题，地域和管理上有华界与租界、上海与外国、上海与内地的关系问题，在论及外国殖民者的作用时还有一个动机与效果的问题。下面，我们概要地提出一些粗略的处理原则，供研究城市史的同志们参考，并请提出批评意见。

其一，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近代化，亦作现代化，在英文里本是一个词，因这里所谈的是近代史的问题，所以我们统一用近代化。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是近年学术界比较关注、讨论较多的问题，对传统、近代化的界说、判断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认为，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多元性。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含道、佛等因素，多种因素并存、互补。二是时代性。所谓传统，本指世代传承、一以贯之的东西，与生物学上的遗传性相类似。我们知道，遗传与变异本是相对而言的，并无万世一系、丝毫不变的传统。同为儒学，宋明理学便不等于两汉经学。述此二点，意在强调所说传统主要是指在近代还起明显作用的传统内容。至于近代化，我们认为，主要是指科学与民主。上海是中国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在这里展示得最为充分。约略说来，这种关系可分为四种情况：第一，基本适应。有些传统，不但是传统社会需要的，也是近代社会需要的，如勤劳、爱国，这些传统只要在新时代条件下注入新的内容，即可与近代社会相适应。第二，经过改造可以适应。如乡土观念，本是农业社会产物，与工业社会无关。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时间短、速度快，大批士绅农民涌入城市，乡土观念也被带了进来。各种各样的同乡会、会馆、公所的建立，便是这种观念的反映。这些组织在城市里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互通信息、密切乡谊、介绍职业、调解纠纷、济难互助等。它与近代化并不完全相悖，相反，在为城市提供可靠劳动力（同乡介绍职业，多有名誉担保性质，其可靠程度较高），对形成社区特色文化、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第三，基本不适应。如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尊君抑民、重男轻女、中华

中心主义等等。这些传统，在上海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受到冲击比较大。第四，需要具体剖析。这方面内容很多，如崇俭恶奢，节俭是美德，过份节俭、抑制消费，便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反之，不看条件，片面追求消费也不是健康行为。再如尊亲，也有一个度的问题，过份尊亲，以至父为子纲，否定儿子的个人独立地位，便不利于近代人格的养成，不合民主精神，反之，绝对反孝，父子视若路人，于个人，于家庭，于社会亦非好事。总之，传统与近代化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评价其长短优劣、利弊得失，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笼统地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都不是科学态度。

其二、租界与华界的关系。作为近代上海城市的两大组成部分，租界与华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租界初辟时，是依傍华界，食品、劳动力均要仰赖华界；其时上海城市重心在县城。租界兴盛以后，城市重心移至租界。以后，租界、华界互相影响。租界先进的市政设施和市政管理，不断为华界所仿效，南市马路工程局、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皆系由此而起。租界繁荣的商业，发达的工业，对华界亦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引起华界乃至市郊一些产业结构的变化，如改粮种棉、种植鲜花、蔬菜等，皆与租界有关。租界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对华界亦有影响，有些民族资本的企业便设在租界、华界结合部。租界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越界筑路象血管似地伸入华界，既侵夺了华界，也刺激了华界的繁荣。总的来说，租界与华界的关系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早期租界依傍华界，繁荣以后的租界侵蚀了华界，也刺激、带动了华界的近代化。

其三，上海与外国的关系。上海的近代化是从外国殖民侵略者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并迫使上海开埠和建立租界开始的。上海的近代化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经营的新模式的示范下进行的，上海许多近代化的民主政治思想、近代城市的管理方式，直至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技术等等，都是从外国引进的。应该说，上海的近

代化和外国的影响密切相关，或者说上海城市的近代化深深打上了西方的印记。但是，上海是不是象有些外国著作所说的那样，在清代还只是一个荒凉渔村，只是由于西方人士的到来，上海才得以开发。上海的经济开发，都是“西人开辟”之功吗？否！上述的这种观点掩盖了清代以前上海经济发展的真相，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有其内在的和外来的因素。外因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可以起决定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决不能替代内因的作用，仍然必须通过内因的变化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这种内因，概言之，就是上海人的学习、理解和创新。经过学习、理解和创新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城市管理方式、企业管理方法和技术等等，决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洋惯例的葫芦瓢，而是上海人参与国际国内竞争的新能力。在近代上海，这种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在工业发展中，上海的国货产品提倡者从西方学得的企业管理和西方技术，在他们手中又立即变成了与外国产品竞销的新手段。他们分析了产品竞争中中外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感到自己的劣势是暂时的，可以转化的，这种类似学生和教师竞争的现象，是在上海同外国关系中经常可以见到的。近代上海之所以能获得较快的发展，是和上海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经营者、职员、劳动者的近代化努力分不开的。近代上海需要外国，没有外国资本主义较先进的制度、思想、技术的注入，上海不会有较快的近代化。同样，外国也需要上海，这是因为上海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它可以消纳西方强国的各种机制产品；而且上海还是中国广阔内地的代表，是世界各国连结中国内地的桥梁。通过上海，外国列强获得了中国更为广阔的内地市场，并从中购取发展他们本国工业的廉价的农产和土产原料，以供外国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之用。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和国外的交流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虽然，上海在交流中有被压迫的一面，但也有不少是带有互补互惠的性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思想、管理制度、技术等促进上海近代化的一面，但上海同样为西方与各国

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其四、殖民主义者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殖民主义者在上海设租界、开工厂、办学校，毫无疑问主要是从其自身利益出发的，但是其经营的效果并不完全是由动机决定的。他们在租界铺路、修桥，装煤气灯、电灯，颁布一系列市政条例，进行严格的市政管理，使得租界市政在很长的时间里，可以与世界许多著名大城市相媲美。他们这样做，主要是从租界外侨的利益出发的。结果外侨得益，居住在租界的中国居民也可以受益。租界良好的市政管理也为上海县城及中国其他城市提供了近代市政建设的典范。外侨在租界经商、办工厂，目的是赚取利润，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这一方面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创造了近代工业发展的环境，提供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例如资金、动力、设备、技术、交通、通讯、保险等。上海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利用这些条件，在与外国资本的抗争中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上海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最大基地，也是民族资本力量最为雄厚的中国经济中心。外侨在租界创办学校，印刷书籍，出版报刊，主旨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其结果，一方面传播了崇洋思想，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地带进了西方科学知识和西方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有利于上海文化近代化。总之，租界对于近代上海的影响，并不全依殖民主义者的动机为转移。效果与动机有一致的地方，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有相反的地方。殖民主义者在上海租界的经营，不管其目的多么卑鄙，它在刺激上海社会进步方面，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其五、上海与内地的关系。上海近代的发展，和其它沿岸城市，特别是内地城市、乡村密切相关。在近代上海与沿海、内地各城市交往中，就其交往性质来看，上海往往显示出中国中心城市的态势，其它城市则往往是一方区域性经济的代表，显示出其乡村的态势。就上海与内地交流的内容来说，上海城市较近代化

的管理范例，近代化的思想、技术、文化以及主要是进口的、亦有相当部分是沪产的机制产品，是向外辐射的主要内容。而内地向上海输出的却主要是以农产品、矿产品和土特产品为主的原料和初级加工品。此外，在战乱年代里，人口和资金向上海集中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就时间的发展来分析，近代前期内地的人口、资金、农产品大量向上海集中，到近代后期，又增加了随市场扩大和对外出口所需的矿产品和土特产品。就上海的输出中，早期主要是外国进口产品对内地的输出，后期随着上海轻工业的发展，国产机制产品亦占相当比重。此外，随着上海全国大都市地位的确立和自身城市化程度的提高，近代化的管理范例、思想、技术、文化的向内地辐射能力也大大地加强了。

由于上海同内地的关系处在城市和乡村不同态势的关系上，所以上海同内地之间自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利益。以交往的物流而言，上海主要以机制产品（不管是进口的还是沪产的）同内地交换农产品、矿产品和土特产品，自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价格上的剪刀差。但是，这种交往物流同样还有着它的另外一面，即这种物流的交往也对内地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加速着农村小农经济的崩溃过程，起着牵动内地农村近代化的作用。至于上海对内地的各种管理制度、思想、技术、教育、文化上的辐射，即对内地的近代化无疑有着积极影响。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近代上海与内地的关系上，上海虽然以中国大都市的地位有剥夺广大内地的一面，但双方的共同利益仍不少，互补性很强。在交往上，往往又是双向的、互利的。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张仲礼，1920年生，上海社科院院长、研究员；熊月之、潘君祥、宋一雷为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

从绅商时代走向企业家时代

——近代化进程中的上海总商会

徐 鼎 新

跨越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两个历史时期的上海总商会（包括其前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上海商务总会），是上海商会史上最能体现出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和利益要求进行自主活动的时期。迄至1929年国民党当局以所谓“整理商人团体”的名义撤废上海总商会、重新组建由官方控制的上海特别市商会止，它存在于世间共27个年头。这27年间，近代化在中国社会里逐步向前推进，社会革新潮流冲击着各个领域，上海总商会也经历了一次新旧机制转换的历史变革，由原来的绅商时代走向新的企业家时代。它在中国商会发展中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对于各地商会的建设，也有先行、示范的作用，因此，把上海总商会纳入当时的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具体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一、上海——中国商会的发祥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政治变故迭起、社会动荡加剧的忧患时期，但又在近代社会思潮不断猛烈冲击之下催人觉醒、催人奋进的年代。一向在传统经济秩序和传统价值观念束缚下的工商界，此时也激起了重重波澜。要求摆脱行会束缚，革新组合体制，便是当时工商界改革要求的直接反映。当时上海工商界一些有识之士，通过报刊上不断介绍西方各国和日本的“商业会议所”条例、章程，以及与先后设立于上海的各国商会和外商

在沪总商会进行经济交往中,受到了很大的启迪和感染,认识到有必要打破原有的一行、一帮的行业、地域小范围的界限,汇各业力量组织统一的符合近代社会要求的商会。因为他们从与外人进行“商战”的屡屡败北中,深感有如排山倒海而来的外国商品其“掎克人国”的力量,决不是依靠原有的行帮以“一波一障之抵力”所能阻挡和抗御的。有些行帮组织已经开始酝酿在有限范围内进行合力应变的联合,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形式,以及适应近代化要求的规章制度,依然不能摆脱行会的羁绊,改变行帮的落后形象。这样,要求仿效外国成例,组织一个不分行业、有统一领导的资产阶级新型工商团体——商会,很快在上海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

早在1896—1897年间,在上海发刊的以鼓吹变法维新为宗旨的《时务报》,就曾连续刊载汪康年的文章,指出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均非常重视商利商权,有关本国商务概由商会主持办理,“凡官设商肆,定税则,皆必与商会相商,故商会之权最大”。认为我国一些“通商大埠”,由于有外商组设的商会而无华商自己的商会,涉及商务事端,“皆西商为主,而华商听其调度;凡市面行情银价,一皆听于西人”。他竭力主张必须迅即在这些城市里建立本国商会,“以集商议,以重商权”,并通过商会“专考求商务盈亏之故,而筹更变之策”^①。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影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1896年也撰写了一篇《商会议》的专文。文中强调“商”是“今日之先务”,如不及早组织商会,“则商无校能之地”。他主张在各行省、各府所在地分别建立总会、分会两个层次,由分会考察“府辖之县最王(旺)之产,最良之产,与风尚之华朴、民俗之勤惰、工作之精粗、市情之消长,各列表,度其所宜兴、宜革、宜变之故,斟酌其如何兴、如何革、如何变之法,闻于总会”,

^① 汪康年:《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论中国求富强宜筹宜行之法》,分见《时务报》第47、52册及13册。

然后由总会进行审核，“决其行止”，并报请督抚“为之主持保护”^①。

在上海，正式被列为维新要图、由清政府谕令筹办商会的，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当时的光绪皇帝载湉采纳康有为奏陈的变法方案，明令在上海、汉口试办商会。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把在上海设立商务局、商会的责任交给张謇，张謇“辞不获允”^②。但旋即因变法失败使拟议中的上海商会流产，办起来的商务局也被慈禧派来的特使刚毅裁撤^③。可是事隔不久，慈禧鉴于振兴商务有利无害，“又有谕旨举办（商务局）”，刘坤一再次札委张謇偕同刘世珩“驰赴上海设局开办，总理其事，并选举丝茶各业巨商严信厚等为商务总董，分飭所属（各业）各举分董”。严信厚等人以上海商务总局总董的身份，组成一个官办的商务公所，充作“商会”组织，隶属于上海商务总局之下。但是，当时的上海商务总局（或称“江南商务沪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府衙门，下属的商务公所也同样沾有严重的衙门气息。尽管设局宗旨意在考求商情，挽回利权，拟“立商学以究源流，蒐商律以资比例，设商会以联心志，撰商报以广见闻”^④；在上海创办的《江南商务报》，“延文学之士撰著论说，采译新闻”^⑤，也颇有一些社会影响。可是由于“局为官设”的官僚体制的严重束缚，一些旨在消除官商隔阂、开通风气、振兴商务的革新图谋，难以见诸成效，“行之数年，敷衍如故，隔阂如故，徒糜无数之资财，曾无丝毫之裨益”；“依然官自官，商自商，而于整顿商务之端，仍如隔十里之雾。”^⑥连1901年间出任商约大臣衔命至上海与各国代表进

①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

② 《高翁自订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七月。

③ 见《汇报》第127号，第2册，第216页（1899年11月11日）。

④ 《江督刘奏陈设立商务总局片》，《汇报》第62号，第1册，第496页。

⑤ 《筹办农工商分门实学片》，《刘坤一选集》，奏疏，卷二十九。

⑥ 《通商情以兴贸易说》，《申报》1901年6月19日。

行商约谈判的盛宣怀也深感“局为官设”的局面不改变，就难奏振兴商务之功效。他认为：“远规西制，近采舆论，商会之设，诚非缓图。伏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旨飭各省会地方设立商务局，亦已开办数年，但局为官设，仍用候补人员，不用商董，未免官与商视同秦越。商情甘苦，终难上达于官，以视各国商会用意，大相悬殊。”^①基于商约谈判的咨询需要，他怀着一种急不可耐的心情，迭发公函，要求严信厚等人于短时期内在上海组建一个名副其实的商会。

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呼唤之下，同时也在官方某种政治需要推动之下，中国第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商会在上海降生了。它就是1902年2月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由于年代久远，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没有遗留下完整的档案资料，仅在后来汇集刊行的《上海商务总会历次奏案禀定详细章程》中有一份章程草案，这当然是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借助于这份文献资料，使我们得以感受到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浓烈的近代化气息，完全不同于传统行帮团体那种仅知“供奉创业开山祖，每逢佳节共拈香”^②的活动方式和内容。显然，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由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一前所未有的商会团体事属草创，拟定的第一次章程草案也是受命急就，在当时国内尚无明文颁布的商会组织法规可遵循，只能大体参酌外国商会（特别是日本商业会议所）成例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就很完备成熟。该章程草案共列有六条内容，即（一）明宗旨；（二）通上下；（三）联群情；（四）陈利弊；（五）定规则；（六）追逋负。大体阐明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的宗旨、主要任务、近期和远期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按外国商会成例规定各种会议制度。但是，这样一份不够完备成熟的章程草案，却以其鲜明的倾向性，表达了代表当时

① 盛宣怀：《请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摺》（光绪二十八年九月督办商务大臣张之洞会衔），见《愚斋存稿》卷七，奏疏七。

② 顾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1，第15页：“各业公所”条。

时代进步潮流的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炽烈追求实现近代化的愿望。

第一，强调要为振兴本国商务办一些实事。章程明确宣称其宗旨是“一以商务为指归”，坚决摒弃以往一切“官场积习”、“纸上空谈”之弊，而要求切切实实地“互相考究”，“循序渐进”。其近期目标是把一向“和而不同”、“涣而不聚”的华商联合起来，争取裁撤病民病商的厘金恶税，修改进口关税税则，以保护华商的利益。因而对当时即将开议的中外商约谈判表示很大的关切和特有的热忱，把“应陈、应改、应争诸大端”，“按事详陈”，转达给主持商约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吕海寰、盛宣怀，以便据此力争应有的权益，“采入约章”；其远期目标则是瞩目于兴办各种层次的商业学堂或实业学堂，设立商品陈列所、博物院、工艺研究所，推广股份制，集资创设各类股份公司，制订各类工商法规，以及推动政府进行体制改革等等一系列具有战略性的措施，形成一整套便利商品和货币流通，培育和储备对外“商战”所需的工商企业人才，促进新产品和新的工艺技术的不断开发利用，革新工商企业组织和实施法制建设等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体系。

第二，强调要为尽速消除官商隔阂发挥桥梁作用。官商之间的矛盾隔阂由来已久，它是由中国封建社会按严格正名定分以区别所谓“尊卑贵贱”的统治秩序造成的。进入近代以后，虽然在欧风东渐、西学勃兴的影响和推动下，一向屈居末位的工商业者逐渐受到社会的重视，有了抬头的机会，但传统的价值观念依然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不仅官商殊途的状况依然严重存在，而且以官凌商、挟势盘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局面不改变，使官方难以获得工商界的经济支持，使工商界难以获得官方的政治保护。如同时人所说的：“中国官吏之薄待乎商，商之不信其上而疾告于无由上诉也，亦已久矣”^①；“且非特不能保护也，又从而

^① 陈炽：《创立商部说》，《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十，上。

抑勒之，剥削之，坐使外人之商权日盛，我国之贸易日衰，迄乎今日，已有难以挽回之势。”^①为了消除这一不利于近代化发展的社会症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章程在明定办所宗旨以后，就把“通上下”列为突出的专条，把“承起上下”，即所谓“上传官府之德意，下达商贾之隐情”列为自己的重要职责。为了取信于商界中人，不蹈官办商局的积习，在章程里特别强调“本公所既非衙署，且欲通官商之情，无论何商，即可便服惠顾，断无阂人禁阻”。为了吸引众商，广开言路，除确定各种形式的会议制度让各入会商董“抒陈所见”之外，对不列商董之名而愿至公所议事的一般商人，亦可“邀为议员之列”。这些规定和在实际生活中的贯彻，使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当地工商界范围内树立起“公所延见各商董，周咨博访，凡有益商家者，无不尽力维持，其虚怀若谷之情形，固与恃高位而睥睨一切者迥乎有别”^②的良好形象。

第三，强调要为“商战”角胜筹措良策。当时的上海，尽管得资本主义风气之先，但行帮势力仍有深厚基础。即使是新型的资本主义商业也未能完全摆脱行会的驾驭和束缚，这种行会性的同业团体，虽然也自发地抵制外来经济侵略，但其抵制行为，大都建立在封闭门户、固守传统经济秩序和行帮势力范围的基础之上；采取的抵制手段，是借助于地方官府出示禁令，阻止洋商开设行号直接收购原料或对不遵守行规的洋行“停止交易”^③。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则强调华商通过与洋商进行贸易交往，要学习和掌握经商贸易的“开通关窍”之法；强调兴利除弊，研究改良，筹措如何“敌洋产”、“挽漏卮”的良策。这个章程对日本和欧美各国商会“凡商务切己利害之事，无不参求详审，是以日见进步，年盛一年”的成效表示向往，明白昭告筹设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以日本商业会议所作为仿行的蓝本，无论是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会务活动大端，或是“准

① 《论变法不探其本之弊》，《申报》1903年10月11日。

② 《论国家设立商部事》，《申报》1903年9月23日。

③ 参见《中国经济全书》第5册，第284、290—292页。

备施行的一系列振兴商务的措施，无不体现出当时上海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对近代化的强烈追求。

对于这个在当时熠熠生辉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中散发的近代资本主义气息，人们据此论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是中国第一个商会大都并无异议，但是对于上海商业会议的组织构成，由于缺乏完整的资料，仅凭当时盛宣怀《核定商业(会议)公所初拟章程批复》的公函中所言“另就南北市各行业各举商董议员二人”^①，而对其性质产生一些错觉，对其究属是一种行会的集合体还是已经是具有近代格局的商会难以确切判断。我在参与编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主持编写《上海总商会史》这两部著作的过程中，获得了日本同行提供的一份完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员名簿。这一重要历史资料收录于明治三十七年(1902年)六月间出版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编印的《清国商业习惯及金融事情》一书内，是当时东亚同文书院组织在读学生对上海商业组织、商业习惯所作的实地调查报告。这一中国近代史领域内重要历史资料的发现，澄清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长期来若明若暗的历史迷雾，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内长期阙如的史料空白，从而使我们得以具体了解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组织构成的真实情况，了解这个团体的性质、特征以及上海工商各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的差异。

根据现在掌握的有关资料，当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有两重领导机构，一为由5名总董组成的权力机构，所谓“权归总董”，这是因袭旧有的组织领导体制；另一为由1名总理、2名副总理、13名议员组成的办事机构，这可能是参酌国外商会成例略有变通而确定的新的组织形式。其他由若干行帮或企业推举的代表作为一般会员，并不限定额数。总董产生程序不可得知其详，总理、副总理、议员一般均由会员互选公推，但主要领导人需经官方审核批准，为便于国内外史学界同行研究分析，今将经过我加以综合整理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组成人员情况列表以示之：

^①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农工商部商务司档案。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组织成员一览 (1902年)

| 职别 | 姓名 | 籍贯 | 官衔 | 代表行业或企业 | 主要企业 (投资或经营) | 其他身份 |
|--------|-------------|------|-------------|------------|-------------------|---------------------|
| 总董 | 严信厚 (筱船) | 浙江慈溪 | 花翎二品顶戴候选道 | 四明公所、南帮汇业 | 源丰润银号、通久源轧花厂、纱厂等 | 上海商务总局商务总董、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
| 总董 | 唐杰臣 (荣俊) | 广东香山 | ? | 广肇公所 | 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美商怡和纱厂等 | 英商怡和洋行买办 |
| 总董 | 梁钰堂 (荣翰) | 广东高要 | 花翎二品顶戴江西补用道 | 徽帮茶栈业 | 永泰源茶栈 | 南洋筹捐彩票局总办 |
| 总董 | 陈润夫 (作霖) | 江西清江 | 花翎二品衔候选道 | 南帮汇业、江西会馆 | 天顺祥票号、宝善斋、江角官书局 | |
| 总董 | 朱葆三 (佩珍) | 浙江定海 | 三品衔候选道 | 五金洋货业、四明公所 | 慎裕五金号 | 平和洋行买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
| 总理 | 严信厚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 副总理兼提调 | 周金箴 (晋龢) | 浙江慈溪 | 花翎二品顶戴江苏试用道 | 四明公所 | 通久源轧花厂 | 后任上海电报总局任职 |
| 副总理 | 毛祖模 | 江苏太仓 | 候补道 | ? | ? | 后任商部通艺司郎中 |
| 议员 | 施子英 (则敬) | 浙江吴江 | 花翎二品顶戴候选道 | 丝业会馆 | 震昌丝号 |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
| 议员 | 朱葆三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 议员 | 谢纶辉 | 浙江余姚 | 同知衔 | 北市钱业公所 | 承余钱庄 | |
| 议员 | 陈润夫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
| 议员 | 梁钰堂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 议员 | 袁泳笙 (在兴) | 浙江镇海 | 花翎四品衔候选同知 | 平水茶业公所 | 永吉茶栈 | |

续表

| 职别 | 姓名 | 籍贯 | 官衔 | 代表行业或企业 | 主要企业 (投资或经营) | 其他身份 |
|----|-------------|------|-------------------|-------------|---------------------------|-------------------------------|
| 议员 | 苏宝森 (德麟) | 浙江鄞县 | 花翎三品 衔候选知 府 | 洋货业公所 | 成记洋货号、恒记 钱庄、成丰永金号 等 | |
| 议员 | 唐杰臣 | (见前) | ? | (见前) | (见前) | (见前) |
| 议员 | 王眉伯 | ? | ? | 汇业公所 | ? | |
| 议员 | 袁子庄 | ? | ? | 华俄道胜银 行 | ? | 华俄道胜银行买办 |
| 议员 | 李云书 (厚祐) | 浙江镇海 | 四品分部 郎中 | 天一垦务公 司 | 天一垦务公司、天 余沙船号 | 商船会馆董事 |
| 议员 | 汪汉溪 | ? | ? | ? | ? | |
| 议员 | 张让三 | ? | ? | ? | ? | |
| 会员 | 严芝璋 (滢) | ? | ? | 上海轮船招 商局 | 上海轮船招商局 (董事) |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
| 会员 | 唐凤墀 | ? | ? | 上海轮船招 商局 | 上海轮船招商局 (董事) | |
| 会员 | 陈辉庭 (猷) | 广东新会 | 三品衔候 选道 | 上海轮船招 商局 | 上海轮船招商局 (总董) | |
| 会员 | 杨子萱 (廷果) | ? | ? | 上海电报总 局 | 上海电报总局 (提调) | 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
| 会员 | 朱子文 | ? | ? | 上海电报总 局 | 上海电报总局 (?) | |
| 会员 | 朱幼鸿 (畴) | 安徽泾县 | 浙江试用 道 | 裕源纱厂 | 裕源纱厂、裕隆面 粉厂 | 曾任浙江铜元局总 办、署理杭嘉湖道 |
| 会员 | 汤子庄 | ? | ? | 纺织厂 | ? | |
| 会员 | 许公若 | 浙江秀水 | | 丝业会馆 | 恒茂丝栈、许若记 丝号 | 买办(?) |
| 会员 | 杨信之 (兆鳌) | 浙江乌程 | 三品衔分 部郎中 | 丝业会馆 | 泰康祥丝栈、同康 泰丝栈等 | 意商延昌恒洋行、 义丰银行、荷商安 达银行买办 |
| 会员 | 顾勉甫 (寿乔) | 浙江 | 候选道 | 缫业厂 | ? | 无锡蚕业公所总 董、美商旗昌洋行 买办 |

续表

| 职别 | 姓名 | 籍贯 | 官衔 | 代表行业或企业 | 主要企业 (投资或经营) | 其他身份 |
|----|-------------|------|---------------------|-------------|-----------------|-----------------------------|
| 会员 | 杨台(印) 之 | ? | ? | 缫业厂 | ? | 美商旗昌洋行买办 |
| 会员 | 唐翘卿 (国泰) | 广东香山 | ? | 茶业会馆 | 谦慎安茶棧 | 英商汇丰银行买办 |
| 会员 | 唐简泉 | 广东香山 | ? | 茶业会馆 | 公洞祥茶棧 | 买办(?) |
| 会员 | 屠云峰 (成杰) | 浙江绍兴 | ? | 北市钱业会馆 | 寿康钱庄(经理) | |
| 会员 | 袁联清 (鑑) | 浙江慈溪 | ? | 北市钱业会馆 | 崇余钱庄(经理) | |
| 会员 | 刘杏林 | ? | ? | 南市钱业公所 | ? | |
| 会员 | 孙荻洲 | ? | ? | 南市钱业公所 | ? | |
| 会员 | 陈笙郊 (澄) | 浙江绍兴 | ? | 中国通商银行 | 延康钱庄(经理) | 中国通商银行首任 经理、北市钱业会 馆董事 |
| 会员 | 虞洽卿 (和德) | 浙江镇海 | 花翎二品 顶戴江苏 试用道 | 荷商荷兰银 行 | 荷商荷兰银行 (买办) | 曾任德商鲁麟洋行 买办 |
| 会员 | 邵琴涛 (廷松) | 江苏长洲 | 候补道 | 振华堂洋布 公所 | 大丰洋布号 | |
| 会员 | 林蓉卿 | ? | ? | 日商某洋行 | 日商某洋行 (买办) | |
| 会员 | 樊时勋 (棻) | 浙江镇海 | 花翎三品 衔江苏补 用知府 | 五金洋货业 | 义昌成五金号 (经理) | |
| 会员 | 叶洪涛 (志铭) | ? | ? | 五金洋货业 | ? | |
| 会员 | 丁钦高 (骏照) | 浙江定海 | 同知衔 | 洋广货业 | 锦章洋货号 | |
| 会员 | 阮宝亭 | ? | ? | 洋广货业 | ? | |

续表

| 职别 | 姓名 | 籍贯 | 官衔 | 代表行业或企业 | 主要企业 (投资或经营) | 其他身份 |
|----|-------------|------|--------------------|-------------|------------------------|-----------|
| 会员 | 焦乐山 (发昱) | 江苏丹徒 | ? | 南帮汇业 | ? | 大清户部银行经理 |
| 会员 | 陈子琴 (薰) | 浙江镇海 | 花翎五品 衔补用直 隶州 | 南帮汇业 | 源丰润银号(经理) 源通官银号(司事) | |
| 会员 | 李福告 | ? | ? | 西帮汇业 | ? | |
| 会员 | 阎九章 | ? | ? | 西帮汇业 | ? | |
| 会员 | 韦天圃 | 广东 | ? | 广肇公所 | ? | 英商麦加利银行买办 |
| 会员 | 周舜卿 (廷弼) | 江苏无锡 | 四品京 堂、候选 道 | 铁业公所 | 昇昌五金铁行等 | |
| 会员 | 陈瑞海 (祖烈) | 浙江镇海 | 五品衔候 选府经历 | 铁业公所 | 可积铁行(经理) | |
| 会员 | 韩云耕 | ? | ? | 煤业公所 | | |
| 会员 | 胡二梅 (琪) | ? | ? | 承办机器军 器业 | ? | 信义洋行买办 |
| 会员 | 周湘云 | ? | ? | 营造业 | ? | |
| 会员 | 孙荔轩 (多鑫) | 安徽寿县 | 花翎二品 衔江苏补 用道 | 阜丰面粉公 司 | 阜丰面粉公司 | |
| 会员 | 祝大椿 (兰舫) | 江苏无锡 | 花翎候选 道 | 华兴面粉公 司 | 华兴面粉公司 | 英商怡和洋行买办 |
| 会员 | 何瑞堂 | ? | ? | 造纸厂 | 造纸厂 | |
| 会员 | 程凝园 (鼎) | 江苏长洲 | ? | 衣业公所 | 程大隆衣行 | |
| 会员 | 席士廉 | ? | ? | 衣业公所 | ? | |
| 会员 | 张乐君 (嘉年) | 浙江鄞县 | 五品封职 | 豆米业公所 | 丰大米行、恒大米 行 | |
| 会员 | 杨菊生 | ? | ? | 豆米业公所 | ? | |
| 会员 | 陈莲舫 | ? | ? | 木商会馆 | ? | |

续表

| 职别 | 姓名 | 籍贯 | 官衔 | 代表行业或企业 | 主要企业 (投资或经营) | 其他身份 |
|----|-------------|------|--------------------|--------------------|-----------------|------|
| 会员 | 干兰屏 (城) | 浙江鄞县 | ? | 木商会馆 | ? | |
| 会员 | 严润田 | ? | ? | 商船会馆 | ? | |
| 会员 | 李泳裳 (厚垣) | 浙江镇海 | ? | 商船会馆 | 慎记沙船号 | |
| 会员 | 王瑞芝 (西锐) | 山东黄县 | ? | 各行装 载行、山东 会馆 | 怡顺昌报关行 | |
| 会员 | 贾润生 | ? | ? | 各行装 载行 | 同和公报关行 | |
| 会员 | 朱森庭 | ? | ? | 参药业 | ? | |
| 会员 | 董朗甫 | ? | ? | 参药业 | ? | |
| 会员 | 叶雨田 | 广东 | ? | 广肇公所 | ? | |
| 会员 | 梁纶卿 (应绵) | 广东 | ? | 广肇公所 | 同泰号 | |
| 会员 | 曾少卿 (铸) | 福建同安 | 花翎二品 封典候选 封道 | 建潮帮、海 味业 | 德发洋(货)行 | |
| 会员 | 李雪岩 | 福建 | ? | 建潮帮 | | |
| 会员 | 刘华亭 | 四川 | ? | 四川帮 | | |
| 会员 | 朱拱之 | 江西 | ? | 江西帮 | | |
| 会员 | 沈梅伯 (功章) | 江苏青浦 | ? | 典业公所 | 鸿裕当 | |
| 会员 | 姚涤源 (洪淦) | 浙江归安 | ? | 典业公所 | 恒大当、恒顺当 | |
| 会员 | 余鲁卿 (之芹) | 安徽黟县 | ? | 质业公所 | 万昌当、协泰当、 晋元当 | |

资料来源：据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编：《清国商业习惯及金融事情》，日文，第1卷，第115~120页和《上海设立商务公所文件》，《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10“商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综合整理。

注：毛祖模担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副总理，系根据东亚同文书院1902年的调查，其他日文资料中亦有记载，但国内所见有关函牍中未曾述及此人，疑未到任。但毛祖模确有其人，商部成立后，被任为该部通艺司郎中，不久又被弹劾而去职。毛祖模的原籍，据《香港华字日报》记载为江苏太仓县人，但《支那经济全书》第4辑，第11页记载为顺天府大兴县人，相去遥远，今从前者。

由于受资料限制，表内开列的一部分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能详知，但从可以稽查到的内容来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员以浙江籍占主要地位，其中尤以宁波府属各县的商人居多数。其从业范围限于一部分上海较大的行帮和一批崛起的近代企业，其中包括银行、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纺织厂、缫丝厂、造纸厂、农垦公司。在其领导层中，则主要是汇业、钱业、丝业、茶业、五金洋货业五大行业。这五大行业，即当时上海与进出口贸易联系比较紧密、握有的经济实力较其他行业相对较强的几个“大帮”。这个发源于上海的第一个商会，一创立就显示出它具有不同凡响的近代面貌，它荟萃了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业中的一批大行业，并有选择地吸取了部分传统金融业（其中汇业、钱业在当时均已发生趋新演变的倾向），构成了一个近代成份较多的行帮组织基础的框架，这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主体部分。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则是一些以近代企业代表身份列名议员、会员者，尽管他们所占比重并不大，但却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使初创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进一步增添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组织成份。

无论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组织构成来考察，或是从它所拟章程规定的宗旨、任务来分析，都足以反映出它是一个粗具近代格局的商会组织。虽然它同当时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还不是那样纯粹，而带有许多前资本主义的杂质，但其主要倾向和基本面貌已不属于传统行会组织，这是肯定无疑的。同时，我们也同样不要被表面形式上那种呈报官府备案和由官府札委任命商会总协理的例行手续所迷惑，产生所谓“官办”或“官督商办”的错觉，实际上，中国的商会是一种赋予近代内容的“商人自治”性的团体，也可以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为中国商会设计了一个近代“商人自治”的模式，并率先按这种模式进行着一系列开拓性的实验，它对未来中国商会的建设是有很大影响的。

二、绅商领导体制下的上海商会活动评析

总体上说,上海总商会(包括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1920年8月上海总商会大改组以前,属于以绅商领导体制为组织形式的时期,也可以称为商会的绅商时代,或商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具有亦绅亦商双重身份的“绅商”,是商会的领导力量,它决定了商会的发展方向和商会的举止行动。它在近代化进程中既有能够适应的一面,又有不能适应的另一面。上海总商会的第一阶段,典型地反映了这种与时代适应与不适应的特点。

如上所述,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一方面发展商务、振兴实业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另一方面则是在近代化的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其中一个重大障碍便是官商之间严重隔阂。这种状况,连以“通官商之邮”自命的张謇也深以为苦,他所主持经营的南通大生纱厂也因得不到政府的保护而坐视日纱的步步进逼,认为:“若官无利商之心,则官尊而苦商;商无利官之心,则商散而仇官。弊在不当隔而隔,欲挽其弊,须自官场决破一切壅隔始。”^①但是要由官府自破“一切壅隔”又谈何容易,“绅商”这个介于官、商两界之间的特殊社会阶层,无疑是消除官商隔阂的最合适的社会中介力量,然而仅靠绅商的个人行为是难以化解整个社会中壅隔之弊的。唯有集绅商一代人众擎之力,利用商会的群体组织力量,始有可能有效地发挥其中介作用,协调官、商关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商会的绅商领导体制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本是应清政府即将举行中外商约谈判的咨询需要而突击组建的,也可以说,商会来到世间,便担负起沟通官商联系的责任。当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绅商领导体制已

^①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四。

基本构成框架，以总董、总理、副总理为核心、以议员为骨干的领导层内，绝大多数都是既冠有较高的品位官衔又是某一行业的领袖、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头面人物，在未建商会以前，他们本已在局部的地区性行业范围内起着决定行业、主宰命运的作用。而当这个绅商阶层联袂组合到一个近代“商人自治”组织的共同体中的时候，绅商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中介作用也就从一业一帮注入到这个商界新的共同体内，形成为当时商界所悦服的绅商领导体制。体现于中外商约谈判中的官、商两界的协调配合，可以说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后的第一次成功尝试。当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一些领导人曾邀集各业商董聚会集议，对修订进口关税税则事宜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大家认为：在谈判中应从实际出发，“惟是不随不激，务求两得其平”。他们经过权衡，向盛宣怀等提出进口税率“可加至值百抽十或多至十二五”^①的谈判方案。这个方案使正陷于被动而焦急万分的盛宣怀等有了一个大致可以在谈判时作出让步的范围和应争利权的尺度，从而奠定了一系列商约谈判的基础。而从消除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的角度看，也可以说是我国自有商会以来第一次作出的努力和显示的成效。

当清政府及后来的民国政府一度有所振作、实施有裨商务发展和实业振兴的经济政策，亟需工商界支持的时候，上海商务总会和改组后的上海总商会有力地发挥了通达上下、联贯官商的作用。最突出的事例是1910年间举行的南洋劝业会和1912年召开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通过上海商会中一批绅商的带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宏大的官商合作、共谋振兴中华大计的热潮。

同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赛会，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体体现优胜劣败的实业竞争的产物。从19世纪80年代起，各资本主义国家定期举行各类商品赛会的活动层见迭出，蔚然成风。当时的中国，经济落后，起步甚晚，间或参加国际商品赛会，也只

^① 《香港华字日报》1902年3月12日。

是由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洋人一手包办，任意拣选一些传统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以及有损我国民族形象的模型送展。1908年7月间，两江总督端方拟在南京举办一次较大规模的南洋劝业会，派人去上海商务总会发动工商界“赞成斯举”，并踊跃认股和精选国货产品参赛。这是一个推动民族工业发展，也是一个有利于消除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的好机会。当时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对此是相当卖力的，总理周金箴偕同议董虞洽卿等一行9人专程赶赴南京谒见端方，磋商由官商合作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具体事宜，并勘察会场地址，同时当场认定商股15万元。虞洽卿还担任了这次南洋劝业会的副会长，作为会长端方的有力臂助。在筹备期间，上海商务总会实际控制了南洋劝业会董事会（设在上海）的活动，这个董事会共13名董事，其中8名是上海商务总会委派的代表充任的，包括总理周金箴、议董朱葆三、严子均、丁价候、苏葆笙、陈子琴、祝大椿、席子佩^①，具体负责为南洋劝业会筹集股款、征集赛品等事宜。同时还相继成立了一个由著名绅商李平书主持的上海协赞会和由时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兼沪南商务分会总理的著名绅商王一亭主持的上海出品协会（又称“上海出品所”）。1910年2月间，上海商务总会还特地向海内外各埠商会发函，招徕各埠华商踊跃将当地最佳的出品送会陈赛。由于上海商务总会的积极推动，上海协赞会、上海出品协会的尽职尽责，这次参加南洋劝业会的上海出品人（国货厂商）代表共125名之众，他们送展的一批代表当时中国工业制造水平的产品，具体体现出作为“全国通商大埠”、“人民麋聚”、“生产聚会”的特色^②。

民国建立后，上海各业民族资本家最为关心的大事，并不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亟盼新政权百废维新，开创出一个促使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局面。有些绅商因参与上海起义，

① 《南洋第一次劝业会》，日本《通商汇纂》第34号，1910年10月1日。

② 《上海出品人代表祝辞》，《申报》1910年6月18日。

作出过一些贡献，在沪军都督府成立后担任某些重要职位，但他们一则因办事棘手，再则也无意宦海生涯，故大都功成身退，重操旧业。但他们对商务的发展，实业的振兴，商学的研究，商情的调查，商法的制订，商会的联合，以及减轻税捐负担、保护工商企业等等问题，则极其关切；对于推派代表参政议政，特别是参与政府有关工商立法和振兴商务、实业的会议，更是倍感兴趣。1912年9月间，北京政府工商部发出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拟通过这次会议，“合全国之人合力以谋”，“聚而各贡所知，各呈其能，甲省可以稔乙省之情形，政府可以通商民之情谊，捧结既坚，进行自易。……归而各庀其工，对内则一业有一业之专家，对外则一物有一物之抵制，散为万株，合为一本。”^①这种官、商两方聚首一堂、共商国计的会议方式和旨在矫正弊害、排除障碍，以推动实业振兴的图谋，对当时工商界是很有吸引力的。上海总商会的一些绅商头面人物对这次会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理周金箴把这次会议看作是工商界又一次向政府“请愿”的机会。协理王一亭亲自偕同议董印锡璋、沈联芳代表上海总商会赴京出席会议。行前广泛征集各业条陈、意见，并携带电报密码，准备在会议期间随时与上海总商会在沪领导人对有关工商界重大问题“发电协商”。作为上海总商会首席代表王一亭认为，此次会议首先要沟通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联系，使政府的经济政策符合工商习惯，上情下达，上联下贯，才能不生梗阻，可臻工商业之发达。“万一部定之范围不合于工商之习惯，即不能实行。工商界有所要求不能上达，即徒抱虚悬”。所以他把这次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称之为一次“上下交通之机会”，“必须上下继合”，才能真正办成一些实事。他认为如果“部定之商法有窒碍难行，

^① 《工商部召集临时工商会议通知书》，见1913年2月北京政府工商部编，《第一次临时工商会议报告录》。

可以驳正，则商人亦自应条议各种办法，以备采择。”^①

出席这次全国临时工商会议的正式代表共152人，上海总商会总理周金箴、议董朱葆三以及上海实业界后起之秀、恒丰纺织新局总理聂云台作为特邀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数以百计的提案，内容集中于关于商会法、设立工商访问局、推广纺织业、创设交易所、奖励出口茶叶公司实行茶叶保育政策、组织丝业公司直接运丝出口，实行裁厘加税等工商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出席会议的上海总商会代表分别就上述问题阐明自己的意见，“均得部中嘉许”^②。但是工商部在会后对于振兴实业、发展商务却未见有什么大的动作，许多语重心长、切中时弊的提案大多辗转迁延，很少有切实解决问题的下文。这当然是使工商界感到遗憾的事。可是作为一次通达上下、联络官商的交际之会，也可以说是取得某些成效的。

上海总商会为消除官商隔阂所作的努力，更多地反映在为商民渴求减轻税捐重负的请命中间。这类下情上达的请愿或抗争活动，充斥于上海总商会与官府往还的大批函电中间。自清末任意加征各种附捐附税、权算锱铢的苛虐行为，到民国建立以后依然如故，严重困扰着工商界。据有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几年内历年征收货物税的预算，“视诸旧额，殆有过之”。1912年度征收货物税的预算金额为3658.4万元，到1916年，增加到4600万元，均超过清末历年的征收额^③。当时的上海县境内，“税所林立，仍逞前清竭泽而渔之手段，其病民病商，视前清为尤甚”^④。即使当民族工商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减轻了外国资本压力的情况下，也仍难以挣脱国内厘金苛索的镣铐。来自上海各业各帮商人和全国各地商会吁请上海总商会出面同政府交涉，要求减轻

① 《（上海）总商会大会记事》，《申报》1912年10月2日；又见《上海总商会议案录》1912年9月28日第七次常会记录。

② 《上海总商会办事报告》1913年2月15日全体会员大会记录。

③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第626-640页。

④ 《民国上海县志》，卷三。

税捐负担的函牍积案盈几，为商民请命，成为上海总商会责无旁贷的任务。

民国初建，由于财政极度困窘，一时间百税咸举，名目繁多，甚至捐及至苛至细的米、麦二项。而米、麦乃民生之必需，一经开捐，直接影响到广大民众的日常生计和社会安定，同时也影响到工商界的经济利益。当时的上海总商会为此连续召开大会，与各业、各帮商董共商对策，决定推派议董陈润夫、祝大椿等为代表，专程赴苏州、南京，向苏省当局和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请求豁免米、麦二捐，以解救商民困厄。他们“呼号求救，亦已舌敝唇焦，声嘶力竭”。上海总商会还专门给江苏省议会致送了一个呈文，指责苏省税务局挖空心思捐及苛细的决定，认为“米麦向无征税，江苏为之作俑”，“殃及小民粒食之艰难”，要求省议会各议员“推己饥己渴之心，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①。及至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上海总商会又会同民生国计会、公民急进党、共和建设会、华侨联合会等十数个团体以及直接因米麦捐开征而被累的上海几家机器面粉公司给袁世凯发了一个呼吁电文，指责米麦捐是“虐政翻新，变本加厉”，表示对这种把过去各业为义军助饷的自动“乐输”行为变成强加于各业头上的明定“常捐”决不能甘心接受，要求“通电各省，凡有米、谷、杂粮等项捐税，一律撤消”^②。

经过上海总商会与其他各团体一起协力抗争，到1912年6月初，总算有了一点着落。但苏省当局仅核准暂免征收米麦捐一个月，这也不过是慑于当时众怒难犯，稍为推迟一些征收时间，握在他们手里的税捐绳索是决不肯轻易放掉的。何况当时法制不健全，地方当局根本用不着通过立法机关、立法程序，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巧立税捐名目或增加税率，因而商民不胜其害，为了缓解

① 《豁免米麦税之呈请书》，《申报》1912年4月7日。

② 《申报》1912年3月12日。

官、商之间在税捐问题上日益尖锐的矛盾冲突，上海总商会在当时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精力致力于此类的抗争活动。

反对苏省产值并征、货物附税等任意增税加捐的抗争差不多持续了三四个年头。1914年6月间，当上海总商会获悉江苏省财政厅决定自1915年7月1日起实行货物税产销并征的消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电财政部、农商部，请转饬国税厅筹备处“从速取消，以顺舆情”，同时又直接致电南京国税厅筹备处，要求“暂缓举行”^①。可是北京政府非但不予采纳，反而对上海总商会严词训斥。财政部的复电公然说什么“事关整顿税务，岂容商民干预”，甚至不惜罗织罪名，指称上海总商会“遽行电阻，希图破坏”，汹汹然扬言“如再有会议阻抗情事，即惟该会是问”^②。上海总商会并不理会这种虚声恫吓，不屈不挠，继续抗争；同时借助于上海新闻媒介，对财政部无视商民正当政治民主权利、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以势压人的行径进行严词批驳，指责北京政府“加税加捐，纷然杂起，罗掘之策已无微不至”^③。苏省产销并征的余案未了，货物加征附税二成的风波又起。各业商人一次再次齐集于上海总商会，“群情激动，无可劝导”。上海总商会会同沪南商会几次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指出：“今日何日，乃旧税未除，新税迭增，苛捐巧取，层出不穷，脂膏已竭，何堪再剥？”要求政府当局收回成命，“稍恤商艰”，否则商民惟有“辍业待毙”。电文中还告知：由于米商风闻加税，“来源裹足，沪上存米不满四万石，食户众多，日销万石，民食攸关，现状危迫”。4万石存米只够4天消费，一场因食米告罄而酿成的社会恐慌已经一触即发。这是极其严峻的社会现实，是一个万分危急的信号。北京政府再顽固，也不能不认真考虑货物加征捐税的严重后果，所以只得急电苏省当局，通知苏厘附

① 《上海总商会议案录》，1914年6月20日第十二次常会记录。

② 《再志产销并征问题》，《申报》1914年7月1日。

③ 《加税感言》，《申报》1914年12月21日。

加二成“缓办”^①。

上海总商会在税捐问题上的抗争行动是很频繁的，其成效则并不一样，或被政府拒而不纳，或促使政府有所感悟，稍作变更。但不管怎样的结局，这类抗争行动至少可以在官、商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使政府对商民的艰困有所了解，对商民的呐喊有所入耳，使一些窃居朝位的专制余孽漠视民瘼、践踏民主的行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有所收敛。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绅商一代人借助于上海总商会这一活动场所在消除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近代化建设扫除了一些前进的障碍物。应该说，绅商领导体制下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完成了自己肩负的这一历史任务。

但是，消除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仅仅是为推进近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气氛，而不是近代化建设本身的内容。论理说，商会在作出了上述努力以后，就必须向着预定的近代化建设目标进行开拓，作出新的建树，可是绅商一代人由于受到自身素质条件的限制，却迈不开经济近代化的步伐，以致当近代化已经成为工商业者的最迫切要求时，绅商领导体制下的商会却反而步履艰难，趑趄不前。这种强烈的社会反差，在上海这个首开近代风气的大城市里尤为明显突出。

从清末近10年间和民国初期的近10年间，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的活动基本上停留在协调各方关系的交际事务中间，对于近代化目标的实现，一直是口惠而实不至。连一个商品陈列所，也迟迟办不起来。1910年间，当时的社会舆论就已批评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人“终年奔走官场，恭维显宦”，“未见其提倡一实业，挽回一权利，凡商会中应行研究调查改进诸方法，从未稍一措意”^②。这些尖锐抨击之词，虽然曾在上海商务总会领导层

① 《请免加征货物税之第二电》，《申报》1916年1月3日；《农商部歌电》，
《申报》1916年1月6日。
《上海商务总会箴言》，《时报》1910年12月20日。

内引起一些震动，但却未见有什么明显的改进措施。尽管当时工商界一些有识之士不断向商会领导人献计献策，可是依然是公文旅行，圈来转去，停留在原地踏步的状态。到1920年，经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洗礼的上海工商界，举着双手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他们对当时上海总商会领导人那种徒知“拘守定章”、“墨守成规”的凝滞状态越发不能容忍了。要改革，要进步，这是当时一股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社会革新潮流。社会舆论向这些执掌上海总商会权力而不能把上海总商会推向前进的绅商领导人发出警告，指责他们抱残守阙的知识已经陈旧，思想观念和原有的办事经验亦已不能顺应世界之趋势，“若不问世界之趋势若何，仍以数十年前之旧脑筋、旧眼光办理数十年后之新事业，未有能立足于世界者也”^①。这确实是击中了绅商领导体制下上海总商会的要害。

于是，由崛起于当时上海工商界的一代新人、崭露头角的上海近代企业家来取代绅商一代人在上海总商会的领导地位，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近代企业家为上海总商会 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于“五四”时期的“佳电”风波^②，迫使当时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双双引咎辞职。1920年8月，长期处于群龙无首状态的上海总商会进行了换届改选。从表面上看，这次改选与以往并无什么不同，但实际上这是一次极不平常的事件，是上海总商会权力机构新旧交替的一次历史性大改组，是上海商会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① 《总商会今后之希望》，《申报》1920年8月24日。

^② “佳电”风波，指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佳日）背离全国民意，公然发出主张直接同日本交涉归还青岛的电文，由此引起公愤，当时社会舆论纷纷予以抨击。

在这之前的18年内，上海商会都按期进行过许多次正常的换届选举，每次改选，大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议董选退下来，而更换另一批绅商继任新一届议董，象走马灯似地循环周转。名义上是为了“以均劳逸”，实则是均衡上海绅商阶层内部的权力分配。换来换去，你唱罢时我登场，原有的盘根错节的绅商领导体制并未有丝毫触动。可是1920年8月间的一次上海总商会改选就不同了。改选结果表明，不但已成为众矢之的朱葆三、沈联芳被挤出领导层，而且原有的33名会董竟有31人落选。在这次改选的前一年，上海总商会内部就已发出“改良总商会”的呼声，认为“商会之于商界休戚相关，利害与共，乃历年来总商会一事不办，一味与官僚派接洽，与吾商界其如秦之视越，暮气太深，官派太重，麻木不仁，非一日矣。以历年来商界金钱之供奉，养成‘文虎’、‘嘉禾’之奖章^①，此次‘佳电’风潮发生以来，商会之名誉信用价值大为减色”，要求各会员“重行选举明哲之才，将来于会务之应兴应革，商界之兴利除弊，锐意改良”，若仍于“旧会董中推举会长，则换汤不换药，终无兴革良好之希望”^②。这次上海总商会改选的结果，充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人士变革旧制、追赶时代的社会心态。通过这次改选，前面提到的上海实业界后起之秀、著名的棉纺工业资本家聂云台当选为上海总商会新会长，富有改革精神的钱业领袖秦润卿当选为副会长，一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成长起来的工业资本家、航运业资本家、银行家，充实到上海总商会内部，并有不少人进入领导层，以近代企业家组成的新阵容取代了原来的绅商领导体制。

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看好经过大改组之后的上海总商会。《民国日报》发表“时评”指出：“总商会向来被顽固者把持，最近几年，周金箴、朱葆三三两人更把总商会弄得糟透了。去

① 指民国初期上海总商会某些领导人因抵制二次革命，被当时袁世凯政府颁奖嘉勉。

② 《江确生之改良总商会意见》，《申报》1919年7月25日。

年曾有剧烈之反对，终未能摇动。而此届选举，竟能将向来把持势力完全推翻，可见商会会员具有改革之决心”；“以前的总商会既不满人意，才有今日选举之结果，则今后总商会之进行，自有一番新标准。”^①英文《大陆报》认为原来的上海总商会中“非绝无热心改革之人，不过众醉独醒，革新之谋，终不能抵消多数守旧派之势力耳”，表示瞩目于上海总商会新领袖任职后能作出“一番大事业”。^②

确凿的历史事实表明，进入本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总商会开始了它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也可以称之为上海总商会的企业家时代。这个新时期，是以摆脱原来“拘守定章”、“墨守成规”的守旧落后状态，逐步适应近代化的社会革新潮流为标志的。

当时，新组成的以近代企业家为主体的上海总商会，不但在组织上刷新了自己的面貌，而且按照预定的近代化建设目标充实了本身的经济职能。特别是在20年代前半期的若干年内，上海总商会采取了一系列适应经济近代化要求的革新措施，那几年是上海总商会历史上最为开放、最为活跃也最有成效可睹的历史时期。

新组成的上海总商会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八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自己的职能机构。这八个专门委员会是：财政委员会、陈列所委员会、图书馆委员会、出版部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公证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华商道契委员会。在这八个专门委员会中，工业资本家、银行家、航运业资本家与商业资本家处于平分秋色的地位，特别是为推进经济近代化而新设的陈列所、图书馆、出版部三个专门委员会内，工业资本家、银行家、航运业资本家担任着主要角色。正因为上海总商会起用了这批近代企业家，让他们在这些专门委员会里有职有权，擘划经营，才使得以往长期悬而不决的一些重大会务建设事项，真正脚

① 《今后之总商会》，《民国日报》1920年8月9日。

② 转引自《申报》1920年8月24日。

踏实地向前推进，作出显著的成绩。

筹办经年一直难见天日的商品陈列所终于在聂云台、秦润卿主持上海总商会不久正式开办。这个商品陈列所并不限于上海一地，而是敞开胸怀，面向整个中国，广泛“征求各省方物，陈列一堂，俾资比较而励观摩，复求改良以供参考。且遇外洋采运，既可作样品广告之场，欲求国货推销，尤当尽说明介绍之责”^①。其口气之大，用意之深，直欲摩清末全国性的南洋劝业会和民初全国性的国货展览会之肩而上之。尽管上海开办商品陈列所的时间落后于北京、天津等地十多年，但一经开办，即后来居上，显示出经办人的巨大魄力和气吞山河的陈列规模。从1921年12月到1923年10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上海总商会附设的商品陈列所连续举办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货展览会，即1921年12月1日开幕的综合性国货展览会，1922年10月6日开幕的丝业专门展览会，1923年10月开幕的分门化学工艺专门展览会。

第一次综合性国货展览会包罗美术工艺品、饮食品、农林园艺产品、机械工业品、染织工业品、制造工艺品、矿产品、水产品、化学工业品、药品、科学仪器、皮制品共12个门类，“所陈方物如天产人造各种类悉由征集而来”，展出一个多月。观众累计6万余人，颇受各界人士的赞赏和中外研究家的重视。具体负责此次展览会的秦润卿认为：“陈列所一比赛场耳，我工商业有出品陈列于斯者，上焉者，当业精于勤，勿自封故步；次焉者，当更改为贵，勿墨守成规。学有专门，理无止境，但能刻苦自求，何不可称雄海上。所幸工商界顺时应势，急起直追，为中华民国特放异彩。”^②

第二次以全国蚕茧丝绸产品为内容的丝业专门展览会，既是谋求丝业改良的重大举措，又是为次年参加美国纽约丝业博览会

①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一次）报告书》，1921年自印本。

② 《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一次）报告书》秦润卿序，1921年自印本。

作充实准备。因为这次国际赛会，对居我国出口商品的大宗——丝绸产品来说，是一次提高产品质量、了解国际市场需求、扩大外销的好机会。上海总商会要求丝绸各业各帮不要错失良机，把这次丝业专门展览会当作参加国际赛会的预演，“物品务求其美，制造尤望其良”，不仅为展览会增彩生色，并使明年赴美参赛的各类国产丝绸产品“于海外增其声价”^①。由于动员深入，准备充分，展览会集中了国内15个省区300余家厂商的两千多种丝绸精品，“或品物精良，或染织优美，荟萃多省之精华，供作一堂之展览”^②，奠定了赴美参赛的基础。

第三次以分门化学工艺为内容的专门展览会，是本着下列宗旨举办的：“盖以吾国工艺正在萌芽，全国所需日用之品，泰半皆系来自外洋，而于化学工艺品类尤为充斥。利权坐失，伊于胡底。惟是化学工艺品类繁多，范围甚广，兹仅就国内各工厂商号所有出品中择其物质显著亟须研求而易为工业之促进者分门征集，以供展览而资提倡”^③。也就是说，这次展览会以国内消费需求最为广泛而市场又长期为洋货侵夺的化学工业品列为征集展览的对象，企望通过向社会公开陈列展览，激发工商界对化学工业品的投资热情和大力开发国产化学工业品的竞争意识，使国货在这一领域内也能逐步替代进口，夺回失去的市场。说明此次展览会也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虽然拟议中的下续几次展览会因受社会大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未能办下去，但已办的这三次展览会的成就在当时社会上已给人们深深地留下了志在振兴中华的不可磨灭的爱国形象，在工商界激起一阵阵“国人愈爱国货，国货愈宜精良”的革新浪花。

① 《商品陈列所为丝业专门展览致各业领袖函》，《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5号。

② 《呈报农商部本会所第二次展览会赴美赛会各情形文》，《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2号。

③ 《第三次展览会呈农商部备案文》，《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

上海总商会兴办的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也相当成功。负责筹办及领导商业图书馆工作的专门委员会的阵容是很坚强的。这一工作在当时得到了上海图书出版发行业的同业团体——书业公所和上海出版界最大的两家企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有力支持，使白手起家的商业图书馆的藏书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多和充实。据统计，仅在1923~1924年的两年内，该馆先后接受上海及外地各书局、机关团体、个人捐赠的书刊共1579种，4478册，来馆阅览各类书刊的读者群每年平均约4万至5万人次，它已成为上海一大批锐意进取、奋发图强的工商业者及其子弟徜徉书海、寻觅近代科技、管理知识的重要活动场所。

上海总商会开办商业补习学校的本意，原“不过为养成本会事务员而设”，并不准备向社会开放。可是临近正式开学之际，“商界青年子弟之闻风而至，要求加入者络绎不绝”。这一新的形势，冲破了商业补习学校原定的施教范围，也开阔了上海总商会领导人培育企业人才的视野。他们决定因势利导，修改原定方案，公开向社会表示愿“与商界诸君同其利，而不私于本会”，把商业补习学校的施教面一下子推向整个上海工商界。这样一来，大受工商界人士及其子弟的欢迎，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渴望。在办校过程中，上海总商会很重视师资力量的配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校方根据学生原有文化知识基础，分设若干班级，伸缩修业期限，而且注重学用结合，讲求应用实效，“凡商业上应有各科，搜罗既备，审择尤精，教授诸君又皆大学毕业名流，循序施教，成效因以大著”。特别是办校的商会会董一般都着眼于“商战”需要来积极培育各类工商企业急需的人才，指导思想非常明确。1924年间新任商业补习学校校长徐可陞以充满强烈国家观念的激情向上海工商界人士指出：“上海沿江海要津，为世界第二通商巨埠，诚一商业竞争之地、人才角逐之场也。况当列强欧战之余，元气俱伤，方期振长策于亚东，藉懋迁以资补救；我国革新而后，利权未辟，亦拟塞漏卮于境内，因抵制以图改良。两

相接触，时势了然。则是商战之暗幕已开，孰为优胜，孰为劣败，胥于人才卜之矣。”他根据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欧战创伤愈合以后又重新激烈争夺中国市场的现实状况和国内工商企业人才缺乏、素质低下、难以适应新的“商战”形势的严峻局面，强调商业补习学校要以培育“商战”中所需人才为宗旨，一切教学计划的安排，“务使青年于公余之暇补习世界商业之知识与技能，且以增长商人之道德而稔知商业之习惯，俾他日肆应有余”，使学校真正办成向社会源源输送“商战中之人才”的一个重要教育基地。正是基于这一具有战略远图的办校方针，该校的施教方式灵活多样，在校就读的学生除由导师“按时上课以外，更有（商品）陈列所可备参观，有（商业）图书馆堪资研究，又不时请商界名人演说，或电映各国实业状况，以感动学者（学生）之耳目，而印入其脑筋。”^①

尤其值得推重的是，当时上海总商会经过与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商科大学的紧密合作，把商业补习学校纳入到全市职业教育的轨道。在组织上，商业补习学校仍归属上海总商会领导，而在教学业务上，则接受由三方代表组成的上海商业补习教育会的具体指导和安排。通过这种开放性的横向社会联系，商业补习学校的师资质量、社会功能和教学水平均大大超出上海总商会一个社团力量所能承担的范围和发挥作用的程度。这所并不十分起眼的商业补习学校在当时实际上成了企业人才的储备库和输送地，正如校方总结中所说的：“比及三年毕业而任商界要职者已不乏人，亦云盛矣。”^②

还有一个突出的建树，就是于1921年7月间正式出版发行了一个内容充实、思想性强、深受国内工商界人士欢迎的自办刊物——《上海总商会月报》。它作为一种“商业经济之专门杂志”推向工商界，同时也作为上海总商会唯一的重要舆论喉舌，向全社会表达

^{①②} 均见徐可陞：《商业夜校弁言》，《上海总商会月报》第4卷，第10号。

上海各业资本家乃至全国工商界的阶级声音。这个刊物有一个强有力的编委领导班子，拥有一批由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专栏作家，还有一批经验丰富、办事认真、活动能力较强、工作效率较高的采编队伍，以及比较完善的能在一定程度上沟通国内外商情的信息资源和信息网络。它辟有专论、译述、丛载、商学、国内外商情、工商调查、统计资料、工商新语、会务记载、名人传记等深受读者喜爱的栏目，每期内容都经过精心组织，精心编排，体现出较强的经济专业性和现实针对性，体现出上海总商会明确的办刊宗旨，即指导商业社会，提倡学术研究，搜集参考资料^①。在“专论”栏内先后发表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王祉伟、郭秉文等一大批专题论文，对工商界急切希望澄清扑朔迷离的变幻时局和经济形势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当时企业界对于政治局面、经济现象、社会思潮皆“有明白的了解，应付之主张”。成了“企业界之指针”。

“商学”栏内也佳作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各种有质量的专题性工商调查和统计资料，使一向对商情较为隔膜 of 工商界人士的眼界为之一宽，并从而增强了他们的信息观念和掌握利用信息的经营手段。“名人传记”栏内连续介绍中外著名实业家的成功道路，在工商业者心目中矗立起一座座为之倾心仰慕、步趋效法的丰碑。这一系列贴近时代脉搏、丰富多彩、言之有物、引人入胜、开启心扉的文字内容，确实对当时工商界人士起到了较好的舆论导向作用。而具体体现于《上海总商会月报》中上海商、学两界“水乳交融”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来“商自为商，学自为学，商鼓胶柱之瑟，学成面壁之谈”的“隔膜”局面，在推进近代化建设的总目标下，各具所长的商、学两界在上海开始发生化合效应，知识和经验的互补，“使商界收集思广益

^① 郭秉文：《总商会月报一周（年）纪念》，《上海总商会月报》第2卷，第7号。

之利，而学界有坐言起行之机”，在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上海总商会有力地发挥了它联贯于商、学两界之间的穿针引线的作用。

然而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得很不彻底，残存的封建专制势力在徒具虚名的民国政府里依然可以作威作福，肆意妄为。而社会上民气、民力的急剧高涨，又促使上海总商会进行的自主活动，从经济领域伸展到当时统治者视为禁脔的政治领域，从原来一般性的呼吁请愿发展到直接干预内政外交活动；从干预政治发展到提出“国民自决”的政治主张和组织“民治委员会”这样近似组织政权机构的活动，这就触犯了当政者之大忌。于是，一双双企图限制社会团体自主活动的手纷纷向上海总商会伸来。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为了贯彻其集权统治的“训政”意图，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素在工商界享有较高声望的上海总商会继续象以往那样不受政府约束和节制地任意干预政治甚至作出抗命行为或染指政权等与国民党中央意旨不相协调的行为。他们甚至不顾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上海各业资本家在国民党政权建立前后竭尽全力的经济支持和附和反共的效忠“党国”行为，还是一巴掌打下去，蓄意罗织种种罪名陷上海总商会于“非法”。最后在所谓“整理商人团体”的名义下强行解散上海总商会，而另行组织由官方直接控制和驾驭的上海市商会。从此，商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名存实亡，商会基本上处于听命于官方摆布的从属地位。尽管它在以后的岁月里还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一些并不显眼的角色，但是象以往上海总商会时期那样演出一幕幕富有时代气息的历史场面，则在以后的社会生活里一去不复见了。

（责任编辑：夏良才）

（作者徐鼎新，1931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隗 瀛 涛

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一些思考,对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近代重庆发展的原因与特点等方面的问题作过一些探索,有一些初步看法。现将这些思考与看法提出,谨向读者们求教。

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

城市史学作为历史学和城市学相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兴起于本世纪20年代前后,至60—70年代在国外,城市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以城市史为题的团体、刊物、著作、会议和课程大量涌现。但总的说来,城市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还很不成熟,尤其是城市史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了完成本课题的研究任务,我们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了如下探索。

(一) 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意义

1. 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建国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比较偏重于政治斗争史,对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研究则比较薄弱。我们认为,开展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不失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入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首先，可为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特征和复杂局面提供新的视角。从总体上讲，近代中国是一个过渡的社会形态，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运动过程：一方面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逐渐从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演进，从闭关自守的孤立状态向世界开放转变，其重要特点是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同步进行，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使近代中国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思潮都呈现出复杂矛盾的特色。近代中国城市是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集中点，其半殖民地化较深，其近代化水平也较高，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近代城市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城市，便可以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过渡特征和复杂局面提供新的视角。

其次，可以为目前近代史学界争议颇大的一些问题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近代中国城市既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又是西方近代文明输入的窗口；既是封建势力盘踞的政治中心，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场所。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诸如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关系、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等等，在近代城市更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在不同的城市，这些问题会有共同的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共同的和不同的特点。那么，通过对近代中国城市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分析，便有可能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再次，可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提供研究成果。中国近代史研究需要拓宽研究领域已是史学界同仁的共识，加强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也为更多的学者所赞同。城市作为一个综合的实体，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内容，而在以往的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研究中，因研究的范围分属不同的专史，其研究虽可在各自的领域深入细致，但却难以做到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把原来分属不同专史的研究课题放在城市这个综合实体中进行整体性研究，必

然会注意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既能为各门专史的深入提供成果，又能弥补专史研究的不足。

2.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①。在我国的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城市的发展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就难以准确地把握和认识当前城市的发展及其问题。当代中国城市是古代中国城市尤其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近代城市发展中的—些规律性因素和条件在不同程度上仍影响至今。例如从城市体系的布局看，近代中国地区之间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至今仍有影响。近代以来，城市发展明显地表现为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因近代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业畸形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些沿海城市迅速崛起并繁荣，相反—些内地城市的发展却出现后滞乃至衰落的趋势。这种东西部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建国以来有了较大的改变，内地城市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这既有自然地理的因素，也有历史遗留的因素。如何使东部沿海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带动内地城市的发展？如何使内地城市凭借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克服地理和历史的局限而发展起来，并进一步促进沿海城市的对外开放？这些问题都需要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入手，寻求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

（二）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城市史无疑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但城市是一个众多因素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容了一个社会所有的现象。如果不能确定它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就很难抓住城市发展史的主题，也就不能显示城市史研究的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69页。

特色。近代城市史和其他历史著作相比,应具有不同的特色,既不同于以政治为主要内容,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一般编年史,也不同于仅探索某一特定领域的专门史,更不同于旨在整理、研究、保存史实的地方志、城市志,应该是综合研究一个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近代化的历史。我们写的《近代重庆城市史》就不是一般的重庆近代史,而是重庆这个内陆山城近代化的历史。

关于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国内外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将城市史列为社会史的分支^①。我们认为把城市史仅仅视为社会史的分支不尽妥当。社会史是一个涵盖面很广的领域,其本身的学科内容国内外尚无定见,把城市史仅作为社会史的分支,难以显出城市史研究的特色。城市社会虽然是城市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但还不能说是城市史研究的全部内容。

我们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首先是这有利于揭示城市发展最基本、最重要的规律。因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总是具有不同的城市结构,而不同的结构又决定了城市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各种功能的形成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城市结构的变化。城市的结构和功能一般是由简单初级形式向复杂高级形式演变,探讨这一演变过程,不仅能揭示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且能够揭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其次,比较明确地与城市志、地方志划清了研究界线。城市史和地方志、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研究的内容。再次,可以比较直接地为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历史依据。这一作用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因

^① 见《世界新学科总览》第441页,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

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城市的性质。所谓城市的性质，即是城市的最主要功能所决定的城市的根本性特点，也可称为“城市的个性”。城市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历史形成的结构和功能为依据的。因此，探索城市结构功能的发展演变，认识其历史优势和历史局限，才能增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科学性。

为了进一步明确城市史研究的基本内容，还有必要区分两种类型的城市史，一种是以国家或地区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如中国近代城市史、长江上游城市史等，姑称之为“群体城市史”；一种是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如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武汉城市史等，姑称之为“个体城市史”。这两类城市史研究的内容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群体城市史”应着重研究城市体系或城市群体的总体结构和总体功能，“个体城市史”则研究某一城市的具体结构和具体功能。

城市的结构和功能是多种多样的，又是发展演变的。近代中国城市史又应该重点研究城市在近代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结构和主要功能。近代中国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 城市地域结构。地域结构是城市的基础结构。城市的各种功能总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实施。城市地域结构的基本内容是城市功能的空间配置问题。中国古代城市因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城市地域多呈四方型，城市中心区是皇宫或官府衙门，城市以井字式建街道并划分坊、市、里、巷。这种四方型的地域结构在近代开始被打破，随着近代工商业在城市的发展，地域结构出现了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城市中心逐渐由商业区、服务区占据。这种变化在近代崛起的新兴城市中尤为明显。

2. 城市经济结构。城市经济是城市产生发展的基础，是制约、影响城市结构功能变化的重要因素。城市和农村相比，其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有较为复杂的经济结构。因近代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在城市的发展以及近代城市基础设施的出现，使

近代城市经济结构较之古代城市发生了较大变化。研究城市经济结构不仅要分析城市中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变化，还需要从总体上，从相互联系中考察各种产业的结构和配置问题。

3.城市社会结构。是指城市社会体系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和古代城市相比，近代城市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诸如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比重增加，阶级结构中新兴阶级的出现，社会组织中业缘关系逐步取代血缘、地缘关系，社会流动增加，社会价值观强调变革、效率、进取、竞争等等。

近代城市的功能较之古代城市同样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主要的特征和趋向是城市的经济、文化功能日益加强。在一些近代崛起的沿海、沿江城市，其经济功能已逐步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一般地讲古代中国城市中政治功能占主导地位，其经济、文化功能多依附于政治功能，由于政治功能凌驾于其他功能之上，便限制了城市其他功能尤其是经济功能的发展。近现代城市由于商品交换范围扩大，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城市经济功能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其他功能也日臻多样化和复杂化。近代教育、新闻、出版业在城市的出现促进了城市文化功能的增强。随着城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的发展又引起城市政治功能的变化。近代重庆是四川同盟会的中心，武昌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区，上海是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大本营，都显然与这些城市近代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的成长有直接关系。城市政治功能最重要的变化则是城市行政管理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传统的向近代化的演变过程。

（三）近代中国城市的西方影响和半殖民地化问题

中国城市近代化是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的。近代城市既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中心，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发展的道路，城市结构和功能的演变以及近代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与中国内部应变相结合的错综

复杂的历史过程。既是封建城市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的过程，同时又是逐渐从中世纪城市向近代化城市演变的过程。

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必然涉及近代中西关系。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关系的基本点是外国侵略中国，中国被迫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接受或采用外国的文明。侵略成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刺激了中国城市变化，开始了曲折的近代化过程。欧风美雨对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在客观上起了“孵化”作用，同时又起了压制作用。中国城市的近代化不能只视为欧风美雨孵化的结果，还要看到中国人为适应新局面所做的近代化的努力，要看到城市人民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等活动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些活动使得城市近代化有了进步，又或多或少地阻止了城市半殖民地化、殖民地化的过程。

近代中国城市半殖民地化的特征主要有：

1. 城市结构和功能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过程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如城市中外国租界的设立和扩大，改变了城市的地域结构和管理结构，外国工厂、公司、银行的设立和增多，改变了城市的经济功能等。

2. 城市的畸形发展和布局的极不平衡。从城市体系的角度看，沿海沿江的一些城市因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据点而膨胀迅速，广大内地城市则又多数发展缓慢；大城市的畸形繁荣和中小城市的落后。从城市的内部结构看，市中心和个别社区畸形繁荣，而多数社区又十分落后，拥有众多的贫民窟。

3. 城市中民族资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活跃。

4. “城市病”流行。城市失业人口增多，嫖、赌、吸鸦片烟等城市犯罪不胜枚举，绑票、凶杀，城市治安混乱，这种社会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和买办所庇护、纵容制造的。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奴化文化也在城市里蔓延。如最大城市上海，

“因名副其实地被当作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之一而闻名”^①。

（四）近代中国城市史的基本线索有两条相互推进、相互制约的主线，一是近代城市化过程，二是城市近代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观，不仅建立在分析城市内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分析城乡分离、对立运动的基础上。这种城乡分离、对立运动“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②。这一运动最基本的规律，在古代是“城市乡村化”，在近现代则是“乡村城市化”^③。因此，用城市化作为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一条主线，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近代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

城市化的定义和内涵至今尚无一完整统一的解释。我们理解的城市化具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人口流动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的过程，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的增长。2.地域景观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状态在地域范围的扩大，城市数目的增长。3.经济领域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第二、三产业在空间上向城市集中、聚积的过程。4.社会文化方面的城市化现象，即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普及。

近代中国城市化的过程既符合马克思讲的一般规律，是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后才加速的，同时又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城市化速度缓慢、程度不高，空间上不平衡等等。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又伴随着城市近代化过程。中国城市近代化也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时间早而近代化迟，城市的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等。

近代中国城市史虽然以这两条主线作基本线索，但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

第一，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史中，这两条主线应有所侧重，全国或区域城市史可以侧重于城市化这一线索。重点探讨全国或区

① [美]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

域城市体系中人口在不同城镇中的分布、密度，城镇的层次、空间分布，城镇的经济类型、产业布局以及城镇之间的社会经济的联系。以某一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史则可侧重于城市近代化这一主线，重点探讨城市结构功能的近代化过程。

第二，这两条主线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表述上的方便。实际上这两条线又是同一历史过程，城市化本身就是近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而城市近代化不过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反映。当然，也应该看到在近代中国，乡村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并非是一致进行的，比如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并非是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造成大量农村相对人口过剩，从而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集中，而是由于农村经济破产、农村人口压力加重所造成的“流民”涌向城市。结果城市人口虽然增长，而人口素质却没有相应的提高。

（五）近代中国城乡关系问题

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城市史研究不能仅仅孤立地研究城市本身，必须扩大研究的视野。国外一些城市史专家已经提出“纯粹的城市现象”是不存在的，主张在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城市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分析，不仅建立在城市内部矛盾运动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剖析城乡分离、城乡对立运动的基础上，特别注意城乡的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说：“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以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①从城市发展史看，随着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在西欧，中世纪是“乡村在经济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统治城市”^①，到了近代，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已经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②。所以，西欧城市史中城乡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城乡的社会分工以及乡村土地权力与城市货币权力的对立。在西欧，封建领主居住在农村庄园中，凭借分封制度和庇护制度占有土地，用租税等形式剥削农村。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权力逐渐成为摧毁封建特权的武器。土地权力和货币权力的日益对立，导致了由城市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业主等组成的市民阶级的兴起，他们通过赎买乃至武装对抗，取得城市自治权，封建阶级则日益衰微，终至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并取得胜利。

但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城乡关系则有不同于西欧的特色。

第一，在古代中国城乡之间并没有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工。如同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③。古代中国的农村，不仅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在农村小市场上又活跃着手工业和商业，而不象西欧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同时，城市中的工商业虽较农村发达，但仅是以满足封建阶级的消费为主要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农村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城市市场的繁荣主要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不必是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为在这种交换中，农村流入城市的产品，尽管也经商人之手，但大半是单向流通，没有回头货与之交换，不是真正的商品。”^④

第二，没有西欧那种土地权力和货币权力的尖锐对立，而农村地产与城市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是相互转化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更突出的对立运动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

④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第13页。

城乡封建统治阶级和城乡农民、手工业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不象西欧那样是市民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对立和斗争。

第三，城市在中国的地位，往往不是经济起决定作用，而是政治起决定作用，至少首先是政治、军事地位决定了城市的设置和发展，随后才是为政治、军事服务的经济的发展。

第四，没有西欧的城市自治和市民阶级的产生。

近代中国城市既然是历史上城市的发展，在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些与西欧城市和城乡关系的不同历史特点。在近代，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及中国内部资本主义的成长，城乡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城市经济功能有所发展，并对农村地区发生了较为广泛的幅射和吸引力，扩大了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如在四川，就初步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从城市到乡村的商品分销网和原料购销网。其次，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有了较明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机器工业大多集中城市，而城市工业所需的原料，市民生活物质的供应又主要来自农村。

但是，也应该看到，即使到了近代，中国传统的城乡关系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仅是有了一些新特征而已。一般地讲，近代城市的政治功能仍占相当重的地位，城市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政治统治的中心。其次，城乡的矛盾，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城市不仅在政治上压迫乡村，而且通过乡村中的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剥削乡村，使乡村破产。在城市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城市工人失业倒回农村，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负担。结果，城市的发展没有更多地带动乡村的发展，反而加剧了城乡的差别。再次，城乡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双向交流运动。例如，一方面城市的近代化因素对农村产生了影响，或多或少地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变迁；另一方面，乡村落后的、中世纪的封建因素又不断地向城市渗透，或多或少地阻碍着城市的近代化。再如，城市对乡村的压迫和剥削，加深了乡村的贫穷落

后，延缓了乡村城市化的进程；广大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存在又使城市近代化进程受阻。

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始终没有占统治地位，自然经济如同汪洋大海，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中国近代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过程缓慢，远远没有象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逐步实现了“乡村城市化”，还只能说尚处于“乡村城市化”的过渡状态中。直到1949年，我国城市人口仅仅占全国人口的1/10的低比例，与唐代中国城市人口比例相等。这不能不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落后的一个标志，也是近代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城市经济是以资本主义大生产为基础的，对农村的影响很大，也在许多方面依赖农村（如销售市场、原料市场及农副产品市场等），特别是近代商业城市向工业城市转化，更须以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为前提。城市工业的发展必须以该城市近郊、至少是附近地区农村经济商品化的发展为基础才有出路。在近代交通运输力量有限和封建关卡尚存的条件下，如果没有附近地区的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是很难与帝国主义竞争而立住脚跟的。可以这样讲，城郊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往往是衡量该城市近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按照列宁的分析，只有农民成为小商品生产者，才有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基础，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助手。所以，对农村经济，首先是近郊或附近区域农村自然经济解体状况的考察，对于该城市近代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特别着重考察附近地区农村经济与该城市工商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与影响，并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对研究今天城乡关系，市管县体制都有积极意义。

所以，在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不能仅局限于探讨城市本身的发展，而必须从城乡关系的更广阔的背景来探讨城市的发展；也不能局限于个别城市的研究，应在个别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一个区域甚至全国的有代表性的城市作比较研究，对城市体系、城乡网络进行整体的宏观的考察，由点及面来弄清近代中国

城市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这也是我们研究国情，促进城乡改革、城乡结合共同发展战略所需要的。

二、重庆城市近代化的过程

重庆城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过程，即由城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的近代化过程（或称近代历史时期的现代化过程）。

（一）因商而兴——由城邑到城市

“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①重庆是一个因商而兴的城市。

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周朝时为巴国国都。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设巴郡，郡治在江州县（今重庆市），张仪在此筑城，作为秦王朝统治川东地区的军事、政治据点。三国蜀汉时期，江州仍为巴郡治所，都护李严屯军于此，筑大城，周围十六里。隋、唐、宋时期称渝州。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光宗即帝位，升“潜藩”恭州为府，名重庆。

在古代的漫长时期内，重庆及附近地区，其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嘉陵江中游地区，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上也是“不学少儒”。自隋唐迄北宋为朝廷贬谪流放罪犯之地。因地势险要，重庆长期只是一个高垒深墙的军事城邑和区域统治中心。

经过隋唐时期汉人与少数民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到宋代，因生产力有所发展，重庆才开始由有城垣的城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的城市渐进。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前期，更是重庆城市形成的重要阶段。

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重庆乃征战之地，所受破坏更加严重，“民靡有遗”。清朝在四川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1页。

立统治地位后，为了恢复四川经济，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移大量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等省无地或少地农民入川垦荒，使四川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耕地面积迅速扩大，粮食大幅度增产，经济作物产量增加，井盐、制茶、制糖、矿冶、陶瓷业皆有发展，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为重庆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条件。

当时，重庆——汉口——苏州的长江航线，是米、木、盐、棉、布、洋广杂货的交流主干。这条主干道上的商品流通，具有长距离运销、全国性流通的性质。川江（即长江宜宾到宜昌段）的航运主要是在清代因经济发展的需要开拓的。长江上游的商运以水路为主体，长途贩运往往以河流为依托，与沿河城市串通，形成了以重庆为枢纽的商业贸易网络。川江主要支流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都是粮、棉、糖、盐产区，汇流而下，集中重庆再转运汉口。重庆是长江东西贸易主干道的起点，又是长江上游商品集散中心，从而大大增强了商品吞吐量和城市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能力，并通过长江交流主干道与全国范围的流通网络连接起来。

转口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展，促进了重庆城市商业的兴旺，重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贸易，吸引了大量商业性移民。商业人口比重在某些街区已超过了官僚、地主、军队、僧尼等人口的比重了^①。在鸦片战争以前，重庆已是一个人口较多且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方向发展，成了长江上游最大的，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业性城市了。

重庆自古就是川东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四川东部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清代，重庆的教育是比较发达的，到19世纪末，重庆城先后建有书院19所，这些书院为传授儒学，准备科举服务。此外，重庆城还有不少私塾，承担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重庆城市的文化教育职能日益显露。

重庆自宋代开始的城市化过程，经历了近9个世纪，直到清朝才基本上走完由城邑到城市的发展道路。就城市类型而言，古

^① 见《重庆城市研究》第1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代的重庆是一个商业城市。从地理上形成的水运优势是四川各地所不能比拟的。古代重庆因水运而商盛，商盛而城市兴。因此，充分地开发和利用长江、嘉陵江的水运，发挥自己转口贸易的优势，站住长江连接上游“天府之国”，中游“鱼米之乡”，下游“金三角”的枢纽位置，仍是今日建设重庆所必须重视的问题。

（二）跨入近代门槛

1. 从封闭到开放

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过程，是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开始的。

重庆因其地理和古代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和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引起了为开拓世界市场而奔走于全球的以英国为首的外国资产阶级的密切注意。开辟重庆市场成了有远见的外国资产者深入中国腹地，占领西南市场的战略决策。中英《烟台条约》有关川江门户宜昌开为商埠，重庆府可由英国派驻寓官查看川省英商事的规定，英国实现了开放重庆的第一步。1890年，中英《烟台续增专条》正式规定“重庆即准作通商口岸”。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891年3月，重庆正式开埠，向世界市场开放。自此以后，洋领事、洋行、挂洋旗的木船和乘风破浪的轮船越来越多，洋货输入量越来越大，作为工业原料的土特产品输出也越来越多。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重庆传统商品市场性质的深刻变化。如果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主义的近代生活史，那么，重庆的开埠就揭开了重庆城市的近代生活史。

从1875年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重庆进口货值呈不断上升趋势。其中洋货进口总值上升的情况是：1875年15.6万海关两，1891年4360557海关两，1911年12559400海关两，1929年14510871海关两^①。进口洋货以洋纱、洋布为大宗。外国商品通过重庆冲击西南。

^①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501—50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重庆市场被迫由封闭而开放，不仅使洋货进口不断增加，而且刺激了土货的出口。土货出口总值由1885年1056790海关两上升到1916年17803414海关两^①。出口货中的蚕丝、白蜡、猪鬃、牛羊皮、鸭毛、羊毛等全部或部分销往国外的。这些土产作为工业原料出口，四川地区已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原料市场，从而加速了农副产品的商品化过程。由于我国工业落后，农副产品中的大部分原料很少被利用，价格也低，甚至弃而不用，一当外国人插手经营，这些冷门货顿时身价百倍。在利润的引导下，农村商品经济渐趋活跃，民族资本经营的山货买卖和加工业以重庆为中心得到发展。

考察重庆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进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重庆城市的商业贸易功能的明显扩大以及重庆城市商品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四川（包括重庆）与外部交换的传统商品结构是：以粮食为大宗，兼及少数丝绸、夏布、药材、山货、糖、盐，与江浙湖广等地的原棉、土布以及少量手工业品交换。重庆开埠后，以1891—1898年为例，洋货的进口值与土货进口值的比例为4.27：1。传统的湖广土布、手工业品已逐渐被洋纱、洋布、洋杂货所取代。至于出口货丝、茧、白蜡等，有一部分已开始向外国出口；新增的品种因国外市场需要而发展较快；猪鬃、羽毛、羊毛等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可见，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外贸商品结构基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外贸商品结构。四川经济与国外市场发生了联系。当然，在中国被列强侵略的大局下，这种联系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屈从依赖于外国的。但是，这种变化明确表明，封闭的重庆市场已转向开放。世界性的商品交换，使重庆既开始走向世界，又增强了自己对四川和西南的经济能力。城市的开放性是城市近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开放使城市一面半殖民地化，一面近代化，这是旧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轨迹。

^①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第501—50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重庆出现了一批新式商人。这些新式商人与前资本主义的商人是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是依附于封建生产关系，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基础的。新式商人的商业活动已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它从属和服务于产业资本，并从产业资本那里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重庆的新式商人尽管还有某些封建商人的痕迹，但他们经营的进出口贸易是从属于和服务于外国产业资本的。清末民初，新式商人经营的进口商品多是外国的机器制品，已不同于原来的中国城乡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经营出口山货，则与洋行和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受制于国际市场，其购销活动已开始纳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近代重庆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商人的资本积累，并主要依靠这些新式商人从外商口中分得的余沥。这批新式商人虽靠外商余沥以肥己，但他们作为中国商人，需要对更大利润的追求而与国内同业和洋人争夺市场，为此，他们举起了民族主义旗帜，提出了“商战”的口号。1904年10月成立的重庆总商会，是四川的第一个商会，也是全国较早设立的商会之一。它是重庆商业发达，商人的地位提高和近代意识增强，乘清政府行新政之机而出现的。重庆总商会发出“登高一呼，直唤四百兆同胞共兴商战；纵目环顾，好凭数千年创局力挽利权”^①的号召，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重庆新式商人的呼声，所表现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是农业小生产者所无，而是近代城市企业家所应有的。

2. 从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性经济中心转变

工业中心是重庆城市在近代才具有的新功能，也是重庆向近代工商城市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表征。重庆因深处内陆，开埠较晚，近代工业起步的时间比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城市要晚二三十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庆的近代工业才开始出现。在重庆，近代工业首先发生在火柴业，随后扩及丝纺、棉织、玻璃、采

^① 《广益丛报》第5年，第4期，“纪闻”。

矿、航运、电灯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手工工场或近代工厂以及近代金融的产生和近代教育、近代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使重庆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单纯的商业贸易中心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呈现出日益近代化的趋势。

19世纪末到抗日战争前的40余年，重庆近代工业从无到有，重庆城市初步改变了单纯的商业中心态势而向既是商业中心又是工业中心的大城市进步。抗战前的重庆近代工业已在较广泛的部门和行业产生，机器生产有了发展，钢铁工业、机器工业、化学工业、水泥制造业也开始出现。据国民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下册统计，到1933年，重庆共有近代工厂和手工工场415家。又据《四川经济季刊》统计，到1936年，四川所有工厂和手工工场共583家。我们用1933年的重庆数据与1936年的四川全省数据相比较，重庆的工厂（场）数占全省工厂（场）数的71%，资本数、工人数皆占全省的2/3。重庆显然是四川工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

近代重庆工商业的发展要求金融业的发展和近代化来支持。重庆最早的金融组织是山西人开的票号。随着重庆商业的发展，票号因不适应需要于辛亥革命以后纷纷歇业，让位给钱庄。钱庄的前身是“换钱铺”和“倾销店”。清末民初，重庆的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钱庄手中。1905年，四川出现了最早的官办地方银行“濬川源银行”，该行隶属于四川藩司，分设成都、重庆两行。但官方银行不办理私人工商汇兑。1909年4月，大清银行重庆分行成立，代理国库。辛亥革命以后，重庆银行业有较大发展，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中商业银行、中和银行等相继在重庆设立分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重庆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的第一家商业银行——聚兴诚银行^①。

^① 参见《聚兴诚银行》第2章，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在近代,重庆的交通运输,特别是两江航运有了明显进展。1911年以前,虽然外国侵略者野心勃勃地企图开辟川江轮船航运,但川江上下货物仍依赖木船运输。据重庆海关统计,20世纪最初10年中,重庆港常年进出口的木船约2万只,运输货物量约50万吨。辛亥革命后,外国轮船公司太古、怡和、日清、捷江的轮船相继入川航行。中国人在川江经营航运是由1908年成立的官商合办“川江行轮有限公司”开始的。民国初年,四川革命党人筹备成立了华川轮船公司。1926年,著名的民生轮船公司成立,揭开了重庆航运史的新篇章。卢作孚以小轮船“民生”起家,锐意经营,轮船从1930年的3只增加到1935年的44只,经营了川江航运业务的61%。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承担了长江上游70%以上的运输业务,航线由重庆延伸上海,并在宜昌、汉口、九江、南京、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①。在陆上交通方面,1928年重庆成立商办北川铁路公司。1936年修成北川铁路16.8公里,这条四川最早的铁路是运煤专线,对重庆、江北一带的煤矿开发起了一定作用。川黔、川湘、川鄂、川陕等公路干线亦于抗战前修成。重庆是这些公路干线的转运中心。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交通中心地位已经确立。

发达近代教育是城市近代化的动力和标志。1892年,重庆出现了四川第一所新式学堂——洋务学堂^②。1894年,美国教会在重庆创办求精中学、广益中学、启明小学。1898年,法人在重庆开办法文学堂。20世纪初年,清朝实行教育改革,重庆的留学运动和新式学堂应运而生。据统计,抗战以前,重庆已有公私中学20所,小学99所(加上郊区小学达396所)。1929年,刘湘创办的重庆大学,到抗战前夕已建成3院、10系、1个体育专修科,学生达720人,教职员196人(其中教授79人)。1936年,四川省教

① 《卢作孚与民生公司》，第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 民国《巴县志》第11卷下。

育学院由乡村建设学院改组而成，有两系一科，以民众教育为主，尤重乡村教育。至抗战前，重庆的近代教育体系已初步建立。

在近代报刊方面，从1897年《渝报》创刊1929到年重庆建市前后，大约有100家报刊先后问世。其中《渝报》、《重庆日报》、《广益丛报》、《重庆商会公报》、《新蜀报》等颇有名气。报刊这种大众传播工具是重庆近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重庆民主爱国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产物。它们的出现增加了重庆城市的信息传播功能。

在重庆城市向综合性经济中心转变的过程中，城市人口逐渐集聚。在20世纪初年，“重庆人口现时估计约30万人”^①。1932年，重庆城市居民已有499693人^②。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重庆建市已势在必行。1929年，正式置重庆市，定为省辖市，潘文华任市长。划定重庆的范围除巴县城区外，还包括江北县城附近和南岸部分地区，设江北市政管理处，南岸市政管理处，开始了重庆地跨两江的布局。到1933年，全市面积共187平方里^③。成了西南地区近代化最早、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

（三）内迁而盛，成为多功能中心城市

抗日烽火连天，民族灾难深重。中华子孙同仇敌忾，开展了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一时，灾难、奋斗、牺牲的血与泪洒满重庆。日寇步步进逼，国土大片沦丧。炮火把国民政府赶到了重庆，炮火将沿海、沿江的工业、人力、财力赶到了重庆。历史的机遇终于降临。重庆开始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进步。因内迁而盛，救国而兴，重庆成了人所共知的名城，登上了城市近代化的高峰。

1. 从区域性中心城市到全国性中心城市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全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一方面，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住重庆宣言。1939年5月5日，

① 《重庆海关税务司1892—1901年十年报告》。

② 《重庆海关税务司1932年报告》。

③ 《重庆简史和沿革》第84—85页，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1年印行。

又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直隶行政院。1940年3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组织同盟国中国战区。次年1月2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等地盟军作战。另一方面：1938年10月，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由武汉迁来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重庆成了有重要国际地位和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城市。

2. 城市经济功能空前发展

中国的政治中心迁渝不仅大幅度升高了重庆的地位，而且也推动了重庆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逼使我国工业布局进行大调整。国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不得不动员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工厂大批内迁。于是，我国原有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便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统计，抗日战争中，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其中有700万人迁移到四川，有100万以上人员迁移到重庆及其附近沿江地区^①。有400多家工厂迁渝，加上为适应战时需要新建的一批工厂，使重庆全市工矿企业增至1690家，工业职工达10万人，占当时“国统区”工厂总数的1/3^②。重庆的工业结构由轻工业为主转变成以重工业为主，同时兵工、机械、冶金、采矿等行业占较大比重，初步建立门类比较齐全、力量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抗战时期我国最重要、最集中的重庆工业区。

这一时期，钢铁与机器工业的发展最令人注目。抗战开始

① 《重庆抗战纪事》第12页，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重庆年鉴1947年》第3页，科技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7年版。

后，进口钢铁来源断绝，军需与众多的工厂的重建扩建又需大量钢材，在重庆建立钢铁工业成了各方面重视的焦点。据1942年“重庆金属冶制工业同业公会”统计，重庆共有会员工厂22家，其中炼铁厂18家、炼钢厂4家（未入会者还有2家）。至1943年底，增加到26家，资金总额达4.6亿多元^①。

抗战时期，重庆是整个大后方的钢铁生产基地。最高年（1943年）产钢约4万吨，占后方全部钢产量约5万吨的80%^②。尽管仍然十分薄弱，但是促进了西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为重庆成为近代工业中心奠定了基础，重庆因此成为“国统区”最大的兵工基地，兵工署属的第十、二十、二十一、三十一、五十等5个兵工厂皆在重庆。同时也带动了重庆近代机器工业的猛进。

重庆的机器工业是战时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据《陪都工商年鉴》记载，重庆机器工业，1940年底已有185家，资本7948万元，技工4200人。到1942年底，增加到436家，资本17388万元，技工11762人，各种工作母机2400台，业务兴旺，在整个大后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战时重庆的动力工业首推天府煤矿。1943年，拥有各种车辆100余辆，各种船只156只，正式职工5000余人，年产煤352131吨，占当时“国统区”机煤产量66万吨的53%，成为后方最大的煤矿公司^③。

战时的交通运输以长江水运为主干，以民生轮船公司为魁杰。1942年，民生公司拥有大小轮船116艘，3.6万多吨位，占后方轮船吨位的90%以上，职工近万人，成了后方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

战时，重庆人口激增，各类商品需求量大，社会游资增多，促进了重庆商业贸易和金融业的繁荣。据统计，抗战时期，重庆

① 《抗战时期重庆民营工业掠影》，《重庆工商史料》第5辑，第53页。

② 《重庆商务日报》，1943年12月《重庆战时经济大事记》。

③ 《民生档案》、《天府概况》。

的大小公司、商店有27481家，各商业同业公会123个。金融业方面，1943年10月底，重庆的银行、钱庄多达162家，其中银行总行37家，分支行89家，钱庄银号36家^①。当时的重庆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城市的近代化，从根本上讲，首先要生产力的近代化。特别是在旧中国，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是农村和城市长期停滞在中世纪的根本原因。对于城市，生产力要近代化又首先必须工业近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是近代文明城市的物质基础。重庆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整体看，它仍然处于大后方强大的自然经济的包围中，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依靠内迁的他力和由内迁产生的带动力，工商业盛极一时，城市的经济综合功能迅速扩大，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的影响，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发出了强大的辐射推力。这正是近代中心城市必备的中心作用。

3. 城市教育文化空前繁荣

城市的近代化不仅需要经济的近代化，而且需要科学文化的近代化和思想意识的近代化，即人的素质的近代化。抗战时期，重庆学校密集，人才荟萃，文化发达，思想进步，这是重庆城市近代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

抗战前，我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多和平津沪宁等地。抗战发生后，这108所高等学校迁到四川的有48所，占战前“国统区”高校总数的44%^②。抗战时期，重庆有高等学校近30所，还有一批中学、中等师范学校迁来重庆。北碚对岸的夏坝，小龙坎，磁器口的沙坪坝，江津的白沙镇形成了三个学校文化区。外省学校的迁渝，使重庆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教育层次和教育水平大为提高。一批著名专家教授都到重庆执教，将一大批爱国

^{①②} 王斌，《四川现代史》第275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忧民、勤学奋进的青年培养成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一代骨干力量。许多学校师生频繁地开展坚持抗战救国，反对独裁倒退的活动，使学校成了爱国民主阵地，影响及于社会。

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事业也空前繁荣和进步。从武汉迁来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战协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等全国性抗日爱国团体，在抗战救国的旗帜下，以争取民族自由与解放为宗旨，团结文化战线各方面力量，推动了大后方文化的进步与繁荣。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领导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利用合法地位，团结“文协”、“剧协”、“青协”等团体，开展多种文化学术活动，使重庆文化学术昌明，民主潮流上涨。在“文工会”的委员、兼任委员和各组工作人员中，有国内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艺术家等。他们或著书立说，或讲学传道，或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在大后方文化运动中起着青年导师、舆论先声的作用。

重庆的新闻出版广播事业在战时有很大发展。大型和有影响的报社达20余家。《新华日报》是进步舆论的主导。出版事业方面，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主要出版质量较高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出版大量古典文史书籍，正中书局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出版教科书及国民党政治书籍，生活书店出版进步文学、哲学等社会科学书籍。1942年，重庆每月出版书籍81种，占全国图书出版数量的1/3，杂志66种，占全国杂志出版数量的1/4^①，堪称知识生产中心和信息传播中心。

抗战时期，我国学术文化的精华多集于重庆。以此为中心的学术文化震波，波及整个大后方。这对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学术文化不发达的后方人来说，无异是一次大学习，大启蒙。科学文

① 《新华日报》1943年2月1日。

化知识的传播，无疑会提高人的知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提高人的素质。这是社会进步、城市或农村近代化的关键。

4. 城市民主潮流空前高涨

抗战前的重庆是一个缺少民主空气的城市，到了抗战时期，这种情形有不小的改变。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使民众的主体意识有所增强。抗日时期，重庆成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中心。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在重庆进行了民主党派的组建工作。1941年7月19日，由一批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织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1944年9月14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又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改称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2月16日，由民主工商业者和一部分同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由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组成的九三学社，亦于1945年9月3日组成于重庆。还在1941年，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在重庆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自1944年上半年起开始在重庆吸收成员，开展活动。这些民主党派的组建，反映出重庆民主势力的增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两件大事都发生在重庆：一、重庆谈判的举行，二、政协会议的召开。民主与独裁，和平与内战，国共两党由合作到分道扬镳，都在重庆的政治舞台上拉开了帷幕。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潮流仍在重庆继续发展。

三、近代重庆城市兴起的特点和问题

考察近代重庆城市的发展，我们发现可从地理环境、成长动力和演变过程等三方面来概括其特点：

1. 从地理环境看，重庆处于中国东西部的结合点，内接腹地、外联江海，地位十分重要。从小环境考察，重庆是四川与外部联系的一个重要枢纽，“重庆者，四川之咽喉，而扬子江上流

之锁钥”^①。四川的地理环境特殊，四周皆高山峻岭环绕，与外部联系主要依赖长江水道；而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的交汇处，乃四川水道之总汇，成为四川交通与航运的中心。由此衍生的主要经济活动有：（1），四川的商业贸易中心；（2），四川的工业基地；（3），四川的金融中心。从大位置考察，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成为西南与华中、华北、华东及国外联系的枢纽。由于重庆居于东西部结合点，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外部的洋货、国货要进入西南，大都需要经过重庆，重庆成为西南的门户。省际的人口流动，往往在这里聚集，然后再往西部疏散。由此衍生的经济活动主要有：（1），长江上游最大的洋货分销中心；（2），长江上游最大的土货购运中心。重庆在四川的小位置和在全国的大位置都有利于它的发展。

2. 从成长动力看，重庆在近代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外力又起了主要作用。世界各国的中世纪城市向近代资本主义城市转化，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内部结构变动引起城市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城市性质的变化。另一种是由于城市外部力量的直接作用，使城市功能发生变化，进而导致城市结构的变化。这种由外力引起的变化，一般不是从工业化开始，而是从商业贸易开始。由于是外力影响的结果，所以演变过程是突变的。中国沿海沿江的新兴城市基本上是属于这种发展模式，重庆即是其中之一。但应指出处于腹地的重庆，“外力”并不是单纯指外国势力，实际上可分为“东力”（指国内四川以东各省的影响）“西力”（指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两种，两种力量都推动了近代重庆的发展。开埠以后，“西力”影响显著，抗战时期，“东力”作用突出。

3. 从演变过程看，起步晚，发展快，呈突变型，特别得益于抗战内迁的强刺激。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这在中华民

^① 金沙《四川贸易谭》，《四川》第2号。

族历史上是一个苦难的标志，但对重庆城市来说，却是兴盛的机遇。如果说开埠是重庆城市兴起的契机，那么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渝则是重庆城市兴盛的关键。在短短的几年内，重庆城市呈跃进式、突变型发展，经济空前发展，文化巨大进步，城市的地位很高，城市的作用显著，城市的贡献也大。从城市功能看，它是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其综合性经济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也大大增强，政治民主空气亦有所激扬。当时的重庆在全国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外有些人士是在抗日时期才闻重庆其名的。从城市结构看，这时，重庆形成了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到大渡口，沿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到綦江的工业区。这是当时后方唯一的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为主干的综合性工业区；形成了北碚、夏坝、沙坪坝学校文化区。还因避日机轰炸，机关和居民疏散而形成的歌乐山、青木关与北碚之间的“迁建区”^①，城市规模空前扩大。1940年划定的市区范围水陆面积约328平方公里^②。当时市区内有人口70万人，加上郊区及“迁建区”人口，约在150万到200万人之间^③。

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十分明显而迅速，但它的发展是特定环境下进行的，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问题。

1. 对国外市场的依赖

开埠以后，重庆被纳入到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的买办商业剥削网之中，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环。由于重庆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因此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较大，受到国外市场的制约。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一方面使重庆城市经济开始摆脱过去地域封闭型经济，外部关系呈开放状态。另一方面，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进口的洋货和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大

① 《重庆抗战纪事》第12—19页。

② 《重庆简史和沿革》第129—130页，1981年印行。

③ 《重庆抗战纪事》第15页。

都是最终制成品和部分初级产品，而从重庆出口的西南地区的产品大都是农副土产品和初级产品及少数中间产品如生丝、猪鬃、牛皮、羊皮、烟叶、药材等。从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可以看出，重庆在对外经济贸易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商业贸易利润的大部分积累到了外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中，重庆和四川的商人只能从外国人口里得到一点余沥，而广大人民却只积累了贫困。这严重地影响了重庆城市的工业化和近代化。

2. 工业发展水平低

抗战以前，重庆城市的基本的或主要的功能仍限于商业贸易，近代工业不仅起步晚，发展缓慢，基础薄弱，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不高，而且发展水平也较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大城市为低。如在1933年，重庆仅及上海工厂数的12%，资本额的4%，工人数的5%，产值的1.4%。重庆的工业产值和资本额都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青岛、无锡、北京、南京之下，在全国名列第九位^①。机器工业是近代工业之母，抗战前，重庆虽有10余家机器厂，但除民生、华兴两厂外，其余皆是修理工场。规模最大的民生机器厂亦是民生公司附属的船舶修理工场，仅有动力52匹马力^②。抗战时期重庆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是：重工业快于轻工业，官僚资本工业快于民族资本工业。发展时间短促，呈大起大落之势。重庆近代工业即使在自己的“黄金时期”也存在许多局限和困难。一是能源不足。据西南事业协会调查，1943年已有1/3的迁川工厂因能源不足不能全部开工生产^③。二是设备陈旧，资金不足。1942年以后，通货膨胀加剧，商业投机活跃，银行利息提高，工矿的贷款和投资下降。三是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通货膨胀政策和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侵吞。一到抗战胜利，重庆的工

① 参见国民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下册；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6页。

② 《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第13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③ 孙健编：《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第3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业便陷入危机与衰落之中。国民党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政治极端腐败，美国剩余物资大量倾销市场，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全面崩溃。1946年4月，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重庆的陪都地位实际上已经丧失。有的迁川工厂和学校纷纷复员回籍。重庆的工厂除棉纺织业外，多数先后停业、破产。1946年6月，仅迁川工厂经批准停业的机器制造业即达98家，占该业总数的54%；电工器材制造业15家，占该业总数的45%。到了1947年7月，重庆开工的机器厂只有63家。1949年，全川土铁厂90%停工，430家机器业中倒闭了200家左右^①。挣扎最力的棉纺织业经一度回升后，到1949年也是摇摇欲坠了。重庆城市近代化进程由是停滞。这不能不说是重庆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3. 重庆城市的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

1891——1930年的40年间，重庆进出口商品值增加了24.7倍^②。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因此，受外国市场的制约较大。外国商品自不待言，出口货亦是如此。据甘祠森编《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进出口贸易统计》分析：1895到1913年的12种主要农副产品的出口值，其中以适应外国市场需要的生丝、猪鬃、牛羊皮、烟叶、大黄等增长最快。这5种商品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重从1895年的15.51%上升到1913年的55.25%。这一方面说明，重庆开埠后，四川农副产品商品化的加速主要是外国市场的导向所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为外国资本主义市场代购代购成了重庆市商业功能的一个突出部分。这种情形与西方某些独立发展城市的近代化是大有不同的。

4. 缺乏城市政治民主化

在近代，重庆既沐浴过戊戌维新的风雨，又经历过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振荡。五四时期，重庆曾掀起过响应的浪潮，马克思主义在五四以后也开始在重庆传播。这一切都在重

^① 《新华日报》1950年11月23日。

^② 甘祠森：《最近四十五年来四川进出口贸易统计》。

庆播下了爱国、革命、民主的种子。但是，近代重庆是由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封建城市发展而来的。重庆城市化的模式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重庆长期在清朝统治下饱受专制之苦。尽管1910年巴县县城成立了地方自治组织城议事会及董事会，又成立了巴县参事会，但在“大权统于朝廷”的限制下，根本起不到促进城市政治民主化的作用。在军阀割据时期，又遇武人专权。军阀们为了扩军、养军、打仗，向重庆工商界恣意勒索。在近代，四川军阀混战在全国是很突出的。重庆又是争夺的焦点，受害尤烈。专制主义的超经济势力，阻碍了重庆城市近代化发展。当政者的意旨与进退足以影响整个城市。例如，重庆电力炼钢厂筹建于1919年，由四川督军熊克武发起创办。1920年从美国引进容量3吨的电炉及有关发电和机器设备，拟就近用綦江出产的土铁为原料冶炼电炉钢，计划月产钢120吨，期于一年半内建成投产。但因政局生变，原当权者下台，建厂计划无形终止，所购机器任锈蚀。1922年上台的执政者以筹款困难改为官商合办，旋又因政局变化而停顿。这个钢厂直到抗战爆发仍未全部建成。一个原计一年半建成，年产量1000余吨的小厂，竟因政治原因拖延近20年之久还不能竣工。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重庆的爱国民主空气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有所激扬。但是，蒋介石政府坚持专制独裁，镇压民主运动，使重庆成了蒋介石政府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心。缺少政治民主不能不是重庆城市近代化的困难和近代化程度不高的表现。在近代，反帝反封建，争取独立与民主仍然是重庆城市近代化的主要课题。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隗瀛涛，1930年生，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格局的形成

皮明麻 李 策

武汉从中古走向近代经历了城市的巨大变迁。正是开埠，扭动了武汉城市变迁的关键；也正是立关，制约和影响近代武汉国际性商场的形成。本文拟探讨开埠与立关如何牵引武汉城市的发展这一问题。

一、汉口开埠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封建社会的自然发展航道，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五口通商。当时英国等向中国抛出大量洋货，但销路受阻，价格跌落。英国商界认为对华贸易不畅的原因是把商业严格地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解决的办法是“把商业向五个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进逼”^①。英国政府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这种扩张愿望，一直企图进入中国内河和内地。1857年4月，英国政府指示侵华头目额尔金，修订与中国订立的条约，“要求准许在扬子江航行与扬子江两岸通商的权利”^②。除英国外，美国早就要求扬子江的自由航行。

① 转引自伯尔考继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页。

② 转引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到19世纪末，中外条约、章程涉及长江沿岸城市权益者有几十个。特别是《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烟台条约》、《马关条约》，打开了长江沿线口岸的门户。

在列强入侵长江流域时，汉口成为其着力经营的战略目标。江汉交汇、九省通衢的汉口，既是外国资本主义控制长江中游、中南腹地的商贸、交通中心，也是联结长江下游、开通长江上游的中转站。他们迫切谋求在汉口通商，而且无不把汉口作为扩大势力范围的据点。

汉口开埠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其酝酿和准备时间可上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当时就有少数商人和传教士非法闯入湖北和武汉地区。1842年，英国海军舰长柯林就驱动军舰从吴淞口上驶汉口。挪威等国还援引五口通商章程，1847年在汉口经营商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列强把汉口开埠提上了日程。

1858年6月，清政府在战败之后分别与英、法代表签订了《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开放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准许外商“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这样，外国商人就获得了长江中下游通商和航行的特权，从而将对华贸易向中国腹地推进。1858年11月8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上海同清政府代表桂良、花沙纳、何桂清等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签字当天，额尔金率几艘巡洋舰及炮艇从上海上闯长江，沿途勘察航道、水文、气象，制作了精密的水线图，于12月6日抛锚汉口江面，窥视三镇全貌，会见了湖广总督官文，侦察行动完毕后，额尔金率舰队折回上海。

不久，巴夏礼根据额尔金的指示，拟定了《长江各口通商暂行章程》。该章程规定，英船执有入江江照即可上驶汉口，并且只在上海完纳关税，就可在汉口与镇江间起卸货物。1861年3月，英国单方面公布这一章程，并且加以实施。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订立中英、中

法、中俄《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除重申《天津条约》中的汉口开埠外，还增加了一些条款，如值百抽五的海关税等。不过，条约虽然签订了，并未立即实施。次年，汉口开埠才付诸实施。

汉口正式开埠始于1861年3月。3月7日，英国火轮船一艘，载上海宝顺行（即颠地行）之主韦伯，英国官员威利司和翻译、随员等驶抵汉口。次日，威利司等入城见湖广总督官文，自称由上海来汉，查看地势，立行通商，并在汉口托都司李大桂代觅栈房一所，留下翻译及随员数名住于栈房，韦伯等仍回上海。

3月12日，受额尔金的派遣英国海军提督贺布与参赞巴夏礼率4艘兵舰抵达汉口，会见官文，称先来汉口查看地势，建造栈房，领事官将由福建调来。3月20日，巴夏礼与湖北、武汉当局签订了《英国汉口租地原约》，划定了汉口英租界。4月，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到达汉口，设置了领事馆。在此稍后，俄、美等国也来汉通商。这些船来汉时，事先未通报。美国琼纪洋行则把它新近购买的轮船派往长江上游，5月行抵汉口。这艘船所载货物卖掉的不多，但该行在汉口买下了地皮和货栈，把余下的货物交代理商处理。

清末时，汉口先后开辟了英、法、俄、德、日五国租界。在汉通商的有英国、法国、美国、丹麦、荷兰、意大利、比利时、日本、瑞士、秘鲁、葡萄牙、刚果等19个国家。建立领事馆的有英、美、德、日、俄、法等12个国家。至于外国的工厂、银行、洋行和创办的学校、医院则遍布武汉三镇。

在汉口开埠30年之后，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为增加贸易税收，自动开放了一些商埠。1900年11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开武昌城北十里外滨江之地为通商口岸。此后武昌（局部地区）遂为自开商埠。

二、江汉关的创设与嬗变

汉口既已开埠，依乎情理西方列强必然把自己控制下的海关推展到内陆。然而，汉口立关却悖于常理，湖广总督官文力主在汉口设关，而署理总税务司赫德竭力反对长江内河新置海关，从而使汉口从开埠到立关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居间期。汉口开埠应该说是赫德扩张权力的一个重要契机，那么赫德为何坚决阻止汉口立关呢？这是一个十分令人费解的问题。官文和赫德在此问题上的交锋可能向人们披露了一点蛛丝马迹。

不设江汉关，可以说是赫德一手策划的。1861年巴夏礼来汉筹办通商事宜时，传递了关于立关问题的某些信息。巴夏礼在拜晤官文时称：“货物出口入口，税课俱在上海、镇江完纳，九江、汉口概不征税，……楚北无须添设关卡，以节糜费。每年亦无报解之款，仅须酌派明干大员，与该国领事官筹办同行事宜。”^①这已经表明汉口今后与外国商务将越出常规的管理方式——海关，由外国领事与地方官会同管理。汉口开埠通商无成例可循，官文自身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对巴夏礼的安排未置异辞，而且表现出言听计从。

由外国领事和地方官员协同监理汉镇对外贸易的独特的管理方式在《长江各口通商暂定章程》（包括修改的章程）中得到确认。由于领事和地方官对外货入汉没有征税权，更无监督盘查权，这种管理上的弊端很快为外商和中国私商抓住。官文发现了这一点，1861年6月奏称：“皖逆上窜，长江南北，贼踪不时出没，洋船来往其间，难保无奸民渔利，代为逆匪置货，尤应严密防维。”^②请求总理衙门就税则和稽查问题迅速议决。此后走私之风日炽，中国私商假外国之旗走私者有之，外国商人借机混水

① 《筹办夷务始末》卷75。

② 《筹办夷务始末》卷78。

摸鱼者更是屡见不鲜。连有一点良知的外国人也承认，来往长江的外国商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些无原则和无品行的人，事实上也就是不法之徒，他们不但把条例和章程一概置之度外，而且把中国人看成是可由他们任性劫掠的。”^①

对于长江上疯狂的走私，赫德当然知道。而他却认为，“如有人稽查及巡船缉私，因中国风篷船赶不上有意走私的火船，恐难缉拿。当中国安静时，长江一带防堵走私，已属不易，况现在各处贼匪滋扰，更不能设船缉拿。”“不但新设三关，徒糜经费，无税可收，而粤海出口税，上海进口税，亦日见其少。”^②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在上海征纳税饷，镇江以上、汉口以下，作为上海的内口，毋庸设虚立之关。这样便否决了长江设关的可能性，官文的设关之请被一笔勾销。

随着走私的真相大白，特别是赫德欲盖弥彰的作法，官文大为光火。1861年9月他与江西巡抚毓科联衔上奏，一针见血地指出，凡进口出口货物均归上海稽查纳税的暂行办法实有心取巧，预萌偷漏之端。他们指出：洋货进口售卖内地，内货出口贩运外洋，皆暗中以货易货，运载上船，既不交进口货物清单，亦不报出口货物数目，以至毫无稽察。奸商倚托影射，甚至将停运之货接济贼匪，违禁之物夹带潜行。汉口至镇江途经千余里，处处可以私售，汉口既无盘验，镇江亦无凭稽察。若经长江出口，上海更无从查知。税课全然无着落，依此下去，将遗患无穷，因此再次敦请清廷在九江和汉口两地拟设新关。

为了消除官文和毓科的不满，总理衙门飭令江苏巡抚将上海代收长江各税每届三月一结，分别解往湖北和江西，以示搪塞。后见太平军屡次攻取两湖地区，为了防止因财政亏空而出现政局动荡，1861年12月总理衙门方议准了官文的设关之请。

1862年1月1日，江汉关正式建立。第一任海关监督是湖北分

^①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202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卷。

巡道郑兰。狭妥玛作为海关代理，1863年1月1日升任税务司。考虑到江汉关的重要性不如沿海各关，进出口正税仍在上海完纳，江汉关最初只负责盘验货物，征收子口税，1863年1月1日正式对外征收正税。

江汉关最初设于夏口县汉口河街，即汉口镇英国租界花楼外滨江。江汉关监督署初设于汉口镇青龙巷。建关之初，江汉关下辖2关3卡。汉阳南关，负责稽查土船；石灰窑分关（1898年）监督订有专章之船，包括承担水泥厂物料进口，水泥出口的轮船以及装运大冶铁矿出口至日本的轮船等。3个分卡为：北卡、子口卡和武穴总卡。此后，外国势力进一步内侵，江汉关的权力也得到伸张。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中英双方“议准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添开通商口岸”，同时在长江沿岸的安徽大通、江西湖口，湖北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开辟暂时停靠之所。为了协助对新开口岸的管理，总税务司决定“增派税务司一员或副税务司一人驻汉口来往稽查襄办”^①。从此，江汉关税务司开始兼理稽查长江6处事务。

民国时代，江汉关的辖权又有展拓。除了管理范围进一步扩大外，其权限远远超出海关职能范围。从管辖范围看，湖南纳入到江汉关的权力圈内。1930年7月14日总税务司命令岳州分关职员大部分撤退，其工作由江汉关税务司领导。1937年1月31日长沙关闭关，人员并入江汉关，关务清理由江汉关接办，职能范围也进一步扩大。1878年12月江汉关税务司惠达创设汉口邮政分局，这是近代武汉的第一家客局，1934年1月汉口盐务检查机构的各项职能移交海关，盐务检查人员也移住海关。

武汉沦陷后，江汉关落入日寇之手。由于对外贸易中断，江汉关实际上名存实亡。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后，1943年5月在汉口组建江汉关转口税局。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

^① 总税务司来文，143号，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降，江汉关为国民党第六战区接受日方物质委员会接收，重新恢复对外业务。

三、开埠设关与近代武汉城市格局的形成

开埠设关对武汉城市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和扭曲作用。

武汉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文明的城市。远在商代中期汉口市郊所建立的盘龙城，就揭开了武汉城邑文明的帷幕。东汉和三国时代，在今汉阳、武昌的市区内又修建了军事城堡。隋唐以降，武昌、汉阳就成为中原重镇、商舟之会，到明成化年间，由于汉水改道，汉口从汉阳析出，迅速发展成为商业市镇，形成三镇鼎立的格局。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武汉三镇已发展成为拥有约20万人口的封建市镇。汉口则成为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齐名的4大名镇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开始扭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武汉也开始从中世纪走向近代。但是，此后处于传统封建统治和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区的武汉，社会机制和经济发展都处于停滞和战乱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新的变局。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力东渐，汉口被迫开埠和扩大开放，才展示出新的城市发展轨迹。在开埠设关之后，武汉才在事实上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城市社会形态、城市文明形态发生转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封闭型封建市镇转化为外向型通商港城，城市功能发生质的变化。闭关时代的武汉三镇，主要是行政、军事重镇。汉口虽然以商贸而兴，但毕竟建筑在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基础上，只能进行有限的内地产品循环，规模亦有限。由于对外通商，自然经济受到猛烈冲击，封建的内向封闭性被打破，输入输出的外向商贸功能迅速发展。伴随着商业功能的发展，武汉的水陆交通运输功能，工业生产功能，文化教育功能，游乐功能等，都发展起来。

晚清时，汉口先后与19个国家通商。12个国家在汉设立领事

署。外国的银行、洋行、工厂遍布武汉三镇，控制着武汉的经济命脉和对外贸易。外国人举办的教会学校、医院和报刊，也对武汉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沿江城市的“船码头”，汉口的航运自然为列强所觊觎。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英国的怡和、太古轮船公司，日本的邮传株式会社、大坂商船会社等，都在武汉设航班，建码头，开航线。至1908年，共有9个外轮公司、29条轮船在汉口航运。1907年日本大阪轮船公司直接在汉口与大阪、神户间通航。后来，日本邮传公司又在汉口与神户、横滨间通航。在此稍后，武汉民族航运业也发展起来。武汉不仅成为衔接上海、宜昌的转口港，而且成为直接输出入港。

在陆路方面，以茶叶出口为主，与俄国通商。鄂、湘、赣、皖的茶叶多集中汉口，转输内蒙、新疆，进入俄国。

汉口城市功能的扩展最突出地反映在商务方面。汉口的开埠，特别是江汉关的设立，把沿用于沿海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引入内地，汉口与外界交往纳入正轨，一个内陆港埠作为一个国际性商场所蕴藏的潜能逐渐得到发挥。1882—1891年汉口贸易收入为358000000海关两，1892—1901年进出口贸易总值494076939海关两，这10年里汉口平均每年贸易净值是49000000海关两，差不多比上个10年增长了40%。20世纪20年代汉口的贸易值更是突飞猛进地增长，1928年是它的高峰年景，贸易总值达到377504295海关两，相当于1882—1891年贸易收入的总和^①。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汉口市场逐渐摆脱“九省总汇之通衢”内陆商品循环的圈子，成为中国中部中外商货的总汇之所。1881年一位外国人这样描述武汉市场的见闻，“对于外国制造的杂货，如玩具、铅笔、工具、图画、装饰品、伞、利器、假珠宝、肥皂等的需要也不断增加，这些货物已成为一般商店的商品。”^②

① 《海关十年报告·汉口》，直译自英文本。

② 姚贤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79页。

第二，从农业文明一定程度迈向工业文明，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型的近代化。由于武汉的近代化建立在封建统治基础上，又受外国入侵，这就决定了它是在曲折与苦难中迈向近代化的。作为一个近代城市，其核心是建立工业文明。这种以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文明是封建时代所不具备的。

武昌、汉阳、汉口在前近代虽然有了相当的经济的发展，但在封建母体中，没有孕育出成熟的资本主义，如果有的话，也只是萌芽。因此和其它地方一样，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是从外国输入，然后与中国土壤相结合，在扭曲中发展。

从上个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中叶，武汉开始成为一个统一的近代都会。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形成的时序不一，各有统属，尽管三镇有密切联系，但毕竟受到江河阻隔，各自为政。张之洞治鄂时，在汉口置夏口厅，并移汉黄德道于汉口，汉口的行政地位提高。民国时期，三镇建置多所更张，但行政、经济、交通的联系显然加强，终于在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将三镇第一次汇合成为统一的武汉市，并成为京兆区，后来三镇间时有分合，但不能改变他们之间统一的趋势。

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武汉城市面貌日新月异。20世纪初是武汉市政鼎革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不仅大批新建筑跃现，不少老式建筑也追附新浪潮改头换面。随着城区道路设施的改善，交通工具不断翻新。1900年在市面见到马车和人力车已被传为新鲜事，20年代机动车正逐步取代人力车和马车，交通日趋近代化。20世纪初年市区警察诞生。一大批市政公共设施也应运而生，如邮政、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广播等。市政组织和市政管理亦效仿西法而立，参议会等议政机构更给武汉的政局披点上民主的外衣。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武汉从中世纪进入到了近代。一个昔日的封建镇邑发育成为近代都会，它在曲折中走向近代化，一种低度、残缺不全的近代化。

第三、华洋杂处，移民云集。开埠后的武汉，城市空间得到展拓，人口迅速集结，昔日20万人左右的市镇到抗战前夕的1937年，已发展成为百万人的大都会。这样短时间所达到的人口峰值，既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又是城市发展的标志。城市内万商云集，工业、交通、商业、服务行业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人口来自皖、赣、湘、川、豫等省以及湖北境内各州县。武汉成为一座移民城市，移民的拥入，流动人口的增加，又推动着城市的发展。

武汉的开放不仅增强了对外围州县、湖北周边各省人口的聚合力，外国人也联翩而来。1905年，在汉外国人已达2148人^①，1932年上升到3515人^②。这些外国人，除少数从事政治活动外，大多以工商为业。1905年外国在汉商店，德国35家，英国32家，俄国27家，日本18家，美国12家，总数达到124家。

在城市布局和发展走向上，也发生了巨变。旧时的汉口镇，基本上是附着在汉水入江口上，或者说是沿河（汉水，当地人称为小河）市镇。因此古汉口的土码头、街道多集结在汉水之旁，有狭窄的正街、河街、堤街，这是木船时代商贾们只能活动在汉水岸边，难以在长江边上运营的表现。开埠之后，列强依靠巨大的轮船驰骋于长江之上，在汉口沿江修建码头、仓库，建立租界，于是汉口市区发展的走向，从沿河折向沿江。从武汉关附近开建的英租界到胜利街下段的日租界，形成一片滨江市区。这块租界区具有各国风情的华丽建筑物及柏油路面，下水道、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等公用设施，既是西方侵略者殖民地掠夺的产物，也是西方物质文明楔入武汉的表征。而租界中的工部局、巡捕房等，是列强们“国中之国”的政权机制，也是奴役凌辱中国人民的机器，武汉人民饱尝了压迫的苦难。

① 水野幸吉：《汉口》，光绪三十四年六月版，第10页。

② 武汉卫戍司令部统计资料，藏武汉图书馆。

在租界区发展的同时，华界市区也有明显的扩展，商业中心发生位移。沿河的旧街道远远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商贸需要，于是从汉正街和长堤街、黄陂街等旧市区向下推移，由硃口武圣路一带延伸至今满春街、六渡桥、江汉路、大智路、车站路、一元路、三元里、黄浦路、刘家庙和江岸车站一线，逶迤几十里。而六渡桥、江汉路则取代了汉正街、黄陂街，成为市区中心。

第四，中西文明在城市中的交融与冲突。在华洋杂处的武汉市区，反帝斗争波澜起伏，中西文明在这里进行着复杂的交融与冲突。从英国最先来汉通商和建租界开始，武汉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包括抵制洋教、洋货，反对扩大租界，抗议洋人虐待或枪杀华人，反对外国军队入驻，直至要求收回租界，可谓是高潮迭起，此伏彼起。这些斗争有胜有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外国势力的扩张。

当然，西方的工业文明高于封建中国的农业文明，西方资本主义潮流对武汉封建市镇文明不能不发生强烈的撞击。西方的资产阶级对落后的东方进行殖民开拓时，火与剑在江汉大地飞舞，造成了血与污在大地横流，落后挨打的民族既要反对外国的侵略，又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以图自救和自强。为了缩短中西文明发展的差距，自然要引进和效仿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武汉地区的人民从有识之士到普通百姓，对通过租界或直接从外洋输入的优秀文明，都持积极的态度。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租界的建筑和公共设施，乃至某些管理规章，都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和移植，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不理解到消化吸收。应该说，自开埠以后，西方文化对武汉的渗透是无孔不入的。大至城市布局，建筑风情，小到家用针线、西装、西餐，更是不同社会层追逐的时尚。民国初年，汉口的商人们曾在辛亥革命战火中化为灰烬的今南京路、大智路一带建造了一个模范区，参照租界现代化建筑和道路等设施，揉以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形成了中西合璧式的大片里弄。至于武昌、汉口各类工厂、学校、报馆、水电设施无不

把西方文明杂揉其中。当然西方文明难免泥沙俱下，污染人们心灵的西方腐朽文化也一起侵入。

爱国者和有识之士能吸收西方先进文明以图自强，而意志薄弱者则产生盲目崇洋媚外心理，这在旧时代的武汉城市中可谓比比皆是。

总之，汉口的开埠设关，给武汉城市发展以巨大影响，使武汉直接卷入世界商品经济的漩涡，也使武汉直接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但由于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掠夺，武汉的城市性质和结构，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型的。城市的形态是畸形的，城市文明也是扭曲的。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皮明麻，1931年生，武汉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策，1963年生，武汉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研）

近代天津城市史散论

罗澍伟

在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在渤海之滨，一座新兴的北方贸易大港和工商业中心城市于百余年前脱颖而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天津。

(一)

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就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言，在开埠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应当说对天津城市的成长起了极大的助力作用。

在近代以前，天津作为中国北方一个传统式的城市已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一直是近畿军需民食的漕粮输转、储备基地，同时也是“襟河抚海，拱卫京畿”的首都门户。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心积虑地迫使天津开埠，其根本的原因正如美国公使列维廉在1858年所说的那样，即西方列强企图在天津建立一个“足以威胁京城的基地”和策划各种“阴谋的巢穴”^①。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美、法两国通过签订《北京条约》便抢先在天津强划租界，此后他们每发动一次侵华战争，天津的租界就增加或扩大一次。到20世纪初，差不多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在天津强占了自己的租界，这绝不应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

^① 雷穆森：《天津——插图本史纲》第9页，《天津历史资料》2。

象。

在19世纪中叶，英国尚处在西方各国“霸主”的地位，所以在天津开埠后不到两个月，英国便率先在天津强划了租界，法、美起而效尤。他们利用清王朝的昏庸和对近代外交的无知，划定租界时根本没有办理任何正式手续，仅凭一张照会。后来，英国政府对于天津英租界的建立，仅以天津县署每年收受英方地租时所给予的收条作为法律依据。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德国借口干涉还辽有“功”，要求清王朝用租界为“回报”；日本则以战胜国的姿态，向清王朝强索硬要，先后在天津设立了各自的租界。义和团运动后，八国联军将天津分割占领，原来没有租界的各国借机肆意扩张，在天津没有租界的俄、意、奥等国，则直接硬占强划。小小的比利时当时并没有直接出兵，但比国驻津领事这时也发布了所谓的公告，擅自划定租界一区。至此，天津出现了9国租界并立的局面。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期间，美国曾提出在天津设立“公共租界”的主张，但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美国决定有条件地将天津美租界置于英租界管治之下，所以后来多称八国租界。这种现象在全国设有租界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

天津租界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和政治侵略的桥头堡，而长期窃居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璀琳就是这一使命的忠实执行者。外国人评论说，德璀琳“决不把自己局限在狭窄的税务司职务范围之内”，“他一向把自己当做贸易的助手，而不是贸易的管理者。……他常常在总督的耳边说些新的意见。诸如输入新的牲畜与水果‘品种’、造林、医学、教育、陆海军编制、矿务、铁路、一个设备完备的大学等等。”所以李鸿章对他言听计从。以致外国人把德璀琳看成是清王朝“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因而，北京的外交使团要不先来到天津见过德璀琳先生与李鸿章之后，

是什么也干不了的。”^①

天津租界还是帝国主义操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总后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政局更迭无常，但社会上普遍认识到：

“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1925年时，英国记者雷穆森正撰写《天津——插图本史纲》一书，他面对当时天津租界操纵下的中国军阀混战局面，惊呼说：“列维廉先生预言天津将是‘阴谋的巢穴’确实是未来的一幅特别清晰的画面。这话说过已67年了，看看今天的情况，简直是太真实了。”^②

另一方面，租界又使近代天津城市出现了全新的社区，进而加速了天津城市形态的变迁。开埠后的二、三十年中，天津租界有了第一流经过规划而修建的碎石道系统，有了中国通商口岸第一座市政大厅，有了远东闻名的报纸，有了煤气，有了自来水，有了医院，有了文学团体，有了业余剧团，也有了俱乐部和运动场。租界在近代天津城市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是开埠后天津政治地位的迅速提高。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清王朝迫于门户洞开的形势，不得不仿照在上海（先在广州）设立五口通商大臣之例，在天津设置了三口通商大臣。当时，南方五口虽任重事繁，但除一任为简派外，余均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方三口刚刚开放，经济地位远逊于南方五口，可是由于天津已开始成为中外交涉的中心，三口通商大臣实际上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驻天津的外交代表，所以设了专官，并以勋戚充任。

天津教案发生后，清王朝看到三口通商大臣由于没有管理地方军队的权力，以致不能迅速制止事变的猝发，所以下令将三口大臣裁撤，改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并加授钦差大臣的关防，开始移驻天津。北洋大臣权势从此煊赫一时，不仅可以代表清王朝接见各国使节，和签订各种条约，而且负责统率集

① 前引《天津——插图本史纲》第40、53页。

② 前引该书第9页。

中全国财力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新式海陆军，某些方面还可以伸入到南洋大臣的管辖范围之内。影响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许多事件，诸如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以及尔后的北洋新政，无不与天津有涉，因为天津一地中外交涉的频繁，直隶总督衙门长时间被目为中国的第二政府。

由于天津开埠后政治地位的提高，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轫于是邦，然而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①外交方面“亦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手下之。”^②近代天津的这种特殊政治地位，当时全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可以取代。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自渤海湾经大沽口入侵北京变成现实，清王朝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对外模式的抗拒，天津遂被选定为清王朝重点布置防御力量的沿海城市，20世纪以前，天津竟成了中国最大的近代化军事基地。

天津开埠后，不但兴办起“能以最新式机器制造最新式的炸药”的“世界上最大最好的火药厂”^③——天津机器局，而且还以天津为中心，修筑了铁路，开通了电报，设置了邮政，兴办起近代采掘业，引进了西方近代军事教育，并且训练和组建了大批新式军队。仅以天津机器局而论，常年雇用工人3000余名，岁需经费一般在30万两上下，多时达50余万两。而当时天津一县全年田赋收入也不过9150余两，其中起运4380余两，留用5620余两，以支发县内一切公需。^④而天津机器局一年的开支，即为天津全县一年开支的50—60倍，有时多达100倍，天津机器局的建立，如同在传统天津城市之外，又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天津机器局记》描述该局当年的盛况说，“巨栋层栌，广场列厅迤丽相

① 金铎，《天津政俗沿革记·序》。

② 《天津政俗沿革记》卷16，“外事”。

③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第363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④ 《天津事迹纪实网见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23页。

属，参错相望。东则帆樯沓来，水栅启闭；西则轮车运转，铁辙纵横。城堞炮台之制，井渠屋舍之观，与天津郡城遥相对峙，隐然海疆一重镇焉。”^①近代军事工业对于天津城市成长的刺激作用，于此可见一斑。

(二)

一般说来，近代城市的发展，是与产业革命所引起的工业化过程同步进行的。然而与西方国家城市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不同，中国传统城市转向近代的契机，是因为处在被侵略地位的中国不得不把一些城市向西方世界开放，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商品通过这些城市，不断渗入到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使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了城市的商业化和工业化，逐步完成了城市功能的调适与转变。

然而，若从天津城市经济开始步入近代流通机制，同时沟通了中国“三北”地区传统商品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来考察，天津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旋涡的意义还在于，开始打破了传统天津做为首都经济辅助城市的地位，一变而为联结国内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跳板，成为以对外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从此天津逐渐脱离封建的经济秩序，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再单纯受国内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化水平低下的限制，而是通过输入外国商品和制造技术，改变了城市的经济结构，进而发挥出中心城市的作用。与往昔不同的是，当近代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因受到种种冲击而消长无常时，天津却以一种“独立”的姿态，无阻挡地向经济城市稳步成长。

开埠初期的天津，由于不能迅速摆脱传统经济的影响，进口洋货受到市场购买力低下的限制，也没有足够的适销土产提供出口。在对外贸易的形式上，与国外的直接数量很小，多半是从上

^①（重修）《天津府志》卷28，“公廨”。

海转口，直到1867年在天津经营直接贸易的只有一家洋行。然而历史为天津确定的主调是城市潜在的经济力量的发挥，“这种力量不顾一切阻碍，持续地向前突进”^①。所以尽管道路崎岖，但从1865年到1898年的30余年中，天津的进口贸易额仍然增长了5倍，出口贸易额增长了9倍，^②开埠前，天津并非传统的棉纱棉布集散地，开埠后却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进口洋布、洋纱的最大口岸。也是华南地区与西伯利亚之间的转运茶叶和呢绒最便利的港口，由于转口贸易在运输、装卸、储存等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花费，随着贸易额的不断增长，直接贸易的趋势遂成为不可避免。所以到了1905年天津从国外（当时的统计包括香港）的直接进口值第一次超过由上海等地的转口贸易值。

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征服中，天津与周围宽广腹地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了，特别是大批初级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相应地增加了腹地购买进口商品的能力。与此同时近代工业的发展也对天津的内外贸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城市对机器设备和各种原材料的需求，另一方面许多工业制成品进入了出口货的行列，所以20年代以后，天津进出口贸易总额直线上升。如1915年为52万余关两，1920年为89万余关两，1925年为107万余关两，1930年为133万余关两，差不多每隔10年就要翻一番。

到30年代，天津的港口城市地位进一步加强，在全国五大港口——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进出口贸易总额各自所占的比重中，天津由1871年至1873年的1.8%，上升到1935年的11.7%。^③在华北各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天津几乎占到60%。其间，天津的面粉进口额，棉花和皮货的出口额，均居于全国首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反映了天津及其腹地卷入国际市

① 派伦，〈天津海关1892—1901年10年调查报告书〉，〈天津历史资料〉4。

② 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第1期。

③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69页。

场的程度和速度。在这一进程中，天津逐渐取代了北京的经济地位，开始成为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①

天津由一个传统的国内贸易为主的的城市，发展成以进出口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的进程中，洋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

所谓洋行，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在本地经营进出口的贸易公司的总称。鸦片战争后，天津虽未列为通商口岸，但一些洋商借机来到天津，经营鸦片和其它贸易。在天津开埠的当年，一批外侨尾随英法联军到来，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准备在天津开设洋行的老板。据1866年的统计，天津共有9家洋行，但到1890年时在各国领事馆注册的洋行已有47家。^②

开埠的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以进口各种洋货为主，而且多半是通过上海而不是通过生产国购入。天津的洋行抓住这个特点，通过上海的洋行购入洋货，再转手给经营洋货的中国商人。传统的商业网络，为洋货的涌入准备了条件，因而在一个时期内这种交易额颇大，洋行老板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一名洋商在开埠后的数年之间在积累起每年可得5000元利息的财产离开天津。^③

然而天津本地的商人，尤其是棉布商很快便有了对策，他们发现自己直接订合同租用船只由上海购进洋货，比通过洋行要合算得多。后来除鸦片之外，其它“通过外国人的手才能与上海成交的交易项目日益减少，在这种竞争中，中国人总占上风，因为他们具有一切便利条件，经营方式简单，生活简朴，手续费用不多。”^④

① 陈克，《近代天津经济功能的变化与城市发展》，《天津历史博物馆馆刊》2，1988年10月。

② 分见1866年和1890年“天津港贸易报告”。

③ 《天津——插图本史纲》第25页。

④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9—540页。

洋行也不会自甘寂寞，不久他们便发现由中国内地低价购买农畜产品，高价运销到国外可获巨利。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洋商从中国内地购得大宗农畜产品，只需在首经之子口交纳25%的税银，便可运抵口岸直接出口。从1870年开始，海关又实行了内地子口税三联单制度，洋商持单赴内地购货，沿途可通行无阻。三联单制度虽然给天津腹地各省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却极大地推动了天津口岸的农畜产品出口。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前一年即1869年，天津只有300担驼毛出口，但到了1874年出口量即超过了3100担，1875年更达到了5500担。只是由于天津港突然冰冻，装船量才减少为4100担。

从70年代开始，天津的洋行又开始专营那些中国商人不易经营的贸易，如乘天津进行“洋务”建设之机，进口各种机器设备，以及军火洋药等。1886年清王朝决定修建津沽铁路，各洋行竞相把天津变成铁路宣传的中心，他们招引来不少国家的商业组织在租界里建立起相当大的办公地点，这些组织的职员竟使天津的旅馆拥挤不堪。经过一番争夺，广隆洋行取得了把火轮车有限公司安置在该行内的特权。^①

此外，一些洋行又特地选择了经营中国沿海以及由沿海向内河航行的近代航运业。开埠以前，天津所有的进口货（包括外国的和国内的）都由中国帆船运来，出口的土产也由中国帆船包揽，1867年怡和洋行首先在天津经营航运业务，开辟了广州至天津和上海至天津两条航线，同时代理世界各大轮船公司的客货揽载。冬季天津封港，则在秦皇岛起卸。1881年太古洋行又开辟了上海至天津和香港至天津两条航线，由于轮船运载客货手续简便，节省时间，风险又小，受到中外客商的欢迎。洋行经营的近代航运业不但切断了中国帆船与外国产品的联系，而且夺走了中国帆船经营的沿海土产贸易，最终把中国帆船推向毁灭的境地。

① 前引《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第18页。

(三)

金融业是城市经济、尤其是城市商业贸易发达的标志。但在近代天津，货币流通的调节与信甲活动的发展，却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的重要辅助手段。

传统天津城市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传统金融业的发展，以兑换货币及存放款为主要业务的钱庄，和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在天津素称发达。据研究，中国早期的汇兑，即发祥于天津的日昇昌颜料庄。^①

天津开埠后，随着内外贸易的发展，资金流通加速。但很长一段时间天津与腹地的信贷主要依靠钱庄，而维系着天津与各地传统金融联系的则是票号。以致传统的金融业继续不断发展。据1867年10月15日的《字林西报》，彼时天津共有钱庄约100家，资本总额60万两，其中资本1万两和4千两的各40家，资本2千两的20家。^②迨至19世纪末，天津的钱庄又增至300余家；^③票号约25家，资本约500余万两。^④

近代金融业在天津出现以前，洋行也不得不利用传统金融业资金周转便利的条件，为他们收购内地皮毛和其它农副产品服务。有的洋行还直接起用钱庄主为买办，据《字林西报》载，天津最老的一家洋行买办，就是一个兼营鸦片生意的钱庄主。^⑤

然而对于洋行来说，仅仅采用这种办法显然是不敷需要的。当时，天津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英国和香港的直接贸易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但天津与英国和香港并没有直接的金融联系，因此在1863年汇丰银行成立之后，便积极谋求在天津建立分行。

①③ 杨国之等，《天津钱业史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

② 张国辉，《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第32—33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④ 刘民山，《鸦片战争前后天津票号的兴起与发展》，《天津史志》1988年第1期。

⑤ 前引《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第56页。

外国资本在天津筹画建立近代金融业的政治目的也是有的，1882年汇丰银行开始在天津筹设分行，他们特地选派一手培植起来的安徽籍买办吴调卿做分行买办，主要原因是想通过吴以“同乡”的关系，积极联络手握重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进而影响清朝的中央政府，其主要手段便是利用清王朝的财政困难进行贷款。

汇丰天津分行成立前，已与清王朝建立了贷款关系，但数额不大（前后4笔，共1200万两）。但自80年代后，由于汇丰在京津设立分行，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的贷款则大幅度增加，1880年——1927年，共达78笔，累计达33848万两，这显然与汇丰银行所处的“近水楼台”地位有关。汇丰天津分行成立不久，清王朝决定兴办铁路，其中津通、津榆和京芦铁路的修筑，多由汇丰提供借款。吴调卿也被任命为京榆铁路总办。正是由于这一笔笔借款，汇丰“使自己成为满清政府不可一日或缺。”^①这显然符合资本主义各国的政策。

除了借款之外，设法吸收中国存款也是汇丰天津分行的主要任务。汇丰银行因为经常接触中国官僚、贵族，吸收这些人的资产存数量也很大。据传，李鸿章在汇丰天津分行有150万两白银的存款，庆亲王奕劻有120万两白银存款。把中国人的货币转为资本，再用于对中国人的掠夺，这是近代外国在华金融资本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为适应环境，吸收资金，汇丰还是中国境内第一家不以金磅为单位，而以中国各口岸通商用的银元为计算单位的外国银行。

近代以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均以现银交易，无所谓国际汇兑。鸦片战争以后，一些通商口岸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国际汇兑业务亟待开展。为了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汇丰银行自建立之始，便在与中国贸易关系的东方各口设立经理处或分行；后来汇丰又把分行扩展到欧美。由于这个原因，汇丰天津分行自建立

^① 毛里斯·柯立斯：《汇丰——香港上海银行》第32页。中华书局，1979年。

后，便一手操纵了天津的外汇牌价，所有的外汇经纪人均视汇丰的牌价为准，汇丰天津分行由此获得了莫大的好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天津的金融市场开始和国际金融市场联结起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汇丰天津分行的建立，为天津各洋行贩卖外国商品，掠夺中国原料提供了方便的资金融通。天津海关税务司在1881年的“贸易报告”中以欣喜的心情指出：

“6月18日汇丰银行分行在天津开业，无疑它将证明对外商业业务非常重要。货物外运比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发展，而且很可能还要发展。”果然，两年后，即1883年英国驻天津领事达文波在一份报告中：“汇丰银行在这个港口有了一个营业鼎盛的分行，使得天津的洋行在金融周转方面得以享受和上海洋行同样的便利，能够直接进口，节省了上海转运的费用，从而得以较低的价格把货物运到天津。”^①在天津的所有洋行中，怡和洋行从汇丰中受益最大。只要需要，怡和洋行随时都可以迅速得到汇丰天津、北京分行库存充裕的白银。19世纪末，当怡和洋行获得为清王朝修筑铁路供应材料和承包工程的合同时，汇丰银行立即借垫款项。这种状况，不一而足。

由于汇丰的储备雄厚，因此得以在中国公开发行纸币，到19世纪末，天津共三家外商银行，但发行纸币的，惟有汇丰一家。汇丰天津分行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该行在天津的最高负责人不是分行经理（Wanager），而是总行代表（Agent）。

继汇丰天津分行之后，华俄道胜银行也于1896年在天津设立分行。同汇丰一样，道胜也积极包揽对清朝的借款，收罗王公贵族的存款，并起用德商泰来洋行买办王铭槐为该行买办。王铭槐利用银行买办的身份和便利条件，从天津沿京榆铁路向关外延伸，在沈阳、铁岭、牛庄等地，开设胜字号银号20余家，专门经

^② 转引自常南，《英国汇丰银行的经济掠夺》，《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营汇兑。另一个买办严筱舫，也在道银胜行支持下，从汉口至北京开设源丰润汇兑庄多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道胜银行控制下的汇兑网。这是道胜的经营特点。此后，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行亦于1898年开业，横滨正金除在天津经营国际汇兑，吸收官僚、军阀存款外，主要目的是扶植在天津的日本洋行。

除了外国设立的银行之外，19世纪末，中国人自己设立的银行也在天津出现了，这就是1898年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天津分行。因为银行是近代化的金融组织，中国通商银行于1897年在上海建立后，一切组织机构，全拟汇丰银行模式，而分行又拟总行模式，在行内分设洋帐房和华帐房，聘用洋大班与华大班。分行的最高负责人为分董，天津分行的首任分董为曾任天津礼和洋行买办的冯商盘。华洋大班的并用，与由买办出任分董，足以说明通商银行的先天软弱。

据1934年的统计，天津共有外资银行17家，资力总额为434129649万两，超过全市中国自行开设的公私银行资力总额的21%。^①由于银行的管理制度先进，资金雄厚，而且都有熟习本地商情与金融状况的买办主持相当部分的工作，以致很多钱庄、票号为开展信贷业务不得不与外国银行建立联系，一些银行买办也是票号或钱庄的股东或经理，从而促进了近代天津金融网络的形成。当然这种金融网络是外国金融资本控制下形成的，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

(四)

城市不仅是地理学和生态学上的单位，还是一个经济单位。纵观世界历史，推动城市化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发生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了。在西方，近代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促进，互为因果；但在中国，工业化却落后于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说，工业化对于近代中国城市的冲击是迟发的。

^① 前引《英国汇丰银行的经济掠夺》。

在鸦片战争后的20年中，中国传统文明与外来模式爆发了极强烈的冲突。在冲突中，虽然中国失败了，但并没有使传统阶级失掉对传统文明所持的优越感；恰恰相反，却激起了他们对西方强烈军事优势的强烈民族主义反应。用李鸿章的话说，那就是：“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①因此，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一个在通商口岸城市或省城建立现代军事工业的热潮，这就是说近代中国城市的早期工业化与西方不同，它不是从动力革命开始的，而是从武器制造开始的，天津城市近代工业的初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至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则是随着日后来自国外的经济侵略不断加深，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朝野上下才坚定了发展近代工业的决心。

开埠前的天津，是一个封建性的城市，在政治上是“传统的”。经济上是“前工业化”（Preindustrial）的。可是到了近代，天津是我国最早建立新式工业、新式对外交通、通讯与通信、新式探掘业的城市之一，一些产业部门在全国还属首创。这些不但使天津城市在走向近代的路途上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也为后来天津城市的成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应当说，早期官办军事工业建立是天津城市迈向近代的特征之一，为什么呢？

就投资总额来看，天津机器局为1000余万两，大沽船坞为200余万两，架设津沪、津京等电报线投资20余万两，修建津榆、津芦铁路投资1100余万两，官商合办的开平矿（包括林西矿）总投资为200余万两，其中集股仅100余万两，其余大部份则是借拨的官款。^②这些近代产业部门的资本总额约为2650余万两。就这些近代产业部门工人数目来看，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共有工人3600余名。开平矿和林西矿有工人3500——4000名，有人估计，

^①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

^② 参看孙毓棠，《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当时的铁路和电报工人至少也应有2000——3000名。这样，官办企业的工人总数应在10000人左右。

与近代天津的外资企业和民族资本相比较情况如下：

| 类别 科目 | 近代天津官办官 商合办企业 | 外资企业 | 民族资本企业 |
|----------|------------------|-------|--------|
| 资本总数 | 2650 万 两 | 100万两 | 60万两 |
| 工人资 | 1 万人 | 1310人 | 1500人 |

这就是说，近代天津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资本总数，占了当时天津全部近代企业资本的94.3%。是外资企业资本总额的26.5倍，是民族企业资本总额的44倍多。近代天津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工人数，占当时天津近代产业工人总额的78%，是外资企业工人数的7.7倍，是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工人数的6.7倍。这说明，官办企业在开埠初期的天津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占了绝对优势。此外，官办企业的资本总数甚巨，而工人总数相对较少，也说明这些企业生产规模大，技术和设备先进。

官办企业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天津旧的生产方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建立起近代化的机器大生产。同时也改变了传统天津的阶级与职业结构，造就出天津第一批产业工人。官办企业的出现，还加强了天津同邻地区——如唐山——的联系，带动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大大提高了天津城市的地位和作用。

然而天津官办企业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在西方，近代工业的发达程度，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的集中表现。天津的官办企业，是封建政权用钱“买”来的，既不能代表中国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不是出自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自然要求。技术和设备再先进，在封建政权的经营控制下，也很难以引发城市的巨大进步。

另一方面，天津开埠以后，虽然迅速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

经济体系中，旧有的经济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以对外贸易为中心的开放型的港口贸易城市经济结构渐渐形成，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伴随着近代大工业的涌入，工业资本应当有一个适应性的发展。可是由于旧有的封建体制的制约，不能使那些旧式商人和官僚、买办手中积累的资金，顺利的向资本转化。

近代天津城市工业的发展，并非缺乏资金。1872年李鸿章筹设轮船招商局，在津的粤籍商人拟筹本银30万两，公举商总承揽。但李以其“资力不厚”而未果。1887年李鸿章决定招股修筑津沽铁路并拟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招股章程。开平铁路局也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后又改名为中国天津铁路公司），汇丰银行被指定为公司的收款银行，公司名称的变更，表明中国的铁路建设已开始突破了地方的局限性。

然而，由于轮船招商局的官商作风，以及无视投资人对公司事务的过问，严重影响了天津商人投资铁路的积极性。“没有人把股金存入银行。合股公司的观念，不能投合大多数投资者的心意，……他们不信任一切经营管理的方式。”^①据1887年（光绪十三年）4月29日的《北华捷报》报导说：“当问起天津的资本家们何以不愿附股时，他们答道，我们不相信这班官员们。他们谈到招商局，局中有他们的资产，而处理这些资产，则从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对局中事务已无发言权。他们怕铁路公司也将管理成这个样儿，投资人对公司事务将无权过问。……天津的资本家和商人们很愿意筹集筑路所需的全部资金，但以保证投资者利益不被剥夺并让他们取得对企业应有的管理权为条件。……这是李鸿章尤其是周馥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只好努力向山西票号和盐户求取资金了；所有这些字号和商人都不愿意支援。”^②

李鸿章为增加投资者的信心，5月底又发表声明，诚恳地推荐

① 肯德：《中国铁路发展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29页。

② 恽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料》，中华书局，1963年，第1册，第135页。

这份章程，强调中国铁路公司一定按照外国股份公司的模式，把业务管理权交给由股东大会所推举的董事会，并摒除官方的干涉，他还要求资本所有人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仔细考虑公司计划的正确性，和这条铁路给沿线带来的利益，希望资本所有人踊跃认股。但大家仍担心这样的声明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①以至这种动员虽至“舌敝唇焦”，仅招得商股银10.8500万两，不得已于天津海防支应局借拨银16万两，又以周年五厘轻息，向英商怡和洋行借用银63.7万余两，德商华泰洋行借用银43.9万余两，然后铁路始得告成。

当然，其它的制约因素也是有的。例如：比起其它一些沿海城市（如上海），传统天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开埠以后。资本积累的过程自然也相对缓慢，天津周围的腹地经济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无力为城市提供大量的资本，也无法吸收城市的大量工业产品，这一点造成对外国缺乏潜在的吸引力。即使到了《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许多城市的近代工业，在该条约的“鼓励”之下都得到发展，但天津的外资企业和民族资本仍未因此取得长足的进步。^②

开埠以后，天津港对外贸易的巨额入超，洋货充斥，使本地的白银要有相当部分输送到上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发展。

天津作为首都的门户，近代以来，屡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尤其是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使天津早期近代工业遭到全面的破坏，失去了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自然也是影响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所以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前，天津的近代工业一直不足以改

① 前引《中国铁路发展史》第29页。

② 施坚雅认为：“1895年的《马关条约》可以看作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转折点，因为该条约鼓励在数量上大大增加的开商口岸中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城市史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一辑，第94页。

变城市的经济结构。20年代以后，由于民族工业的崛起，以及纺织、化工、面粉等工业基础的奠定，使工业总产值成为城市经济的主要成分之一，天津也由对外贸易型的城市，发展为工商业城市，完成了城市功能的又一次转变。

(五)

一个传统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上的突变，而且应当包含着制度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于这种新经济秩序的调适。这就是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为城市带来文明和进步。

最早由天津这个窗口进入的资本主义文明应是为掌握西方军事技术而兴办的技术教育和军事教育。如附设于机器东局的电气和水雷学堂、水师学堂、电报学堂、武备学堂、天津北洋医学堂等等。其中天津北洋医学堂还是我国最早的自办西医学校。当时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倡设立普通学堂，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在多数人看来，在城市中接受传统教育，参加科举考试才算正途，也是完善城市社会控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特别是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建立，成为我国建立最早的高等学府。义和团运动后，更激发了一般人“启迪民智”的情感，无论是地方政府和士绅，都在尽力为城居人口创造更广泛的接受基础教育或专业技术教育的机会。各级各类新式学堂迅速在城市中普及。后来这种教育体制又扩展到近邻农村。这一时期天津近代教育的特点是“大吏提倡于上，乡人负重望者主持于下，官绅合力，远近同风，不十年间各级学堂悉备。”^①“询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②到辛亥革命前夕，天津兴办的各级学堂（包括蒙养院）共达150所，不但层次完备，而且门类齐

^①《天津县志·文教》（稿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藏。

^②《袁世凯奏折专辑》第1676页。

全，工业、农业、医学、军事、法政、外语、师范、女学应有尽有。辛亥革命后，私立学校也获得较大发展，如著名的南开大学就是于1919年创办的。在20年代初期，直隶一省各级学堂学生总数，居于全国之首。这不能不与20世纪初期天津所奠定的近代教育基础有密切关系。

生活文化和礼俗文化也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在社会上出现了渐变的趋势。服饰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阶级与身份的标志，也是权力和服从的象征。因此统治阶级十分重视衣着所产生的社会心理作用。在开埠后的天津，服饰和习尚仍从方便实用的角度悄悄地出现了小改小革的趋向，尤以为外国侨民服务的下层人员为甚。《津门杂记》说：“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装置零物，取其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袴，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①追求时尚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心理因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前进；服饰与习尚的凝固，则是社会僵化的表现。

西方式的消闲生活的出现，对中国城居者也产生了冲击。例如外国侨民春秋两季的赛马活动，竟使天津“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②在城市中一件新奇事物的出现，往往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对于长期在封闭状态下过生活的人们，更是如此。

大约在80年代之后，中国城居者的消闲生活更直接受到西方娱乐文化的影响。比如天津城乡的一些盲艺人，开始把一些由外

^① 《天津杂记》，标点本，第137页。

^② 《津门杂记》，第135页。

国侨民带来的古老的世界名曲，搀杂到自己的演出里，到处演唱。其中有《我的各字叫理查·香槟》(Champagne Chavlie is My Name)，《玫瑰李》(Rosa Lee)、《牧场之花》(The pvaive Fowov)、《比利·派特逊》(Billy patterson)以及《上帝保佑女皇》(Good Sare the Queen)等。到了90年代，在一般居民经常出入的杂耍馆子中，除了经常上演的大鼓书、京子弟八角鼓、相声、时新曲子之外，还添加了“外洋灯影”^①也就是早期的无声电影，以广招徕。

在城市中华洋杂处，相互交接的结果，使中国居民了解外国侨民的机会增多了，中西文化和习俗的差异，不能不在人们的头脑中引起反响，孰优孰劣，会油然而生。这一点对于那些文化的知识阶层尤为感受敏锐。他们做了一番比较之后，对于西方社会的某些进步方面，流露出艳羡之情。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租界影响的扩大，以及城居青年接受近代教育机会的增多，一些西方习俗逐渐渗入到天津城市社会中。

天津是传统中国后起的城市，婚丧本有“不拘六礼”的习惯，有人甚至认为“天津有婚丧之事而无其礼，所谓‘婚丧赛会’而已。”^②辛亥革命后，这种“赛会”式的婚礼亦开始革新，迎亲马车首先开始娶代了花轿，运送灵柩也开始由杠夫抬行改为马拉灵车。1905年我国文化艺术界一代大师李叔同之母病逝于上海，李叔同遂挈着扶柩，回津葬母，决定不行吊唁旧仪，并谢绝一切呢绒绸幛，纸札箱彩、银钱洋元等物，仅于当年7月29日开追悼会，由家人致哀辞、献花、行鞠躬礼，再由李叔同弹钢琴、唱哀歌，最后由家人致谢来客行鞠躬礼。^③这种革新之举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赞扬。

① 《津门纪略》，标点本，第97页。

② 高凌雯：《志余随笔》卷6。

③ 高成元：《李叔同革新丧礼的事迹》，《天津史志》1990年第3期。

到了20年代，自由恋爱之风也在青年中流行起来。当时有人写竹枝词记载男女间的谈情说爱情况，“倩影喁喁话柳荫，灯照不觉日光沉，别时密订来朝约，座假中街起士林。”^①婚仪也改变了过去的繁琐礼节，而是“指环互换结同心，不用交杯酒再斟，宾致贺词主中谢，堂前应节奏风琴。”^②

开埠以后，随着天津城市的成长，富有市民特色的通俗文化日渐成熟起来。因为与中国古老的封建文明相比较，天津的地方文化传统是短浅的，始终没有形成深厚的地方文化积淀。又由于天津城市区位的特点是“路通七省舟车”的水旱码头，因而极易受南北文化的冲击。开埠后城居人口空前增多，这些人大半来自北方各地，而且多是靠出彗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社会下层，他们对于文化的需求是偏重实际与通俗化。所以各种富有民间色彩的通俗文化极易在天津获得发展。

京剧是嘉道时期最先由北京传入的剧种，但因极受城居者的欢迎，不久便出现了“戏园七处赛京城”的盛况；业余京剧爱好者也所在多有，如京剧第一代名丑刘赶三，就出身于侯家后群雅轩票房。天津观众嗜京剧如醉如痴，连儿童也乐于学唱，当时的竹枝词说：“只有儿童偏快乐，满街争唱二簧腔”^③。到了同治中叶，京剧又由天津进入到上海^④。由于京剧艺术的普及，天津还涌现出了一批在艺术上有相当造诣的著名演员，许多演员也是在天津唱红后才回到北京或走向全国的。直到40年代，京剧仍是天津一种极时髦的陶冶情绪的娱乐。

评剧是20世纪初期在天津形成的一个新剧种，所以天津有“评剧摇篮”之称。古老的弋阳腔——河北梆子进入天津后，也

① 起士林是天津著名的咖啡厅，初由德商建于中街（今解放路），后迁浙江路今址。

② 转引自张秀英：《冯文洵与〈天津丙寅竹枝词〉》，《天津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期。

③ 《梓里联珠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0页。

④ 马少波等：《中国京剧史》，戏剧出版社，1990年，中卷，第254页。

演出了自己的特有风格，形成了“卫派梆子”。

20世纪以后天津的畸形繁荣，还促使天津成为北方说唱艺术的“集散地”，当时的天津是说唱艺人演出场地最多的城市。书茶馆的老板和演员为了使那些收入不高的下层观众，花一份钱就能看到多种形式的演出，得到较为丰富的艺术享受，创造出“什样杂耍”这一演出形式。即在一个小园子里，同时可以看到相声、大鼓、戏法、踢键、口技等各种表演。后来这一演出形式成了天津说唱艺术的特征。

20世纪初期以后，天津的戏曲演员和说唱艺人名家荟萃，形成了激烈的艺术竞争。能够长期在天津站住脚的演员，多半是其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大批优秀演员的长期演出，又培养出大批观众对戏曲和说唱艺术极强的鉴别能力。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也说：“谁都知道天津这个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名演员，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你要是在天津站不住脚，那你就甭想到江南去，因为江南的角儿都到天津来约，你要在天津能站住脚，挂上号，那你这个演员就算行了。”^①

(六)

近代以前，天津不过是一个府、县的治所，与之同等地位的城市，在当时全国有近二百个。近代以后，全国先后有107个城市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然而在这些被迫开放的城市中只有北方的天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上升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天津城市的快速成长，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应归结于城市所蕴藏的内在因素。

从中外城市的历史状况来看，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经过有机增长的方式发展起来；一种是经过规划建设

^① 《燕都艺谈》，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228页。

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所谓有机增长系指城市长时期在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自发地演进，城市各系统间逐步形成合理的、有机的联系。所谓规划建设系指按照一定意图或规划有计划地建造的城市，城市发展缺少经济动力，其中大多数会随着政治权力的更迭而兴衰。前者为自发地发展，没有城垣，所以也叫无垣城市；后者体现了统治者的人为影响，多筑有城垣，所以也叫有城垣的城市。

若用这两种发展模式来考察天津城市的成长过程，我们会发现，天津更接近于前一种类型。传统的观点认为，天津城市形成于15世纪明王朝的设卫筑城，实际上这是把城垣的修筑与城市的形成等同起来了。天津城市所以能够生产和发展，首先应当归结于她所处的河海冲要的优越地理位置。

自金元以降，随着运输系统的不断完善，地处海河与子牙、南运二河交汇处的老三岔河口一带，因有连樯万艘的漕船停泊而逐渐繁荣起来。元王朝在这里派驻有专门管理漕运输转工作的接运厅，临清万户府以及为水手们修筑的东、西两座天妃庙。从此兵民杂居，人口大量增加，商业贸易也开始兴盛，当时人写诗说：“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粟越布满街衢。”街头上的吴粟越布可能是用于本地消费，更可能会转贩到外地。交通和商业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所以直到明初，这里仍是“商贩所聚”之处。永乐时虽然在直沽修筑了天津卫城，但卫城只是军事指挥机关的所在地，并非城市中心。明中叶以后，为了稳定漕船运丁的生活，允许他们免税携带一定数量的南北土特产品沿途售卖，运河遂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通道，直沽也随之发展成运河北端的著名商业城市，甚至出现了“粮船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①的盛况。沿河一带，“商贾辐辏，骈骖逼侧”，“素封巨室，率萃河干”，而卫城之内仍是“屋瓦萧条，或为蒿莱”^②。

① 吕盛：《天津三卫志跋》。

② 毕自严：《督饷疏草》卷4。

城内四角及城中间为五个大水洼，弘治时，先后在卫城内外设立了10个集市，5个设在城内的不见发达，而设在城外沿河地区的集市却日益兴旺。^① 所以有人认为，明代对天津城市的规划设计，已考虑到天津城市形成的历史特点，采用了“局部封闭，总体敞开”的布局结构，从而为后来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②

清初虽将天津纳入地方行政体制，但城市沿河发展的自然趋势未尝稍改。康熙时，钞关由京津间的河西务移至天津北门外南运河畔，运河商船以及闽粤江浙驶来的海船都要到这里验关纳税，南北商货的大批到来，使这一带逐渐形成了一条随河弯曲的“环城开衢”，并促进了对附近专业性街道和市场的出现。这时天津已成为国内有名的商贸港口城市，沿河两侧市店丛集，“所有富商大贾，百货居集，均在城外”。^③

本来中国城市的地方系统包括两种不同的层次，一种是出于地方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区划和控制的层次，另一种是由于交易活动而形成，并反映了中国社会自然结构的层次，^④ 应当说，天津城市虽是这两种层次兼而有之，但其主导方面则是后者。

自清代中叶以后，外国侵略者逐步认识到了天津城市的经济特点。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首次提出在天津“收泊贸易”的要求。鸦片战争后的“修约”谈判中，开放天津也一直是西方国家的既定目标。及至1860年天津开埠，侵略者欣喜若狂，他们希望天津港“能在重要性上压倒上海或其它敌手，或者至少把那些地区的商业吸引过一部分来”。^⑤ 因此各国租界的划定，完全在海河上游两岸，使租界成为天津港口的航运重心，后来这些地方终于发展成天津城市的经济中心，日本侵占时期，为了加

① (新校)《天津卫志》卷1,“形胜”。

② 参看李森:《天津开埠前城市规划初探》,《城市史研究》第一辑。

③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第1729页。

④ 施坚雅:《城市与地方系统的层次》,参看张仲礼:《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⑤ 前引《天津——插图本史纲》,第25页。

强对华北地区战略物资的掠夺，感到海河的河港码头已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在塘沽以南的渤海湾西岸处，开始修筑人工港口——新港，从此天津港口开始走出市区，客观上为日后天津城市的扩展开创了条件。

总之，开埠后的天津城市迅速成长的历史向我们表明，与中国那些做为政治实体与权力象征的城市不同，天津是做为河海通津的交通枢纽和商贸集散地发展起来的。除了非经济因素影响之外，本质上天津是一座自然发展的、开放型的无城垣的城市。正是旧城市的这种经济火花，才点燃了新城市的发展之火。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历史既不应是对过去的简单肯定或否定，也不应仅仅写成被压迫、被欺凌的血泪史。而是应当通过科学的研究与论证，达到继承过去，面向未来，振奋民族精神，拿起历史的接力棒应付时代的挑战，为创造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天津而自强不息的目的。1986年国务院在批示《天津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中指出：“天津应当成为拥有先进技术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多功能、开放型的经济中心和现代化的港口城市”。这完全符合天津城市发展的历史特点。只要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就一定能够顺利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责任编辑：夏良才）

（作者罗澍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试论列强在中法战争中的“调停”活动

方 堃

1883年爆发的中法战争，在近代远东国际关系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各西方主要列强都趁中法交战之机插足“调停”，在中法战争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本文试图以英美德三国的“调停”活动为主线，探讨这三个国家插手中法交涉的动因，各自“调停”的特点及对战争双方的决策和战争结局所产生的影响，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师长与同行。

一、80年代的远东国际关系对各国“调停” 立场的制约

19世纪的后半期，远东已经成为列强殖民争夺的重点地区。无论是老牌的殖民帝国，还是后起的新兴国家，都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世界的东方。因此，如何对待中法争端，必然会集中反映列强在远东的战略。而了解列强远东政策的实质，则会为我们分析中法战争中列强的“调停”活动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

英法的矛盾和殖民活动对整个亚非殖民势力的划分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80年代初，法国在金融资本干预了国家政治生活的背景下，大力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竭力企图实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称雄地位。它同时在非洲和亚洲两个地区实施其扩张计划。1881年法国出兵占领了突尼斯；同时加紧侵略越南，企图以此为跳板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确立法国在这一地区的霸权。法国疯

狂的海外扩张政策，严重地威胁了英国的殖民利益，加剧了英法之间久已存在的殖民竞争。1882年英国为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不顾法国的激烈反对出兵占领了埃及。这使两国的殖民冲突愈加尖锐化，影响到它们在所有其它方面的关系，在远东，英法既勾结又争夺的外交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危机。英国基于它在远东已有的巨大利益，从根本上对法国的扩张持排斥态度。在80年代的列强对华关系中，英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政治方面，都处在无可与之争先的优势地位。可以说，此时它全部远东政策的着眼点，都在于竭力维护这一优势地位，不容其它列强染指。

然而，我们不能仅以此作为评判英国远东政策的唯一依据。列强之间的竞争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在相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区互相牵制。为此，它们不得不在总的原则之下经常变通具体的对策。由于普法战争后，德国势力在欧洲崛起，为了平抑德国的势力，英国格莱斯顿内阁被迫采取了一种“不做任何可能不必要地激怒法国的事”的政策，借此笼络法国。但英国的埃及行动损害了法国利益，对此它又不得不以某种外交让步求得法国的谅解，印度支那就成了英国对法实施“补偿政策”的砝码。在其“调和与渐进”的对华外交总方针指导下，英国政府制订了“调解冲突与不公开地保护中国完整。同时如果中国给予其它列强任何独占的权利，那么它照例要从北京方面得到补偿”的具体政策。依据这一策略，英国对法国在中国保有“藩属”关系的越南进行的扩张，采取了外交沉默乃至纵容的态度，希望以此缓和法英之间一向紧张的关系。但是必须指出，英国并未将此态度坚持始终，当法国的行动扩大到中国本土并威胁到英国的利益时，它便坚定不移地从维护其利益出发，一方面以远东霸主的地位抑制法国，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调停”，操纵中法议和，达到巩固其在中国地位的目的。

德国在中法战争中采取了一种十分险恶的外交策略。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以后，为了巩固德国的地位，在欧洲执行了“维持现

状”的大陆政策，同时采取各种手段削弱法国的势力，防止法国报色当战败之仇。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俾斯麦迎合法国的扩张心理，将祸水东引，支持法国踏上东侵之路。他预计，支持法国在远东扩张既可以削弱法国在欧洲的实力，又能使英法两国因利益冲突而加深矛盾，陷法国于孤立地位。因此当80年代初法国政府扩大了它在远东的侵略时，德国政府便以各种渠道再三向巴黎表示了它支持法国的立场。这无异于给了法国一个德法和平的保证，对法国形成远东扩张战略起了极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德国远东政策的着眼点是它的欧洲利益。一旦俾斯麦实行的“均势战略”由于远东的影响将要失衡，德国也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它支持的对象施加某种微妙的影响，1884年8月德国对远东策略的修正就集中反映了这种制约力的作用，同时说明它的战略并非一成不变。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似乎被人们忽视了。

美国在中法战争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在迅速的发展，并日益关心海外市场的开发与势力范围的扩大。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指出：“美国在这个时期扩张政策的新特点是干涉，参预西半球以外发生的事件”^①。它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亚太地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此时美国在远东的势力、影响和军事实力，都无法与那些拥有强大远征力量的老牌帝国进行全面抗衡，因此它必须另觅途径来弥补其实力与野心的差距。中法战争的“调停”为它提供了一个大力进行外交活动的机会。美国在避免加入列强实力角逐的同时，希望靠外交活动来扩大它在远东的影响，同时靠扩展商业来增强它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因此，美国所最希望于远东的就是“和平”，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乃是贸易的妨碍。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外交使节们在中法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活跃，屡次主动插手“调停”，甚至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存保等译，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99页。

不惜采取迎合法国的外交姿态来谋求“调停”成功。对美国来说，此时唯有通过外交和商业手段，才能实现其远东战略的目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远东国际关系中，各种矛盾交错复杂。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英美德三国都在向战争的双方施加影响，力图使战争的结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同时还在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策略。这就使中法战争的中外关系更加复杂。

二、英美德三国在战争期间的“调停”活动

中法战争是由法国侵略越南，并企图一举切断中越之间的“藩属”关系，确立其在这一地区的霸主地位而引起的。法国上述行动的目的，在于以越南为跳板，入侵中国的西南地区，并先于英国在中国的滇桂川黔等地扩展势力。“对法国的侵略意图，不仅清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各列强对此也十分清楚。英国的政界与商界就曾认为法国的渗入红河流域，……是对于英国计划上溯珠江，或……经由缅甸以达云南的主要威胁。”^①实质上，中法战争的“调停”活动就是围绕着法国究竟可获得多大侵略权益而展开的。参与“调停”的各列强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按照自己的目标而频繁活动于中法之间，它们的“调停”又都随着战争的进程及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中法战争中列强的“调停”活动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中，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手法和策略，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阶段：

(1) 在1884年6月以前，德国扮演了主要角色。它不露声色，在幕后活动，支持法国在远东的扩张，为它通风报信，出谋

^① 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毅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划策，鼓励它发动战争。

先看看此时正急于插足远东事务的美国。它知道“调停”成功不仅可以阻制战争，而且可以促进美国在华势力的增长，弥补无实力与列强相匹敌的“缺憾”。美国此时的驻华公使杨约翰曾说：“中国政府愿意获得美国的帮助是我非常重视的事情。……鼓励这种情感的发展，将增进我们在亚洲的势力。是我执行公使任务中的经常目的”^①。而清政府对美国，则一直认为其“较为公顺”，李鸿章就曾公开表示，美国不象其它列强一样只顾私利，而是经常给予中国“友好的劝告”，他对此十分赞赏^②。1883年6月，李鸿章奉命与法国特使脱利古在上海谈判，杨约翰积极插手，分别会晤了双方代表，就此拉开了“调停”的帷幕。

此时美国“调停”的基点是尽力保证和平，维持远东的现状。杨约翰劝说脱利古不要在远东发动战争，理由是这样做不会促进西方的对华贸易。这使脱利古十分反感。在和李鸿章的接触中，杨约翰力图说服李对法国在越南的行动忍让，以避免两国间军事对抗局面的产生，因为中国不具备与法国对抗的条件^③。李鸿章对杨约翰的态度很感兴趣，7月6日，他正式提请美国政府出面调解，对此美国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它指示美驻法使馆探询法方的意向和条件；同时拟定了一份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文件。中国方面8月8日将六条谈判要点交送美方转法国政府，形势似乎对“调停”十分有利。然而法国却关闭了谈判的大门，8月9日，法国军舰开始封锁东京湾；同日，法国政府命驻各国公使向驻在国发出照会，宣布它将在远东采取行动。8月11日，法国政府正式拒绝了由美国驻法代办交送的有关调停的公文，并且表

① 《美国外交档案》1883年，转引自解汝辑《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1956年，第2卷，第189页。

②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61—1893, Series 2 V.5, The French-China, p.104.

③ 同上，第87页。

示：“法国不接受任何调停与公断”^①。美国第一次“调停”的努力遂告失败。

此次“调停”为时不长。法方从一开始就怀疑美国的目的，早在7月中旬，茹费理就曾公开表示对美国的“调停”不感兴趣，脱利古也曾提醒其政府：“一个第三国的干涉可能阻挠我们在安南和在东京的行动，使我们与中国的争议更加复杂化”^②。实际上，美国的目的在由它转送的六项谈判条件中借它人之口已经表达了出来，即：使“红河的航运和东京的商业将对所有国家开放”^③，这恰与法国独霸越南的远东战略相悖，法国当然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在美国积极进行“调停”的时候，英国持做“壁上观”的态度，等待着对它有利的时机出现。英国的纵容，坚定了法国既定的以战争手段实现扩张计划的决心，也导致了美国第一次调停的失败。

1883年8月25日，法国以武力胁迫越南阮氏王朝与之签订了《顺化条约》，将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脚下。法国在越南取得“保护权”和封锁东京湾等行动，损害了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英国无法继续沉默，态度开始有所转变。9月初，英国外交部指示驻法代办就法越战事与法国外交部接触，英国国内舆论也对法国进行了指责。而正是此时，法军在越北丹凤之役中遭到失败，这引起了法国国内反对派的强烈指责，法国政府被迫采取措施以摆脱危机。9月5日，法外相沙梅拉库指示法驻伦敦大使瓦定敦，要求英国进行斡旋，并想办法说服英国支持法国的立场。9月8日，瓦定敦向英国提交了法国的提案，提出以设立中立区和开放蛮耗作为中法和解的条件，同时他又声明，法国无意停止对越北法军的战争增援。英国对法国的登门求助表示欢迎，鉴于设立

①② 1883年8月11日法国外交部记录，《中法战争》七，第174、176页。

③ 同上书，第175页。

中立区于英国利益无大的妨碍，而开放商埠似乎还可以促进贸易，英国同意了法国的条件^①。英法两国就“调停”的基点达成了一致，只剩下由英国“劝说”中国接受法国的条件了。但是中国方面坚持不做退让，拒绝了法方的条件。英国的“调停”没有取得进展。

英国的初次“调停”，暴露了英法在远东问题上既矛盾又勾结，共同对中国进行外交讹诈的面目。英国此时仍以姑息的态度对待法国的行动，并希望以增加开放口岸作为自身利益的补偿，因此没有在外交上给法国制造压力。这样，它的“调停”只能助长法国的侵略气焰，加快其侵略步伐。

在英国进行“调停”的过程中，法国不断增派援军。11月，在北圻的法国军队已达9000人。它决意要以武力强占包括山西、兴化、北宁在内的红河三角洲地区。这使英国开始忧虑它在远东的利益将受到更大损害。为此，英国试图再做努力，阻止战争的扩大。11月18日，英国政府提出由某欧洲国家或由美国“仲裁”中法争端的建议，希望以此造成对法国的某种压力^②。对此，法国未予采纳，但瓦定敦也代表法国政府再度重申，其舰队不主动攻击中国的通商口岸。法国以这种形式既表明了它决心一战的态度，同时也向英国保证，战争不会妨碍英国的对华贸易，以取得英国的谅解。

作为接受“调停”的一方，清政府在12月10日通过英国向法提出了自己新的议和条件：法国放弃对红河以北的领土要求；红河中立化并向各国商业开放。很明显，这一条件符合英国的利益，有利于它的商业和在印度支那争夺霸权，故而英国对此表示了支持的倾向。但是法国没有接受这一条件，也没有理睬格兰维尔的压力。这更加引起了英国对法国野心的警惕和厌恶。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英国还需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再做决

① 1883年9月13日瓦定敦致沙梅拉库，《中法战争》七，第185页。

② 1883年11月18日格兰维尔致瓦定敦，同上书，第199页。

策，它显然不愿将自己的全部赌注都压在越南问题上。英国再次采取了观望态度。

法国此时拒绝英国的劝告，决心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幕后再次取得了德国的支持保证。在9月封锁东京湾时，德国就表示了支持，柏林外交部指示在华人员不要违反封锁令^①。12月11日曾纪泽请德国出面调停，柏林马上将此消息通报了巴黎。俾斯麦还亲自会见了法国大使，不仅再次保证了德对法的支持，同时为法的军事行动出谋划策，提议法国增派更多的军队去远东。他特别指出，德国对法的支持不能完全公开，因为那样“于法国内阁将害多益少”。他还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如果法国政府由自己来结束他自己的事务的话，当较依赖一外国，如英国和德国的干预以摆脱困难更能满足法国的自尊心”^②。俾斯麦的此番筹划可谓用心良苦，同时也反映出德国的对法政策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制约。尽管它怂恿法国在远东侵略，但却不敢露骨地公开支持茹费理内阁，以免使其受到反对派更大的攻击而陷入危机。它厌恶英国“调停”，但又不能因公开反对而惹恼英国；引起英德之间公开的外交对抗。于是俾斯麦运用了幕后支持法国的策略，借以控制局势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用这种外交方式，德国有效地抵消了英美对法国远东行动的压力和影响。

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到1884年初，法军在越南战场因兵力不足而无力扩大进攻，英法两国又因埃及问题发生对抗。法国为了缓和它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拼全力给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一方面也表露了议和的意向。但是，英美两国均未能及时做出反应，而德国却看准了这一时机，通过德籍中国海关税务司、李鸿章的亲信德璀琳，操纵了中法议和。³

^① 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乔松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2页。

^② 参阅《中法战争》七，第204—208页。

月初，他受法国方面的委托，开始沟通中法之间的联系，游说于李鸿章、张之洞等清廷要员之间，使谈判重开。在德璀琳的撮合下，李鸿章与法方代表仅进行了一次谈判，就签订了《天津简明条约》。

对于这一条约，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曾经评价说：“它给了法国一张在越南的空白支票，而且是法国保护中国的第一步。”^①然而除却条约本身，赫德所最关心的是由于德璀琳在议和中的作用，“德国的势力将因他而高涨，英国人的势力却衰沉下去”^②。赫德和德璀琳的关系，正是英德两国在远东和中国的关系之缩影。对德璀琳的活动，赫德早生妒心，为了英国的利益，他曾企图暗中破坏此次议和。当条约签订之后，德璀琳的身份徒增，使赫德更加不安，他甚至自叹“得意的日子也许会完了”^③。对德国来说，天津议和与条约的签订确实是一大成功，尤其是笼络了手握实权的李鸿章，使德国的势力在更大程度上打入了清廷的最高决策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德璀琳在华的活动毕竟仅是俾斯麦既定的远东战略中的一小步棋，甚至与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均势战略”有相悖之嫌。因此对由德国出面进行公开“调停”，俾斯麦此时并不感兴趣。

(2)《中法天津简明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换来清政府所幻想的和平，也没有满足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法军急于完成对越南北部全部领土的占领，以图进一步对中国西南各省实施侵略。1884年6月23日，法国蓄意挑起了“北黎冲突”，以中国背约为借口，要挟清政府撤军和赔款，战事再起。对此，英美德之间各怀鬼胎，积极插手，形成了以“北黎事件”为开始标志的“调停”高潮。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50页。

② 同上书，第158页。

③ 同上书，第159页。

7月13日，法国方面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赔款撤军。总理衙门于7月19日再次邀请美国依据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出面调停，美国又一次周旋于中法之间。华盛顿方面反复劝说法国接受美国的公断，并指出：“此非仅关系法国一国，抑且关系着与中国有庞大商务关系的各国”^①。然而法国此时占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所以有恃无恐，决心用武力获取更有利的结局，对美国的调停，断然予以拒绝，并肆无忌惮地在8月5日炮击基隆，其海军舰队也先期开进闽江口。8月中旬，法国议会又增拨3800万法郎战费，并增派援军东来。8月23日，法舰袭击马尾港；26日，清政府下令对法宣战。

对法国直接攻击中国本土和通商口岸，并且传闻还将攻取舟山^②，英国十分震怒。法国已违背了其承诺，而舟山属于英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英国绝不容许法人染指。它在伺机以做出外交反应。

这时，德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俾斯麦一改以前幕后支持法国的做法，不再掩饰德国的立场，公开为法国的远东侵略活动撑腰。同时他又通过外交渠道向法国表达了德国的意向：不希望远东战事无限制地扩大，经费理应将在远东的作战限制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上述外交动作说明在支持法国的背后，德国又有了其它目的。笔者认为，促使德国改变策略的原因，并非是其远东的利益使然，而是德英关系的恶化。

在1884年初，俾斯麦开始公开支持德国资产阶级的海外殖民，并在此后的非洲殖民扩张中与英国发生了冲突。时至8月，两国矛盾日益尖锐，俾斯麦认为：“只有在我们和英国处在良好和可靠的关系上，法国在海外的纠纷才对我们有利。倘此关系一受任何影响，法国在欧洲的势力因为在海外的纠纷而削弱一事就没有好处了”^②。因此他不希望法国再继续无限制地扩大它的远东侵略

① 《法军侵台档》，〔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735种，第13页。

② 施丢克尔：前引书，第194—195页。

规模，导致欧洲力量对比改变，使“均势”的欧洲失衡，使英国占据上风。他希望借重法国在欧洲的部分力量，利用他与法温和的共和党人政府之间良好的关系和法英之间的宿怨，在欧洲给英国造成压力，保护德在欧洲的利益和地位。但他又不会反对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也不希望法国就此收兵。故而在继续支持法国的同时，俾斯麦以“善意建议”的姿态修正了他的远东策略。

自8月中旬开始，德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贯彻它的新策略。一方面俾斯麦拒绝了德国海军部派遣海军到中国去的建议，以使法国人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同时他通知法国政府，德国将在中法冲突期间不允许德国军官赴华工作，武尔康船厂为中国建造的两艘装甲舰受命缓赴东亚。巴兰德也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人，如他们参加战斗，后果自负；并警告德国船主不要运载中国军队。另一方面，9月14日由俾斯麦亲自出面，德国开始在柏林自任“调停”。

此时美国则在致力于美国式的“调停”。战争的拖延给法国带来了内政、外交和财政上的重重困难，美国抓住这一时机，企图在中法交涉中攫取“调停”的主导权。在20余天的时间里，杨约翰急不可耐地向中方提了几次方案，频繁出入于总理衙门。他不惜改换了“同情中国”的面孔，压清政府答应给法国赔款，以迎合法国，求得中法双方同时对美国调人资格的承认。但总理衙门没有接受他的条件。10月1日，杨约翰又径电法驻沪总领事，提出四项议和方案，其中有“法军暂时占领基隆”，“听美仲裁”的内容，再次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与法国进行交易。从承认法国的对华索赔权，到承认法国对基隆的暂时占领，表明了杨约翰“调停”策略的重大调整。美国这种外交让步的背后有着十分隐密的目的，这就是美国希望能以“仲裁”的方式，掌握中国东南国门——台湾的命运。

美国早已瞩目台湾。台湾作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必经之路，是美国未来在远东地区扩张的重要战略目标，任何国家对台湾的

长期占领，都将成为美国在东亚扩张的障碍，它在1874年积极支持日本入侵台湾，就是为了“得地分肥”。在8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更加关注台湾的归属，防止其落入它人之手。法国在对华作战中，很早就曾策划过占据台湾为基地来保障法海军在远东的行动，并以它作为向清政府索取战争赔款的“担保品”。对法国的意图，美国十分警惕，它担心法国的目标一旦实现，将成为日后美国在远东发展的巨大障碍。但是它又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来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只能依据自己的原则，通过外交活动来限制法国的行动。当美国再度“调停”时，看到法方侵略胃口很大，并不因获得一定的利益而满足，一再增兵，这使它相信，法必欲得赔款，占台湾而后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为了使“调停”获得成功，从而握有“仲裁”台湾归属的权力，就不惜调整了“调停”策略，承认法国对基隆可以“暂时占领”。法国对美方的这种姿态虽然表示可以接受，但并没有停止军事增援，15000人继续开往远东。而中国方面始终不允法军占台和对法赔款，加之此时英国也已插手中法交涉，美国的“调停”遂告中止。

(3) 中法战争的继续扩大，迫使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严令南北洋派兵轮援台，并对桂、滇边境战场增派冯子材、王孝祺两军驰援。但与此同时它也希望平息战争、稳定局势，企图借助列强的“公断”来结束战争，由此形成了多方谈判、“调停”四起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英国政府为了防止“中国走入德国和美国的怀抱，英国人和英国的利益将被抛到一边”^①的结局发生，加紧了它的外交活动，力图独任“调停”操纵全局。

10月4日 正当美国力图使中法双方接受它的“调停”时，英国外相会见了法国驻英大使瓦定敦，对他施加压力。格兰维尔表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50页。

示“他一方面不希望中国市场由于长期战争而枯竭”；另一方面，中国的任何胜利将普遍对欧洲人产生严重后果。”^①这无疑是在给已经处境维艰的法国一个警告。在法国国内，以激进的共和党人为首的反对派激烈批评法国政府的殖民政策；在远东战场，法军的攻势随着淡水惨败和陆战兵力缺乏而再次陷入停顿。困境迫使法国人重新坐到了谈判桌旁。10月16日，茹费理指示驻华公使巴德诺：“法国舆论的情况，列强的意向，以及我们在它处应照顾的重大利益都要求我们，如果可能应赶紧获取一个光荣的解决”^②。紧接着，法国人向伦敦传递了“接受英国调停”的信息，并将法方提案交给了格兰维尔。为了维护英国利益，尽快结束这场已经损害了英国远东商业的战争，格兰维尔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法国“赔款占台”的谈判立场，声称法国的条件“与他所提出的差不多一样”^③。这样，法英两国在“调停”的基点上再次达成了默契，由此把美国的“调停”抛到了一边。

历史现象的出现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但又确实是受种种因素制约的现实过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法国屡次拒绝了美国的“调停”建议，最终却主动接受了英国人的“调停”，这是什么原因呢？人所共知，法国在远东最危险的竞争对手是英国，它在采取行动时尽量避免引起与英国的直接对抗。它也十分清楚，法国必须有国际支持者，德国的支持是靠不住的，它最终会再次成为法国的威胁力量，而其它国家尚无契机可以与之结盟，因此法国选中了英国。茹费理知道，英国不会容忍远东战争长期延续而损害其利益；不断产生的国际纠纷促使英国迫切希望在远东结束战争；英国又不愿法国战败，因为中国的任何胜利一般说来对欧洲人会有严重后果。这样，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出现了两个竞争对手间的协同。

① 季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许步曾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页。

② 1884年10月16日茹费理致巴德诺，《中法战争》，第269页。

③ 1884年10月24日，瓦定敦致茹费理，同上书，第270页。

10月23日，法国宣布封锁台湾，企图压服中国，同时借此刺激英国为自身的利益而加速“调停”，共同胁迫中国接受法方条件。封锁在正负两方面对英国人产生了效应：一方面一封口气强硬的外交公文表示了英国对此的强烈不满，使英法两国歧见加深；另一方面，出于对全球战略的考虑，英国又害怕“中国身上的伤口”，“将周期性的溃烂，这对全世界都将是一个讨厌的东西”^①，因此格兰维尔加快了步伐，由英国居间的“调停”在北京和伦敦同时展开。

此次由英国政府出面进行的“调停”，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英国一直牢牢独揽“调停”大权，格兰维尔坐镇伦敦，一手抓住曾纪泽，一手拉住瓦定敦，赫德则在中国全力协助，奔走于总理衙门和各决策人物之间。英国政府把“拟定一些基于中国是较弱一方的条件”作为“调停”的起点，对中国极尽恫吓压服之能事，企图胁迫清政府接受法方的条件。对法国，格兰维尔却是施加压力和表示理解一齐使用。为了使法国在获得某些利益后尽快停战，他更多的是向法国表示关怀，为它出谋划策。他甚至向法国建议以实力取得谈判主动权，以攻取淡水来增加谈判桌上的筹码。但是由于中国方面不接受法国的全部侵略条件，谈判双方分歧甚大，交涉几致中止。

在英国的调停活动处于搁浅边缘之际，赫德的作用突出地显示出来了。作为调停者，赫德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他一方面可以通过心腹金登干从英国最高决策人物那里获得指令；另一方面则可凭借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身份，依靠他“阴持朝政，综管邦交”的巨大作用，对清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在英国政府停止了公开“调停”之后，赫德就扮演了“调停”的主角，操纵了中法秘密议和。

赫德深知，如欲使“调停”成功，必先结束“厨子太多”的局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4页。

面，排斥其它列强的插手，独揽议和大权。他很快就达到了目的：茹费理同意以赫德作为唯一居间人；清廷则命令京津沪粤各处谈判全部停止，这使赫德“把事情统统抓在他自己手里”。赫德老谋深算，当大权在握后，他改变了由英国出面给茹费理内阁和总理衙门一齐施加压力的做法，把“调停”的重点集中于了解法国的条件和诱迫清政府让步上。因为他知道，结束战争的关键在于能使清政府满足法国的贪欲。赫德的努力终于产生了结果，1885年2月28日，他的四款方案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赫德的调停并非一帆风顺，正在他加紧游说清政府的时候，法国却加紧了它的战场攻击。在陆路，1885年2月13日法军占领了越北要地谅山，23日攻陷了中国西南门户镇南关；在沿海地区，2月12日法国宣布行使交战国的一切权利，28日宣布大米为战时违禁品，禁止商船运载，同时法舰沿海岸线北上，骚扰浙东沿海。法国的上述行动，再度引起了英国的愤怒。对大米的禁运，伦敦以强硬的态度拒绝承认和服从这一封锁，以保护在华英商的利益。对法国胆敢直接攻击浙东地区，英国摆出一付要与法国正面对抗的姿态来保全它的势力范围^①。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再持默许和纵容的态度来对待法国打这样一场严重威胁英国利益的战争了，它公开反对法国扩大战事的企图。因此，笔者不同意将英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笼统地归结为“基本上采取了支持法国进行侵略”^②的结论。实际上，在远东的英法关系尽管有着列强侵略的一致性原则，但是殖民主义者之间的争夺受其本性所驱使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1884年的“调停”中，格兰维尔曾公开通知法国：无论其将来得到什么贸易特权，英国也将提出同样的要求。笔者认为，在80年代英国的全球战略中，远东已经成为其殖民扩

① 参阅《浙东筹防录》卷一(上)，第16页。对法军占领普陀的企图，英国领事表示：“如法军往占，英国愿助中国驱逐。”

② 参见熊志勇：《对美德两国关于中法战争态度的考察》，《中法战争史论文集》(一)，第53页。

张的重要利益所在。英国既没有也不可能甘心以牺牲它在中国的巨大利益来换取与法国的和解，它对法国的“补偿政策”并非意味着英国将让出自己远东霸主的宝座，相反，英国对法国在远东进行战争的容忍是有限的，随着战争的扩大，英国公开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英国对法态度转为强硬，这仅是茹费里内阁继续进行战争的障碍之一。它在国内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兵员缺乏，士气低落，财政匮乏，政局不稳，激进派猛烈抨击政府的远东政策，民众也已经“对战争厌倦了”。最后，战局的变化对法国“以战胁和”打算给了致命的一击。3月底，中国军队在越北的东西两线战场分别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和临洮大捷。当法军在远东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茹费理内阁倒台了。在赫德的一手包办下，法中两国在4月14日匆匆签订了停战协定。清政府在胜利声中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三、有关列强“调停”活动的几个特点

综观英美德三国在中法战争中的“调停”活动，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英美德在中法战争中各怀鬼胎，争相插手“调停”，都企图通过中法交涉，谋求在远东获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与特权。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困难乃是所有外国的机会”^①。在中法战争期间，无论是英美的外交政策，还是德国的“均势”战略，都带有明显的争夺霸权的色彩。它们趁火打劫，都企图把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它们插手“调停”，“阳则议和，阴则做祸”，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法国做交易，都力图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由于各种因素

^① 季南：前引书，第13页。

的制约，以及列强在华经济政治势力的不平衡，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干涉方式。英国和美国积极活动于中法交涉的外交前台，尤其是美国公使杨约翰更为活跃，在衙门上下、京津沪之间奔走，力图使美国的“调停”成功。英国则以远东霸主的面目出现，利用它在清政府的巨大影响，区别对待两个“调停”对象。对清政府它时而诱降、时而施加压力；对法国它随着形势的变化变换策略，改变脸谱，运用外交手段，把握时机，排挤它国势力，掌握主动，使事态的发展有利于英国的远东利益。德国的方式不同于英美，它利用一切可乘之机，先是采取幕后外交的形式，尔后又公开站到了前台，鼓励法国向远东扩张，并自始至终给法国以外交支持。德国的远东政策，在“调停”活动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二，在中法战争中“调停”的起伏与整个国际形势和中法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紧密相连，同时受到国际关系的制约。就法国来讲，当国际形势对它不利，或国内矛盾尖锐，战场遭到挫败时，它就暂时接受“调停”，当上述情况稍有变化，它就诉诸战争，拒绝和谈。就列强而言，当他们的利益相互冲突或受到损害时，他们就更加急迫地插手“调停”，企图趁机捞一把，得到利益补偿。由于慈禧、奕訢、李鸿章等在战争中采取妥协求和的政策，又由于列强的诱降和插手“调停”，所以在中法战争的全过程中出现了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边打边谈的局面，显示出战争几起几落的状况。

第三，谈判多头进行，伦敦、巴黎、柏林、北京、上海、天津都是谈判场所，正如赫德指出的：“整个中法谈判就是一件反常的事。……它们双方的争执，倒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插手来试图解决的公开地盘”^①。中法战争中的“调停”一直纷繁交错，各种势力的代表，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争先挤进“调停”圈子，企图

^①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177页。

以此获取好处。它们都利用了清政府妥协求和，急于结束战争的心理，开展了各式各样的阴谋活动，官方的、私人的、以“客卿”身份参与的，以首相身份参与的，好不忙碌，以求做成交易。

第四，英美德都以公正人的面目出现，但它们都在战争中左袒法国，助纣为虐。列强侵略的一致性原则使各国对华外交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不能让被侵略者取得胜利，即使是法国的进攻已经威胁到各国的在华利益时，列强也没有放弃这一出发点。它们从提供煤粮物资到提供军事情报，使法军在军需补给和临战决策方面获利不小。对中国它们则百般刁难，甚至连清军在沿海地区进行军事设防都横加干涉，暴露了帝国主义“调停”者的真面目。

特点反映了实质。上述中法战争中列强“调停”的特点，充分反映了19世纪80年代列强在远东和中国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共同对中国进行掠夺的侵略面目，同时，也向人们揭示了某些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规律。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方堃，195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罗素访华平议

冯崇义

先进的中国人在五四时期开始带着自觉的心态走向世界，他们热切地希望吸收异族文明的优秀成果来再造中国文明。当时，中国学术界从西方请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而杜威和罗素恰巧又是西方百科全书式大思想家的最后两位代表，他们相继来华，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也引发了许多问题。

罗素于1920年10月12日偕女友勃拉克女士兴致勃勃地踏上中国的土地，迄1921年7月11日扶着病躯归去，行及上海、南京、杭州、汉口、长沙、北京等地，发表了《教育三效用》、《爱因斯坦引力新说》、《布尔札维克与世界政治》、《宗教的要素及其价值》、《中国人到自由之路》等10余篇单篇演讲和《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数学逻辑》等5大系列演讲。

罗素演讲的听众甚多，各大报刊更竞相刊载其演讲记录，盛况空前。但是，没有一位产生广泛影响的人物不引起争议。在罗素来华之前，他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相当崇高：他是一位非常渊博的大哲学家、一位社会改革的导师、一位勇于为民请命的耿介之士^①。而罗素在来华之后却不可能满足所有中国人对他的期待，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十字路口上，而且内部张力和外部拉力

^① 参阅张松年：《独立精神宣言》附记，《新青年》第7卷第1号；《志罗素》，《晨报》1919年12月1日。

均前所未有的，中国知识界在中国应该选择何种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深深地陷入了分裂，那时罗素的思想也处于相当复杂、矛盾的状况之中。罗素给中国人带来希望、带来鼓舞、带来有用的知识，也带来了误会和困惑。回首往事，罗素造成的误解和困惑的那些地方更值得人们思考和回味。

一、罗素与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

一般认为，罗素访华是五四时期中国那场社会主义论战的直接导火线。这没有疑义，因为那场论战的起点确实是张东荪随罗素赴湖南之后所发表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张东荪在该文中说，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实业，社会主义应该缓谈。他还说，“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①罗素被张东荪等人引为同盟，而且罗素又发表了一些批评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国内学术界便据此判定罗素在中国站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一位社会主义者被描述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此中有诸多误会。

1. 罗素的社会主义反思期

问题还得从罗素本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谈起。现代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其基本的特征是：第一，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谴责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第二，认定这种不合理性不是根源于不变的人性，而是根源于人的历史性错误；第三，倡导以新的生产关系与新的社会道德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秩序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第四，提出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并建立理想社会的纲领。但是，在理想社会的具体模式、实

^①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又见《新青年》第8卷第4号。张东荪早年留学日本，1912年出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秘书，五四时期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部长，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显赫人物之一。

现理想社会的具体途径等问题上，同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们却分歧很大，因而便自然地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

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行程始于1895年—1896年间。罗素于1895年专门到德国去研究“社会民主主义”。当时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世界范围内最具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政党。罗素在旅德期间广泛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领袖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人交往，比较全面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德国的实践。1896年初，罗素返回英国，受聘为由费边社会主义者创办的“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位讲师，讲授他在德国的研究成果。他随即将讲稿汇编成书出版，这就是罗素的第一部著作《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罗素在该书中赞赏“社会民主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政党学说，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它是关于整个世界与人类发展的自成体系的哲学；一句话，它相当于一种宗教与道德体系。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判断马克思本人或他的追随者的那些目标与信仰，将会忽略掉他们在整体上与精神上的伟大性”^①。不过，当时罗素前脚踏在社会主义的门槛上，后脚仍留在自由资本主义的阵营中。他支持诸如自由贸易之类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且还争取作为自由党候选人竞选议员。

罗素从自由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个重要因素促使他完成这种转变。其一，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与罗素的和平主义立场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绝望，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民族之间的残杀。用罗素自己的话说，“看在和平的份上我将拥抱社会主义”^②。其二，战争使罗素与英国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素到英国各地进行反战演讲，特别是参

① 罗素：《德国社会民主主义》，1896年伦敦英文版，第1页。

② 罗素致奥托琳，1914年11月某星期三。原件藏加拿大罗素档案馆。

与领导“拒服兵役联谊会”的活动，使他有幸深入到英国工人群众中去。当他发现不少工人读过他的哲学著作并具有浓厚的理论兴趣时，他的兴奋程度并不下于当年发现同样情形的马克思。罗素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是，在实践上，他1915年正式加入了英国工党并以工党左翼自许，直接投身于下层工人的运动；在理论上，他发表了《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等一系列著作，清算了自己的过去，尖锐地批判了自由资本主义及其理论表现形态如自由主义、边沁主义等，并且鲜明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与信念。

但是，罗素作为一位社会主义者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保持着独立性，他从未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心全意地托付给任何一个党派。罗素颂扬社会民主主义，但他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并未建立组织关系，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一直多有微词；罗素与“费边社三巨头”——韦伯、瓦拉斯和肖伯纳私交甚笃，但因为反对他们的“国家崇拜”思想和帝国主义倾向，他与费边社的关系一直若就若离；他在思想上曾经明确表示归宗于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兼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两者之长、而又避免了两者之短，但他与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柯尔等人的关系一开始就产生了严重龃龉而无法合作；罗素在组织上与英国工党的关系最深，但是，因为不满工党上层那种与现存制度妥协的势利倾向，他一直只是挂名党员，既拒绝参加领导工作、也极少参加党务活动，并在入党40年之际终于愤激地退出了工党。

从个人气质上说，罗素讨厌纪律的束缚与意识形态的枷锁，宁愿承受“众叛亲离”而在思想上离群索居的痛苦，也不愿须臾放弃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没有充分的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对罗素来说根本不可思议；就罗素的个人雄心而言，他也不希望通过日常的行政工作来实现他那些远大的目标，他对琐碎的事务主义不屑

一顾，他希望游离于严密的组织之外，通过自由写作与演讲来实现他的抱负。

罗素在访华期间正处于对社会主义的反思过程中。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将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推向最高峰。他一度激进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号召英国工人采取“直接行动”并在英国建立苏维埃^①。罗素政治思想的高度亢奋状态一直持续到访苏前夕。他在1920年2月26日发表的一篇演讲中宣告世界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从大战中产生出来的一切新事物中，最重要的便是现在有一个大国居然已把社会主义实施起来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罗素作为一位和平主义者，居然还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使用暴力和实行专政等行为辩护，指出那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人类为了迎接更美好的未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②。

但是，1920年5月11日至6月16日的苏俄之行，却引起了罗素对社会主义的深刻反思。在这种反思过程中，罗素经常使用一些引人注目、甚至于危言耸听的词句来提醒人们关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些难题。

罗素反思得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权力分配问题。本来，罗素的社会主义思想包含一个非常突出的观点，认为经济制度上实行公有制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绝不是充分条件，社会政治的充分民主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不可或缺。他指责“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将那么多的权力赋予国家和政府官员乃是荒唐之极。在罗素看来，要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理由之一就是要打破权力的垄断，而如果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经济权力和政客们的政治权力统统转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手中，这显然是造成更高度的权力垄断，从而这种权力垄断

① 参阅约翰·斯拉特：《里兹发生了什么事情？》，《罗素》第4期。

② 愈之译：《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1920年2月26日罗素在伦敦之讲演》，《东方杂志》第17卷，第18号。

所带来的祸害比资本主义社会还要大。而且，一旦权力通通落入政府官员之手，国家成为雇主，工人仍然是雇佣工而毫无权力，这样，社会主义事业对于工人阶级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①。

罗素在考察了苏俄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俄国革命的实践证实了他的论断。在罗素看来，苏俄社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是名副其实的“革命贵族”：“他们在实际上掌握了全部权力，从而他们也享受到了数不清的好处。他们并不奢华，但他们绝大多数人比社会上的其他人吃得更好、生活得更为安全舒适……。”^②他认为苏俄的现实已经证明，以往被“国家社会主义派”视为万应灵丹的财产公有和经济平等，实际上并不是实现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最主要条件；如果社会政治权力分配不均，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意义便微乎其微。而权力的平等化在罗素看来并不象财富的平等化那样简单，它需要高度的技术水平、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这又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俄国还远远没有具备条件^③。这样，社会主义事业在俄国那一类落后国家中取得真正的胜利，被罗素视为是相当遥远的事情。

与此相应，罗素对实现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需的具体道德条件也想得很多。在苏俄的现实中，罗素看到布尔什维克比西方社会中的资本家更倾心于强制劳动。在他看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实际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他们真诚地认为他们正在使世界获得新生，但他们却创造了一种很容易导致腐败的制度；第二类是因为革命的胜利、带着利己的动机而跻身于布尔什维克的队伍，其中包括帝俄时代的官僚和警察；第三类是出于爱国或有利于专业工作的考虑而参加新政府的职业工作者。除极少数外，他们将经不起权力和财富的引诱而堕落^④。特别是，罗

① 罗素：《社会改造原理》，1916年伦敦版，第137页。更完整的论述见罗素：《工业文明的展望》，1923年伦敦版，第153—154页。

②③④ 罗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伦敦1921年版，第30—31页、第162页、第78—79页、第128—129页。

素认为，要造就适合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意味着要减弱或消除社会政治生活中人的那些基本欲望：占取欲、虚荣心、竞争欲和权力欲^①。

既然现代社会的一些邪恶现象光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还无法消除，罗素又开始思索这些现象是否还有更深刻的根源。罗素得出结论，社会的有机化、政府权力的膨胀、个人自由受限制、劳动强度增高等现象，与工业大生产本身有内在的联系。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那些弊病更为突出。因而，罗素向中国人指出这样一种令人痛苦的事实：“实业上也是如此，当初总不免有点专制的事情，无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都一样；俄国是行共产主义的，但实业不发达，所以专断不在资本家而在政府。……俄国现在的情形，与英国当初，甚为相近——工作苦、时间多、压力大、不准罢工。所以无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实业初发端时总不免如此”^②。罗素认为，要消除机器对人的奴役，还要在经济制度变革的基础上做更大的努力。他甚至引述别人的话将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当代的重要事实，并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而是工业文明与人文价值之间的斗争”^③。

通过反思，罗素还认为，布尔什维克有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的倾向。他说布尔什维克已经将指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宗教化。因为他们抱持教条主义的态度，不允许人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任何怀疑，而不管这些怀疑是否公正，是否有事实根据。罗素一贯认为，确立教条的绝对权威，是对人类智力的自杀，而且在实践中必将带来灾难^④。

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罗素对社会主义采取了非常现实和冷静的态度。他不再笼统地讴歌和呼唤社会主义，而是将注意力

① 罗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第128—129页。

② 罗素：《社会结构学》第1讲，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3月2日。

③ 罗素：《工业文明的展望》，序言。

④ 罗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第8页，第113—114页。

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好处以及在实践中如何落实和保证这些好处。

2. 罗素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真意

将罗素视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最主要的理由是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本来，罗素也曾为是否应该对布尔什维克提出批评而苦恼过，因为他深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任何批评都会被资产阶级利用，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在他的社会主义友人中间引起误会。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的神圣事业本身，他必须对他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一切都直言不讳。

罗素与那些恶意攻击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有根本的区别。罗素充分地肯定俄国十月革命是比法兰西革命更有意义的历史事变；它是人类为了实现美好理想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正改变着人的日常生活、社会结构、以至于人的信念。说得更具体一些，“俄国革命最重要的一面在于，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次尝试。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所必需的，而且我认为，俄国革命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点燃了实现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希望之火。作为对共产主义的最后成功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辉煌的尝试，布尔什维克主义理应受到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敬仰和感激”^①。

那么，罗素何以要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罗素的本意有两层。其一，如罗素自己所说，“这如下这些方面我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一致：为了使工业大生产成为人的奴仆而不是主人，绝对有必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有必要深刻地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有必要深刻地改变现存的哲学、艺术和个人关系。只是当在我看来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已经偏离了他们的目的，我才批评布尔什维克。”也就是说，罗素认为布尔什维克依靠暴力、依靠少数

^① 罗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第5—8页。

人的专政、依靠宗教般的狂热，无法在人间建立共产主义天堂^①。

其二，罗素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不适用于西方工业发达的国家。罗素提出的主要依据是，一方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有机化程度已如此之高，根本经不起长期内战的破坏；在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在近代几百年的历史中已经学会了、也习惯于通过民主、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

罗素还提出一种观点，在一个象俄国那样工业落后、民众教育水平低、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来推动社会进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也比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有利于未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一场试验已经失败了，但它恰恰是在落后国家迅速地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一种理论和严酷纪律^②。

既然罗素认为在俄国那样的落后国家中有必要实行布尔什维克主义，既然罗素认为中国与俄国一样也是工业落后国家，那么，他便没有理由在中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罗素访华期间，他批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言论也传到了中国^③。但那些批评是罗素针对西方而说的。当中国那些害怕或不愿意看到中国“赤化”的一帮先生们试图借助罗素的那些言论大作文章时，罗素立即起来进行反击。罗素在给《劳动导报》的信中指出，他从未反对布尔什维克所怀抱的理想^④。他在给《上海生活》编辑部的信中严正声明，他从未“嘲笑俄国”、从未指斥“俄国无产阶级所犯的错误”、也从未说过“俄国农民中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

①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第7页。罗素承认，在革命政权极不稳固的时候，采取一些非常手段是必要的，在那个时候革命领袖们根本无暇考虑革命手段与革命目的之间的矛盾。但罗素坚持认为，从长远的角度说，神化国家、迷信暴力，只能使社会主义事业迷失方向。

②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第171页。

③ 参见展瀛译：《批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新青年》第8卷第4号；袁振英译：《罗素——一个失望的游客》，《新青年》第8卷第4号；愈之译：《罗素新俄观的反响》，《东方杂志》第18卷第8页。

④ 转见《晨报》，1921年5月13日。

他提醒那些编辑先生们注意，他最近在中国一再说过布尔什维克是“勇猛、能干之士”、苏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他还警告《上海生活》编辑部说，“我担心你们已经被资本家的新闻媒介引入迷途”^①。

当罗素面对中国的听众时，他高度地评价了布尔什维克的理想；即使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所訾议，主旨也在于提示中国人采纳其方法时能够总结经验教训而有所补救。罗素在中国就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了两场专门演讲。第一次是1920年10月在长沙所讲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他在那一演讲中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形势下、顺应世界的潮流而产生的，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平等、消除战争、铲除商业主义、人人自食其力，等等；罗素也指出，马克思本来是指望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爆发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却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弊病是对外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对内采用强硬手段压制人民，因而，实现共产主义最好是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②。

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第二次演讲是1920年11月在北京女高师所讲的《布尔塞维克底思想》。他在那一演讲中进一步为布尔什维克的动机辩护。针对资产阶级舆论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攻击，罗素反击道：“人家所最反对布尔塞维克的地方，正是布党最高尚的和最好的地方；……布尔塞维克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公理’，以为如男女的关系，国际间的关系，经济上的关系，社会间的关系……，一切都应该是公公平平地来讲公道的”^③。

3. “中国到自由之路”

“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五四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是罗素在访华期间指示给中国人的方向。中国学术界之所

① 罗素给《上海生活》(Changhai Life)编辑部的信，1920年12月21日原件藏罗素档案馆。

② 罗素：《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3日。

③ 罗素：《布尔塞维克底思想》，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29日。

以产生误会，误以为罗素反对五四时期的中国选择俄国人的道路，主要原因是拘泥于罗素的片言只语而忽略了罗素全部在华言论的基调，忽略了旅华期间罗素思想的重大变化，忽略了“社会主义”一词在罗素那里的特定含义^①。

罗素旅华之初对中国现实的隔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踏上中国的广袤国土的时候，罗素对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惊讶不已。更对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贫穷落后感触良深。且不说他对中国文化某些部分的眷恋，仅就从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这一角度说，罗素也情不自禁地急切期待中国能迅速改变其落后面貌。但是，罗素在访华之前并没有机会考虑过中国应如何改变其落后面貌的问题。他以前在社会哲学方面倡导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是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他也没有想到，当他对中国现实还完全陌生的时候，中国主顾便会将他视为改造中国的导师而向他索取改造方案。他更无从晓得，中国思想正处于波涛翻涌、浪花四溅的时刻：有人主张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有人主张从经济上改造、有人主张从政治上入手、有人主张实用主义、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有人主张国家主义、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主张实业主义、有人主张社会主义。

因而，罗素来华访之初被问及中国的“改造方案”时，或者支吾其词，或者凭直观随便应酬。罗素来华第三天，在上海七团体举行的宴会上发表即席演说，一面说欧美在发展实业过程中破绽毕露，一面说中国改造当以教育为第一义^②。如果杨端六没有误传，罗素在居沪期间和去湖南途中又对他说过，开发工业有依靠

① 毛泽东1920年12月写信给留学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并未将罗素视为社会主义的敌人，他将罗素在长沙演讲的《布尔礼维克与世界政治》归纳为：“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并断言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直到1923年思想最激进的共产主义者瞿秋白也仍然将中国共产主义者与罗素的分歧视为社会主义者内部的分歧。瞿秋白《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新青年》季刊，第一期。

②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年10月16日。

资本家、依靠国家、依靠工人三条路可走，中国工人阶级幼稚，中国政府又腐败无能，所以目前发展实业非靠资本家不可，将来要越过资本主义阶段，则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①。据记载，罗素1920年11月9日在讲学社的欢迎会上又说了这样一番话：“兄弟对于中国改良的方法，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开发中国财源，以为现时应该从教育入手，应该从平民教育入手，把人民智识增高。到那个时候，再采用社会主义。若未到这种程度，即行采用，如俄国今日大多数人民智识尚未发达，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终不免于失败的。”^②

罗素对中国新知识界的内部论争不知底蕴，面对一个落后国家提倡实业与教育，本来平淡无奇。他说“社会主义”在苏俄也还未实行，表示他所指的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张东荪等人想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于是便化平淡为神奇，对罗素的片言只语借题发挥，以加强他们关于中国尚没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的论点。张东荪等人后来为这种拙劣的招数自食其果，这是他们所始料莫及的。当时很多人都立即指出张东荪有断章取义或假传圣旨之嫌。邵力子著文说：“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罗素先生底话。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资本主义底覆辙。东荪君不要祇采用他半截话啊！……罗素先生教训我们不要再蹈欧美资本主义底覆辙，正是恐怕‘有了资格’以后已是焦头烂额感受十分痛苦；那么，现在谈论社会主义，至少也可算得‘曲突徙薪’，怎么说是‘必定无结果’呢”^③。另一位作者引述罗素《布尔塞维克底思想》的演讲，指出它“一可以洗刷罗素但提倡实业

①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期。杨端六在罗素离华之际又发表《罗素去华感言》，提及罗素在中国“主张以俄国的方法对付现在之问题”，但不加任何评论。见《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期。

② 《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

③ 力子：《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新青年》第8卷第4号。

教育的谰言，一可以堵住说中国无讲社会主义必要的先生们的口舌”^①。更有人指出张东荪等人的“假借附会”比起北京政府要将罗素当作危险思想的传播者驱逐出境，手段更为卑劣^②。

实际上，罗素当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形成明确的主张，他在大庭广众中只能语焉不详。中国进步思想的泰斗陈独秀急不可耐，认为罗素作为一位社会主义思想家没有理由反对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直接写信向罗素问明原委。他在信中说：“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所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③。据称，罗素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

罗素认真地思考“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始于1920年12月。他12月10日在中国社会政治学会所作的《未开发国之工业》的演讲中指出，“在鲍尔希维党得志于俄国以前，群以为社会主义之实行，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达以后，即社会党人亦作如是想，马克思之意见即是如此，柯茨基指出之遂引起李宁之激烈的答覆；鲍尔希维党以为俄国工业之发达，自始即可应用共产主义，旧有之俄国工业，经此次大革命，业已扫地无余；故目下之俄罗斯，自工业上言之，可以谓之一新国；……此种试验之结果，必大有影响于人类无疑，……”。不过，当罗素在中国第一次将苏俄的经验普遍化的时候，他还相当小心。他给中国人提出的具体建议还模棱两可，一方面说“俄

① M·U·，〈读罗素演讲的感想〉，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1月30日。

② 汉青：〈罗素的不幸〉，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4月1日。罗素的“临别赠言”发表以后，他批评张东荪等人“假借名义”的行径，措辞更为辛辣。汉青：〈“假借名义”的听得吗？〉，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15日。

③ 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8卷，第4期。

国所选择之方法”为“最良之方法”，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在技术方面求助于俄国不如求助于英美^①。

前文提到，因为罗素在中国宣传“危险思想”，北京政府曾在1921年3月间考虑要将他驱逐出境^②。但罗素的“危险思想”究竟指哪些言论，我们不得而知，有可能是指罗素赞美布尔什维克的言论，更有可能是指那篇被上海共产党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③。

罗素直接号召中国人效法苏俄，是他留给中国人的“临别赠言”，也就是罗素在中国的最后一场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Chian's Road to Freedom》）。这篇演讲实际上是罗素改造中国的纲领，他在其中向中国人提出了十多条建议，包括“必须打破中国传统”、“必须以现代教育为长远之计”、“必须发展爱国主义”、“必须从政治改革入手”、“必须依靠一万果敢坚毅之士”、“俄国的方法适合于中国”、“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之出路”、“社会主义必须保护自由”、“必须迅速掀起强大的运动”等等^④。而对中国的道路抉择问题最重要的一段话是：“求国民的智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非资本主义的产业方法有多种。有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有工团主义，有国家社会主义〔即〕俄国所采用的，有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会社会主义，只适用于产业已经发达的国家。在产业幼稚的国家，依我的意见，应用资本主义或国家社

① 罗素：《未开发国之工业》，《杜威罗素讲演录合刊》，第45页，第50—51页。

② 关于这一传闻，参见石岑《怀罗素》，《时事新报》1921年3月29日；汉曹《罗素的不幸》，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4月1日。

③ 罗素：《共产主义理想》，英国《先驱日报》1921年10月19日。

④ 以上所列都是罗素英文原稿的小标题，曾由《北京导报》（Peking Leader）原样刊出，《哲学》杂志也曾刊出傅铜依英文底稿译出的译文。见《北京导报》1921年7月7日；《哲学》杂志，第3期。

会主义。故现在若欲我答如何能免资本主义而发展实业，我必说第一步惟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固然有许多的黑影，但是最容易促成实业和教育的进步，我相信这类方法，比较等到教育上和实业上达到和英美一样的程度，然后再来祛除资本的流毒，总要好点。”^①

罗素明白不误地主张中国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这番言论对张东荪等人来说非同小可。本来张东荪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而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他很自然地将罗素视为精神上的导师与同道。罗素来华之初，他甚至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②。当罗素来华之后又曾说过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与教育，张东荪更觉得他与罗素志同道合、已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而，他赞叹道：“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没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诀窍……。”^③

张东荪万万没有料到，罗素在中国的时间愈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愈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效仿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短短几个月间，张东荪觉得罗素已判若两人。罗素在他看来已变得那么陌生、那么不可思议、那么可恨。张东荪深深地感到罗素将他卖了，但又不好立即发作。在罗素离华后半个月，他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对罗素申诉“几句不满的话”。他抱怨说，“罗素先生的这一篇中国行自由之路上有许多地方和他向来的主张相矛盾。如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社会主义未假

① 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

② 张东荪《一个申说》，《改造》第3卷第6号。当然，罗素等人在英国所倡导的“基尔特”是工人群众的产业联合体，与中国当时资本家所组织的“同业公会”根本不是一回事。这是张东荪及许多中国人没有搞明白的。

③ 张东荪：《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新青年》第8卷第4期。

说中国最好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往自由之路上却说非采用劳农专政不可”^①。

其实，罗素旅华期间的思想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其前后言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却未必真有矛盾。张东荪指责罗素的言论刊出后，立即有人站出来为罗素辩护。傅铜指出，因为欧美与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罗素给欧美人和中国人提出的方案常常刚好相反；罗素初到中国时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最合理想，“乃为欧美各国说法”，这与他在临别赠言中仅中国人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无冲突^②。成平所说的一段话，也可视为对张东荪的反驳：

“罗素于劝中国发展实业之下，尚附有其他条件，不为机械的奴隶，不蹈资本主义的覆辙，凡此皆与资本主义者所主张开发实业之目的不同。”^③

由此看来，罗素在五四时期中国那场“社会主义论战”中并不站在张东荪等人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罗素基本上是一位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他居然劝导中国人选择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这倒是意味深长的。由此而生的一个疑团是，中国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没有将罗索引为同道？这一方面是因为，罗素来华初期中国报刊上关于罗素不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等报道，已经使人们对他形成了成见。在另一方面，尽管罗素也主张中国应该“走俄国人的路”，他与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重大差别。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满怀初恋情结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万应灵丹，罗素则只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通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个特殊

① 张东荪：《后言》，《时事新报》1921年7月31日。

② 傅铜：《致张东荪先生书》，《哲学》杂志，第3期。傅铜曾在英国攻读西方哲学达7年之久，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是聘请罗素来华讲学的联络人，“罗素学说研究会”的召集人，《罗素月刊》的顾问、《哲学》杂志的主编。

③ 成平：《罗素、勃拉克讲演合刊》编者序言。成平即成舍我，这位大报人时为北京大学学生，“新知书社”社长。

步骤，从一开始就指出还必须依靠高度的自由民主来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向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当时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一种包罗万象而又富于战斗性格的意识形态来接受，罗素则仅仅是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捷径而并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其他方面^①。罗素与五四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者上述观点之短长，历史似乎已经作出了结论。

二、罗素与中国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罗素旅华引起的另一场重大风波，便是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一些赞美之词，导致了中国人之间的又一场“国粹”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认为，罗素与继他之后不久旅华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样，同属于“东方文化派”。将罗素视为一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其误会并不比将罗素当做社会主义的敌人更小些。

1. 罗素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

不少人常常会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或“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其内容而言，确实同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极其相似。其情形恰如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启蒙运动时所说：“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顾名思义，正是要全面更新中国的文化，也就是要以现代文化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更新民族心态，重塑国民性格。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在形式上根本区别于欧洲。当中国重演欧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

^① 参阅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又见罗素：《中国之问题》，伦敦1922年版，第1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经历过的思想运动或精神运动的时候，它并不是要以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新文化”来代替自己过时的“旧文化”，而是要借西方的文化来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新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基本同一的。这样，“古今之争”也就被掩盖在“中西之争”的帷幕之中。更有甚者，这场文化运动本就肩负既要抵抗西方又要学习西方、既要振兴中华又要鞭打中华的矛盾使命，而它正在走向高潮的时候又与“西方文明的破产”这一声浪不幸遭遇，在那斑驳陆离的历史画面中，交织着希望与失望、期待与忧思、执着与混乱、亢奋与迷惘、进取与无奈。

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被中国主顾视为通晓一切的圣贤而自身却对西方文明和人类命运满怀悲怆意绪的罗素来到了中国。他似乎注定要让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失望。在中国当时的启蒙战士看来，罗素在来华之初，确实发表了一些不知就里的言论。在中国主顾为之接风的第一个宴会上，罗素便依照他本来的思维逻辑放言：“中国固有之文明，如文学美术，皆有可观，且有整理保存之必要。……往者欧洲尽力奖励生产、开发实业，力求物质文明，迨夫今日，破绽毕露，是又欧洲错误之经验，而中国不必效法者”^①。紧接着，罗素在第一场学术演讲中又提到：“鄙人初来中国，觉得种种事情，都有兴味，而对模仿西方之各种事象，终觉得可厌。若中国将来因发达产业而使固有之审美上、精神上有价值的事事物物，逐渐丧失，实觉可惜”。也是在这一演讲中，罗素告诉中国人说，老子关于“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信条与他本人关于“鼓吹创造的冲动、而减少占有的冲动”这一社会改造的总原理完全一致^②。

既然最杰出的西方大哲学家尚还称赞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西

① 《沪七团体欢迎罗素记》，《晨报》1920年11月16日。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10月14日的报道《欢迎哲学家罗素记》，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但大意相仿。《申报》的报道则添油加醋，详下。

② 《罗素在沪之讲演：社会改造原理》，《晨报》1920年10月17日。

文化论战中那些反对西化的保守派与调和派当然感到鼓舞。当时保守色彩较浓的《申报》在报道上海七团体欢迎罗素的宴会时，特别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罗素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而且特意将罗素的有关演讲辞译为：“现代欧洲之思想，多激烈破坏及纷乱之状态，妒忌以之而起、战争以之而生，诚以当初过渡时代各种过渡思想有以误之也，中国殊不宜学之。夫中国古代有甚好之文明，及今中国国民尚谨守之，凡中国人之一举一动，一事一物，未受欧化之影响者，均有至可羡慕之处，此皆中国固有之国粹也，不宜弃之。”^①

但是，当时保守派和调和派的主将们并没有直接借罗素之威迅即反击对方。倒是当时的新文化派首先紧张起来并立即作出了反应。一种态度是假定《申报》的报道为真，指出罗素的失策，以周作人为代表。他著文说，“罗素初到中国，所以不大明白中国的内情，我希望他不久便会知道，中国的坏处多于好处，中国人有自大的性质，是称赞不得”^②。另一种态度是揭露《申报》为混水摸鱼而篡改了罗素的原意，以张崧年为代表。他是慕名从北京赶到上海见罗素的，并亲自参加了上海七团体的欢迎宴会。他以见证人的身份辩驳《申报》的歪曲报道。他指出，罗素答辞的目标是鼓励中国人确立一种“于已有的道路以外另开一条新路的精神”；正是抱定希望中国人创新的宗旨，罗素才提醒中国人在振兴工业时，不要采用已在西方带来恶果的“商贾主义、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罗素虽然说过中国的文学艺术有可取之处，但这是特指为西方“过胜的商贾主义”所毁坏了的某些艺术，绝不能笼统称为“保存国粹”。张崧年得出结论说：“由‘保存国粹’四个字的寻常联想，把此四个字加在最注重创发的罗素身上，

^① 《各团体欢迎罗素博士记》，《申报》1920年10月14日。

^② 仲密（周作人）：《罗素与国粹》，《晨报》1920年10月19日。

吾很恐不但诬了罗素，并要误尽苍生”^①。

罗素明白了中国新思想界的反应之后，便不再片面地为中国传统文化唱赞歌。在“讲学社”举行的欢迎会上，罗素提出：

“中国人不要遗弃中国的好处。而对于西方的好处，也要尽量采入。”这已明显地突出了学习西方的必要。同时他也强调了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例如，他批评中国文字古奥，阻碍了中国学术和教育的发展，并建议简化汉字或使汉字拼音化，以便迅速地“使一般平民皆受相当教育”^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素于1920年12月初给歪曲报道他的言论的《申报》写了一封长信，澄清他对中国文化的观点。他指出，西方人发思古之幽情、爱惜中国的古典美是一回事，中国的古典美已丧失了活力、为中国的生存发展必须不惜代价革旧鼎新又是一回事；如果中国不是要作为一个博物院存在下去，而是要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存在下去，就不能不象欧洲人那样牺牲古典美而发展现代工业大生产；工业大生产、德谟克拉西、科学、新教育等等新事物，正是中国所急需的；中国的希望就在于少数有识之士正满腔热情地谋求对中国的改造^③。

不拘泥于罗素的某些抽象浮泛的应酬之词，而着眼罗素言谈的具体内容，不拘泥于罗素的片言只语，而考察罗素在华的总体言论，我们应该说，罗素的在华言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完全合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具体地说由前后的两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组成，先是民主和科学思潮的惊涛骇浪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中的封建伦理道德及蒙昧迷信思想，继而是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社会改造”的呼号汹涌澎湃。罗素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注入的水滴，我们已经在上文估量，下文让我们品评罗素对民

① 张崧年给《时事新报》的信，见《时事新报》1920年10月15日；又见《国人对罗素的误解》，《晨报》1920年10月20日。张崧年即张申府，时为北京大学讲师。

② 《讲学社欢迎罗素之盛会》，《晨报》1920年11月10日。

③ 《罗素对于中国之第一感想》，《申报》1920年12月16日。

主与科学思潮的具体贡献。

必须承认，除了泛泛而论民主政治是中国和整个人类的理想，罗素在中国并未热情地阐述民主政治的具体内容。罗素当时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并不满意，而且他认为中国连实现西方那样的民主政治也还缺乏条件。但是，罗素对西方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西方实现民主政治至关重要的一面——个人自由，则鼓吹不遗余力。罗素当时在中国所谈论的自由，不仅包括五四启蒙思想家谈得很多的“人格自由”，即要求社会个体内在的精神自由并力求充分实现社会个体的社会价值；他还特别注重五四启蒙思想家除陈独秀外很少注意的“政治自由”，也就是将自由作为社会个体生存的最低原则，反对政府对个人权利的非分干涉。他在演讲《社会改造原理》的时候，呼吁中国人以助长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创造为社会改造的最高原则^①。他在演讲《教育之效用》的时候，指出教育除要提供实用知识外，更要紧的是教人作“合格的人”和“合格的国民”，从而能够实现“由下及上”而不是“由上及下”的健康政治；为要实现这种目标，“教育之方针既不是教人学会压制，又不是教人学会服从，……最要者，在乎教人学会自由，能学会自由后不复以压制施诸他人”^②。他在演讲《社会结构学》的时候又强调，最好的社会制度绝不是黑格尔之流所设计的那种严密得水泄不通的制度，而是能满足各社会个体在不妨碍别人享受同种权利的条件下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③。中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任务，是要革除对中华民族来说特别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无论是媚于鬼神、媚于君、还是媚于官）。罗素同时强调“人格自由”与“政治自由”，当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罗素还同中国的五四启蒙战士一起抨击以等级尊卑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罗素在其“临别赠言”中明确号召中国人一定要

① 罗素，《社会改造原理》，《晨报》1920年10月17日。

② 罗素，《教育之效用》，《晨报》1920年10月24日。

③ 罗素，《社会结构学》第5讲。

打破传统。他指出，“中国古来遗传的文化，以孔子学说为基础，而又掺杂佛学的意味，已经到了自然剥落的程度。既不能成就个人的事业，更不足以解决当中国前面的内外政治问题了”。他特别强调，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的“孝道”伦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人的公共精神与爱国精神的发展，也强化了陈规陋习对中国人心灵的暴戾统治，使中国人不能形成适应现代需要的新观念、新思想^①。

以科学的精神战胜蒙昧的迷信，本是罗素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天职。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无法孕育出现代科学，中国在现代科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是罗素关于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因而，罗素在华讲学时不会忘了本职。他刚来到中国就向中国人表明，“吾为极信科学之一人，以为世界各事，皆惟科学是赖”^②。罗素的《五大演讲》向中国人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精神。他向中国人阐释了数理逻辑、相对论、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方法等20世纪初年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同时，罗素非常强调中国人要养成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他劝中国人对尚未证实的东西都抱持“怀疑的态度”，不要贸然信奉那些所谓“确切不易、万古不变的定理”；他建议中国人一扫“以古书旧说来断定是非曲直”之朽风，摆脱泥古、抄袭、盲从之恶习；要求中国人凡事都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并“依科学的方法来解决”^③。

2、罗素与“中体西用”

罗素关于中西文化的一些言论，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中体西用”。在那本被西方中国学界誉为经典的《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先生就依据罗素说过中国人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只是“科学”而不是“道德”，指出罗素的中西文化观接近中国一些士大夫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④。国内学术界对罗素作如

① 罗素：《中国人到自由之路》。

② 罗素：《爱因斯坦引力新说》，《晨报》1920年10月31日。

③ 《罗素、勃拉克讲演合刊·哲学问题》第46页、第53页、第66页。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是观者也不在少数。但是，经过细心的考察就会发现，这种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

应该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中国哲学中自古以来便有“体用不二”的说法，认为“本体”与“效用”是不能分开的。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体”指“结构”，“用”指“功能”，任何事物都具有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而不会有离开“结构”的“功能”，也不会有离开“功能”的“结构”。不过，当清末洋务派揭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公式的时候，“体”、“用”之分通常是被界定为主次之分或本末之分。因而，我们姑且按照虽不科学但已约定俗成的说法为出发点来讨论问题。

近代中国那些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们，都是将“中学”奉为“高于万国之上”而万不可变的“道”或“本”，而将“西学”视为可以随手采用也可以随手抛弃的“器”或“末”。所谓“中学”，在他们那里指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以及体现这些纲常伦理的制度；“西学”指的是西方居于优势的器械技艺，有时也可包括一些相应的生产方法以及政制、学制。因而，所谓“中学为体”，也就是要原封不动地维护明上下贵贱、别等级尊卑的封建等级秩序及相应的价值观念体系；所谓“西学为用”则是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而相对灵活地采用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方法、以至于某些政治、教育体制。

从表面上看来，罗素的一些言论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公式颇为接近。罗素一再指出，西方文明高于中国文明之处在于西方产生了迦利略、牛顿等科学家，这些人的科学发明使西方人在杀戮方面的效率比中国人高得多；西方人应该教给中国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关于政治的道德箴言，而是科学和技术；西方文明的长处在于科学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在于人生观^①。

^① 罗素：《中国之问题》，第49页、第80页、第205页。

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罗素这些抽象的词句来捕风捉影，而是应该准确地把握那些抽象词句的具体含义，特别是要弄清楚罗素的基本意图和大前提。首先必须指出，罗素明确地宣示，他的《中国之问题》主要是为西方的读者写的。他在该书中再三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有千秋，其出发点并不是要使中国人自我陶醉、固步自封，而是苦口婆心地劝说西方人不要奴役中国，“不要认为我们是高等文明的布道士，更不要以中国人比我们‘低劣’为理由而理直气壮地去剥削、压迫和敲诈中国人”^①。

我们也不难发现，当罗素在比较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时，他所使用的“道德”概念基本上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就在罗素说到西方人所应教给中国人的不是道德而是科学的时候，前面还有一句话：“普通人的道德到处都一模一样，他们有多大的胆就干出多大的坏事，而他们只做他们非做不可的好事”。罗素接下去说，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坏，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充满活力，从而能够干更大的坏事。这种说法就象罗素有时说西方的政府由于效率高反而能比无能的中国政府干出更多的坏事一样，只能聊当英国幽默一笑置之。按照罗素关于人性的观点，人不分东西南北，都具有基本一致的共性，同时兼备善与恶两种倾向。用罗素最得意的说法，就是凡人都具有内在的创造冲动和占有冲动。按照这样一种理解，罗素当然不认为西方人的道德高于中国人的道德，但也不会认为中国人的道德高于西方人的道德。而这一点倒是非常明了：清末“中体西用”派所要誓死维护的儒家封建等级伦理，正是罗素所深恶痛绝的。这从他对等级尊卑及三从四德之类所进行的尖锐批判，和他对自由平等的讴歌中，可以得到证明。

罗素所说的“人生观”也有特定的内涵。他曾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要在获取西方知识的同时，排

^① 罗素：《中国之问题》，第5页。

拒西方人的机械人生观”^①。罗素所批评的西方“机械的人生观”，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本身被当成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原材料”，人们盲目地追求所谓“效率”、“进步”和“无休止的变化”，并在这种盲目的追求中变得欲壑难填、浮躁不安、焦头烂额，只有“刺激”与“绝望”的轮回效应，而享受不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罗素所称誉的“中国人的人生观”，则是特指道家那种“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人生理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那种淡泊宁静、悠然自得的人生意境^②。不管罗素的这种描述是否符合现实，他在这里绝没有主张中国人抵制自由与平等理念的诱惑而以保全儒家所倡导的伦常关系为人生目标。

“科学”一词的内容，在罗素那里又比中国的“中体西用”派所说的“技艺”要丰富得多。撇开前文之所提及的“科学态度”、即依靠独立思考和实际验证来鉴别是非的“工具理性”不谈，罗素所说的“科学”也有非常广泛的意义。且看罗素下面一段论述：“少年中国应该确立这样的目标：保存中华民族所具备的温文尔雅、坦然自若和安逸宁静，结合西方的科学知识并应用科学知识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内条件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国际环境形成的。解决第一类问题包括发展教育、实现民主、消灭贫困、环境卫生和防止饥荒。解决第二类问题包括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发展工业大生产、修改条约并收复通商口岸（可以日本为榜样）、并建立一支强大到足以抵抗日本侵略的军队”^③。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除了精神生活某些方面不属于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所有现代科技、现代武备、现代教育、现代民主政治、现代工业大生产，都被罗素包括在“西方科学”之中。

罗素与中国“中体西用”派最根本的区别也许还在于：“中

^① 罗素：《中国之问题》，第80页。

^{②③} 罗素：《中国之问题》，第12页、第80页、第205页、第264—265页。

“中体西用”派是保守主义者，而罗素是创新主义者；“中体西用”派希望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念体系万寿无疆，罗素赞美中国道家人生理想和人生意境的大前提则是彻底变革中国的传统而开创新的文明；而且，这种革旧鼎新的主要动力是来自西方的现代工业大生产、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社会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说，罗素的主张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他的真正主张是依靠“西学”为主导来变革中国，同时也利用“中学”中的一些有益因素。

中国传统文明的辉煌时光已经成为古远的陈迹，它已丧失了活力并被时代的浪潮远远地抛到了历史的后头，中国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都必须以根本改造中国的传统文明为前提，对于这一点，罗素毫不含糊。我们说过，他在“临别赠言”中就叮嘱中国人要打破传统，特别是抛弃儒家的包袱，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去重塑中国文明。在《中国之问题》一书中，罗素又多次指出，“象所有文明国家一样，中国也形成了阻碍其进步的传统”；“中国土生土长的古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死灭”；“中国人道德方面的重大变革”对于复兴中国具有决定成败的意义；“中国文化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而且这种急剧的变化无疑是必需的”^①。在罗素看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中国文明的更新是先进的中国人必须同时完成的任务。

不可否认，很有一些西方人士主张中国走“中体西用”的路线，中国人越守旧，他们就越高兴。但是，这类人一直是罗素激烈抨击的对象。罗素认为，西方人希望中国停步不前、永远依旧，即使是出于对不同事物的好奇心也不是为训，因为那种人实际上是将中国视为供西方人观赏的古董、而不是供人生活的国家，将中国视同死的化石、而不是活的文明^②。罗素更加看不惯那些别有用心的西方人总是对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按照新时代的要求来

① 罗素：《中国之问题》，第21页、第263页、第261页、第7页。

② 同上，第226页。

改造中国的努力冷嘲热讽。罗素在回击这种人的一位代表人物对他的责难时写道：“他很为惊奇，象我那样羡慕中国传统的人，居然没有主张原封不动地维持这种文明，反而主张大规模地向中国灌输西方的思想。……事实上，只有那些依靠中国的弱点来大发横财的外国人才希望维持中国传统制度中的弊病，以便使中国人无力抵制他们对中国的掠夺”^①。归根结底，希望中国独立富强并在关键时刻给人类带来曙光的罗素，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全面现代化。

（责任编辑：雷颐）

（作者冯崇义，1961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师）

^① 《罗素的反击》，《新一代》（英国），1923年1月19日。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肖 牲

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目的在于恢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的党权，“肃清”共产党的势力，并妄图消灭共产党。胡汉民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①可见，所谓“清党”，实际上不过是“清共”的代名词。本文就“四一二”至“七一五”期间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作一概述。

一、“清党”的酝酿

国民党“清党”的动因，可追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时代。早在1923年11月，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就联名向孙中山递交“弹劾”共产党的报告书，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国民党“一大”时，方瑞麟、江伟藩、黄季陆等再次提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指责这是“党内有党”^②。由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据理力争，他们破坏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企图，才未能得逞。这表明，在国共合作一开始就潜伏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一股逆流，埋下后来国民党实行“清党”的祸根。

①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胡汉民言行录》，上海广益书局1931年版。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录》。

国共合作以后，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上的对立和斗争，从未停止过。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3人提出《弹劾共产党原案》，对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进行无端攻击，说什么这“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提出要“速求根本解决”^①。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共活动愈益嚣张。一些右派分子“专为解决共产派问题”^②，于11月在北京召开非法的西山会议，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西山会议实际上是一次“清共”会议，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反共逆流的大爆发，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前奏，标志着国共联合战线内左右两派的公开分裂。

由于陈独秀等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一味妥协退让，给蒋介石篡夺领导权以可乘之机。蒋介石于1926年3月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提出限制、排挤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这不仅在实际上取消了中共“党团”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担任的领导职务，而且还要将加入国民党的全部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这就使本来就比较脆弱的国共关系，再次蒙上一层阴影。

蒋介石通过北伐极度膨胀了他个人的权势，其军事实力居各派军事势力之首，而且集国民党的党、政、军三权于一身，形成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局面。这就给他尔后凭借军事实力与政治权势进行“清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力量的壮大，引起国内外敌人的恐慌与仇恨。蒋介石就咬牙切齿地说：“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③国民党右派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编：《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1927年9月版。

② 《沈定一报告关于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由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43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训话》，《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出版。

为了实行“清党反共”，首先给中国共产党罗织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一）诬蔑中共“党团”，是“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扩充共产党的势力；适势力既已扩充，即取国民党而代之。”^①（二）诬蔑中共分裂国民党。胡汉民说“共产党把持我们的党部，破坏我们的基本组织，分裂我们同志的结合。”^②右派还胡说什么共产党故意制造国民党左右派，“造谣中伤挑拨离间，使本党领袖不能团结。”^③（三）诬蔑中共操纵和破坏工农运动，反对和破坏北伐。说什么共产党在北伐中“煽动工人罢工，捣乱后方”，“希望北伐失败”^④。（四）诬蔑中共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把持和操纵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这些所谓“罪名”，成为国民党进行“清党”的直接借口。

虽然由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压力，以及鲍罗廷发动的“倒蒋运动”，迫使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主张迁都南昌的阴谋未能得逞，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撤销了蒋的部分要职。但蒋的“清党反共”活动并未因此而收敛，相反却以表面上的让步麻痹了革命者对他的警惕。

蒋介石从1927年二三月间公开反共。他在南昌总司令部总理纪念周演讲时，一面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面诬蔑共产党“有排挤国民党的趋向”，表示“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⑤。这篇演讲是蒋决心“清党”的公开信号。蒋置武汉方面对他的任何限制措施于不顾，从3月开始，在赣州、九江、南昌、安庆等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连续制造反革命事件，为其公开叛变革命进而“清党”，作了精心充分的准备。

① 颂民：《清党》，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

② 胡汉民：《清党之意义》，《胡汉民言行录》。

③ 《肃清共产党分子宣传大纲》，广东特别委员会编：《民众一致起来护党救国》，1927年5月版。

④ 《告学生书》，同上书。

⑤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月26日，蒋介石从江西抵达上海，即与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青红帮头目和新军阀等，商定“清党反共”的阴谋计划。28日，在沪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古应芬、蔡元培、李石曾等召集监委临时会议。会上原则议决“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并责成吴稚晖负责起草文件，以提交监委全会讨论决定，还将此次运动称为“护党救国运动”。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正式举行紧急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共8人出席，占监委总数之2/3。吴稚晖在会上提出《惩办共产分子呈文》，内容有：（一）诬蔑中共“党团”为“共产党决定铲除国民党之步骤”，国民党若“不愿亡党，在内部即应当制止。”（二）现在的武汉国民政府已为“鲍罗廷个人支配”，将来中国受苏俄直接支配，将成为“在变相帝国主义下为变相之属国”。（三）现在汉口国民党中央“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以及鲍罗廷所“盘踞”。（四）“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①会议通过《咨请中央执委会处置各地共籍叛乱分子咨文》，并开列出各地共产党首要分子名单，咨请中执会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各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②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全面“清党”的动员会，为“清党”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

此时，自“中山舰事件”后“出国养病”的汪精卫于4月1日抵达上海。蒋汪进行多次密谈。蒋希望汪能留沪“赞助清党”。由于汪当时还摸不清宁汉双方的底细，加上蒋汪在权力分配上的矛盾，不主张立即“分共”，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③汪表示：“国民党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6日。

② 见国民党广州特别市执委会编：《清党纪念专刊》，1933年4月出版。

③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74页。

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① 蒋汪等谈话会决定，在未召集四中全会之前，采取如下应急办法：（一）由汪负责通知陈独秀，立即制止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不接受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三）各军队及各省党部和团体机关的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应予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不准存在^②。汪精卫于4月6日离沪赴汉，行前曾表示：“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同志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越早越好，总之十五日左右为宜）。”^③ 上述情况表明：汪蒋在对待共产党的根本态度和主张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反共的方法和时机上有分歧，汪主张缓进，蒋主张急进，汪蒋的政见，“亦可谓殊途同归”^④。

与此同时，蒋介石准备先发动反共政变，为清党运动扫清道路。因此，在4月上旬，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和实际步骤：（一）将担任东路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江董琴调离其职，改由蒋的亲信陈群接替。（二）下令解散受共产党影响较大的第一、二两师政治部，后又下令将一、二两师分批调往南京。（三）4月5日发布上海戒严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任命白崇禧和新投靠蒋的旧军阀周凤岐为戒严正副司令，并颁布《战时戒严条例》12条，禁止集会、罢工、游行，对所有新闻报纸实行严密检查和控制等。（四）下令制止中共领导的上海市政府成立，指使其党羽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以篡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五）下令查封上海国民革命军

①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7辑第120页，台北1957年3月版。

② 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8日。

③ 《汪精卫致张静江书》，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30日。

④ 《李石曾复汪精卫书》，《汪精卫集》第4卷。

总政治部及其上海办事处，以排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该部的控制。（六）针对武汉方面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南京的计划，蒋抢先一步，派其心腹杨虎留驻上海，蒋本人4月9日进驻南京。当天下午，南京便发生逮捕进步人士，捣毁市总工会事件。10日，又发生袭击群众游行，逮捕侯绍裘、谢文锦等9名共产党员（不久均被秘密杀害）的严重事件，成为上海“四一二”政变的先声。（七）4月12日，白崇禧颁布取缔上海总工会武装纠察队的布告。在此之前一天，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八）组织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为头子的一批流氓打手，成立“中华共进会”，指派流氓兵痞成立所谓“上海工界联合总会”，与上海总工会对抗。

上述反革命措施，为“四一二”政变作了周密的准备。上海的中外反动势力给蒋介石拨款1500万元，作为反革命活动费用，并且决定大屠杀之后，再给蒋3000万元的巨款，作为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的酬金。

二、“清党”的发动

4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凡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12日，蒋收买大批流氓，扮成工人、学生，袭击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同时命令26军周凤歧部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封锁工会，枪杀工友，逮捕工会领袖，当场打死38人，打伤300多人。当天，白崇禧部还搜捕共产党“首要三百余人，攻破大小机关八十余所，仅一日之工夫，而清党之工作告成。”^①13日，上海总工会为抗议拥有2700人的工人纠察队遭攻击和被缴械，宣布总同盟罢工一天。反动军队对请愿游行的工人群众，又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仅三天，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杀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另有500多人逃亡、失踪。尔后，著名共产党领袖陈延年、

^① 白崇禧：《从容共到剿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54页。

赵世炎等壮烈牺牲。“四一二”政变，成为国民党清党运动的开端。

蒋介石的叛变，博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喝彩和捧场。以江浙资产阶级为主体组成的上海商业联合会表示“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①并加紧为蒋的军事行动筹措银款。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狂妄叫嚣，全国务“灭此共产凶魔，以免遗害子孙。”^②4月15日，蒋介石发布《清党通电》和《清党布告》，声称：“如有藉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执法以绳其后。”^③

汪精卫原在沪提议4月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党内纠纷，但汪到武汉不久因发生“四一二”政变，骤然改变态度，于13日致电沪宁各委员，提出武汉已决定迁都南京，待政府迁宁后再议此事。可是，宁沪中央执监委员执意坚持15日开会原议，并于15日、16日在宁委员改开“谈话会”，到会有蒋介石、吴稚晖、张静江、邓泽如、李宗仁、何应钦等18人。会议决定，定都南京，否认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并通过恢复1926年7月所拟定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以及开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等议案。17日，南京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并举行庆祝典礼；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将查办共产分子一案咨请国民政府执行。这表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事势力，在“清党反共”问题上，开始勾结在一起。

针对沪宁方面的分裂行径，武汉国民党中央4月17日议决，将蒋介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并缉拿蒋介石，“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④。这标志着宁汉分裂的局面正式形成。

当上海、南京开始“清党”时，以“清党先觉”自居的西山

① 见《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之电文》，《时报》，1927年4月14日。

③ 《时事新报》，1927年4月19日。

④ 《武汉国民党中央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279页。

会议派便以上海为基地，与南京政府合作“清党”。6月6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正式恢复了西山会议分子的党籍。这样，西山会议派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在“清党”一致的基础上已经完全同流合污。

根据中央监察委员会4月2日上海紧急会议的决定，南京国民政府于19日发出经蒋介石圈定的“秘字”第一号命令，公布首批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名单，其中包括著名共产党人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等；著名国民党左派徐谦、邓演达、彭泽民、柳亚子、詹大悲等，共197人^①。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接受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案处置共产党首要分子及否认武汉党部所发命令通电》，宣布：（一）对共产党首要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其有叛乱行为业已昭著者，系属内乱罪犯，应依法惩办。”（二）“所有汉口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产生之机关所发命令，一律否认。”^② 蒋介石更提出要以“快刀斩乱麻”^③的手段，去对付共产党。

为指导清党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以统一思想、统一组织、统一行动，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清党委员会。会议通过《清党原则》6条：（一）在清党时期，停止入党。（二）所有党员经过3个月之审查再发党证。（三）混进本党的一切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和腐化分子，一律清除。（四）所有党员须每半个月向所属党部报告其工作，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予以警告，三月不报告工作者，取消党员资格。（五）军队及海外清党办法另定。（六）任命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何思源（未到职，改为萧佛成）、段锡

① 《国民政府通缉共产党首要令》，《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26页。

② 见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315—316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朋、冷欣、郑异7人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①。7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泽如任主席委员^②。10日，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清党条例》11条，包括“组织各省县市清党委员会”，“清党开始及终止时间，由中央清党委员会决定之”，“经各上级清党委员会将审查合格之党员呈报中央清党委员会再行审查，汇报中央执行委员会，最后发给新党证。”^③等等。此外，还颁布了《中央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指派各省市清党委员，组织省市清党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发布“第二期清党”的任务，指出：“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还特地说明：“第一期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④于是，由南京、上海首先开始的清党运动遂在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乃至全国各地陆续全面展开。

为及时指导和加速进行“清党”工作，中央清党委员会从5月21日至6月2日，连续发布三个通告，对清党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作出如下主要规定：（一）“所有各地自动组织之清党委员会限于五月三十日以前将其组织经过及工作情况详为呈报本会。”^⑤（二）“凡各地清党事宜，遵照清党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应由本会直接委人办理，所有各地自动组织之各种清党团体，应即停止进行。”^⑥（三）“各省清党日期限六月一日起八月三十一日止。九月三十日以前须概行呈报到中央，逾期无效。”^⑦（四）“各县市清党委员由各该省清党委员会迭选委

① 《中执常务会决定清党办法》，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7日。

② 8月初，又加深覃振、谢持为中央清党委员会委员。

③ 见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27—2828页。

④ 蒋介石：《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蒋胡最近言论集》，1927年9月版。

⑤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清字第一号》，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⑥⑦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清字第二号》，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派，但即须呈报本会备案。”^①（五）“所有各地未经中央认可之清党委员会，着即一律取消。”^②此外，还成立以胡逸民为主席的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和特别临时预审法庭，以确保“清党”的顺利进行。

三、清党运动全面展开

“四一二”前后，清党运动，除南京、上海外，陆续在全国各省市全面展开。4月20日，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等陆海军将领37人，在南京举行军事会议，通过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恢复党权，拥护4月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建议案，否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等项决议^③。随后，南方各省各军和北方实力派冯玉祥及阎锡山等，均通电声明，表示赞同“清党”。在清党运动进行中，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特地议决：“现在各省正厉行清党，所有各处共产党之机关应悉行解散，共产分子应分别逮捕看管，不得稍事姑容。”^④大批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惨遭监禁和杀害。现将各地“清党”梗概分述如下。

在浙江，4月11日，反动当局搜查省党部，以共产党嫌疑捕去国民党进步人士丁济美、查人伟等20余人，总工会及纠察队被解散。“四一二”政变后，宁波总工会被解散，嘉兴县党部被捣毁。17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指派张静江、蒋介石等11人组成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马叙伦、蒋介石等17人组成浙江省务委员会；陈希豪、邵元冲等8人为改组各级党部特派员。浙江“清党”运动于4月下旬逐渐展开。6月1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张

①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清字第二号》，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② 《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清字第三号》，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③ 《国民政府公报宁字第一号》，《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21页。

④ 《国民政府伤属解散各地共产党余孽机关并逮捕共产分子令》，《革命文献》第16辑第2829页。

静江、蔡元培、陈希豪、沈定一等9人为浙江省清党委员。在清党运动中，著名共产党员宣中华、安体诚、杨眉山等遭到杀害。

在福建。4月初，福州召开“拥蒋护党”大会，议决肃清跨党分子等16条，开始驱逐、逮捕共产党人。9日，福建全省戒严；厦门召开“拥蒋护党”大会，市总工会被监视，市党部被接收。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展云、林寿昌等9人为福建省清党委员，全省清党运动遂全面展开。

在广东。1927年4月初，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反共会议返粤后，根据蒋介石的密令，14日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在广东“清党”，下令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15日凌晨起，开始进行全市大搜捕，包围并解散工人代表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粤汉、广三、广九等铁路工会；缴械工人纠察队；中山大学、执信中学、第一中学等，均遭严重破坏；还查禁《国民新闻》和《民国日报》两家报馆。至15日晚，共逮捕共产党员600多人，工友约千余人。由李济深、古应芬、李福林、陈孚木、邓彦华5人组成广东省特别委员会，主持广东党政及“清党”工作。18日，李济深派兵包围黄埔军校，逮捕共产党员200多人，黄埔学生及入伍生800人被缴械。特别委员会宣布与武汉中央党部“脱离关系”，发表拥护南京政府的通电。广州“四一五”大屠杀比上海“四一二”大屠杀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一周之内，有20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杀害，著名共产党人萧楚女、熊雄、李启汉、邓培、刘尔崧等均遭杀害。5月下旬，中央清党委员会指派李济深、曾养甫等11人为广东省清党委员；指派邓彦华、邓文仪等7人为广州市清党委员，进一步加紧“清党”。

在广西。4月初，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参加上海反共会议后，指令黄旭初于12日将共产党领导人梁六度等13人逮捕；黄家植等共产党人也遭通缉。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绍竑、黄旭初等7人为广西清党委员。

在安徽。“四一二”政变前，安徽已发生“三二三事件”，

省市党部、省市总工会、市妇女协会、江右军政治部等，均被反共分子捣毁，重伤10余人，轻伤无数。4月18日，安庆反共团体举行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会，发表拥蒋清共宣言。同时，芜湖等县市也发生捣毁党部、解散工会等事件。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柏文蔚等7人为安徽省清党委员。

在四川。“四一二”政变前，四川反共势力制造“三三一”流血惨案，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包围市民大会会场，封闭省市县各级党部和省农协、市总工会、市妇联会，搜捕共产党员，搜查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的中法学校、中山学校，共有400多人伤亡，共产党员杨闇公、陈达三、冉钧、漆南薰等均遭杀害。4月9日，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頌尧等7军长联名通电，正式宣布反共清党。4月和6月，成都、重庆两地分别成立“登记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随后下令解散全川学联会、成都学联会等进步团体。

在湖南。5月中旬，由覃振等发起的湖南旅沪同志清党急进会，连续开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铲除共产党及一切反动势力”，然后促成全省“党务与省政之完成”。会议推举覃振为执行委员会主席。23日，湖南国民党右派分子在长沙成立“救党临时办事处”，许克祥、张敬兮等5人为“救党”临时主席团。29日，正式成立湖南国民党“救党委员会”，张敬兮任“清党”委员长。该委员会宣布共产党的所谓“十二大罪状”，反共气焰十分嚣张。除长沙许克祥发动反共军事叛变，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等革命机关和团体被查封，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枪杀外，常德、衡阳、醴陵、武冈、益阳、湘阴等地，先后发生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惨案。7月14日，南京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周震麟、覃振、仇鳌等16人为湖南清党委员。

在江西。6月上旬，在江西的200名共产党员被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礼送”出境。下旬，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李烈钧、程天放等11人为江西清党委员。

在军队。4月25日，在南京的黄埔同学会成立清党委员会。6月底，中央清党委员会指派陈铭枢、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11人组成军队清党委员会。由于军队情况特殊，加上处于军事时期，军队进行“清党”颇感困难，所以，7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军队“清党”停止进行。在冯玉祥领导的国民联军中，7月7日开始进行“清党”，决定“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然后收容之。至于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①9日，全军政治人员一律被解职，加以甄别。为此，将刘伯坚、宣侠父等一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国民联军。

在海外。早在1926年底，海外即着手进行“清党”。6月15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指派萧佛成、周启刚等5人组成海外清党委员会，主持海外“清党”。从6月下旬至7月上旬，派遣各级党部改组委员，重建组织。海外清党委员会还先后向日本东京、美国三藩市、加拿大、古巴、暹罗（今泰国）、法国、墨西哥、印度等地，委派清党委员，主持“清党”工作。

此外，在湖北、江苏等省和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的“清党”，也陆续开展起来。

推翻共产党参与和影响下的武汉政府是南京国民党这次“清党”的一个既定目标。在他们看来，“不把武汉的共产政府打倒，叛党分子阴谋根据地肃清，清党运动不能算成功。”^②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策动和影响下，在清党运动进行过程中，夏斗寅在湖北、许克祥在湖南相继反共叛变，深深地动摇

① 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3辑第152页，中华书局1984年印。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了武汉政权的根基，也为汪精卫在武汉进行“清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6月下旬，蒋介石在徐州会议期间扬言：如果“武汉政府能驱鲍清共，则本党同志均可合作。”其实，汪精卫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呢？汪自郑州会议后，便加快了反共的步伐。在汪等人的指使下，6月29日，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表反共声明，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①。并派兵占领总工会。汪精卫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便是破坏国民革命”。“国民党要一致起来，将他打倒”^②。由此可见，武汉“清共”，亦势在必行。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分共”，规定：（一）置籍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凡于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机关并国民革命军中有职者，应即声明即日脱离共产党。（二）于国民革命未完成前，共产党员不得妨碍革命，并不得假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活动。（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允许，不得加入他党，违者以背党论^③。这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的显著标志，也是武汉方面实行“清党”的一个严重步骤。18日，发表《武汉国民党政委会主席团宣言》，指责中共7月13日宣言和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④。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在《告中国共产党》中，指责中共不接受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要对共产党执行纪律，加以裁制。

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共叛变，中共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此后，武汉国民党便“由和平的分共而进于严厉的驱共”^⑤，一方面明令通缉拿办的共产党员名单，一方面提出制裁共产党员的办法：（一）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各行政任职人员，须一律登记，

① 《国闻周报》第4卷第29期，1927年7月31日出版。

② 《汪精卫集》第3卷。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④ 见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65页。

⑤ 汪精卫：《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477页。

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著名共产党分子，应由地方军警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当即拿办。（三）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四）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①。

在“清党反共”问题上，武汉方面与宁沪两方已经达到完全一致，经过三方协商，达成合作与谅解，由三方在南京组成特别委员会，作为行政党政之最高权力机关。由此可见，武汉与宁沪形成对峙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清共的目标不同，而只是“清党容共主张之不同”。既然三方已趋于一致，宁汉对峙局面自然不复存在，所以随着武汉方面清党运动的完成，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于是告终。”^②

四、几点认识

综观“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清党运动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长期斗争的必然产物，是国民党右派一贯坚持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得到壮大和加强，这对以西山会议派和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老右派，无疑构成严重的威胁。他们感到十分恐慌，不愿意看到北伐战争胜利果实落到共产党和革命者手中，于是千方百计地打击、排挤革命势力，尤其是在蒋介石军事势力极度膨胀的情况下，更不能容忍共产党的存在，因此下决心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一番决战性的较量。他们认为，“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

^① 见《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9日。

^② 陈训正：《清党》，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5辑第2112页，台北1956年12月版。

府，均为共党所把持，感于党国前途之危亡，故首先发难，在沪宁主张清党。”^①他们把这场斗争，看成为“事关本党成败存亡”^②的大关键。这表明：国共合作的破裂有其必然性，合作中潜藏着分裂的隐患，而“清党”不过是国民党右派制造分裂、清除共产党所采取的一种手段罢了。历史证明，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以合作开始，以“清党”、“分共”告终。国共两党这种合作又破裂的关系，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影响。两党实行合作，便加强了革命力量，加速了革命进程，取得了伟大胜利；而蒋、汪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分共”，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国民党内部虽然派别林立，派别斗争严重，但在反共问题上，可以达到相互合作与谅解。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本来是作为国民党的反对派而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并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谴责。但是，当共产党和革命的力量发展壮大，对他们存在威胁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便逐步同西山会议派趋于一致，取得暂时谅解，在反共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宁沪合作，共同“清党反共”。而清党运动本身又是公开为西山会议派“正名”。尔后，汪精卫集团步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之后尘，在通过“清党反共”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的基础上，达到宁汉合流，进而实现宁沪汉三方合作。这样，国民党在分裂两年之后，经过“清党反共”，又暂时得到了“统一”。

第三，中共对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缺乏必要的斗争对策，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党通过清党运动，企图达到消除中共，孤立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目的。应该说，这一阴谋目的基本上得以实现。通过清党运动，大批共产党员及其领导人和工农群众遭到逮捕和杀害，共产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

① 白崇禧：《容共到剿共》，《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第451页。

② 《沈定一报告关于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由来》，《中国国民党两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433页。

由6万人减至1万人。共产党和革命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此，内战代替了合作，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这是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罪恶后果。造成这种惨重的恶果，固然主要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反革命的势力大大超过了革命势力。但与中共年轻幼稚，缺乏理论准备和斗争经验，也不无关系。幼年时期的中共缺乏革命斗争实践经验，尤其是缺乏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尽管联合国民党左派对“清党”也进行过一些斗争并取得某些胜利，但终因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势单力薄，加上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领导，自动放弃领导权，致使中共在强大的反革命联合战线面前，束手无策，吃了大亏。这既是国民党“清党”能够得逞的根本原因，也是共产党在大革命中遭到惨败的主要教训。当然，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他们预想的通过“清党”完全消灭共产党的阴谋。中共通过清党运动的血的教训，变得比较成熟起来，并投入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土地革命战争中。

第四，国民党的清党运动给国共两党关系长期蒙上难以消除的裂痕和阴影。蒋介石、汪精卫等“清党”、“分共”，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背叛了孙中山的遗训，玷污了国民党的旗帜。由于国民党“清党”使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好景不长而化友为敌，并且置共产党员于死地而后快，使共产党员难有生存立足之地，因而在国共两党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使国共关系蒙上难以消除的阴影与裂痕。回顾国共关系史，虽然有过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合作，但第一次合作后的十年内战和第二次合作后的三年决战，实际上都是清党运动所造成的积怨。

（责任编辑：梁尚贤）

（作者肖甦，1938年生，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副教授）

爱国何所罪 青史有定评

——张学良爱国获罪略析

张友坤

张学良将军是一位举世公认的伟大的爱国者。他赤胆为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一心以救国为己任，不计个人恩怨得失，在极端屈辱的逆境中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而今已过九十高龄了。

回顾张学良所走过的漫长道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他的一贯思想。直到现在他仍然热爱祖国，矢志不渝。1990年，他在祝寿会上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会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豈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将军的这一不朽诗篇，充分表达了这位“千古功臣”的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下面就以张学良在不同时期几个重大事件中的态度、作为及因爱国被蒋介石无限期“管束”，作以略析。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息争御侮是张学良的一贯思想

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序幕，从此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愈演愈烈，犹似狂潮。进入民国之后，军阀以帝国主义为靠山，据地称雄，横征暴敛，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致使生灵涂炭，民不遑生，若大的中国，弄得四分五裂，任人宰割。长期处于日、俄帝国主义夹击和控制下的东三省犹为破碎江山的悲惨缩影。生长在这样时代的张学良，自

幼就目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蹂躏，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尤其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横行霸道，使他萌发了爱国抗日的思想意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一个爱国狂，特别欣赏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他崇拜的历史伟人，有宋朝岳飞、文天祥，明朝戚继光、史可法，清末的丁汝昌；以及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将军，英西海战殉国的纳尔逊将军。当他的父亲张作霖希望他成为一代君王的李世民时，遭到他的严正拒绝。从这里可以看出他高尚的品格和志向。尽管他是大军阀的儿子，但是强烈的爱国心却驱使他在思索和寻觅着改变中国命运的途径。

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张学良，从一个军阀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转化为反抗侵略、投身救国拯民的潮流中来，却又有他特定的思想意识为基础的。

第一，他意识到，抵御外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他看来，只有国家的凝聚和结合才能迸发出一道对外的巨大力量，这是反帝爱国的必要条件。

张学良原来是希望学医治病救人，但是事与愿违，他十九岁就入了讲武堂，开始其军事生涯。他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他当初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1927年1月3日，汉口民众集会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游行队伍在江汉关前遭英国水兵刺杀。6日，英国水兵又在九江向码头罢工工人寻衅，杀伤多人。这两起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人民的事件，时称“汉浔惨案”。当时的张学良还站在北伐军的对立面，是与北伐军干戈相向的，但1月12日他在北京与英国某要人谈汉浔惨案时却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

贷。”^①是年春，他在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写道：“此前虽奉父命出师河南作战，‘但念同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快快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②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于22日午后全部占领上海。当时张学良正在郑州督战，即与奉系将领韩麟春自河南前线联名发出对时局的通电，表示“期在地方共得安局，人民悉循正轨，并望追随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至挽颓流。”^③24日，当北伐军打败直鲁联军、占领南京时，帝国主义竟疯狂炮轰南京，造成军民重大伤亡。张学良得讯后，立即发表谈话，再次呼吁各方息争御侮，“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

1928年春，张学良从河南前线返回北京，力劝其父退兵出关，结束内战，南北统一。撤军时，他坚决制止炸毁弹药库和铁路桥梁，认为这些都是国家的东西，应该用于保国卫民，一旦炸毁势必造成巨大损失。在最后撤离北京时，张学良命令驻南苑担任警备任务的部队，宁可被阎锡山、冯玉祥部队全部吃掉，也不许使北平居民包括外国驻华使馆，外侨受到侵扰，无辜死一人、抢一家、失一物，这一做法受到各方赞许。而事实上避免了一次以日本为主的驻北平东交民巷和天津各国租界的驻军以保侨为借口进驻北平“维持秩序”，给北平和天津人民造成灾难。这是他的一大功绩。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身亡，这使张学良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东北的狼子野心。他为东北三省的前途计，怀着“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改革”的强烈愿望，毅然于同年7月19日指令热河都统汤玉麟通电宣布该省“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④日本政府对此举极为不满，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面对

①②③④ 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98、104、106页。

这种蛮横的政治讹诈，张学良毫无畏惧，予以有力回击。他断然宣称：“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①并明确表示，“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②寥寥数语，义正词严，充分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外力的崇高的民族气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做好各种准备之后，通电东三省易帜。

以上这些事例都有力地证实，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前所时刻考虑的已不仅仅是自己一派势力的消长与恩怨，也不是一家一姓的实力与地盘，而是从大局出发，息内争，御外侮，以解救濒临危亡的祖国。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他当时还不可能意识到，把一个国家交给一个背叛革命的人来掌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但这种强烈企求统一，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以期一致对外的决心，诚然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他的爱国思想，带有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为了外抗强权，他极力谋求增强国力，同时不惜一切来维护南京国民政府的权威。

张学良主政东北前后，为了与日本抗衡，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抓教育、修铁路、建海港、办工厂，自强不息，为东北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显著成绩。为了钳制南满铁路，继修“沈海、吉海、大(大虎山)通(通辽)铁路之后，又修筑了洮索、齐昂等铁路，建沈阳北站、东站。”^③为了减少对大连港出口货物的依赖，他修筑葫芦岛港口，作为东北的吞吐港。他还先后新建、扩建了一些现代化工厂，如沈阳纺织厂、肇新窑业公司、兴奉铁工厂和东北大学工厂等。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他扩建东三省兵工厂、新建迫击炮厂，支持迫击炮厂生产汽车，还积极准备建立奉天飞机制造厂和沈阳汽车装配厂。从而为对付日本经济侵略和军事进攻作好物质准备。张学良尤其注重教育、培养人才。1922年他就捐给阎宝航

^{①②} 张得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页。

^③ 参见礼广贵：《张学良将军》，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5万银洋，用于修建校舍。为了改进教育事业，他设立汉卿教育基金会，捐赠私产500万元，创办同泽中、小学；还应邀担任了辽宁简易教育协进会的名誉会长，慷慨捐助大洋5000元，作为发展活动基金。他还重视高等教育，积极发展东北大学并兼任校长，重金聘请章士钊、梁漱溟、梁思成等国内一流教授到东大任教。另外扩建讲武堂等，培养东北军的将才。这些都对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张学良易帜和建设现代化东北的唯一目的，是实现国内统一团结，富国强兵，一致抗日。但此后两年政治局势的发展却事与愿违。1929年3月爆发了蒋、桂之战，1930年4月，又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真是内战频繁，国无宁日，哪里还谈得上抵御外侮呢？张学良审时度势，认为尽管蒋介石是个贯耍险谋的政治家，但南京国民政府当时还是全国的中心，支持这个政府，才能实现全国统一。而与之对立的，由阎锡山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利害冲突极为尖锐，即使暂时成事，结果必然分裂。为尽快停止内战，早日实现国家统一，张学良于1930年9月18日发表了拥蒋通电，并以调整各方为名派兵进驻平津。自此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迅速结束了延续数月的空前规模的军阀混战局面。张学良之所以在这场中原大战中扮演了收场的角色，应当说主要还是息争御侮的初衷所决定的。

自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即在我国东北地区接连挑起事端，频繁寻衅。1931年夏又蓄意制造了中外咸知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发动侵占东北三省的战争寻找借口。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东北战事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张学良曾急电蒋介石请示机宜。是年9月16日，蒋介石竟于复电内严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①这样，蒋介石就给日本帝

^①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1页。

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了方便之门，使日本侵略军在一夜之间就轻易地占领了沈阳。1932年1月初，蒋介石再度命令数十万东北军毫无抵抗地退入山海关内，至此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张学良眼看着生养自己的东北三省的沦亡，深感切肤之痛。在蒋介石“绝对不许抵抗”的命令钳制下，他还千方百计地支持东北各地的民众抗日活动，特遣“救国会”^①常委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等人携带他的亲笔信潜入东北慰问抗日武装，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扬靖宇任政治委员的南满游击队取得联系，这对当时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攻占热河，随后又向长城各口大举进犯，平津告急。张学良闻讯，立即电召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吕正操（吕进平时任东北军16旅参谋处长，返回时，张委任他为647团团团长）星夜赶赴北平汇报战况，张学良听后立即表示，不惜一切收复热河，并命令吕正操立即赶回前线，“转告何柱国、缪澂流、孙德荃三位旅长：准备反攻！东北军全部拼上，也要打到底！”^②

东北沦陷，本来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他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所造成，但就在这时，张学良却因东北军奉蒋之命全部退入关内而遭到举国上下的责骂。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竟莫须有地加在他的头上。结果满怀爱国救国之心的张学良，反而冤枉地代蒋受过，在一片谴责和唾骂声中，登上了驶往欧洲的渡轮，被迫下野出国。

张学良主张实力御外，加快国家建设步伐，构成了他强烈爱国心的积极一面；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一厢情愿去依赖失去民

^① 1931年9月27日，由东北流亡北平的高崇民、车向忱、阎宝航发起，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车向忱是常委之一。当时张学良曾在物质和精神上给该会以大力支持。

^② 《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心的蒋介石政府实现国家近代化，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从这一角度说，这也是他当时爱国热情中仍带有国家主义“超阶级”国家观的一种反映。

第三，他的爱国思想，又是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是当他毅然决然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不惜献身时，其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升华，达到了新的高峰。

张学良去国之日，正是国内局势更加江河日下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将侵略魔爪逐步伸向华北地区。蒋介石为了“围剿”红军，继续对日妥协，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从而使华北门户洞开，给日本随时进占冀、察、平、津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蒋介石媚日卖国的政策下，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阶层爱国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

但是蒋介石念念不忘的只是消灭共产党，认定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他的“心腹之患”。为此，他于1934年初电召张学良回国，随即调张率东北军到鄂豫皖“剿共”，后又调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赴陕甘一带围歼长征中的红军。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箭双雕之计。他阴谋通过张、杨部队与红军的战斗，造成两败俱伤，好坐收渔人之利。

张、杨在“君命难违”的不得已情况下，加之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但是张的部队多次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损兵折将，蒋介石不给补充，坐观不救，致使东北军陷入困境。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张学良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抗日是唯一出路。终与红军达成了停战协定，形成西北三为一体（即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的相互联合）的大好局面。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6年6月13日，张学良在会见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和一些中国新闻记者时，透露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我确信

中国的真正统一是可以实现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齐心协力抵抗日本侵略了。我之所以抱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只从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地区以后，许多次内战迫在眉睫，但由于中国人民实际上都想联合一致，抗击外国侵略，所以民心之所向阻止了这些内战的爆发。因而，只有抵抗外侮，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①

是年6月22日，张学良发表《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内称：“抗日是中华民族唯一出路和东北军的最大使命。”他在演讲里对广大东北军官兵说：“假如我的决心动摇，枪在你们手里。你们随时可以把我打杀。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失地收复之日，才算完成了我们东北军‘孤臣孽子’的任务。”^②

同年11月，张学良在向蒋介石请缨抗日的电报中称：“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分之前愆，为国家尽一分之天职。……今者前锋既接，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调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而言，若非及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而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恳切要求蒋介石下令“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③他坚信：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中华民族。

为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哭谏，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蒋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与此相反。蒋介石却将大批军队调到豫陕边境，逼迫张、杨率部继续进攻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

①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

② 西安《解放军日报》1937年1月5日。

③ 政协沈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张学良将军史料专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第114页。

扬言张、杨如不服从命令，即剥夺其兵权。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是月12日清晨被迫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等八项政治主张。应该说，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发表广播讲话，说明了这次“事变”的性质和目的。指出：“我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我们也曾用过种种方法请求蒋委员长即刻领导起来抗日，不要摧残民气，他始终不听，我们才不得已而行之。”同时声称：“我们希望国人了解真相。我们不愿意任何人利用这个机会造成内战，给侵略我们的帝国主义造成机会。我们只求有利于国家民族，至于个人的毁誉生死，早置之度外。”^①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张、杨和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全国人民的推动，蒋介石终于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使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为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张、杨二将军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千古功臣”，名扬海内外。

身陷囹圄，不忘爱国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期间，被迫口头答应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张学良从大局出发，立即做出释放蒋介石并陪蒋返京的决定。他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

^① 陕西省档案馆藏：《东望》第6卷第6期，随军第67军参谋处刊行，1936年12月12日出版。

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①还说：这次事变，对蒋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走他，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要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更明确表示：当蒋“回京的时候，我准备跟他同去，站在国人面前受冷静的公平的审判。如果他们听了我的说述的事实以后，认为我的举动谬误而责罚我，我愿意承受任何责罚，甚至死刑。”^②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于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将受到审判和处罚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这也表明，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是置个人安危生死于不顾的。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当张学良乘坐的专机飞抵南京后，果不出他料，立即被蒋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张学良身陷囹圄，仍关心着抗日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解往奉化天目山一座古刹中拘禁。此时他已得知西安方面为解救他将采取行动的消息。他担心因此而内战再起，抗日无望，于解往奉化的当日即致函东北军高级将领，恳切叮嘱他们“要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并谓：

“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③同年2月17日在致杨虎城函中亦云：“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有利于国者，吾辈何有尚惜乎？！”他呼吁东北军将领要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勉励东北军广大官兵“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④

① 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95页。

② 李传信：《论张学良送蒋及被“管束”的前因后国》未刊稿，第5页。

③ 西安事变研究会从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页。

④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72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学良梦寐以求的是及早奔赴抗日前线，他为不能实现这一愿望而心急如焚，痛苦万分。1938年秋，他曾反复多次向来看望的人表示：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我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

张学良渴望在抗日战争期间能给他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为此他多次向蒋介石请缨，但蒋对他的要求始终置之不理。抗战胜利后，他为不能参加全民抗战深感内疚和遗憾，曾痛苦地表示：

“自己是个军人，在八年抗战中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①直至八十年代初，他还念念不忘没能参加抗战这件事，并引为终身憾事。他曾不止一次地自责说：学良是东北父老的不孝子孙！

但是，造成张学良不能驰骋疆场杀敌卫国的樊笼的究竟是谁？是张学良本人吗？当然不是。正是张学良为促成全民族团结抗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岂能违背自己的初衷。寻根究底，正是蒋介石剥夺了张学良这一神圣的权力。因此张学良的遗憾和自责，正是对蒋介石最强有力的控诉！

蒋介石以怨报德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拥护蒋介石当抗日领袖。释放蒋介石并陪他返回南京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完全出自公心，胸怀坦荡，无私无畏，但却因此变成了阶下囚，饱尝了五十余载的“铁窗”风味。张学良忠爱国家何罪之有？这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冤狱究竟是谁制造的？毫无疑问，制造这起冤狱的正是刚从西安被释回宁，信誓旦旦绝不计较个人恩怨的蒋介石。

^① 沈醉：《军统内幕》第165页。

蒋介石是个阴险狡诈、心胸狭小的人，他所斤斤计较的正是个人的得失与恩怨。丧失东北，明明是他自己下命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逃到台湾，明明是他自己众叛亲离，“剿共”无能，却把丢失大陆的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张学良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陪蒋回宁，蒋却认为西安事变有损于自己的威信，这使他切齿痛恨必欲进行报复。因此，当他一回到南京，立即自食其言，把陪送他的张学良先是送军事法庭审判，“特赦”后又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蒋介石握有党、政、军的最高权利，又是个极端专制的独夫，他的决定就是“圣旨”，因此，当时尽管有些人据理力争，要求释放张学良，但也无济于是。于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冤狱就这样铸成了。但在中外人事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的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还不敢冒然处死张学良，于是便采取了对张学良永远监禁、不断折磨其身心的办法，使他在极度痛苦中了此一生。对此，就连宋氏兄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他（她）们对不起张学良。

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遭蒋介石拒绝。

1947年元旦，旅居上海的东北籍人士乘蒋介石颁布“大赦令”之机，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但是“大赦令”的名单中，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子。是年2月28日，台湾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自发的武装反抗迅速遍及全岛（即“二·二八”起义。）当时蒋介石指示毛人凤，务必不使张学良趁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先将他和赵媿打死，然后以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上报。其用心何其毒也！只是因为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张学良与赵媿才幸免于难。

同年10月，张治中去台湾探望张学良时，张学良又向他倾诉了要求恢复自由的强烈愿望。张治中将此愿望向蒋介石转述后，蒋对此不但仍不置一辞，反而下达手谕，规定以后非经他批准，

任何人均不得往访张学良。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不断溃退、内外交困、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又施展以退为进的诡计，宣告“隐退”。代总统李宗仁顺应輿情，“立刻给参谋总长顾祝同下达释放张学良的命令。给张群也拍了电报，要求释放张学良，同时还派程思远作为代理总统代表专程去台湾找陈诚商量释放张学良一事。”^①结果，竟被有关人员以此事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辞，予以拒绝。由此更可证明，蒋介石是制造这一冤狱的罪魁祸首！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死。这距张学良被拘押已将近40年。蒋经国死后，台湾当政者也未及时给张学良彻底恢复自由。无论就人道、就法律，就特赦的意义而言，都没有理由将此案继续下去，代人受过。去年台湾出人意料地给被“管束”54年的张学良举办九秩寿诞，其规模之大为世人瞩目。这是值得庆幸的。

近年来，海峡两岸人民交往日益繁频，全国人民渴望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屹立世界。这也是将军为之奋斗的宏伟事业。值此张将军91岁诞辰即将来临之际，鉴于将军身心健康，在去年末接受日本记者采访后不久，又出游美国，全国人民甚感欣慰。人民渴望他早日返回故乡，拜谒先祖陵寝、会晤亲朋故旧，游览大陆风光。企盼张学良将军把握时机，作出抉择，满足全国人民的这一强烈愿望！

（责任编辑：夏良才）

（作者张友坤，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

^① 【美】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译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315—316页。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对蒋 政策的演变

鹿锡俊

在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经过了“胁蒋转向”、“倒蒋立新”、“汪蒋合流”、“世界规模压蒋”、“对华新政策”和“拉蒋谋和”六个阶段。下面，我们将依次进行一番考察。

—

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个中国新政权产生后3个月不到，日本的田中义一内阁就召开所谓“东方会议”，把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定为其对华国策的首要目标，并决定在必要时随时诉诸武力^①。这是日本当局针对蒋政权建立后的中国政局所作出的第一个战略决策。由此发端，日本随即步入了加紧侵华的新阶段，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先后策动了1928年“济南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事变”、1933年“长城战役”和1935年“华北事变”等，其铁蹄由东北向内蒙、华北，向着中国腹地步步进逼。

1935年前，蒋介石政权采取“攘外必先安内”和以退让求妥协的错误方针处理内政外交，招致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恶果。但

^① 《田中外相关于东方会议“对华政策纲领”的训令》(1927年7月7日)，见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日〕原书房1973年第3版第101—102页(以下该书简称《年表与文书》)。

丧权辱国并不等于甘心卖国。因为这个政权既有反共反人民的一面，又有从民族主义出发要求维护民族独立的一面。这种两面性的内在作用，促使它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既步步退让，又在退让中坚守一定的限度；既寻找妥协，又在妥协中进行局部的抵抗。它带来了不同后果：退让和妥协遭致侵略者的蔑视；不屈和抵抗则引起侵略者的仇视。1935年以后，蒋政府的对日政策逐渐转向强硬。这种转变同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针锋相对，使日本加紧侵华而中国政府不甘屈服这一民族矛盾日趋尖锐与激化。正因此，在日本决策者的对蒋态度中，蔑视未减，仇视日增。后者反映在日本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如下看法之中：

一是认为他竭力推动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运动。由于日本决策者一贯以中国保持分裂与虚弱作为对日本有利的理想状况，因此，中国的统一、复兴趋势被他们视作日本的潜在危机；二是认为他“依附欧美”，“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特别是“采取联苏政策”，在必将到来的日苏战争中，将导致日本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三是认为他“容共抗日”，“与赤化势力相苟合”，拒不承认日本制造的“满洲国”，并“以排日和抗日作为昂扬国论和加强政权的工具”^①。

基于上述认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愈来愈被日本决策者视作其推行侵华国策的障碍。1934年底，他们提出“南京政权的存亡决定于其有无打开中日关系的诚意。如无诚意即须将其赶入不能存在的最后境地。”^②这一“对南京政权的基本方针政策”表明，至迟在此时日本当局就只给这一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留下两条路：顺从日本的意志则存之；违抗日本的意志则亡之。它预示着一场民族入侵战争的必将来临，并规定了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对

^① 参见《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声明》（1934年4月17日、26日）、板垣征四郎《根据关东军的任务看对外诸问题》（1936年3月28日）等。

^② 《关于对华政策》（1934年12月7日），转引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

蒋政策的最高准则。

1937年7月7日，日本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从此至翌年1月16日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这半年中，日本的对蒋总政策，是通过武力“膺惩”，逼蒋“反省”、“悔悟”，“转变方向”，彻底屈服于日本的媾和条件。这是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的集中体现，也是其对蒋政策乃至整个对华政策的根本立足点。它的内容是随着战局的扩大而步步升级的。

日本当局的最初目标，是逼迫中国政府放弃华北主权，听任它用“现地解决”的方法实现华北的“满洲化”^①。“八一三”淞沪战役开始后，日本军事上的打击重点，从“膺惩29军”扩大为“膺惩中国军队”^②，其媾和条件也随之越出了华北的范围，向全中国扩张。10月1日，日本首、外、陆、海四相确定的调整“日中邦交细目”为：中国抛弃抗日排满政策；与帝国协同防共；从全中国的海运、航空、铁道、矿业等事业着手，按日中平等的立场，实行日中共同开发；逐渐推进两国真正的经济提携，改正排日关税^③。同日，他们还提出了所谓“国民期望增长论”，声称：随着战局的扩大，国民对战果的期望也同时增长，而“不再满足于遵循常道”，故从对内考虑出发，在调整日中关系时还须交涉：（一）赔偿（直接损害）；（二）创办日华合办的大辛迪加，经营海运、航空、铁道等；（三）矿业（开发华北的金、铁、煤）；（四）解决关税协定等悬案^④。11月2日，日本外相向德国驻日大使提出“日中媾和交涉基本原则”，在对蒋要求的具体化上又跨出了一大步。其要点有：在内蒙建立国际地位相当于外蒙的自治政府；在华北设立非武装地带，由亲日人物任行政

① [日]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原书房1973年版第88—89页。

② 日本政府《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声明》（1937年8月15日），见《年表与文书》第370页。

③ 《中国事变处理要纲》（1937年10月1日），见《年表与文书》第370—372页。

④ [日]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四·日中战争（下）》，朝日新闻社1963年1月版第119页

长官，在上海扩大非武装地带；废止抗日政策；协同向共产主义斗争；削减对日货关税；尊重外国权利^①。12月1日，日本军部在下令攻占南京的同时，提出要通过处理“中国事变”，“一举从根本上解决日中之间的全部问题”。为此，它又在媾和条件中增加了正式承认满洲国，在华北和内蒙分别建立日、满、华互助共荣及共同防共的政权，与满洲国共同参加日德意防共协定，负责赔偿日本侨民的损害等项目^②。13日南京沦陷，21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大幅度提高媾和条件，其内容与上述军部方案相同，细目则更详尽。但在通过德国转达蒋介石时却又“要约”成笼统的四条^③，以利在交涉开始后见机行事。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把上述各个时期的对华要求综合归纳为“日中和平交涉条件细目”九条^④，作为最高国策正式确定下来。

从上述步步升级、扩张的过程及内容可知，日本的对蒋媾和条件以攫取最大的中国权益、对华实行全面征服和“全面管理”为目标，完全无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背离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其苛刻的侵略性远远超过了1915年的“廿一条”。它和其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暴行相印证，把亡国的危机血淋淋地展示在一切中国人的面前。这就促使中国内部各阶级之间的所有矛盾都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共同致力于反抗民族敌人。在这种大趋势下，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即使单纯为了反共和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需要，也决不可能全盘接受日本的媾和条件^⑤。何况，在日本的全面侵略使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于生

-
- ① 参见《德国驻日大使致广田外务大臣照会》（1937年12月7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第272—273页（以下该书简称《资料编》）。
- ② 《中国事变解决处理方针案》（1937年12月1日），见日本みすず书房出版之《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1—52页。
- ③ 详见1937年12月21日“阁议决定”，《年表与文书》第380页。
- ④ 详见《年表与文书》第385—386页。
- ⑤ 参见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与陶德曼的谈话。见《德驻华大使给德外交部密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

死存亡的关头之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本身存在的从民族主义出发反抗侵略的一面，比战争爆发之前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尽管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接连失利，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仍然坚持其在战争前就维护的“最低限度”。这个限度用开战初期的话来表述，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事态”，即可以默认“满洲国”的事实，也可以维持冀察政权特殊化的局面，但决不公开承认“满洲国”，更决不容许日本进一步染指华北和其他领土主权。这样，日本的媾和条件越是升级，其和中国政府“最低限度”的距离就越是增大，与此相应，其“胁蒋转向”政策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是减少。这种逻辑关系，正是日蒋全面破裂和持久对立的症结之所在。

战争初起，占据日本决策层主流地位的所谓“强硬派”大多“用处理满洲事变时的经验”来看待卢沟桥事变，以为只要日本“予以一击”，蒋政府就会“举手投降”，“不出三个月就可解决问题”^①。而对战胜者来说，同一个屈服了的“现中央政权”来“调整国交”，无疑比另立新政权更为便利。这种对蒋政府的极度蔑视和对自身实力的盲目自信，是日本“胁蒋转向”政策出笼的主观原因。但是，在上述“症结”的作用下，战争的实际结果和日本决策者的主观愿望南辕北辙：武力恐吓，未使蒋不战而屈。日本当局因此而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要么为实现“胁蒋转向”而降低对蒋媾和条件，要么为坚持媾和条件而改变既定政策，推倒蒋政权，另立能够服从自身意志的中国新政权。由于日本当局在开战后实际走的是一条步步提高媾和条件的路，所以，早在“胁蒋转向”政策推行之初，“倒蒋立新”政策就已处在孕育之中。1937年10月之后，倾向于后者的人日见增多^②，但因担心过

① 参见《石原莞尔中将回想应答录》(1939年)、《下村定大将回想应答录》(1939年)，载《现代史资料》第9卷。

② 前揭《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130—131页。

早否认蒋政权会“迫使蒋狗急跳墙，专意抗日”^①，也因其时正以“陶德曼调停”配合军事膺惩，日本最高决策层仍决定以1937年底作为等待蒋“悔悟”的期限^②。然而，直到南京失陷，蒋政府仍不“转向”。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终于决定“今后不一定期望与南京政权谈判成功，而另行考虑收拾时局”^③。翌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在最后确定媾和条件的同时，进一步决定：若蒋拒绝接受此条件，日本就应抛弃以蒋为对手解决事变的希望，而“帮助建立新兴中国政权，与之调整国交”^④。同月14日，日本收到德国转交的中国对调停条件的回答后，认定中国“使用拖延战术”，“不愿悔悟求和”，遂于16日公开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⑤两天后又补充声明：“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权更为强硬”，是“在否认的同时予以抹杀”^⑥。这两个声明表明，“倒蒋立新”已取代“胁蒋转向”，成为下阶段的对蒋总政策。这是战争以来日本对蒋政策的第一次重大转变。

二

1938年1月至1939年底，是日本推行“倒蒋立新”政策的两年。这一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坚决以蒋政权为消灭的对象；（二）拒绝以蒋政权为交涉的对手。

对第一方面，日本始终坚持贯彻。1938年间，重点是采用军事进攻的手段，先后进行了徐州、武汉、广东等会战，企图“以连续的败战感特别是中原的丧失，促使抗日势力自我毁灭及放弃

①② 《对中国中央政权方案》（1937年11月21日），载《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49页。

③ 《中国事变处理要纲》（甲）（1937年12月24日阁议决定），见《年表与文书》第381页。

④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1938年1月11日），同上第385页。

⑤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府声明》（1938年1月16日），同上第386页。

⑥ 《补充声明》（1938年1月18日），同上，第387页。

继战意志”^①。在军事倒蒋同时，日本还积极辅之以政略倒蒋。主要手法有：

一、推行“全国分裂主义”，在占领区遍设汉奸组织和傀儡政权。早在1937年11月，日本决策层就提出，“在南京中央政权坚持长期持久抗战而在事实上成为一地方政权的场合，要暂时允许全国分裂主义，在各个方面成立反蒋反共政权，转入政略攻势”^②。据此方针，日本于“一一六”声明前后分别在其占领区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等伪政权以及“维持会”一类的多种汉奸组织，以图贯彻其“分治合作”、“分割统治”、“以华制华”的统治原则。

二、制订和推行倒蒋“谋略”。在倒蒋立新政策正式推出之前，日本就初步制订了“抗日政权溃灭策”。其中有：在占领区内组织反对抗日政权的团体，在全中国煽起反政府行动；利用抗日政权内部“红”与“白”、反日与亲日两种势力并存的局面，激起其内讧，使抗日政权在金融上崩溃等^③。公开否认蒋政权后，日本更经“五相会议”专门决定了“促使现中央政府垮台和蒋介石下野”的六大谋略：（一）起用一流人物，削弱现中央政权与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酿成成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氛围；（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怀柔工作，分裂和削弱敌战力；（三）利用并操纵反蒋实力派，在敌内部成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设立依托于回教徒的防共地带；（五）促使法币暴跌，取得中国在外资金，使中央政府在财政上不战自灭；（六）开展谋略宣传^④。不久，他们又对六大谋略作

① 《关于指导中国事变的说明》（1938年6月17日，陆军大臣），见《资料编》第262页。

② 《对中国中央政权方策》（1937年11月21日），见《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49页。

③ 《事变处理要纲（否认现中央政府后）》（1937年12月15日，大本营陆军部），见《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6页。

④ 《适应时局的对华谋略》（1938年7月12日，五相会议决定），见《年表与文书》第389—390页。

出重大补充，强调要“尽力把民族矛盾引向主义的对立”，“在抗日容共政权中挑起内讧”^①。其用心就是要挑动“国共内战”，用阶级矛盾削弱和涣散中国政府对付民族敌人的力量。随着对蒋谋略的具体化，1938年7月和12月，日本分别成立了“对华特别委员会”和“兴亚院”，专门领导对华政略、谋略活动。他们以“离间蒋政权”和“树立新政权”为重点，先后开展了“吴佩孚工作”、“唐绍仪工作”、“广东广西工作”和“高宗武工作”等^②。

武汉战役后，由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走到了力量的极限，日本当局被迫于1938年12月6日决定“武力行使告一段落”，今后转入“政略攻势，战略持久”时期^③。从此，日本的政略工作上升至与军事并行的地位，有时甚至起着主导的作用。其重点逐渐集中于分化抗战阵营、策动汪精卫集团叛国和组建“新中央政权”上。并与1939至1940年间日本针对国民党军队的南昌、随枣、长沙、南宁、宜昌等会战的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共同致力于实现“促使蒋政权崩溃或屈服”的既定目标。

但日本的“倒蒋立新”政策在执行中进行得并不顺利，实际走的是一条摇摆中逐步修正的道路。

“不为对手”方针的始作俑者是近卫内阁。当时他们以为蒋政权在南京沦陷后已降为奄奄一息的“地方政权”，日本只要趁热打铁，即可将其彻底消灭；反之，如果半途而废地进行“调停”，则很可能导致蒋死灰复燃，“在一、二年内重演事变”。据此，他们以“不遗大患于将来”为理由，竭力反对日本参谋本部继续“陶德曼工作”的主张，并不惜以辞职相威胁^④。这场内

① 《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1938年7月22日，五相会议决定)，同上，第390—391页。

② 参见《给土肥原中将的指示》(1938年10月7日，五相会议决定)。

③ 《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案》(1938年12月6日省、部决定)，见《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53—554页。

④ 参见《桥本群中将回想应答录》(1939年)、近卫文书：《关于媾和问题之所信》(1938年1月)。

阁与军部的争论，以“一一六声明”的发表即内阁的胜利而结束。但日后事态的发展远远出乎近卫等人的意料之外：在政治上，中国蒋政府虽然撤出了首都，但依然保持着中央政府的地位和权威；在军事上，中国军队虽在退却，却仍旧保持着有生力量，且抵抗不止，在徐州会战中还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与此相反，日本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却因根本不具备一个政权应有的实力基础和民心拥护，而无法充当同日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交涉对手”。近卫不得不承认，“一一六声明”是“内阁在政策上的失败”，“成立傀儡政权反使事态可能向错误方向发展”^①。为此，他于1938年5月26日改组内阁，由主张“不拘泥于‘不为对手’声明”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②。后者上台不久，就开始对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和平试探”，意欲在事实上恢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手^③。

在政府方面出现修正“不为对手”方针的意向时，原先曾对这一方针有所不满的军部，却又反过来要坚守这一方针了。这因他们当时的异议，是建立在靠“调停”就可逼蒋全盘接受媾和条件的幻想之上的^④。而现在他们的幻想已为事实所打破。因此从徐州会战起，军部就一致主张积极作战^⑤。7月，以军部为核心的五相会议先后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和《对华谋略》等，其基本点是：坚持不以现中国政府为交涉对手；坚持以“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改组”为中国屈服的先决条件；坚持以“促使现中央政权溃灭或屈服”为最低目标^⑥。尽管所谓的“宇垣外

① [日]三宅正树等编：《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1983年版第2卷第221页。

②③ 前揭《走向太平洋战局之路》第146—150页。

④ 参见《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枢府议长在昭和13年1月11日御前会议上的说明要旨》，前揭《现代史资料》第12卷第395—398页。

⑤ 参见《桥本群中将回想应答录》（1939年）。

⑥ 详见《资料编》第263—264页。

交”只是想在上述第一个基本点上略有松动，也终被主流派所不容。它同中国政府对宇垣媾和条件的拒绝相互作用，使“宇垣外交”在内外两面都走投无路，最后以9月底宇垣的被迫辞职而破产。

宇垣外交的结局说明：日本的对蒋政策，是日本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产物。只要这个整体意志不变，就非个别人的愿望所能左右，即使其再“明智”也罢。而在当时，日本当局贯彻“倒蒋立新”政策的整体意志是非常强硬的。其原因有三：（一）决策层寄以厚望的武汉战役正在策划和进行之中；（二）侵华战争的目的正在通过制订行将出笼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而进一步升级并具体化；（三）在是年七、八月间发生的日、苏“张鼓峰事件”中，日本判明“苏联无意在满苏边境生事而发动全面战争”^①。这一“对苏火力侦察”的结果，使之减轻了对“北方威胁”的顾虑，以为今后“可毅然致全力于中国”，从而对解决中国问题“增强了信心”^②。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只要蒋政府拒绝全面屈服，日本决策层就不会轻易变更“不为交涉对手”的既定政策。

然而，战争的进展是不以侵略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1938年10月武汉战役结束，日本在这个“唯一的或最后的机会”中并未实现其“结束事变”的原定目标，自身却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后，随着日本被迫转入“政略攻势、战略持久”时期，其决策者不得不在坚持打击蒋政权的同时，逐步修正“不以蒋政权为交涉对手”的方针。这一修正过程，同时也是次阶段“汪蒋合流”政策的形成过程。

1938年11月3日，近卫政府的第二次对华声明是政府修正的第一步。它宣布，只要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建设”，日本就可对其“不

①② 《折本群中将回想应答录》。

予拒绝”^①。这一声明缓和了“一一六声明”毫无余地的“不为对手”立场，以上述四个条件为前提，向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政府发出了诱降信号。

同月18日日本大本营决定的《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战争指导方针》迈出了政策修正的第二步。它仍然坚持“不以蒋为对手来全面调整日华新关系”，但又提出：在交涉停战的时候，“如无人能取代蒋介石的话，日本可同意以蒋为交涉停战的对手”，待停战交涉成功后，再使蒋“立即离开负责地位”^②。

1938年底，汪精卫在日本策动下叛国投敌。这一分化抗战阵营的谋略的成功，一时间曾使日本决策者对以汪代蒋、另立“新中央政府”寄以厚望。但随着对汪精卫集团虚弱本质和孤立地位的认识不断加深，日本对汪的期望和信心日益下降。1939年6月，日本五相会议否定了以汪精卫集团为新政权唯一主体的设想，重申“新政府”应是包括“悔悟后的重庆政府”在内的各种附日势力的集合体^③。此后，日本迈出了政策修正的第三步——力促“汪渝合流”。此举原因何在？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作了如下说明：实现对华停战，是“适应欧洲局势”和“瓦解重庆团结”的当务之急，但停战是“日本与重庆之间的问题”，汪集团并无实现停战的实力；日本面对的实际是，不使重庆同汪“合流”，就不能建立起具备武力和财力基础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央政权”，也就不能实现日中停战，而且反有“酿成永久抗争之虞”^④。如何指导“汪渝合流”？决策层提出了三种方式：事前

① 《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1938年11月3日），《年表与文书》第401页。

② 《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49—552页。

③ 《中国新中央政府树立方针》（1939年6月6日，五相会议决定），《年表与文书》第412—413页。

④ 《事变解决秘策》（案）（1939年7月5日，参谋本部第二课），《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65—567页。

合流方式——以本年内为期，先停战，后合流，再成立新中央政权，这是努力争取的首要目标，事后合流方式——以翌年必要时间为期，先成立新政权，再停战合流；大持久战方式——新旧两政权对峙，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一种方式^①。

迄止政策的第三步修正，日本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仍坚持必须使其下野。认为“只要把蒋介石赶下台，中国就会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而使日本得以随心处置”^②。但是，恰在日本为应付欧洲大战爆发后激荡的国际局势而更急于及早解决中国问题之际，中国军队却于1939年12月初发起了对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攻。这次冬季攻势使日本当局在事实中看到，“蒋介石的统治力今天依然保持于全军”^③，想撇开蒋介石、实现单纯的“汪渝合流”是不可能的。于是，在经过整整两年的徘徊后，日本当局终于在年底下定了解决“对蒋处置”这一“打开局面的唯一障碍”的决心，决定以后不再坚持以蒋下野为解决中日问题的先决条件^④，并随之明确地提出了“汪蒋合流”的口号，从而完成了“倒蒋立新”政策的最后一步修正，实现了对蒋总政策的第二次转变。

三

1939年底，日本逼迫汪精卫集团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使之彻底沦为侵略者的傀儡。因此，所谓“汪蒋合流”，不过是“日蒋合作”的一个代名词罢了。它是日本陷入既无法消灭蒋政权，又无望另立名副其实的“新中央政权”的窘境后，被迫作出的决策。其实质，是通过恢复日蒋交涉，以在某种程度上保留蒋介石及重庆政府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作让步，换取蒋政

① 《以成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1939年10月30日），同上，第578—579页。

② 转引自日本鹿岛和平研究所编：《日本外交史》第20卷。

③ 《昭和十四年冬季作战经过概要》，《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440页。

④ 《对外施策方针要纲》（1939年12月28日决定），《年表与文书》第423页。

权停止抗日，交出手中的武力与财力，和汉奸集团同流合污，然后按日本的条件同其全面解决“中国事变”，使之从中国拔出脚来，全力应付欧战爆发后的国际新形势，进行世界范围的新的扩张^①。

从1939年底起，“汪蒋合流”政策以所谓的“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为中心而全面展开，前后历时10余月。日方对它寄以极大的期望与“热情”。为了获得成功，日本当局尽管怀疑“宋子良工作可能是中方的谋略工作，目的是干扰汪政权的成立”^②，但在1940年3月30日以前，仍然不惜推迟汪记“中央政府”的成立，力图实现汪蒋“事前合流”。在汪政权成立，“事前合流”已成泡影后，日本仍把“努力获得重庆和收揽人心”作为“指导新政权的要谛”，将正式承认汪政权的期限推迟到秋季，以“防止过早地导致新旧两政府对立的观念和事态”，争取实现“事后合流”^③。8月，日本首相冒着“被中国利用来宣传日本的虚弱”的风险，给蒋介石发出亲笔信，催促他与其“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中将会晤，“确立调整两国邦交的基础”^④。在热情谈和的同时，日本还以打逼和，于5月初发动宜昌战役，6月起开始轰炸重庆。上述软硬兼施的两手，造成了抗战以来中国最困难的形势和蒋政权最严重的动摇。但是最后并未能使蒋答应“合流”。10月3日，日本无奈地下令停止“桐工作”。此后，其外相松冈洋右又进行了所谓“钱永铭工作”，企图通过江浙财阀来促蒋停战和日，结果依然以夭折而告终。11月30日，日本终于“正式承认”汪记“中华民国政府”，并与之签订《日

① 见《陆、海两次官会谈一致意见》（1940年3月17日）、《桐工作实施要领》（1940年3月17日陆军部决定）、《停战交涉要领》（1940年3月26日）、《资料编》第297—300页。

② 日本战史室资料，转引自前揭《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232—233页。

③ 《新中央政府指导方针》（1940年5月5日，总参谋部），《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91页。

④ 《近卫亲书》（1940年8月22日），《资料编》第300页。

华基本条约》，匆匆宣告了“汪蒋合流”政策的收场。

“汪蒋合流”政策的失败是必然的。其根本原因是，它在对蒋政策上改变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方式、方法和对蒋及重庆政府其他要员的“宽容”幅度，却丝毫没有改变这一政策的内核，即体现于“日汪条约”中的再次膨胀了的战争目的，坚持要蒋政府“接受同汪精卫一样的条件”^①。日本当局曾认为，蒋之所以拒不屈服，主要是顾虑个人的进退得失，故只要日本在“下野”问题上对蒋“宽容”，就可换来蒋的附日^②。这种对蒋认识，是日本从倒蒋到拉蒋的“理论依据”之一。它深刻暴露了日本对蒋认识中的谬误。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谁以民族的利益同敌人作交易，谁就必然失去人民的拥护和自身的价值。因此，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地位并非取决于日本对他们的态度。而恰恰取决于他们的对日态度。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日蒋对立的症结之所在。

1940年，日本在竭力推动“汪蒋合流”的同时，积极设计着“从世界规模压蒋”的政策新构想。后者的日臻成熟，是“汪蒋合流”政策匆匆收场的又一基本原因。日本决策者的新构想，同他们对下述两大问题的观点、对策及所造成的后果紧密相关。

首先是侵华战争与世界战争的关系的问题。日本的野心，不止于征服中国，还要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因此，处理中国事变和为应付日后“国际局势”作好准备，是不可分割的两大任务^③，日本要求“蒙疆特殊化”，是为了进行“对苏战”；要求“管理”华南岛屿，是为了确保“获得南洋资源的战略据点”和

① 《陆海两次官会谈一致意见》（1940年3月17日），《资料编》第297—300页。

② 参见〔日〕《重庆方面关系经过概要》（1939年10月），《日本外务省档案》编微胶卷S11001·214。北京图书馆藏。

③ 外务省记录：《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的说明》，转引自前揭《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155页。另见《参谋次长在军参谋长恳谈会上的演说要旨》（1939年4月1日），《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59页。

“对英战争的前进据点”，而要求在华北和长江三角地带的“保障驻军”，则是为了防止在“次期战争”时中国站在日本的敌国一边^①。这就证明：日本的侵华战争是其推行“北进”、“南进”的世界战争计划的前哨战。所以，它在粗暴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同时，不仅因其要把中国变成其“全面管理”下的独占殖民地而严重损害了以英、美为代表的第三国的在华既得利益，更因其为世界规模的侵略扩张打前站的性质，而严重威胁着第三国今后的长远利益。这样，它就迫使一切不愿拱手相让的第三国以各种方式来援助中国和抑制日本。1938年11月第二次近卫声明后，随着日本公开否认华盛顿体制和九国公约，并公然以占领海南岛、封锁天津英租界等对“旧秩序”的挑衅行动去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新秩序”^②，第三国的援蒋与抑日，已更多地从口头的和道义的，转向实际的和物质的。1939年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8月21日，日英关于天津租界的谈判破裂。翌年1月26日，日美正式进入无条约时代。日本与英美等国矛盾的发展，使之迫切需要改变国际关系上的严重危机，冲破所谓的ABCD包围圈^③。

其次是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华的关系问题。日本决策者一贯认为蒋政府“依附于欧美”。与此相关，早在侵华战争第二年，日本就提出只有扫清远东地区的苏、英势力，中国事变才有根本解决希望^④。此后，随着英、美等第三国对华援助加强，日本越来越认定第三国的对华援助是蒋政权坚持抗日的根源。基于这个本末倒置的认识，他们积极策划切断各国对蒋援助和调整“存在于中国的国际旧秩序”，认为凭此即可收到中止中国抵抗的釜底抽薪之效。

① 外务省记录：《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的说明》，转引自前揭《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第155页。另见《参谋次长在军参谋长呈谈会上的演说要旨》（1939年4月1日），《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559页。

② 参见《第二次近卫声明》（1938年11月3日）、《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对美国的回答》（1938年11月18日），《年表与文书》第399页。

③ 指美、英、中、荷四国。

④ 《关于指导中国事变的说明》（1938年6月17日，陆军大臣）。

由于受到国策上的对外侵略性和国情上的对外依赖性这对内在矛盾的制约，在侵华战争和以“北进”、“南进”为目标的世界战争的先后顺序问题上，日本决策层最初的主导性意见，是认为只有先解决中国问题，才能解决世界问题。但在上述两大关系的作用下，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实际上已形成一种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怪圈”：要解决中国问题，必先解决世界问题；要解决世界问题，必先解决中国问题。于是，随着日本在此两大问题上日陷困境，其决策层愈来愈急切地盼望能出现一个双重意义上的“良机”：既能扫除欧美在远东和南洋地区的势力，扩张日本的势力范围，以结束日本在资源、经济等方面的对外依赖性，实现世界规模的侵略扩张计划；又能截断各国的对华援助，堵住中国的抗日根源，以早日解决日中战争。1940年5、6月，欧战局势剧变，德意法西斯在一个多月内横扫欧洲。法国投降，荷兰沦亡，英国面临本土决战。在欧美列强暂时丧失了与日本抗衡的能力后，日本决策者为他们终于等来了所谓“千载难逢”的“良机”而兴奋不已。7月19日，近卫在第二次组阁之先举行“狄洼会谈”。22日，日本军部提出了利用欧战形势解决中国事变的“理由书”。同日，第二次近卫内阁组成。26、27日，日本先后制订了《基本国策要纲》和《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上述一系列文件贯穿着同一个中心思想：适应世界形势之变化，在处理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以借助德、意，收到既夺取南洋地区，扩张“东亚新秩序”为“大东亚新秩序”，又切断“援蒋国家群”的对华援助，堵塞中国抗日根源这双重效果^①。日本的全球战略，已从“先中国，后世

^① 详见《狄洼会谈决定》、《“适应世界情势的时局处理要纲”提案理由》（1940年7月22日，大本营陆军部、海军部）、《基本政策要纲》（1940年7月26日阁议决定）、《适应世界情势的时局处理要纲》（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载《资料编》第319—320页、324页，《年表与文书》第436—437页。

界”，趋向于“中国与世界并行”。这一全球战略上的重大转变，加快了对蒋政策的变更。11月底，日本最后认定：在国共保持合作和英美继续援华的形势下，近期难望使重庆屈服，中国事变的持久化已不可避免。因此，仅仅在日中两国范围内已不可能解决问题，日本应向“南进”寻找机会，“将中国事变作为世界战略的一环来解决”，即通过驱逐欧美势力、切断对蒋援助，从世界规模来压垮中国政府^①。从此，他们中止了“汪蒋合流”工作，把“从世界规模压蒋”的构想正式上升为下一阶段的对蒋总政策。

四

“世界规模压蒋”政策早在构想时期即已逐步付诸实施，因而一度与“汪蒋合流”政策交叉并行。其全过程，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分为两期。

1940年6月至1941年12月是前期。在国际范围内，它的特点是，以切断中国外援、恶化中国国际环境为目的，逼迫有关国家封锁援华路线或与之订立孤立中国的协定。其重要步骤有：（一）1940年6月，逼迫荷属东印度取消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对日输出的限制；强使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停止输送援华物资，并接受日本的监视团。（二）7月，逼迫英国封锁运输中国抗战物资的重要通道滇缅公路。（三）9月23日，派军队进驻法属印支北部；27日，订立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四）1941年4月13日，与苏联订立中立条约，换取苏联“尊重满洲国”和“抛弃援蒋政策”^②。（五）5月12日，宣布封锁香港、澳门。（六）7

^① 参见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关于“中国事变处理要纲”的说明》和《“中国事变处理要纲”提案理由》（1940年11月），见《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603—610页、《资料编》第342页、《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第589页。

^② 《对德、意、苏交涉案要纲》（1941年2月3日联络会议决定），《年表与文书》第480页。

月，派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以“加强对华封锁”和“确保对南方的军事基地”^①。此外，从1940年11月起，日本还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对美谈判，力逼美国停止援华、不妨碍日本按“日汪协定”解决中国事变^②。同期，在直接针对蒋政权的中国战场上，日本的方针是“以维护治安，肃正占领区为主要目的，不进行大规模作战，必要时在短期内实行近距离奇袭作战，但不扩大占领区，返回原驻地为原则”^③。按此方针，1941年侵华日军在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方面，主要是发动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封锁战”和以武汉为中心的“短促作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挑起太平洋战争。自此迄翌年底，是“压蒋”政策的后期。其特点是：在战略上，首先对付英、美，促使“英国屈服”，“美国丧失战争意志”；对中国则“尽量避免消耗”，着重“运用对美、英、荷战争特别是其作战的成果，来禁绝援蒋行为，削弱蒋之抗战能力”^④。在政略上，强化“掌握中国租界，诱导南洋华侨”等措施；同时，为避免暴露自身弱点，明令禁止一切对蒋“和平工作”，而只“先设立针对重庆的谍报路线”。后者仅限于“谍知重庆动向”，“不触及一切屈服条件”，等到“由于帝国获得的成果和对其致命点的强大压力而造成重庆方面的动摇时，再及时将谍报工作转为屈服工作”^⑤。

在“南进”和“世界规模压蒋”政策的引导下，日本一天天将战争对手从中国一国扩大为亚、欧、美诸国。这种政策和动向，对蒋及国民政府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同日本“从世界规模压蒋”的政策针锋相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从世界规模制日”。早在抗战之初，蒋介石就确定以多交与国、孤立敌人、有利抗战作为“外交的根本

① 大陆命第513号。

② 参见《年表与文书》所载日美交涉文件。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卷第612—613页。

④⑤ 参见日本“联络会议”1941年11月15日决定《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战争的内部方案》、11月13日决定《关于“帝国国策实行要领”的对外措施》、12月24日决定《关于根据形势变化的对重庆“屈服”工作问题》和东条英机发言等。

原则”^①。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蒋提出了“中日问题和世界的问题同时解决”，“中国抗战和世界战争同时结束”，即把抗日战争与“势在必起的世界战争联接起来”，在世界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②。并随之于11月修改了此前将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之“底”的提法，确定抗战之“底”应是“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③。1940年后，日本的软硬兼施，一时曾又加剧了蒋的动摇。但是，9月27日日本订立“三国同盟”后，国际形势迅速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蒋及国民政府内部的动摇随之得到克服^④。1941年3月，蒋进一步提高抗战之“底”，强调指出，抗战的最后胜利，应是打破敌人的“大东亚新秩序”，“恢复我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⑤。此后，在日本高唱“中国事变之世界性”，强化“从世界规模压蒋”的行动之时，蒋却正盼望日本“从单纯侵华的战争，进一步冒险侵犯国际，来参加世界战争”，以达到“我们抗战政略的最重要的目的”，即“联合世界反侵略的各友邦，共同一致制裁日本”^⑥。1941年12月，日本终于走上了孤注一掷的道路。蒋在为中国从此结束孤立抗战局面，到达“政略成功的顶点”而庆贺之余，将日本的压蒋政策喻之以一句中国成语——“饮鸩止渴”^⑦。历史证明这一比喻是十分恰当的。日本以世界规模压蒋的结果，与其初衷背道而

① 蒋介石：《抗战的回顾与前瞻》（1938年7月9日），见《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台湾1984年版第15卷第348页。

② 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39年10月29日），《蒋集》第16卷第420—426页。

③ 蒋介石：《中国抗战与国际形势—说明抗战到底的意义》（1939年11月18日），同上，第477页。

④ 见1940年11月日本大本营陆、海军部《关于“中国事变处理要纲”的质疑应答资料》中所作分析，《现代史资料》第9卷第606页。

⑤ 蒋介石：《抗战的新形势与全国努力的方向》（1941年3月1日），《蒋集》18卷第64—65页。

⑥ 蒋介石：《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1941年10月20日），《蒋集》第18卷第340—341页。

⑦ 蒋介石：《中华民国31年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蒋集》第31卷第276页。

驰。太平洋战争之初，它以为利用其连战连胜的形势，“只要用武力再压迫一下，就可以解决重庆问题”^①。但仅隔半年，它自身即因中途岛海战的惨败而转入逆境。1942年7月25日，日本军部第二部长在联络会议上哀叹：“大东亚战争”以来，重庆内部虽有公然议论和平的迹象，但它“全是为了威胁美英，逼他们加强援蒋”，实际上，“重庆政权的对日抗战意识依然炽热”，蒋的统制力“仍旧巩固”，“将来只要美英不屈服，中方也绝不会屈服”^②。在“蒋政权主动来和”的幻想破灭后，日本又想用直接的军事行动来打垮中国政府，为此于9月3日正式下达了以进攻重庆为目标的“五号作战准备要纲”。但由于力不从心，最后不得不于12月中止了这一计划。

当日本在中国战场、南方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受到多重牵制、打击的时候，蒋及国民政府的国际地位却因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而得到提高。日本的压蒋政策不仅未能压倒蒋，反而使蒋和国民政府在世界战局的演变大势中，对借助国际力量赢得抗日胜利的前景坚定了信心。今后的日蒋妥协更不可能了。这实在是日本决策者始料所不及的。

五

1942年底，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因瓜岛战役的惨败而开始撤退；在中国战场上则主力被围，寸步难移。在“进行长期战的各项基础案件逐渐出现破绽”^③的局势下，日本统帅部只得改变此前“中国与世界并行”的方针，力求先从中国“脱出身来”，集中全力对付眼前的最大威胁美国^④。这是向其原来“先中国后世

① 见参谋总长杉山元在第123次联络会议上的发言，《现代史资料》第38卷。

② 《第二部长(冈本清福)在联络会议上对有关重庆谍报工作的说明》(1942年7月25日)，《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44页。

③ 见田中新一中将之回忆，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卷第620页。

④ 见《第9次御前会议要领》(1942年12月21日)，《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77—86页。

界”的全球战略的复归。它同实际战局的演变相结合，提出了相应改变对蒋政策的客观要求。与此同时，在日本决策层中出现的一种我们称之为“胜利第一主义”的指导思想，则为这一政策转变提供了主观动力。

“胜利第一主义”最早见之于东条英机首相在1942年10月讨论汪伪政府“参战”问题时的发言^①。翌月27日，青木大东亚大臣在联络会议上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指出：“过去，由于预料事变解决后美英势力必将重新回到中国，从而受着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凡有可能成为美英势力复活据点的一切都必须握于我手。但是，在扫除了美英势力的今天，只要打赢大东亚战争，其势力即不能再回到中国。因此，今天恐无必要如此彻底地予以控制。而且，万一大东亚战争失败，则即使现在加以控制，最终也将一切化为乌有。现今打赢战争是先决条件。只考虑这一方面即可。‘彻底获得’的想法应予纠正”^②。这种“胜利第一主义”对日本来说是很现实的。因为，它在同汪精卫订立的条约中所取得的一切“战果”，仅在汪记政府的地盘即日本的占领区内是一种“有条约依据”的东西，对整个中国的非沦陷区来说，则还是一种“纸上的空文”。只有打赢，方能化为现实，反之，保留得再多也将悉归泡影。而在眼下战局每况愈下的形势下，日汪条约不仅不能帮助它打赢战争，反而由于它赤裸裸的侵略性质，既“使现地民心日益背离日本”，汪政府“日益虚弱无力”，又“使重庆引为抗战的理由”^③。因此，日本决策者认为，今后在形式上放宽或放弃一点“日汪条约”的有关条款，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不但可以帮助自己和汪政权赢得民心，“增强政治力”，更可“消灭重庆抗战的理

① 他认为：汪政权“参战”“在实力上对日本毫无帮助”，但“只要战争胜利了，我国就可随心所欲，故为胜利而参战是可以允许的”。见《联络会议议事录》（1942年10月29日）。

② 《联络会议议事录》（1942年11月27日），《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63页。

③ 《联络会议议事录》（1942年11月27日）。

由”，从而瓦解其将领，吸引其要员，削弱其实力^①。二者结合，将保证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一旦胜利之后，一切仍可听任胜者的意志来重新安排。

基于这种意在一箭双雕的“胜利第一主义”，1942年12月21日，日本御前会议制订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以此为标志，其对蒋政策转入了致力于加强汪政府的政治力量，努力消灭重庆抗日的根据与借口的所谓“对华新政策”^②阶段。其要领为：（一）加强汪政府的政治力量；（二）重点开发占领区内的紧要物资，积极获取敌方物资；（三）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③。

日本的对华新政策形式上包含对蒋、对汪两个方面，实质上“对汪”乃变相之“对蒋”。二者的实施，充分反映出了日本决策者此时的无奈、虚妄和欺诈、伪善。“无奈”和“虚妄”突出地表现在它在对蒋方面所规定的“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实际上，此时日本决策者清楚地看到，要解决中国问题，“先靠强化国民政府是不行的，必须使重庆也投奔我方。故须双线并进。”^④问题是，要使对渝和平工作有效，必须具备两大条件——对方的响应和己方的实力。但现实情况是，重庆“绝不愿谈和”，日本则无力以“彻底的作战”来做对渝工作的后盾^⑤。因此，对华新政策规定“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实属“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欺诈”和“伪善”具体表现为“新政策”在对汪方面的口是心非和言行相悖。“新政策”规定，“为加强汪政府”的政治力量，应对其“尽量避免干涉”。但这一挂着“国民政府”招牌的“政权”，本身一开始就明确地是作为一个傀儡政权、谋略政权而建立，并始终处于侵略者的刺刀控制之下的。纸

① 《联络会议议事录》（1942年12月18日），《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66—71页。

②③ 《年表与文书》第580—581页

④ 《联络会议议事录》（1942年12月18日）。

⑤ 《第9次御前会议要领》（1942年12月21日）。

面上的“避免干涉”，焉能掩盖实质上的主奴关系？“新政策”规定，为了加强汪政府的政治力量，应“在适当的时机考虑对日华基本条约及附属议定书加以必要的修改”。但其修改的原则都是：在不失日方既有成果的前提下，“给中方以面子”，“授予新中国以大东亚战争完成以后的光明”；而在战争持续期间，则以“战时特殊性”为由，一切保留原状^①。即使是这种画饼充饥式的修改，日本也再三拖延，直至1943年10月30日，才在汪政权的反复恳求下勉强与之签订了所谓的《日华同盟条约》。这个同盟条约一面宣布《日华基本条约》连同附属文书“一并失效”^②，一面却又在“交换公文”中规定：目前中国存在的既成事实中“根据本条约精神需要进行调整者”，须到“两国间恢复全面和平，结束战争状态”之后再予以“根本调整”^③。“对华新政策”的上述欺诈性和伪善性说明，日本决策者此时虽然换上绣有“公正”、“和平”字样的“新鞋”，实际走的却依然是侵略、掠夺的“老路”。然而，造成日本之厄运的根子不在别处，恰恰在它所走的侵略之路本身。因此，这一政策一出世就被注定了是短命的。1943年5月31日，日本当局在其发布“对重庆不进行一切和平工作”的命令不满半年之时，就决定要“伺机实施对重庆的政治工作”^④。这充分暴露出了他们对“新政策”的失望。旨在“收揽民心”和“消灭重庆抗日根据”的对华新政策，已即将寿终正寝。

六

1943年9月18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立即开始由汪政府“进行对重庆工作”^⑤。从此，尽管“对华新政策”作为一

① 《第9次御前会议要领》（1942年12月21日）。

②③ 《日本同中华民国间同盟条约》及附件（1943年10月30日），《年表与文书》第591—593页。

④ 《大东亚政略指导要纲》（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决定），《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115页。

⑤ 《关于对重庆政治工作》，《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130页。

种宣传还在继续鼓噪不止，日本实际上的对蒋政策，却已放弃了它长期坚持不变的“使蒋政权溃灭或屈服”的目标，转而以取消原定的“媾和条件”的某些条款为“让步”，曲意拉拢蒋，迫切谋求在尽可能维持既得“战果”的基础上，实现日、蒋和平。这一“拉蒋谋和”政策，是日本在“对华新政策”彻底破产，自身被迫退守“绝对国防圈”、“求生存”取代“求胜利”成为第一需要，而中方仍然“战志坚强”、“资源丰富”、“地位巩固”、“力量强大”^①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的抉择。

就“拉蒋谋和”政策的具体条件及特点的变化而言，其实施过程大致可分为两期。1943年9月至翌年6月为前期。此期的对蒋“和平条件”为：（一）解除在华美英军队的武装或使之撤离中国；（二）断绝与美英之间的交通联络；（三）为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作出实质性的协助^②。其工作特点是，由汪政府出面接洽，日本躲在幕后操纵，以求在拉拢重庆的同时，安定汪政权的军心和维护日方的“面子”。

1944年7月小矶·米内联合内阁登台至战争结束为后期。此期，日本在遭到反法西斯同盟国致命打击的危在旦夕的形势下，将“争取重庆协助”作为打开外交全局的最大要务^③，更急迫地加强了对蒋和平攻势。为保证成功，它再次降低对蒋要价，规定“和平条件以完全平等为原则”，具体条件为：（一）关于全面和平后中国与美英的关系，只要中国采取善意的中立，日本即可满足；（二）同意蒋回归南京，成立统一政府，汪蒋关系作为中国国内问题，听任二者直接交涉；（三）废除日汪同盟条约；在全

① 引自1943年9月30日日本第11次御前会议所作《世界形势判断》，前揭《杉山笔记》下卷第474—480页。

② 《关于对重庆政治工作问题》，（1943年9月21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135—136页。

③ 《重光外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说明》（1944年8月19日），转引自《日本外交史》第24卷第342页。

面和平后另订有利于日中永远和平的新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四）只要在华美英军队撤兵，日本亦完全撤兵^①。此期的工作特点是，不再拘泥于维护“面子”，急欲同蒋直接谈判，并准备在必需时以“解散汪政权”来讨好重庆^②。后者说明，越是到战争末期，汪伪政权作为“工具”的作用越是减小，作为“包袱”的因素则越是增长，以至不惜抛弃之。

从“拉蒋谋和”政策前后两期的具体条件可知，日本在对蒋条件中降低或舍弃的仅仅是那些已被战局的发展证明完全失去了实现可能性的东西，而对它认为仅有实现可能的内容，则坚不退让^③。更可恶的是，即使是对那些已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它也要中国以“脱离英美，协助日本”作交换。在中日战争和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负大局已定的形势下，日本竟妄图以如此内容的“降价”来使蒋同意脱离并肩反抗侵略并正走向胜利的盟国，转而协助日本这个交战了多年的民族敌人进行已必败无疑的“大东亚战争”，实在“天真”得背离了常识。1943年12月1日的《中英美三国开罗宣言》庄重宣布：“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④。这一宣言表明，在日本转入拉蒋谋和阶段，无奈地、伪善地降低其对蒋条件的同时，蒋及中国政府则实质而正当地提高其对日条件。这是日蒋对立的症结在新形势下的新表现。在这种趋势下，除非日本有能力扭转整个战局，否则它就只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侵华“战果”，接受《开罗宣言》，才能真正求

① 《关于对重庆政治工作之实施》（1944年9月5日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年表与文书》第605—606页。

② 畑俊六日记（1944年9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卷第374页。

③ 譬如，在1944年9月5日决定的所谓“以完全平等为原则”的对蒋条件中，日本仍然要求中国“不变更满洲国的现状”和“同意日本在必要时出兵中国”。详见《年表与文书》第605—606页。

④ 《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4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6页。

得同中国的停战与和平。然而，日本决策者在对外侵略上特有的顽固性、冒险性和投机性，驱使他们背离这条唯一可行的道路，而试图以老手段和新策略的相互配合来实现梦想。

老手段表现为，在对蒋政策转入以“拉”与“和”为重点的阶段后，日本仍然在军事上保持对蒋政府的强大压力，以“打”促“拉”。特别是在1944年中，发动了中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大败国民党军队，使蒋引以为“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①。但日本“一号作战”的胜利并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比“以打促拉”的老手段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此阶段采用的两种新策略。一是积极策划以中国主权作“贡品”，换取苏联为中日战争作调停。为达此目的，日本决策层在1944年8月考虑的“对苏让步条件”有：满洲成为对苏非武装地带，或将北半部割让给苏联，重庆地区全面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日本所占领的地区作为日苏势力混合地区^②。二是以“对渝对延分别工作”的方法，加紧破坏国共合作，“以延压渝”。为此，日本当局于1944年7月3日规定：以后应把中共根据地“称呼为延安政权”，“尽量避免使用反共、灭共、剿共等名称”，以利“分裂重庆抗战阵营，酿成压战思想”^③。翌年4月，日本军部进一步明确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强力推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和对延安谋略工作，以实现与重庆的停战”，“对延安谋略作为对重庆措施的辅助（牵制）而利用之，极秘密地分别进行”^④。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就把苏联作为它的最大假想敌之

-
- ① 蒋介石，《青年远征军干部之使命》（1944年12月10日），《蒋集》第20卷第550页。
 - ② 《依据“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的对外政略指导要领》（1944年8月8日，省部主务者案），见〔日〕参谋本部资料集《败战的记录》，原书房1967年8月版第35—38页。
 - ③ 《对华作战的宣传要领》（1944年7月3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现代史资料》第38卷第146页。
 - ④ 《大陆指第2467号》，同上，第162—163页。

一。解决“北方问题”，一直是它梦寐以求的目标，“共同防共反共”更是它强迫中国接受的媾和条件之一。但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它竟又把算盘打到了它一贯要除之而后快的敌人头上。这充分说明了日本决策者极端的利己性与投机性。

“消除中国赤化的危险”，“与中共断绝关系”，“讨伐共产党”，这是日本对蒋要求的又一重心。然而，到了垂死挣扎阶段，它竟又妄图利用它长期视为作战重点而蓄意消灭的中共来帮助其实现对蒋目标。这个“打中共牌”的手法和前述“打苏联牌”一样，既充分地暴露了侵略者在贯彻其目的时是如何地不择手段，又清楚地告诉了人们，所谓“防共”、“反共”，在日本的政策中一贯起着“目的”与“手段”的双重作用。

然而，不管新老策略的配合如何巧妙，日本自1943年9月开始的“拉蒋谋和”攻势，包括最后的“缪斌工作”，始终只是日方一厢情愿而中方冷漠待之的“单相思”。最后终于同其前面各阶段的对蒋政策一起，以“无条件投降”的败战而打上了休止符。

纵观中日战争的全部过程和最终结局，日本的对蒋政策既未能实现其各个阶段的阶段目标，更未能实现其全局性的整体目标，因而是一种完全失败的政策。这除了其政策性质上的侵略性和政策渊源上的历史性之外，始终贯穿着以下三大特性。

一是政策制订上的整体性。在对蒋政策的演变过程中，虽然日本的政府与军部之间以及政府、军部内部的各个机构之间，曾对这一政策的某些具体的方法、时机等问题发生过一定的争论乃至分歧，但这些枝节问题上的争论，并不妨碍他们在总的目标、总的方针等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对蒋政策作为日本国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不是日本政府与军队中某一个职能部门或统治阶级中某一个人、集团的个别的决策，而是包括政府与军部、政客与军人，乃至宫廷与元老集团在内的日本整个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产物。

二是政策实施上的顽固性。它突出地表现为，对于这一政策

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体现在媾和条件中的战争目的，日本不仅在战局有利时绝不降低，在战局不利时也竭力维护。与这种顽固性互为因果的，是日本当局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意志至上的主观性、闭眼蛮干的盲目性、侥幸取巧的投机性和重战术、轻战略的“短视”性。它们的相互影响，使日本的对蒋政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非理性的色彩。

三是政策效果上破产的必然性。日本的对蒋政策及以此为核心的对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对中国的全面征服，而且是对亚洲的霸主地位，进而还从“东亚新秩序”扩张为“大东亚共荣圈”。这种政策目标同它的实际国力是根本不相称的。由于受到这一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的制约，尽管日本当局特别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特别注重搞政、战并行，硬、软兼施，刚、柔相济一类的阴谋诡计，但终究逃脱不了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失败结局。

（责任编辑：宋士堂）

（作者鹿锡俊，1955年生，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中国近代史译事五难举例

黄光域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中国近代史论著资料的翻译，近十年可谓盛况空前。译品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令人目不暇接。识者于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译业的兴盛；忧的是繁荣景下隐藏着某种芜滥，而人们习焉不察。何以言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一部有关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资料最能说明个中情形。该书题名《中华归主》，凡三册，176万字。版权署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实则系三代人努力的结晶^①。译者为读书界提供了这样一部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的巨制，所付出的辛劳是可以想见的。读者感激之外，自然也很高兴。但是，披览之余，不无遗憾。撇开由于语文的培植不够而出现的问题不谈，单就书末所附的两个译名表而言，其中误译或似是而非的地方，即不下百处。鉴于编译者所具的权威性和影响，为了不致谬种流传，这里不妨举几条实例。比如，译名表将司督阁(Dugald Christie)译为克里斯蒂，香便文(B. C. Henry)译为亨利，戴乐仁(J. B. Tayler)译为泰勒；将远东地理学会(Far Eastern Geographical Establishment)译为远东地輿建设会，广济医学堂(Hangchow Medical Training College)译为杭州医科学校，北京万国拒土总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译为国际拒土运动，《最新中国商业政治地理大全》(The New Atlas and

① 参见《中华归主》译后记。

Commercial Gazetteer of China) 译为《中国之新地舆及商城合志》，(上海)工部局西童书院(Public School for Foreign Boys) 译为外国男童公立学校，善胜医院(Wilson Memorial Hospital)译为威尔逊医院，等等，等等。笔者书此，丝毫没有苛责当事人的意思，只是想借以说明译事之难，而翻译中国近代史论著资料更有其特殊的困难之处。译者不明乎此而疏于查考，则往往是致误的主要原因。

本文拟从人名、地名、职官衔名、行名及书报名五个方面，申述中国近代史译事的特殊困难，以期求得翻译者及研究者的共鸣。不妥或谬误之处，敬祈方家不吝赐正。

一、人名译难

中国近代史涉及的人物，国别不同，背景各异，其姓其名千差万别，令人眼花缭乱。翻译这些姓名，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音译。但是这种办法在中国近代史论著资料的翻译中往往行不通。因为其所涉及的人物，一般在中文旧籍中都有记载。“先入为主”，今译姓名如不照顾旧译，则极易造成混乱。倘若有人将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的姓名按原文音译为马丁或威廉·亚历山大·帕森斯·马丁，将《万国公报》主编林乐知(Young J. Allen)的姓名音译为艾伦或扬·约翰·艾伦，即使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多年的人，恐怕也不会有几位认识。当然，旧籍中西人姓名也不乏音译者。但是由于译例不一和方音的影响，文献中同名异译、异名同译者屡见不鲜，加上今昔用字习惯的不同，如果径按现今标准音译，则万难与旧译沟通。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率舰炮轰广州江口炮台的美国水师提督 James Armstrong，《筹办夷务始末》记作奄师大郎，而根据现今标准音译，则应为阿姆斯特朗。其间差异，何啻天壤。

怎样正确翻译这些姓名，如何掌握翻译中国近代史人物姓名的技巧，很值得探讨。

首先，我们看看外国人姓名的译译。这里侧重讲西文汉译。我认为，凡主要活动于中国以外地区或在华日浅，并无汉名或者旧译名影响不大的，如果寻觅旧译不得，可按现今标准音译加注原文；而对主要活动于中国的外国人，则应力求查出其汉名或旧译名，不可图省事，轻易取音译法。

所谓主要活动于中国的外国人，包括驻华外交官及领事官，寓华传教士，中国海关、盐务及邮政机构职员，中国政府顾问，以及旅华商人、学者、报人、医生、工程师、律师等。这些人为了工作或活动的方便，一般取有中国姓名，至少也有比较固定的惯用译名。西人取华名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完全脱离原来的姓名，新取一个纯粹汉化的名字。寓华传教士中不少这类例子。比如康熙年间曾任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耶稣会士 Ferdinand Verbiest，取名南怀仁，字敦白；美国圣公会华中区主教 Logan H. Roots 取名吴德施；汉学家、法国耶稣会士 Antoine Gaubil 取名宋君荣，字英奇；等等。其原姓名与所取华名之间，简直找不出一丝联系来。另一种是依据原姓名，或取音，或从义，或音义兼顾，以确定华名。此种情况所占的比例最大。取音的，比如著名传教医师嘉约翰(John G. Kerr)，英国驻华公使朱迩典(J. N. Jordan)，中国海关税务司、著名中外关系史学家马士(H. B. Morse)等是；从义的，比如公理会传教士、教育家富善(C. Goodrich)，加拿大联合会会长王卓如(G. K. King)，美国寓杭女教士甘师母(Mrs. W. S. Sweet)等是；音义兼顾者则有美国南长老会教士吴板桥(S. I. Woodbridge)，哈佛燕京学社俄国教授钢和泰(Von Alexander Stael-Hostein)，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采用音译的办法，显然，除了造成混乱外，不会有其它积极效果。

同名同姓者，也是译述中的一大难题。比如英国伦敦会先驱传教士麦都思和驻华领事官麦华陀，父子二人西名均为 Walter

Henry Medhurst, 美国公理会教士、汉学家恒慕义和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父子,西名均为Arthur William Hummel。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文献中均有记载。译者逢此,颇费思索。举一个现成的例子:史载1854年6月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包令(J. Bowring)训令W. H. Medhurst等赴天京访问。这个Medhurst,蒋孟引及《中国近代史词典》等译为麦都思。对此笔者未敢苟同。认为麦都思其时已58岁高龄,以他当时的地位而论,不大可能奉命出访。同时原文使用的称谓是Mr. (先生),而非Rev. (教士)。而麦华陀当时正在驻华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任上,是包令的下属,奉派出访,才是正理^①。至于仅见其姓而不知其名的,翻译考证起来就会更加麻烦了。

拉丁化日文姓名的译译,严格地说不是翻译,而是还原。因为绝大多数日本姓名本来用的就是汉字,只是与汉语发音不同罢了。唯其如此,翻译起来更加困难。西方人的姓名,实在无计可施时,音译加注原文仍不失为一种不得已的解决办法。如果把原本是汉字的日本拉丁化姓名音译为与原字不同的汉字,再加上拉丁化的附注,岂非不伦不类。1978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日本姓名译名手册》,翌年商务印书馆又出了一本《日本姓名词典(拉丁字母序)》。包括笔者在内的,平日为翻译拉丁化日本姓名所苦的人们,莫不欢欣鼓舞。以为两书在手,一切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其实大谬不然。原来日本姓名同音字甚多,仅仅根据拉丁拼音根本无法确定原用汉字。所以,翻译拉丁化日本姓名,仍然需要根据具体人物的身份、履历及生卒年等背景材料,查阅相关书刊资料,直至找出原名汉字,才算完事。

其次,我们谈谈西文中国人姓名的译译。西文中国人姓名的翻译,同拉丁化日本姓名的翻译一样,实际上是还原而非翻

^① 参见《文史》第一辑蒋文,《中国近代史词典》第160页及《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第1页。

译。同样很困难。不过，对于中国人物我们毕竟要熟悉一些。如果单是对音，相比之下困难可能少些。但是，由于方音的关系，有些人名的对音也不容易。比如孙科，西文作Sun Fo，讲普通话的人就很难想象。有不少中国学者、政治家、外交家及商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取有西洋名字。这又给译者添了一重麻烦。比如平民教育家晏阳初西文名为Y. C. James Yen，燕京大学教授洪业西文名为Wiliam Hung，当代中国近代史学者陈志让西文名为Jerome Ch'en，早期留美的女医生石美玉西文名为Mary Stone，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西文名为Eugene Ch'en，外交家顾维钧西文名为Vi Kyuin Wellington Koo，《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董显光西文名为Hollingt on Kong Tong，天主教枢机主教田耕莘西文名为Thomas Tien，华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季珊西文名为James Y. Tong，等等皆是。总之，西文中国人姓名的译译，无论其有无西洋名字，均须追本穷源，还其本来面目。

二、地名译译难

中国近代史论著资料中地名的翻译，一般说来，比人名的翻译容易。外国地名可以音译。同时有《外国地名译名手册》、《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及《世界地名录》等多种工具书可供查考。但是，中国地名的翻译就不那么容易了。最简单的也需要对音还原。同音异字的处理，方音的辨别，都很棘手。比如Shihkiatsi，在安徽者称石家集；而在江苏则有两处，一称硕家集，一称施家集。最后落实仍免不了查考的工夫。再比如广东的Pakhoi和Hoihow，福建的Amoy，不谙粤语闽语者就很难对译出“北海”、“海口”和“厦门”来。至于西方人称沈阳为Mukden，称张家口为Kalgan，称烟台为Chefoo，称营口为Newchwang，称澳门为Macao，称广州为Canton等等，自有其历史的原因，但若根据发音回译，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译者更困难的却是西化

地名,也就是外国人命名的中国地名。除旅顺 (Port Arthur)、台湾 (Formosa) 这些大地名外,主要表现在租界和其它地方的街市名称上。比如The Bund一词,外国人所到之处用得相当广泛,但其华语名称在各地却迥然不同。它在上海公共租界称黄浦滩或外滩;在天津英租界称河坝道,俄租界称河沿路;在汉口,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均称河街唯有德租界称江岸街;在广州它称长堤,在营口称河南边,在南京称江边马路。此外,在烟台、汕头、厦门、福州诸埠也都有各自的华语名称。从美国纽约搬来的Broadway也是如此。在上海公共租界称百老汇路,音义兼容,译得漂亮;但在烟台却直质无华,径称大马路。有的地名取义相同,而音形各异。比如为纪念法国驻华公使吕班 (P. R. G. Dubail) 而命名的街道,在上海法租界有吕班路 (Avenue Dubail),在汉口法租界有吕班使街 (Rue Dubail);为纪念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额尔金 (Lord Elgin) 而命名的街道,上海公共租界有爱而近路 (Elgin Road),天津英租界有围墙道 (Elgin Avenue)。中外文均不一致。北京也有若干西人自译的地名。比如使馆林立的东交民巷,西文译作Legation Street,倒也合意;紫禁城译作The Forbidden City,皇城译作The Imperial City,雍和宫译作The Lama Temple,国子监译作The Hall of Classics等等,皆例此。至于把台基厂译作Rue Marco Polo,王府井大街译作Morrison Street,天桥市场译作Thief's Market,东珠市口译作Big Embroidery Street,西湖营译作Small Embroidery Street,内城译作The Tartar City,南城译作The Chinese City等等,其所蕴涵,则非熟知掌故者莫能道其详。除此之外,哈尔滨的拉丁化俄语地名,大连、青岛、沈阳等地的拉丁化日语地名,也都是译者的“拦路虎”。由于目前尚无一本实用的工具书可资查考,译者逢此,每多搔首踟蹰,不知所措。我看,眼前别无良法,只有勤查资料勤积累,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排忧解难。

三、职官衔名译难

中国近代史上的职官衔名，就数量来说，当不及人名和地名。但是翻译的困难程度，却未见其稍减。由于系统和时代的差别，同名异译、异名同译的现象处处可见。稍一疏忽，就有可能张冠李戴，造成差错。

英文Secretary一词，可以说是普通至极。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妙用，却变幻莫测，难以捉摸。那怕手捧《英汉辞海》那样义项齐全的大型辞书也无济于事。在外国驻华使馆，晚清及民国前期，官方将其译作参赞，比如First Secretary为头等（一等）参赞，Second Secretary为二等参赞，Chinese Secretary早期称汉文正使，嗣先后改译为汉务参赞、汉文参赞或中文参赞。从《外交官衔名录》的记载看，1930年代初才有今天一秘、二秘的译法。而在与之相对应的中国驻外使馆却大不相同。清政府将使馆书记官译作Secretary，至民国改译秘书为Secretary。在中国海关，职衔称谓自成系统。Chief Secretary初称总理文案税务司，民初以后改称总务科税务司；Chinese Secretary先后称管理汉文案税务司及汉文秘书科税务司；Audit Secretary先后称委巡各口款项事税务司、稽查帐目税务司及会计科税务司；Non-resident Secretary为驻英税务司或驻外税务司，Private Secretary为总司录事司，Assistant Secretary为襄办文案副税务司，等等。而在通商各关，税务司的英文衔名却是Commissioner。在晚清邮政系统，Postal Secretary称邮政总办，Deputy Secretary称邮政额外总办，Assistant Secretary称邮政副总办。在清季政府系统，军机章京译为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of State，大学士作Grand Secretary，协办大学士译作Assistant Grand Secretary，各部郎中译为Senior Secretary；迨清末各部新设参议厅，其左参议译为Senior Secretary，右参议译为Junior Secretary，郎中只好别译为Department

Director。蒲安臣使团中有两名随同出使的外国人，即英国驻华使署汉文副使柏卓安（J. M. Brown）和中国海关九江关法籍税务司德善（E. de Champs）。他们的职衔分别为左协理和右协理，英文著作中则译为First Secretary及Second Secretary。笔者当年参与编订《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时，未遑查考中文史籍，径按英文依驻华使署成例将其译为头等参赞及二等参赞，数年后写蒲安臣传才发现，悔之晚矣。这说明在中国近代史论著资料的翻译中，必须因时因地制宜，千万不可想当然，贸然行事。有关Secretary不同译法的例子还很多。比如在香港殖民政府中Colonial Secretary初称辅政司，嗣改布政司；在澳门殖民政府中Colonial Secretary初称大写，嗣改辅政司。上海公共租界总办处中Secretary称总办，Deputy Secretary为副总办，Assistant Secretary为会办。其余，如General Secretary，广学会相当长时间译为总理，后来才改称总干事；而基督教青年会、博医会及中国主日学合会等则一直称总干事。Chief Secretary，在国民政府文官处须译为文官长，在行政院却要译为秘书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中国近代史文献中难译的职官衔名，当然远不止Secretary一个。例如General Director，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初译为总裁，内地会却译为总理。上海“大英按察使司衙门”及“大美国按察使衙门”译Judge为按察使，香港考数署译Auditor-General为考数司，晚清官书译美国及秘鲁等国总统（President）为大伯理玺天德，译Admiral为水师提督。诸如此类，要皆自成体系。译者仅仅依靠坊间普通字典是无法译的。

与职官衔名相连带的秩品勋爵，译起来同样困难。比如清季的顶戴、花翎，英文分别译作Button和Peacock Feather。The Button of the 1st Rank为头品顶戴，The Button of the Sixth Rank为六品顶戴，The Three-eyed Peacock Feather为三眼花翎，The Double-eyed Peacock Feather为双眼花

翎，The Single-eyed Peacock Feather为单眼花翎，等等。如果没有相关的知识，平时又无积累，恐怕只好望“字”兴叹了。

四、行名译难

这里所谓“行”，不仅指工商企业，而且包括机关团体。在中国近代史上，行名的繁复纷杂，较之人名、地名、职官衔名，有过之而无不及。

先看外国行名。初期，外国人在华开办工商企业，为了便于经营，常常取有地道的中国行名；而西名仍按照本国习惯，多以发起者或合伙人的姓字称之。例如英国大鸦片商查顿(W. Jardine)和马地臣(J. W. Matheson)合伙发起开办的怡和洋行，西名为“Jardine, Matheson & Co.”；颠地(L. Dent)等开办的宝顺洋行，西名为“Dent, Beale & Co.”；劫(T. A. Gibb)等合伙开办的仁记洋行，西名为“Gibb, Livingston & Co.”；德商甲罗威(R. von Carlowitz)等开办的礼和洋行，西名为“Carlowitz & Co.”；卜加士达(J. J. Buchheister)开办的瑞生洋行，西名为“Buchheister & Co.”，等等。义记洋行(Holliday, Wise & Co.)、和记洋行(Blenkin, Rawson & Co.)，森和洋行(Wolcott, Bate & Co.)，裕记洋行(Diron Gray & Co.)，旗昌洋行(Russell & Co.)，隆茂洋行(Mackenzie Bros. & Co.)，太平洋行(Gilman & Co.)及泰和洋行(Reiss & Co.)等的命名，均循此原则。从字面上看，这些商号的中外文名称之间，可以说了无关联。另一类行号，其中文名称即为行主或发起人姓字的音译。如“David Sassoon, Sons & Co.”华名沙逊洋行，“Thomas Ripley & Co.”华名李百里洋行，“Melchers & Co.”华名吻者士公司或美最时洋行，等等。像这样命名的工商企业，后期为数甚多。翻译时多少有些线索，但在用字上也颇费斟酌。至于以地名、物名、行业或特殊命意取名的工商企业，其中外文名称，更是错综复杂，五花八门。同名异译者有之：Astor

House Hotel, 上海称礼查饭店, 烟台称法国饭店, 沈阳称华富饭店, 营口称泰来饭店, 而汕头称适宜楼; Asia Export Co., 在天津的是华亨洋行, 在上海的是亚洲出口公司。异名同译者有之: 挪威商“Berbom & Thowsen”华名协和洋行, 英商“Anderson & Co.”华名也是协和洋行。行名译译之难, 于此可见一斑。

外国在华机关公团的中外文名称, 由于历史的变迁或地域的隔离, 有不少今天看来很难理解。比如1865年英国在上海设立的远东高等法院, 西名 H. B. M. 's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 Japan, 华名为大英按察使司衙门, 其后因辖境变易, 西名稍有更动, 而华名几十年始终如一。香港的立法咨询机关, 西名 Legislative Council, 华名为定例局; 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机关, 西名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华名工部局。下面我们再看看其他方面的例子。西侨联谊会或俱乐部: Shanghai Club 华名总会, Hankow Club 华名波楼, Hongkong Club 华名新公司。来华基督教新教差会: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North) 华名美以美会, 而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华名却为监理会。教会医院: 北京的同仁医院西名为 Hopkins Memorial Hospital, 武昌的同仁医院西名为 Church General Hospital, 安庆的同仁医院西名为 St. James Hospital, 上海的同仁医院西名为 St. Luke's Hospital; 而西名为 St. Luke's Hospital 的, 又有福建兴化(莆田)的圣路加医院和山东兖州(滋阳)的中华圣公会医院。教会学校: Peking University 1904年初办时华名汇文大学, 1919年改组为燕京大学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仍袭用旧西名; Nanking University 华名为汇文书院。此外, Anglo-Chinese College, 在厦门者先后称英华书院及私立英华中学, 在福州者先后称鹤龄英华书院及私立鹤龄英华中学, 在上海者称中西书院, 在天津者先后称新学大书院及私立新学中学。著名教会文化出版机构广学会的中西文名称更是扑朔迷离。《辞海》、《中国近代史词典》及其它一些著述在提到广学会时, 均注明其西名

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这当然不错，但不够准确。它1887年在上海成立时称同文书会，西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始定名广学会，同年首在英国启用“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这一西名，但在中国国内，广学会仍袭用原同文书会的西名，直到1906年。翻译时如果忽视这一史实，就很可能张冠李戴。

中国行名的译译同样艰难。著名的轮船招商局，西名为China Merchants' Steam Navigation Co.；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西名为Chinese Engineering & Mining Co., Ltd.；聚兴诚银行西名为Young Bros. Banking Corporation；浙江兴业银行西名为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Ltd.；先施有限公司西名为Sincere Co. Ltd.；大新有限公司西名为Sun Co., Ltd.，等等。这些工商企业的中外文名称之间，由于缺少必要的联系，翻译起来并不比外国工商行名省力。至于机关团体，类似的情况也不乏其例。清军机处，西名译为Council of State或Grand Council，内阁译为Grand Secretariat或Imperial Chancery；北洋政府国务院西名译为The Cabinet，大理院译为Supreme Court；国民政府文官处西名初译为The Secretariat，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处西名相同；在上海的对外宣传机构中华公共通信社西名为China Bureau of Public Information^①；端纳（W. H. Donald）主持的北洋政府经济讨论处西名为Bureau of Economic Information；总税务司公署西名清季作Inspectorate-General of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民国改为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等等。如果按照字面硬译，则很难避免差错。

在翻译实践中，行名的历史演变，译者不可不察。比如美商花

^①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第2208页将此译为公众情报局，大误。

旗银行，香港等埠称万国宝通银行，1902年来华开业，在上海福州路四川路口设分行，西名为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1920年代中在华各分行改用纽约总行西名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华名依旧；大通银行1921年来华开业时西名为Equitable Eastern Banking Corporation，1930年总行并入蔡斯国民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 of the City of New York），华行遂更西名为Chase Bank，而华名“大通”却被总行采用。诸如此类例子，在一般工商企业中更多。

工商企业常有因地域不同而出现的 一行多名现象。比如Chartered Bank of India, Australia and China，香港等地称渣打银行，盖自Chartered转音；而上海及内地诸埠则称麦加利银行，据考源于沪行第一任总理麦加利(John Mackellar)的姓氏。怡和洋行，香港等地一度译称“渣颠”或“义和”；宝顺洋行，在香港等地称“颠地”，沙逊洋行称“沙宣”等等。对此，译者也应有所了解，才不致误会。

五、书报名译译难

书报名也是中国近代史译事的难点之一。因为许多报刊杂志有其固定的中外文名称，而能供查考的资料却少得可怜。比如受袁世凯津贴的上海《中国公论西报》英文名为“The National Review”，《大公报》西名为“L'Impartial”，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西名为“National Herald”，上海《大陆报》西名为“The China Press”。《密勒氏评论报》西名原作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嗣改“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1923年6月启用“The China Weekly Review”新名。香港《孖刺报》西名原称“Daily Press”，嗣改“Hongkong Daily Press”，《德臣报》西名为“China Mail”。北京及天津的《益闻西报》西名为“China Times”，恰与上海中文《时事新报》西名相同。天津《警卫报》西名初作

“China Review”，嗣改“*The China Critic*”，又与上海中文《中国评论周报》西名雷同。如此等等，仅凭西名想要译出准确的华名，或仅据中文想要译出准确的西名，几乎是不可能的。有若干报刊中外文名称之间从字面上看有一定的联系，翻译时要做到准确无误也非易事。比如“*The Far Eastern Review*”华名《远东时报》，“*The Far Eastern Times*”华名《东方时报》。不少人照字面将前者译为《远东评论》，将后者译为《远东时报》，其实都不对。因为这些报刊的中外文名称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动。类似的例子很多。比如“*Shanghai Times*”为《泰晤士报》，“*Peking & Tientsin Times*”为《京津泰晤士报》，“*Tsingtao Times*”为《青岛泰晤士报》，“*North China Standard*”为《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r*”为《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为《字林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初称《南清早报》，嗣改《南华早报》；“*Chefoo Daily News*”为《烟台英文报》，“*Canton Gazette*”，1886年创刊者称《广报》，1923年创刊者为《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Daily Sun*”为《广东英文新报》，“*Canton Truth*”为《广州实事周刊》。年鉴方面，“*The China Yearbook*”初称《中华年书》，嗣改《中华年鉴》，1912年英人贝尔(H. T. M. Bell)所创办；“*The Chinese Yearbook*”华名初称《英文中国年鉴》，嗣改《中国年鉴》，1935年国人自办。不少译者(包括一些颇有声望的译者)拘于字面，将前者译为《中国年鉴》，后者译为《中华年鉴》，一字之差，以致成错。疑似之间，实不可不辨。

另有一些西文报刊，本无华名，但在学术界有惯用的译名。比如“*The Chinese Repository*”，从前多从魏源译为《澳门月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译为《中国文库》，近年则倾向于译为《中国丛报》；“*Canton Register*”魏源译为《澳门杂录》，戈公振译为《广州纪录》；“*Canton Press*”魏源译为《澳门新闻录》，戈公振译为《广东报》等等。

上海开埠后英人发刊的第一种西文报纸名“North China Herald”，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译作《北华捷报》，为学术界广泛采用。但是史学翻译家、老报人孙瑞芹以为不妥。他认为该报虽由奚安门（H. Shearman）创刊于1850年，但在1856年奚氏死后不久即被他人收买接办，报馆华名为字林洋行，1864年起又成为《字林报》的每周附刊，如果原无华名，理应译为《字林报周刊》；同时认为，当时所谓“North China”，是相对广州而言，实指上海一带，与今日华北在含意上完全不同，更何况一周一期，较之日刊《字林报》何捷之有？为此，笔者据不完全的资料进行过初步考证。1870—1907年该报报头确无汉字，1908—1926年笔者未见原报不敢妄言，但从1927年起西文报头右边即有一行小字，题为《字林星期周刊》。1937年出版的杨家骆《全国机关公团名录·期刊社卷》将该报著录为《字林周报》，惜未详所据为何。

书名的翻译所受制约较少。但有两种情况须加注意。一是原书本来即有中文题名，这种情况一般应照录原文。实在有必要翻译，对原中文题名也应有所交代。比如翟理思（H. A. Giles）的《古今姓氏族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①及《曝山笔记》（Adversaria Sinica），卫三畏（S. W. Williams）的《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夏之时（Louis Richard）的《中国坤舆详志》（Geographie de l'Empire de Chine），阿灵敦（L. C. Arlington）的《青龙过眼》（Through the Dragon's Eyes）及白瑞华（R. S. Britton）的《中国报纸》（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②等。另一种原书虽无中文题名，但旧译言简意赅且为大家所熟

①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第658页将其译为《中国人名辞典》，大可不必。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32页将其译为《在华出版机构》则毫无道理。因为白氏全书所述均为报刊史，并未涉及出版机构。

知，则无烦重译。比如高第（Henri Cordier）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库寿龄（S. Couling）的《中国百科全书》（*The Encyclopaedia Sinica*），裕尔（H. Yule）编译的《西域记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梅辉立（W. F. Meyers）等合编的《中日商埠志》（*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及卜舛济（F. L. H. Pott）的《上海租界略史》（*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等。此外，对于外国人所译中文著作的西名也应留意。比如蒲爱德（Ida Pruitt）所译吴永《庚子西狩丛谭》西名为“*The Flight of an Empress*”，李提摩太（T. Richard）所译李志常《西游记》西名为“*A Mission to Heaven*”等等。

结 语

中国近代史译事之难当然不止上述五个方面。会议名、条约名和术语的译译，以及引语的查核等，实际上也都相当棘手。但是，本文所举各类例证已经足以说明翻译中国近代史论著资料的特殊困难，无须再一一赘述。

翻译是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之一。好的译品可以使读者开阔视野、活跃思维、丰富知识、取长补短；不好的译品则不然，它不但不能为读者提供便利，反而会造成混乱，严重的甚至可能将某项具体研究引入歧途^①。一个严肃的译者当然不能仅仅感叹于“译之为事难矣”，而应积极主动千方百计去克服困难，以成就出好的和有益于学术的译品来。

对于译者来说，治难之方，我以为首要的一条就是承认困难和认识困难。只有正视困难才会有战胜困难的愿望和勇气。那种视翻译为易事的人，往往正是芜滥译品的制造者。其次是熟悉和

^① 参见齐钟久：《罗大纲、吴如孝致英使文翰的照会》（《文物》1979年第8期）。

掌握广泛的近代史专业知识，那样才能富于联思、触类旁通。第三则要求遇事认真，平时勤于查考、勤于积累。三条如果都做到了，我想困难必定会越来越来少，译品必定会越来越精。

对于学术界来说，帮助译者克服困难，似有两件事可做。一是经常对译品进行严正、同情的评论，这有利于催人上进和消弭芜滥。二是组织人力编辑一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译名手册之类的工具书，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译者翻检查考的劳累。

（责任编辑：雷颐）

（作者黄光域，193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求 疵 一 束

——关于《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的译释问题

刘 岳 斌

姜秉正先生所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综目》）是一部搜罗丰富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情报性工具书，该书收录了自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到1981年为止国内外研究太平天国的专著、论文和资料等，造端宏大，包罗广泛。但是该书还有些不尽人意之处，笔者最近翻阅该书收录的英文著述目录时，发现一些译名不尽恰当甚至错译，经归纳整理，草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综目》中英文译名的舛误和失当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误译，包括某些论著名和一些专有名词。

论著名的误译如：

Memoirs of Generals Ward, Burgevine and of the Ever-Conquering Legion, 应译为“华尔、白齐文将军及常胜军回忆录”，《综目》误译为“沃德、白齐文将军和常胜者利金的回忆录”（乙V003）^{*}；

Trip of the Susquehanna to Nanking and Wuhu, Mclane's Visit, 应译为“麦莲乘萨斯奎哈纳号（军舰）访问

* 《综目》序号，下同。

南京芜湖记”，《综目》误译为“从萨斯奎哈纳到南京及芜湖的旅行：麦克莱恩访问记”（JCO15）；

An Englishman at the Court of Taiping Kingdom, 应译为“太平天国朝廷中的一个英国人”，《综目》误译为“一个英国人在太平天国朝廷受觐的情况”（JCO90）；

Letter Denouncing the Taipings upon his Departure from Nanking, 应译为“就其离开南京抨击太平天国的信”，《综目》误译为“抨击太平军离开南京的一封信”（JCO43）；

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 应译为“一串中国桃核”，《综目》误译为“中国一连串的美丽的里程碑”（JCO-71）。

专有名词的误译，如：

组织机构名称如 the Grand Council (of the ch'ing Dynasty)、Public Record Office(of Great Britain) 和 the Triad Society (the Triad, or the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分别为清代的“军机处”、英国的“国家档案馆”和清代的秘密反清组织“三合会”（或“天地会”），《综目》将其分别误译为清朝“宏大的议事机构”（甲M054）、“公众登记办公室”（JC002）和“三种力量联合”（甲K001）或“三合一社会”（JCO70）。

教会名称如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和 the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应分别译为“伦敦（布道）会”、“美国浸礼会”和“卫理公会”，《综目》将其分别译为“伦敦传教士协会”（甲M004）、“美国基督教国外布道团学会”（甲M010）和“卫理公会教士学会”（甲M011），让人以为这是几个学术团体，其实它们是地地道道的教会组织。Basle Evangelical Society 通译“巴色会”，《综目》译为“巴色尔布道会”（JCO13）似不为过，但毕竟有造成误解的可能。另外，《综目》译者望文生义，一见到 Mission 就以为与宗教有

关，把Narrative of the Earl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 1858, 1859中的the Earl Elgin's Mission误译为“额尔金伯爵的传教团”（甲M003）。额尔金是那个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下令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的英国侵略分子，并不是宗教领袖，何来他的传教团？在这里，mission应作“使命”解，因而该书名应译为“1857—1859年额尔金出使中国和日本纪事”。

明显的地名错误有：The Fight With the Rebels near Minghong（甲C005）中的Minghong，应为“闵行”，位于上海附近，《综目》误译为“闽杭”；Rebel Invasion of Chenkiang（JC025）中的Chenkiang，应为“镇江”，《综目》误译为“重庆”；The Transfer of T.T.Meadows from Shanghai to Newchwang in 1861（JC092）中的Newchwang，应为“牛庄”，《综目》误译为“海防”。

（二）译名不当，包括某些论著名、人名和个别历史名词。

有些外国人（或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述，史学界早已有为人熟知的译名，《综目》未予采用，而是另创他译，虽无可厚非，毕竟不合习惯，如：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The Middle Kingdom应译为“中国总论”，《综目》译为“中部王国”（甲A007）；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Martin）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应译为“花甲记忆”，《综目》译为“中国南北一瞥”（甲A012）；

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三卷本巨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由张汇文等译，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联书店1957年起出版，《综目》将其译为“中华帝国的国际交往”（甲M051），这就使人误以

为是另一本书了；

韩山文 (Theodore Hamberg) 的 *The Visions of Hung Siu-tsh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1935年简又文将其翻译出版, 易名《太平天国起义记》, 1952年收入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六册, 《综目》仍按原文直译为“洪秀全的幻想和广西暴动的由来”(乙B001);

呤喇 (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 的 *Ti-Ping Tien-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中译本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出版, 王维周译, 名《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综目》则译为“太平天国革命史, 包括作者个人冒险纪事”(JCO65);

容闳的 *M4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中译本以《西学东渐记》行世, 据云1915年恽铁樵、徐凤石翻译, 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取名“西学东渐记”, 虽不忠实于原文, 却无人提出异议, 一直通行于史学界, 《综目》则仍直译为“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JCO77)。

另外, 还有法国人加勒利 (J.M.Callery) 和伊凡 (M. Yvan) 合著的 *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于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时已易名《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而《综目》仍译为“中国武装暴动史”(甲A001)。

人名的翻译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对外国人名的翻译, 一般采用的是“音译”法, 《综目》中大多数人名即采此法而译。然而, 某些与中国有渊源的外国人, 如曾在中国工作生活过多年的人及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他们或自己取有汉名, 或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有约定俗成的惯用汉译名, 前者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原名 John King Fairbank, 音译应为“约翰·金·费尔班克”, 后者如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 原名 Norm-

an Bethune, 音译应为“诺曼·贝休恩”。在这种情况下，我

| 原 名 | 《综目》音译名 | 惯译名 | 人 物 简 介 |
|---------------------|---------------|---------|----------------------|
| Alcock, Rutherford | 阿尔科克 | 阿礼国 | 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华公使。 |
| Bonham, George | 博纳姆 | 文翰 | 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华公使,访问过天京。 |
| Cushing, Caleb | 库欣(JC024) | 顾盛 | 美国外交官,迫清政府签《望厦条约》者。 |
| Davis, John Francis | 戴维斯 | 德庇时 | 英国外交官,曾任驻华公使、港督等职。 |
| Edkins, Joseph | 埃德金斯 | 艾约瑟 | 英国教士,汉学家,曾访问天京。 |
| Forrester, Edward | 弗雷斯特 | 法尔思德 | 美国流氓,“常胜军”司令华尔的副手。 |
| Hamberg, Theodore | 汉伯格 | 韩山文 | 瑞典教士,著《太平天国起义记》。 |
| John, Griffith | 约翰 | 杨笃信(格非) | 英国教士,曾遍游华中,访问过天京。 |
| Legge, James | 莱格 | 理雅各 | 英国汉学家,译四书五经。 |
| McLane, R.M. | 麦克莱恩(JC015) | 麦莲 | 美国外交官,曾访问天京。 |
| Marshall, Humphrey | 马歇尔 | 马沙利 | 美国外交官,曾任驻华公使。 |
| Martin, W.A.P. | 马丁 | 丁睦良 | 美国教士,曾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
| Morse, H.B. | 莫尔斯 | 马士 | 英国人,长期任职于中国海关,著述甚多。 |
| Parks, H.S. | 哈里·帕克斯(JC075) | 巴夏礼 | 英国外交官,曾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
| Reid, Gilbert | 里德 | 李佳白 | 美国教士,长期在华传教。 |
| Roberts, I.J. | 罗伯茨 | 罗孝全 | 美国教士,曾在天京居住。 |
| Ward, F.T. | 沃德(ZV003) | 华尔 | 美国人,“常胜军”首领。 |
| Wright, Mary C. | 怀特,赖特 | 芮玛丽 | 美国当代史学家。 |
| Boardman, E.P. | 博德曼 | 濮友真 | 美国当代史学家。 |

们就应本着采用自拟汉名和“约定俗成”的原则来翻译外国人名，如硬将众所熟知的费正清、白求恩按现在通行的音译标准译为“费尔班克”、“贝休恩”，就会令人不知所云。《综目》中属此类情况的不少，兹以《综目·作者索引》按字母排列的顺序举例列表如下（见上页，索引所无者，“在《综目》音译名”项下列出序号）：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华人学者的名字回译错了，如把《美国人和太平天国》的作者邓元忠（Teng Yuan-chung）误译为“郑元充”，把台湾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郭廷以（Kuo Ting-i, Kuo Ting-yee）误译为“郭廷一”。

历史名词如the T'ung-chih Restoration，应为“同治中兴”，《综目》将其译为“同治复兴”（甲M059）。

（三）某些译名前后不一致。人名如John King Fairbank，有时译为“费正清”，有时译为“费尔班克”，应以前者为准；职务名如Prime Minister，有时译为“宰相”（乙M003，乙M004），有时则译为“军师”（乙M005），《综目》中涉及到的Prime Minister是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自以译为“军师”为确；书刊名有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一处译为“中日知识宝藏”（JC062），另一处则译为“中国和日本纪事”（JC064），鄙意以译为“中日文库”为宜。

二

造成《综目》中英文部分译名错误和失当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数端。

第一，对原文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对原文的透彻理解是翻译的基本要求，这是不言而喻的，《综目》英文著述目录的译者显然对某些原文未理解透，以致错把the Ever-Conquering Legion中的Legion（军团、部队）当作人名，把Trip of the Susquehanna to Nanking and Wuhu中的Susquehanna当作地名来翻译，把An Englishman at the Court of Taip-

ing Kingdom中的Court一词两译为“朝廷”和“受觐”。其实，the Ever Conquering Legion是指由美国人华尔创立、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的反动武装“常胜军”，英文通常译作the Ever-Victorious Army；Susquehanna是美国驻华公使麦莲1853年溯长江西上访问南京、芜湖等地时乘坐的军舰的名字；而Court一词应取其“朝（宫）廷”义，一个英国人不可能被当作君主在太平国“受觐”。令人殊不可解的是《综目》对A String of Chinese Peachstones的翻译，这是英国循道会教士高葆真（W·A·Cornaby）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出版于1895年，1925年改写并再版，易名A Necklace of Peachstones（《桃核项链》）。《综目》将其译为“中国一连串的美丽的里程碑”，不知有何依据？此名显系直译，不知“美丽的里程碑”又从何而来？

第二，对有关知识了解不够。翻译（纯理工科者除外）是一门“杂学”，天文、地理、成语典故、神话传说，说不定碰上哪方面的知识，这就需要译者起码要对所译内容涉及的专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综目》英文译名存在的问题看，译者对中国近代史显然缺乏这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就不会把清代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军机处”望文生义地译为“宏大的议事机构”，也不会把清代民间秘密反清组织“三合会”译为“三合一社会”了。如果译者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不会把玛高温（J. Mac Gown，又译“麦高文”）1858年6月关于太平军的报道Rebel Invasion of Chenkiaug译为“造反者入侵重庆”。大家知道，太平军自金田起义，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顺流东下，定都南京，然后分兵北伐西征，后又东下建立了苏浙根据地，活动范围的确相当大，但是何曾到达过重庆？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部出走，转战数省，最后全军覆灭于大渡河紫打地，也未曾进攻重庆，更何况他是在1863年春才进川，1858年他正率部转战于浙、闽、赣等省。而镇江位于南京下游长江南岸，正是太平军活动地区。如果译者对太平天国史有所了解，就应该首先想到镇江而不是重庆。

该文作者玛高温也并未到过重庆，即使太平军真的进攻重庆，他也不可能进行报道。而且，译为“镇江”不是比译为“重庆”更接近Chenkiang的读音吗？

从某些译名不当也可以看出译者对中国近代史缺乏应有的了解，中国历史上通常把一个朝代的再度复兴称作“中兴”，如汉代光武帝刘秀在王莽代汉称帝20年后复兴汉室，史称“光武中兴”；宋代赵构称帝，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史称“建炎中兴”。同样，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回光返照的同治时期一般称作“同治中兴”或把同治、光绪两朝合称为“同光中兴”，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被称为“中兴名臣”，《同治中兴录》、《中兴名臣传》、《同治中兴奏稿》等以“中兴”命名的书籍也相继刊行。由此可见，在中国史上，“中兴”一词已成为专门术语。《综目》把the Tung-chih Restoration译为“同治复兴”，虽忠实于原文，却与历史拉开了距离。笔者曾亲见芮玛丽该书（*The Last Stand of the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封面上即赫然有中文“同治中兴”四字。

人名的翻译不单是个翻译原则问题，也同样存在着中国近代史知识缺乏的问题。前表所列人物都是在近代史上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人物。例如，文翰，他曾在1848—1851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1853年赴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访问，刺探太平天国的情况以确定其对华政策，只要讲到太平天国的外交就不能不提这个人；华尔，是臭名昭著的“洋枪队”的首创者和“常胜军”首领，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1862年9月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讲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太平天国时必须提此人；罗孝全，美国浸礼会教士，1847年洪秀全曾在广州向其学习基督教教义，1860年10月赴天京，受洪秀全优遇，1862年1月不辞而别，到上海后在《华北先驱周报》（*North China Herald*，又译“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即“就

其离开南京抨击太平天国的信”，如果译者了解这一背景，也不至于将其错译为“抨击太平军离开南京的一封信”了；丁韪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8年任首任驻华公使列卫廉的翻译，参预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9—1894年任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如果译者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追寻这些人物为人熟知的汉译名（许多中国近代史专著都附有“译名对照表”供读者参考，尤其是港台出版者），而不至于开出博纳姆、沃德、罗伯茨、马丁这一串面孔陌生的名单来。

与对中国近代史知识了解不够相伴而来的，必然是对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及国内史学界对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的译介知之不多。论著名方面，如果说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丁韪良的《花甲记忆》还不是那么为人熟知的話，那么，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和呤喇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却是学习（还不要说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者尽人皆知的几本书。《综目》将这些论著另冠他名，加之有的作者名字不采惯译名，会让人误以为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又凭空增添了几种新著述。人名方面，费正清不用再说，芮玛丽、濮友真等也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芮玛丽的代表作《中国守旧派的最后一次抵抗：同治中兴》已列入王庆成先生主编的《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丛书》，准备翻译出版。

我们可以发现，《综目》英文译名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其实大都是中国近代史学习和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并不需要具备多么高深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和研究水平，只需稍具中国近代史知识，大致了解其研究状况，其中的绝大多数错误和失当就可以避免。

第三，译者似欠严谨。这里只举两个例子。其一，某些译名的不统一。John King Fairbank，译者明知是费正清，有时却偏译为“费尔班克”；Prime Minister，出现在连续挨着的三个

题目中，而且后两个题目一模一样，都是邓嗣禹(Teng Ssu-yu)的Hung Jen-kan, Prime Minister of the Taiping Kingdom and his Modernization Plans(太平天国军师洪仁环及其近代化计划)，只不过一为登在杂志上的论文，一为单行本，《综目》却将其分别译为“宰相”和“军师”；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也出现在同一页上(P.492)却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译法。其二，地名Minghong的翻译，原文为The Fight with the Rebels near Minghong，系刊登在1863年3月8日《华北先驱周报》的一篇报道，《综目》将其译为“闽杭附近同太平军的战斗情况”。众所周知“闽”指福建省，“杭”指杭州城，那么“闽杭附近指哪里”？如果译者谨慎一些，这一错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退一步说，即使不能正确地译为“闵行”也应该选用另外两个字并注明系音译。然而不管怎么说，把Minghong译为“闽杭”读音上还正确，总比把The Transfer of T.T.Meadows from Shanghai to Newchwang中的Newchwang译为“海防”略胜一筹。把Newchwang译为“海防”(越南有此地名)，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读音都相距甚远，更不用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了(密迪乐是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

当然，一个人纵使学富五车，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又不能象用母语写作时那样可以把自己不熟悉的东西绕过去，这就要求译者对不熟悉的东西下功夫去学习、索查、研究，如仍无把握，则须注明系音译或意译，切勿轻易下笔。

诚然，翻译良非易事。严复虽然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自己也未能一以贯之、身体力行，但是翻译的基本原则“信”即忠于原意，则是必须要遵守的。译得不“达”、不“雅”，至多是读起来不那么文采斐然、流畅顺达，但是若译得不“信”则所关匪浅，或令人不知所云，或诱人误入歧途，故而不可不慎。具体到中国近代史论著的翻译，“信”就不仅仅指符合词典上的一般意义，更要符合历史专业的特定译法，这主要是指专有

名词的翻译。有人认为,专有名词有固定译法,翻译似较容易,殊不知,翻译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专有名词,因其不能随便采用其它意义相同的译名。中国的专有名词译成英文时,不外意译与音译两种。就意译而言,例如中国历史上同一职官的名称在不同朝代各异,封建王朝的“丞相”、“宰相”,太平天国的“军师”,英文都译作prime minister,回译时则必须区别开来(至于英、日等国的prime minister,则又须译为“首相”);就音译而论,虽较意译易于回译,但在威氏汉字拼写法(Wade-Giles System)被普遍采用前,对外人对汉字的英语音译很不统一,且多采用各地方言译音,如光是“安徽”一个地名,在史料中即有Ngan-hoey Ngan-huie, Ngan-hwei, Ngan-hwui, Ngan-hwuy, Ngan-kouei, Ng'an-whuie, Anhwei等八种译法(见M·E·Clarke & J·S·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Canberra, 1982, P.442)。这就要求译者除了具备良好的外文理解能力和汉语表达能力外,还要对有关的典章制度、人物地理等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有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好是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或研究的人员。目前,史学界对外文资料尤其是对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译介还很不够,翻译作品不仅发表出版难,而且在职称评定中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颇不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由此笔者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近一个时期来,严谨的学术作品出版难,而某些并不怎么严谨甚至是粗制滥造的书却能经由各种渠道问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姜秉正先生所编《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仍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的一部颇有用途的工具书。《综目》即使存在上述缺陷,也是白璧微瑕。笔者晚辈后学,所以不揣浅陋、不避吹毛求疵之嫌而校正评析如上,无他,深望该书增订再版时臻于至善。(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刘岳斌,1962年生,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

俄罗斯首次对清政府赠书始末

羽离子

清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两国间文化交往有所进展，俄国派遣留学生来中国，清政府则于雍正六年将会同馆改设为“俄罗斯学馆”（又称“俄罗斯馆”、“俄罗斯教习馆”），接待留学生就学。后来，清政府又先后在国子监和内阁开设了“俄罗斯学”，选八旗子弟入学学习俄罗斯文字。为此，俄文书籍逐渐传入中国，但数量极少。

1845年，两国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国家间的正式的图书交换。关于这一次图书互赠活动，留存下来的记载很少，《清史稿》仅以一句话提及此事：“道光二十五年，俄进呈书籍三百余种”^①。已整理的目前尚存的清朝档案中也只简略地提及收到俄国来书一事。但清代文献《朔方备乘·卷三十九·俄罗斯进呈书籍记叙》中却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事情的起因：

道光二十五年，俄罗斯国王表言《丹珠尔经》乃佛教所重，而本国无之，奏求颁赐。上命发雍和宫藏本八百余册赐之。越数月，其国王因肄业换班学生进京，乃尽缮俄罗斯所有书籍来献，凡三百五十七号。

上述记载虽较完整却不甚准确。第一，清政府赠予俄国的不仅有《丹珠尔》，且还有《甘珠尔》。1868年，清理藩院曾咨复总理衙门：“道光二十四年据住京俄罗斯达喇吗佟正笏呈，恳请

^① 赵尔巽等：《清史稿·邦交志一·俄罗斯》，中华书局，1976年，第16册，4485页。

领唐古忒干珠尔经、丹珠尔经各一部，曾经奏明颁给只领等因”^①。“达喇吗”是中国人对俄东正教教士的称呼。从理藩院的这一报告可知，俄皇尼古拉一世的获书愿望是通过已居住北京多年的俄国东正教第12届驻华传教士团首领佟正笏（即波里卡尔普，Полякарп，1840~1849年在华）向清政府书面提出的，所要求的则是唐古忒文（即藏文）的《丹珠尔》和《甘珠尔》（即全套《大藏经》）。

第二，俄国回赠书籍并非借俄罗斯国学生换班之机，因在1845年并无任何留学生被遣来华，也无任何在华留学生归国。据前引理藩院咨文，这批图书是专门从俄国首都彼得堡出发，取道伊尔库茨克，经库伦运至北京的。此外，关于这批图书的俄方文件清楚表明，俄国赠书是对清政府赠书的答谢：“因前蒙赏给伊等住京人书籍，令由该国萨那忒衙门备送俄罗斯书籍呈进”^②。

最初收下赠书的是理藩院。理藩院奏准后奉旨在本院保存，但须在军机处“存注档册”，以便皇帝垂询。为此，由直属理藩院的俄罗斯馆译出了书名目录^③。这是第一次的译目，分类严谨，与中国的传统体系迥异，显然是按俄国提供的俄文目录翻译的。目录共编至357号，其中第356号为仪器工具，第357号为仪器工具的说明书，355号及之前均为图书；多数是每编号为一种书，少数情况下一种书有几个编号，故实际应是281种图书。《清史稿》等称其为300余种，其实是不确的。每种书本数不一，少则1本，多则20本，最多的是《喀拉马星氏各家文人编》，有59本^④。1~355号图书，除3个编号下未注本数外，其余的有803本（极少数为幅），估计连总目在内，总共近810本

①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6。

②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62。

③ 《朔方备乘》和《北徼汇编》均收有此目录。

④ 是书多号，其中第295号，《朔方备乘》作11本，《北徼汇编》作12本，本文按12本累计。

(幅)。

从总书目可清晰地看出所有图书都被按照内容性质而依次分类排列：

| | |
|-----------|-------------|
| 第1~7号 | 政令类 |
| 第8~10号 | 自然观类 |
| 第11~14号 | 宗教观类 |
| 第15~47号 | 历史类 |
| 第48~88号 | 军政、军史类 |
| 第89~137号 | 地理、行记、方志类 |
| 第138~142号 | 经济、财政类 |
| 第143~160号 | 农林业类 |
| 第161~168号 | 手工业、工业类 |
| 第169~178号 | 植物、动物学类 |
| 第179~182号 | 矿物学类 |
| 第183~207号 | 医药学类 |
| 第208~223号 | 数学、测量学类 |
| 第224~234号 | 天文学、气象学类 |
| 第235~251号 | 军事类 |
| 第252~253号 | 音乐类 |
| 第254~266号 | 文字学类 |
| 第267~272号 | 语言学类 |
| 第273~310号 | 文学类 |
| 第311~326号 | 教育类 |
| 第327~328号 | 综合类 |
| 第329~355号 | 图幅类 |
| 第356~357号 | 天文、地理仪器及说明书 |

总共为21大类，反映了19世纪前期俄罗斯的广阔的知识领域，而宣传宗教的书籍只有4号，共4种4本。

咸丰八年（1858年），除一部分图书因被清文宗调用而送军

机处外，“其余遂移存方略馆”。同治八年（1869年），“复移存总理衙门书库”^①，而据曹汝霖的追忆，则是交存于隶属总理衙门的同文馆：“同文馆既开，复以道光间俄皇所赠书六百余册移置其中”^②。是时，对俄文书籍图说曾作了检点，共计存有682本，并随即由同文馆洋文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会同同文馆内的俄文馆教习班铎率领学生，根据实有书籍再次翻译书名并编制目录。这次译编的书目仅保存在《纯常子枝语·卷三》中。此目录与初译目的分类体系不同，是将所有图书分成18类。这18类是：①语法书类，②史传类，③律例书类，④名臣列传类，⑤杂志类，⑥游历书类，⑦农书类，⑧兵法书类，⑨天文算术书类，⑩史书类，⑪地理书类，⑫医学类，⑬天产万物各学类，⑭工艺诸学类，⑮泉刀谱类，⑯训幼书类，⑰幼学书类，⑱图画类。18类书共233种，比入华时的总数缺了48种，当然，首译目中的一种书，在此次编目时可能被分成几种书。另与首译目不同的是，在此目中每一号仅代表一本书。这两部书目的译编，标示着西方的图书分类和编目方法首次传入中国。

译制书目时为了尽量适合中国的习惯，将一些俄书书名中国习语化了。如首译目中《本草纲目》、《武备志》等书名，并非译成俄文的中国图书，直至1932年，《武备志》尚无完整的俄译本，而《本草纲目》的植物部分也是在多年之后才被译成俄文，题作《中国植物学》。在第二次编的书目中，译名中国习语化的现象更为普遍和过分，以致几乎名不符实，难以理解是何书了，如将首译目中的《俄罗斯国防守丛林隘口推广条例》改译成《种树必读》，文廷式就感到颇费猜度：“此书何以入律例书内，殆不可解”^③。但后一书目也有可取之处，即一些音译比首

①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② 曹汝霖：《外交部藏书目录序》，载李希泌、张淑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第376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③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

译更为接近今天的译法，如改首译目中的“阿弥叶喇喀”，“喀法喀斯”、“丕叶忒尔布尔噶城”、“那普哩勇”为“亚墨利加”、“高加索”、“彼得堡”、“那波仑”，即今日的“亚美利加”、“高加索”、“彼得堡”和“拿破仑”。

这批俄国赠书中许多都是当时最新出版的文化及科学名著，如首译目中第216号《贴斐叶楞齐数书》，在后译目中编号为447，改译作《微集分》，是法国柯士所著，由后来成为俄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数学家尼布雅柯夫斯基(1804~1864年)译成俄文，并在1846~1859年间被他作为在彼得堡大学讲授微积分的教材。首译目中第166号《淘金新法发明》，后译目作《矿学课程》编为588号，是曾参与俄、奥、德、比等国采矿工作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乌扎蒂斯所著，1843年方在彼得堡出版。首译目中第205号《眼科》，后译目编为542~543号，改名为《眼科必读》，今仅存1册，是柏林大学医学教授容根所著，德国眼科学的水平当时是世界第一流的。此书由俄国赫里德布兰特根据1836年的德国初版本翻译，1841年出版于莫斯科，对各种眼病都有详细的阐述。首译目中第187号的《医法新编》，后译目编为537~539号，改名作《医术新编》，今已散失了1册，此书由俄国著名医学家、药学家、“聂氏止血药”及多项医药学成果的发明者聂留宾所著，于1840年在彼得堡出版。因被清文宗调阅，未编入后译目而仅著录于首译目的第333号《天下东西地理图》，共有2幅，各宽97厘米、高90厘米，是彩色的世界总图，极为详细、精致，于1831年由俄国军用印刷所出版。另一些地图也都是套色印制，幅大而精细，从世界地图到俄国各地地图，以及专门的水陆交通图、土产分布图、历史地图、军事图等都有。目前所存的其它书籍，如后译目中的《农政全书》、《太阳出入时刻表》、《律例汇编》、《颇王列传》(颇王即彼得大帝)等书，也都印制、装帧精美，或配以形象的插图，或辅以表谱。

显然，这批书就版本而言，即使在苏联本国也皆属珍本图

书，就实用而言，对当时的中国也有着很大意义。但实际上这批赠书在华的遭遇与其价值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清政府在收到这批俄书后，因“通体皆俄罗斯字，人不尽识”，以至办理收书事宜的大臣竟“议发还之”，只是有的大臣认为这是报谢之礼，如拒绝了会“转拂远人之情”，才奏请收下^①。关于它们被清政府直接利用的情况史载不多，“咸丰八年，文宗显皇帝御批图书四十一种，皆舆地图画之书，进呈乙览”^②。咸丰帝调阅的目的显然与治边有关。同治八年，总理外务的恭亲王奕訢曾奏请将赠书中的地图等书转置他的官邸以备查考，以后，这些书当也曾一用。

据旧史所记，起先，清政府确有过翻译这批书的意图。何秋涛写道：早在俄书入华之初，就有大臣奏准“……请收存于理藩院，以俟暇日翻译焉”^③，因此“先译书名”。甚至入光绪朝时，还有人吁请翻译它们。但大多数图书最终皆未被翻译以用，却是可以肯定的。

清政府虽很早就已设立了俄罗斯文馆，先后派少数八旗子弟及内阁官员学习俄文，但都几无成就。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多由俄方人员翻译；重要文件，如两国间条约文本等，则请在华的欧洲天主教教士翻译。俄罗斯文馆内中国人的俄文水平十分有限，不可能进行全书的翻译，“馆中学生荒废日久”，即使是翻译书名，也是“强为设名”^④。到同治二年（1863年）清政府将理藩院俄罗斯文馆并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同文馆时，俄罗斯文馆的学生早已鸟兽散，仅剩下的1名老迈的教习却不通俄文，因此也被裁撤。同文馆开设后，其俄罗斯文馆仅定学生10名，且遭到守旧之臣的强烈反对，因此，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总理衙门

① 何秋涛：《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载《朔方备乘》卷39。

②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③ 何秋涛：《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载《朔方备乘》卷39。

④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

准同文馆招考学生后，还为迂腐冥顽的“世家子”所不屑入学。翻译人才的培养有如此大的阻力，致使译者，尤其是俄文译者奇缺，因此，这批俄文图书的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

一方面是翻译人才的奇缺，而另一方面，清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并未想通过这些当时最新的图书去研究、了解俄国与世界。

数十年后，当一些人开始想了解世界时，这批俄文书籍却又被认为过时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由翰林院编修文廷式起草奏文，御史赵尔巽奏请将这批书检交同文馆翻译，但“旋据总署复奏，以为旧书不如新书之详备，俄书立论又不如英、德、法三国，可不必译，事遂中止”^①。薛福成也觉得事已晚矣，故不赞成再去翻译：“窃惟风气开自泰西诸国，其中已由上海制造局译出五、六十种，天津机器局译出兵阵火器书二十余种，同文馆先后译出各国史略、西学诸法近二十种，皆新出推勘较密之书。俄国偏居北徼，风气较晚，……故知俄人进书事在四十年前，其时沿用旧法，未必有裨时务，应请无庸置议”^②。

戊戌维新时期，国内请译西学诸书及请设译书馆的呼声大兴，但却多主首先采译日文西学书以应急用，理由是日本已将世界各国有用的书差不多都译成了日文，且日文学成较快。翻译俄国图书之事，遂不再提及。

清政府虽未组织俄国赠书的大规模翻译，但零星的翻译似乎有过。咸丰帝、恭亲王奕訢既调阅参考，就难免要翻译，或仅译概要。俄书曾长期存放理藩院，因此被俄罗斯学馆的师生使用、译参，也应是可能的。同样，后来俄书移到同文馆，成为必不可少的教学与实习用书，馆内师生对之进行零散的翻译或摘译不但可能，而且必然。据《京师同文馆馆规》，学生须学八年，从

①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

②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年起学习翻译，从第五年起则要正式实习翻译外文书籍，直至第八年。丁韪良曾用英文编过一份粗略的同文馆师生辑译书籍表，仅列出所译书名及辑译者。表中著录有：“History of Russia, Studants of Russian Class,”即“《俄国历史》，俄文馆学生（译）”^①。清代徐维则《东西学书录》对同文馆翻译的俄书也作了著录。但不管怎样，总的说来，在大批俄国赠书入华的最初几十年里，清政府并未努力开发、利用它们，而民间则基本上不得与闻。

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总理衙门内各处藏书有很大损失，“庚子之变，故书旧本，什失六七，其存者又或委弃于阴房败簏之间。典守者无以应，则委之于兵燹”^②。次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将原衙门内各处散书集中，专设储书处庋藏，俄书也藏于储书处的小楼。辛亥革命后，外务部改称外交部，储书处改称图书处，时所藏俄国赠书已只剩80多册，被重新作了装修，图书处并为之编定了俄文书目1卷，与其它书目11卷，汇成《外交部藏书目录》^③。但此后30来年，时局变乱不已，俄国赠书又散失殆尽。解放前夕，北京图书馆从旧书肆中发现并购回一部分，共20余册，经修葺后，珍藏于馆中特藏部。1955年，在故宫库房里又意外地发现了这批赠书中的7幅单幅地图及10余种地图集，珍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羽离子，1952年生，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工作人员）

①〔美〕丁韪良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记》，载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

②③ 曹汝霖：《外交部藏书目录序》，载《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376页、377页。

《热河密札》中“宫灯”一词新解

徐 彻

《热河密札》是了解“辛酉政变”的第一手资料，是极为难得的珍贵的秘辛。《热河密札》有两个版本，一为高劳本，一为吴庆坻本。高劳发现的《密札》最早刊于《东方杂志》，是他从所见的诸多密札中选录12道刊登的。吴庆坻在其撰述的《蕉廊臆录》中收录了11道密札。吴本较高本发表在后，但发现在前。两本《密札》都很重要，内容不尽相同，可互为补充。

《密札》因是驻热河行在的军机章京与北京政界要人的秘密通信，所以其中多用隐语。有的隐语已得到公认的解释，有的则不得其解，有的则多解。但关于“宫灯”一词的解释，则被普遍承认，认为“宫灯”是指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肃顺。作这种解释的正是上面提到的两位学者高劳和吴庆坻。高劳在发表的12道密札后作了个案语，其中说：“宫灯，指肃顺。”^①而吴庆坻则在《密札》中间作了注释：“宫灯指肃顺，当时隐语，肃字象形也。”^②这种解释自《密札》发表后，几十年来一直被学术界所认同，如著名学者金梁就认为：“原札肃辈作宫灯辈，当时隐语，谓肃字形也。”^③

① 黄浚：《花随人圣庵忆》第427—428页。

② 史文简：《热河密札订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234页。

③ 金梁：《清帝外记·清后外传》第217页。

笔者近读《密札》，发现如把“宫灯”不区分具体情况一律解释为肃顺，就出现了不可析解的矛盾。

高本《密札》“宫灯”词凡四见。一为八月三日撰写的第二札：“宫灯尚无回京消息。（回京须望阁下图他密，十日容再作信。）初一后尚未叫起。”^①二为八月六日撰写的第三札：“宫灯已跪安，日内回京。”三为八月十六日撰写的第五札：“另拙作一页，乞与加官、通典同一例者阅之。因有关系，可望其借达宫灯也。然万望秘之。”四为八月一日樵客致黄螺主人札，即第七札：“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连日颇为敛戢。”^②

因高劳注“宫灯，指肃顺”是在12道密札之后，所以高劳认为这四处“宫灯”全指肃顺，当无疑义。别的学者也是这样理解的，如在《近代史资料》（总36号）刊载的《热河密札》第二札的“宫灯尚无回京消息”句下注解“宫灯”为“高云：宫灯指肃顺”。这是高本12道密札中“宫灯”一词的第一次出现，所以作了注释，以后三处皆未注释，当然是解释同前之意了。

“宫灯”是否指肃顺呢？上引第七札的“宫灯辈颇有惧心，见恭未尝不肃然改容”一句，明显是指肃顺。这里的“恭”是指恭亲王奕訢，宫灯同奕訢对举说出，当然是指肃顺了。而宫灯辈，即肃顺们的贬义说法，指顾命八位王大臣。

那么，其他三处宫灯是否也如高劳所说是指肃顺呢？肃顺于咸丰十年八月八日随咸丰帝出逃热河行在（见翁同和日记，八月八日“肃顺随扈”），就寸步不离地守在咸丰帝身边。咸丰帝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宾天后，他也没有离开过行在，即近一年时间，肃顺一直呆在热河行宫，从没回过北京。同时，行在上层也从没就肃顺回京事议论过，他本人也是坚决反对回京的。咸丰帝生前，他坚决反对并设法阻止回銮；咸丰帝死后，他又坚决反

① 史文简：《热河密札订补》，《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234页。

② 史文简：《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总40号）第234页。

对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回銮。他的理由是“皇上一孺子耳，京师何等空虚”，并威胁说：“如必欲回銮，臣等不敢赞一辞。”^①一年多的时间内，肃顺没有离开行在一步，这是历史事实。如果把宫灯解释为肃顺，那么前引的头三札便解释不通了。

第一札的“宫灯尚无回京消息。（回京须望阁下图他密，十日容再作信。）初一后尚未叫起。”里的宫灯如指肃顺，那就是说，热河的某军机章京密告北京的奕訢党人，肃顺目前还没有回京的消息，同时嘱咐他要为肃顺回京保守秘密，又说自八月一日召见肃顺后两宫没有再另行召见。某军机章京是奕訢党人，他密告北京的奕訢党人要为死对头肃顺着想，这简直不可思议。同时，八月一日两宫也未召见肃顺。

第三札的“宫灯已跪安，日内回京”一句的宫灯如指肃顺，也与事实相悖。如前所述，肃顺从未返回北京过。此札是八月六日所写，这一天，两宫也没有召见过肃顺。

第五札是热河的某军机章京，有人认为是守墨道人寄给在北京的奕訢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的。从札文看，这位某军机章京是经常把热河行在肃顺集团的情况密报给北京的奕訢集团的。如“深远有郁郁意。加官、麻老甚是得意。通典之甘为作用，尤可笑也。弟公余以酒浇愁，以牌遣兴，得一日是一日。所幸进城有期。”^②深远指郑亲王端华，说他对局势有忧虑感。加官（匡源。以戏中“跳加官”例用小锣，其声“匡、匡”而得名。）因晋升为户部侍郎，麻老（焦佑瀛，面麻，时有焦大麻子之称）因晋升为太仆寺少卿，而得意忘形。通典（杜翰）心甘情愿为肃顺辈所利用。这是密报肃顺集团主要成员的表现。他本人则度日如年，期以早日回京，以见灿烂的黎明。就在这封信的末尾处，他写道：“另拙作一页，乞与加官、通典同一例者阅之。因有关

① 薛福成：《庸庵笔记》第19页。

② 见前引史文、简文。

系，可望其借达宫灯也。然万望秘之。”“同一例者”是谁呢？章士钊认为，此“同一例者不知指何人，然必其人与肃顺有连无疑”。这是因为他先入为主地认为宫灯是指肃顺而得出的结论。然而，也有人认为“以文祥当之”。笔者认为，以文祥为是。加官（匡源）、通典（杜翰）都是热河行在的军机大臣，与他们二位“同一例者”，即都是军机大臣的，在北京的只有文祥一人。文祥于咸丰九年十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咸丰帝崩，载淳继位，文祥请求辞退军机大臣职，上命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帝于十年八月初七日发出上谕，因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撤钦差大臣职，授予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此后文祥便成为奕訢集团的主要成员，奕訢经常同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衔上奏。文祥成为奕訢的重要的左右手，深得奕訢信任。如果“同一例者”是文祥的话，那就是说，奕訢一派的某军机章京自热河发往北京的信札中，夹有“另拙作一页”这种有关肃顺集团情报的附信，通过和肃顺集团正相反的文祥转达给肃顺。不要忘记，其内容正好是有关肃顺集团的，这无疑自掘罗网。高劳则解释为：“然观其第五信末，称另有拙作云云，欲因杜翰达于肃顺，则无背面之勾搭也。”^①如若搞背面勾搭，某军机章京可以在热河通过别人，或面交肃顺，不必象现在这样，把这封信先寄到北京，然后再由北京方面转回来交给在热河的肃顺。我想，这某军机章京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这些矛盾源于何处呢？源于不假思索地认定宫灯就是肃顺。那么，这三处的宫灯是指谁而言呢？笔者认为是指恭亲王奕訢。如果是奕訢，以上的矛盾便迎刃而解了。

奕訢是八月一日到达行在的，当天受到两宫太后的召见，这是密谋政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召见。他到达行在后何时返京，正是北京方面最为关注的问题。第一札的信是八月三日所写，告诉他们奕訢还没有回京的消息。关于奕訢回京的确切消息，如一旦

^①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28页。

通知你，“须望阁下图他密”，为他保守秘密，以免遭人暗算。而八月五日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因惧怕奕訢在热河停留时间过久于己不利，面见两宫，代奕訢请示行止。两宫传下谕旨，“令明日请安”，即决定八月六日召见恭王。所以，第三札的“宫灯已跪安”，是指两宫召见奕訢后，命他尽快回京。奕訢“跪安”，就是将要起程返京，请两宫训示。这次召见，两宫明令奕訢七日回京，即是第三札的“日内回京”之意。

而第五札如果宫灯是奕訢的话，就完全合乎逻辑了。即某军机章京将“拙作一页”的热河肃顺集团的情报通过文祥转达给奕訢。综观《密札》，军机章京往往是将密函先送达文祥，然后再由文祥转呈奕訢的，这似乎是一条秘密通道。如第六札的“家言内另有小函，系弟所作习套语，尚祈到时透于与可，因中有关键也”。这份用军机处通信的习用套格秘法所写的小函就是先交给与可，这与可就是文祥。第八札的“此信仍望呈湖州阅之”，湖州仍是指文祥。第二札记“博翁前有数行，可呈与否，希酌之”，这博翁仍是文祥，文祥字博川。第九札“文堂未能另稟，祈代稟一切。”章士钊认为：文堂者，谓堂官之文姓者也。此当指文祥。因此，“同一例者”的文祥是负有下情上述的使命的。

综上，高本《密札》之12通里所提到的四处“宫灯”，其中三处是指奕訢，一处是指肃顺。并不是如高劳所说全指肃顺。而吴本中宫灯只一见，即高本指肃顺而言的那句话，内容完全相同，就不再另考了。

那么，为什么一个“宫灯”的叫法却指两个人呢？原因之一是寄信的不是同一个军机章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用语。第二札、第三札和第五札是同一个人所写，而第七札是另一个人“樵客”所写。第二札寄书者不署姓名，受书者为朱修伯。第三札，据见到原札笔迹的高劳说：“寄书者笔迹同前。受书者无姓名，疑是前人”。而第四札是守墨道人寄给结一庐主人的。第五札寄书者笔迹同前，受书者为朱修伯。如高劳所认笔迹不差，那

么，第二札、第三札应为一人所写，第四札、第五札应为守墨道人寄给结一庐主人，也就是朱修伯的。既然四札全部是寄给同一个朱修伯的，而且笔迹又相同，就可以认定寄信者为守墨道人。总之，第二、三、四、五札应为守墨道人所写。章士钊正是持这种观点的。由守墨道人所写的寄朱修伯的密札，其习惯用语是称恭亲王奕訢为“宫灯”。而另一军机章京“樵客”寄黄螺主人的密札却习惯地称肃顺为“宫灯”。不同的军机章京使用不同的习惯隐语，他们之间的信札又互相保密，所以同一“宫灯”就不是同一含义了。

原因之二是“宫灯”到底取其何意？高劳没有说明为什么宫灯就是指肃顺，而吴庆坻则解释为“当时隐语，肃字象形也”，即肃字是灯的象形字，如此而已。如果宫灯只是指肃顺，这样解释未尝不可。但宫灯又指奕訢，这又怎样解释呢？笔者认为，灯是照明指路用的。宫灯，即宫廷里照明指路时所用的灯，可以引伸为宫灯指在宫廷中身居显要地位的重臣，因为这样的重臣有举足轻重的引路作用。如这样解释可以被接受，那么，宫灯既指奕訢，又指肃顺就可以被理解了。

（责任编辑：谢维）

（作者徐彻，1939年生，辽宁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

李 时 岳

史学的生命在于真实。在史学领域里，不论多么精彩的记述，如何宏伟的议论，如果脱离了真实，就只能成为虚妄的东西而失去其价值。

但是，要做到完全真实又是很不容易的。历史属于过去，即已经消逝，不复存在的事实。人们要了解那逝去的事实，无非凭借事实所遗存的残片和事实见证人的叙述，而这二者如不经过认真审查都可能存在着不足置信的地方。

事实的遗存有文字的、非文字的，前者如公文、契据等，后者如器物、遗址等。遗存是事实的物证，遗存的存在即证明事实的存在，有很高的实证意义。但是，遗存只是事实的残片，它无法提供事实的原委；通过遗存去逆推事实，往往需要附加种种解释，在解释的每一个细小环节里都可能渗入解释者的主观判断；而且，遗存中还可能掺杂着伪造的赝品。

事实见证人的叙述也有文字的、非文字的，前者如奏报、回忆录等，后者如口头传说、画像等，它们是事实的人证，即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为了解事实及其原委所不可缺少的材料。但是，见证人的叙述只是事实在当事人或同时代人头脑中反映的表述。反映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表述可能恰当也可能不恰当。当时的报告存在着因“当局者迷”而失实的可能，事后的追忆存在着因记忆难周而错漏的可能。而且，既属主观的反映和表述，就难免

有所取舍,有所隐讳或夸张,乃至有所歪曲和捏造。至于根据当事人或同时代人的叙述而编撰的各种记载,更难免掺杂着编撰者的主观取舍、推断臆测,辗转相传,转手愈多则失实的可能性愈大。

因此,史实的考订是细致、烦琐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是史学的基础。

廖宗麟同志新作《抗法名将刘永福》的贡献,首先就在于蒐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认真的勘比考核,订正了以往奉为信史的《刘永福历史草》的讹误,展现了刘永福抗法斗争的真实业绩,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事实。

《刘永福历史草》是刘永福晚年口述、由家庭教师黄海安笔记的生平事迹。因为属于本人的回忆录,向来为研究刘永福的学者所重视。香港罗香林《黑旗将军刘永福传略》,台湾李健儿《刘永福传》,刘汝锡《刘永福》,国内杨万秀、吴志辉《刘永福评传》,施宣国、吴树杨《刘永福》等有关传记,均以《历史草》为蓝本。从史料学的角度考察,回忆录是历史事实在当事人头脑中反映的追述,虽有很高的价值,但也难免蔽于主观的好恶爱憎,加上事隔久远而淡忘、“事后已知”而粉饰、有心流传后世而夸功扬善,失真失实的可能性比当时的文书档案要大得多。刘永福的文化水平不高,黄海安的知识有限,更增添了《历史草》中存在讹误的可能。廖宗麟同志不囿于《历史草》,广泛查阅《中法越南交涉档》、《大南实录》、《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等等,从中辑出刘永福的文件书信及有关资料,辨讹正误,去伪存真,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廖宗麟同志是中年学者,治学刻苦、长于考证,写作上略人所详、详人所略,常有新意,但在理论功底、对史料的驾驭能力等方面,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相信廖宗麟同志一定能够不断奋进,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

(责任编辑:雷颐)

(作者李时岳,1928年生,广东社会科学院教授)

对帝国主义侵华本质的分析

——评《八国联军侵华史》

茅家琦

八国联军之役是帝国主义发动的、参加国家最多、影响最深的一场侵华战争。在此以后，中国进一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史学家对这场战争研究的成果不少，但是若干问题仍然模糊不清，若干观点仍然有待商榷。由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三位同志编撰的《八国联军侵华史》洋洋40万字，在阅读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丰富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在内容上，本书在三个问题上的分析，值得读者注意。

第一是八国联军侵华的起因。这个问题牵涉到战争的性质。

有些著作把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军民围攻使馆和义和团的反教斗争，回避了帝国主义列强跨入20世纪之际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以“救使”为借口的必然组合。另一些著作，又往往对八国联军的历史组合和出兵目的谴责有余，证据不足，对“保卫使馆”这个口号所引起的诸多困惑也时隐时现，留下了不少历史的疑点。还有一些著作，将八国联军侵略和义和团运动合在一起论述，在客观效果上，往往使读者将两者视为因果关系。

本书根据外交档案着重对八国联军各成员国出兵侵华的必然性作了历史的回顾，并对八国联军在1900年5月底、6月初纠合起来联合反华的直接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作者说：“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前夕，帝国主义的侵略正处于一个新的时期。一方

一方面，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已获得阶段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列强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产生了日益激烈的矛盾。”“为了加强在华斗争的地位和力量，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盟友，制定新的侵华政策。远东国际关系呈现出微妙复杂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得列强既神经紧张地注视着对手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或是扩大侵略成果准备在瓜分中国中取得自己的一份；同时，又唯恐刺激其他列强从而加剧矛盾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运动，列强在华利益受到极大冲击。帝国主义列强组成了八国联军，对中国进行联合的军事侵略，各国间的矛盾也更加充分尖锐地展开。”这样的分析，我认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二是根据新的史料——《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纪要》，揭露八国联军的罪行。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以后的烧杀淫掠暴行，世人早已公愤。本书作者利用天津历史研究所翻译的《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纪要》，把八国联军统治天津的决策、措施以及“天津都统衙门”的机构变化和对八国联军各国势力消长的影响作了详细的叙述，这就使读者对八国联军的暴行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天津都统衙门”是由侵略者控制的一个地方伪政权，从1900年7月30日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撤销，存在了两年多。在这个“衙门”的统一指挥下，洋巡捕、华巡捕，反动绅商和反动教民串通一气，以镇压义和团为名，大开杀戒。男人肩上托枪的痕迹，妇女身上的红色衣服和人们脸上愤懑的表情，都成了捕杀的理由。甚至河东地区一对正在结拜天地的新婚夫妇，也被巡捕们以“新妇身穿红衣，疑为红灯照，新郎身披红衫，疑即拳匪，遂用枪一并轰毙。”“都统衙门成立以后，大肆搜括天津人民的财富。首先将直隶总督和天津地方政府的一切财产全部没收”。“都统衙门”在其存在期间，共收入捐税达275万多两。

第三是充分揭露了八国之间的矛盾、倾轧。

八国联军串通侵华，但是它们内部又明争暗斗，矛盾重重。本书对侵略者在军事行动和签订《辛丑条约》时所暴露出来的矛盾、猜忌、倾轧，进行了充分的揭露。作者指出，从1900年10月开始议和签约的谈判，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和约》，将近一年时间，绝大部分谈判都是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列强从矛盾、倾轧逐步走向协调、妥协的过程。德国驻华公使穆默公开说过：“将与中国代表开始谈判拖延下去，等到有关列强间达到一个原则上的谅解。”

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加深了我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揭露。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它首先界定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时间和地点。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义和团运动时期及其稍后所有帝国主义侵华活动，包括俄军出兵东北、德国军队抢占长江、日本舰队窥伺厦门、列强策划“东南互保”等等，都包括进去。作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八国联军尽管是一个十分松散且又极不稳定的暂时联盟，但它毕竟有自己特定的使命和内涵，那就是以‘解救’北京各驻华使馆为借口和以直隶为主战场的联合作战。正因为如此，八国司令官的联席会议就成为八国联合侵华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而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行动和联军之间的相互消耗又都会受到联军内部的舆论谴责。这种情况到了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抵京之后更为明显。”因此，“八国联军侵略”是指八个帝国主义列强对直隶地区的联合侵略。凡属不以直隶为主战场而又由个别帝国主义单独进行的侵略活动，都划在“八国联军侵略”的范围以外。

根据这个界定，在叙述中以联军的军事活动为主线，以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作为它的对立面。

作者又认为，八国联军作为一个松散的军事联盟，在纠合之初就不是奉各国事先的协议行动，也缺乏各国驻华公使的统一调度。随着京、津、沽之间铁路和电讯设备的先后毁坏，很快就形

形成了三支独立作战的队伍：一是由各驻华公使指挥的北京使馆卫队；二是由天津紫竹林租界联军防区司令部指挥的各国联军；三是由各国舰队司令指挥的大沽口外舰队。这种情况虽然随着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而不断改变，但一直到瓦德西来华之后也没有完全克服各自为政的局面。再加上各国在联合侵华期间又一直增兵不止，出兵无序，京、津、保、沽各主要战场均呈现出军队调动频繁和战事曲折多变的复杂局面，这一切都使得八国联军的军事行踪和人事变动愈发显得来去匆匆，模糊不清。本书根据中外文史料相互印证，对目前史书上涉及较少的问题，如大沽增援紫竹林租界的多次进军、紫竹林租界的军事部署和力量变化、联军由津到京的沿途战斗和到达使馆区后在京城军事行动，以及联军四面扩大侵略的路线，作了重点叙述和补充，从而初步理清了列强对华派兵行动和军事行动的情况。

这样，读完这部书，人们会感到头绪清晰，印象深刻。

本书引用了大量中外文资料，据粗略统计，直接利用的档案材料800多条，其中外文档案达500多条。此外，还从中外著作中转引了许多档案材料。作者还多次深入到八国联军侵略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并与中外文史料记载进行核实印证。这些都说明了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

这部著作在最后一方面指出《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强了对清朝政府的军事监督和政治控制，使它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忠实工具，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另一方面，又指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激发了中国人民进一步的觉醒，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这是很辩证的分析。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茅家琦，1927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辛勤拓荒 扎实求真

——《辛亥人物文集丛书》评介

山 屈

从1986年起至今，短短5年间，由章开沅教授主编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已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了8种。

此8种文集共计400余万字，其中《雷铁崖集》（唐文权编）、《经元善集》（虞和平编）、《吴禄贞集》（皮明麻、虞和平、吴厚智编）、《居正文集》（罗福惠、肖怡编）、《戴季陶集（1909—1920）》（唐文权、桑兵编）已经面世，《卢作孚集》（凌耀伦、熊甫编）、《刘揆一集》（饶怀民编）、《马君武集》（莫世祥编）已下厂付印，将于今秋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前行市。《周学熙集》（夏良才、虞和平编）也已编妥待版。

或许，未曾见过该丛书文集的读者会感到疑惑，许多著名辛亥人物的文集已经纷纷出版，或者正在编辑与出版之中，为什么还要另编这一套《辛亥人物文集丛书》呢？

诚如该文集的“出版说明”所谓：辛亥革命是一个群星升起的时期，当年许多仁人志士的言论文字、与他们的社会实践一样，都焕发出灿烂的光华。其中一些著名人物，诸如孙中山、黄兴、蔡锷、章太炎、廖仲恺、朱执信等等，早已有人编辑刊印过各种版本的文集，而且现在又不断有更全、更完善的新版文集问世。但是，辛亥革命不是极少数人的事业，它是由一个数以万计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因此，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或是探讨社会思潮，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应

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然而，一些知名度稍低的人士，或则因为早逝，或则由于其他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诗文至今还散存于各种报刊以至稿本之中，需要花更多的气力加以访求、搜集、清理、编辑、校勘和出版，为辛亥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提供若干方便。这就是丛书编辑旨趣之所在，可谓慧眼独具也。

本着这种拓荒的精神，经过编辑们艰辛的劳作，现在，已有一部分辛亥民国时期的人物（丛书之宗旨并非局限于革命志士，包括那些中间的甚至是旧营垒的曾在辛亥革命史中产生过影响的人物）的言论和事迹得以保存和流传。其中如雷铁崖、经元善、吴禄贞、卢作孚等文集都是第一次全面结集出版。可以预料，这些文集的刊行，对推动辛亥民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扎实、求真，是编辑文集的基本功。该丛书在广博收罗、爬剔梳理、审慎考订方面颇具功力。丛书各该编者沉潜于集主有关活动的书山刊海，钩稽探求，材料来源非常广泛，几乎每种文集都在史料发掘方面有所成绩，从而增加了各该文集的权威性。以《经元善集》为例，该集搜罗的180余件文献中，有经氏生前自定文集、有专论汇编、有信札电文及家书，有发表于清末民初各种报刊的文字。所采用之版本，既有铅印本，也有木刻本、还有手抄本。收罗之宏富，不一而足。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编者对于各该集主笔名及其著述的考订颇费心力。以《戴季陶集》为例，几十年前，坊间流行的《戴季陶言行录》、《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都是戴氏20年代的著述。就是1959年台湾出版的陈天锡先生编辑的《戴季陶文存》，所录的也多是20年代以后的撰述。因而，戴氏辛亥期间的文字阙而不全，令人时有神龙见尾不见首之感。经过编者努力，考订出“泣民”、“散红”、“思秋”、“思秋楼主”及“商孙”、“云巢道士”等少为人知的笔名，从而为辑集戴氏早年文字提供了重要依据。集主作于1909年

的《宪法纲要》，发表时未曾署名，编者据文章内容及按语辨析，确定为迄今所知集主的最早著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发现。“泣民”笔名的考订和“思秋”与“思秋楼主”笔名的认定，又分别发掘出戴氏发表于1910年《民立报》和二次革命流亡日本期间所发表的一批论述，收获喜人。

为提高文集的学术性，有些文集编者对若干文献作者的存疑没有妄下断言，而是根据文献的史实、时间及文风审慎考证，提出自己之所见，和读者一道思考。这样做，既可避免集主的作品成遗珠之列，又可防止赝品混入信史殿堂，不失为严谨之举。

对史料的广泛搜求与严密考订，反映了丛书编者的总体学术修养。据悉，在现有编者中，有教授、研究员3名，副教授或博士学位获得者6名。他们都是在辛亥民国时期政治、文教或经济方面学有素养的研究者。

在当今出书难，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资料书更难。而华中师大出版社有魄力出版这一套丛书，不能不引起笔者的赞叹。愿这样利益学界造福国人的好书，能源源不断地摆到书店和学人的书架之上。至盼，切盼。

（责任编辑：卫香鹏）

（作者山屈，1951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

评《民生公司史》

聂宝璋

民生公司1925年以5万元股本、一艘70吨的小轮“民生号”开业，到1936年股本已达167.4万元、船队两万余吨，到1948年船队将近6万吨、职工不下8千人。而且以船运为中心，横向投资企业有67个之多，俨然形成“民生资本集团”。单就其发展速度与规模而言，这样一家企业早就应该研究了。如今作为中国水运史丛书《民生公司史》（四川大学凌耀伦教授主编）终于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值得庆幸，值得欢迎。展读之余，颇有启发，亦深感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科学专著。

《民生公司史》的特色不仅在于它以清晰的脉络体系，通过大量数字的加工整理，找出股本、资本增殖、公积金的历年变化及利润增减盈亏数额，为读者提供民生公司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与总体发展图景。就个人所见，《民生公司史》还写出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与特点。

一、一部反映战时经济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的企业史

民生公司自1925年创办到1956年公私合营的31年历史中，却经历了军阀战争、抗战、内战长达20余年连绵不断的战争。战争给予民生不少干扰与破坏，同时也给民生创造某些发展条件与机缘。难能可贵的是，《民生公司史》的作者并未把研究的视野专注于企业本身，而是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多层

次的考察。从而使分析兼有深度与广度。例如在创立与发展阶段（1925年—1937年），民生的“化零为整”的决策，是在川江线上中外轮运业激烈竞争、地方军阀战争规模空前的背景下推行的，目的就在于“联合统一”、“避免同业竞争”，统一川江航业，以便与外商争夺航权。在“化零为整”决策的实施过程中，民生以优惠价格收买职工亦同时转为民生编制，从而得到多数华轮公司支持，进展相当顺利。这样合并的小轮公司，1931年渝叙线上7家，1932年川江线6家，1933—1934年又合并7家。仅三四年时间，民生就奠定了统一川江航线轮运的基础，足以与外轮公司抗衡，并打破帝国主义川江轮运业的垄断势力。在民生的资产负债表上也同时显示迅速增长的资本额：自1926年的49,049元增至1937年的350万元。船吨及资产总额增长尤速：同期船吨由70吨增至18,718吨，资产则由77,515元增至12,156,852元，这一发展速度在国内民族资本企业中是罕见的，甚至超过著名的荣家企业。“化零为整”乃是民生初创和发展时期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然而牵涉到川江上、下游众多中外轮船公司的“化零为整”，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除公司资金举措维艰外，它还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阻力。如果不是川江船运管理处及四川省当局（刘湘）行政及政治上的支持，怕也不会顺利，民生在某些航线上的专利，也未必能够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民生公司史》的论述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进入抗日战争阶段，是为“壮大时期”。社会条件急骤变化，民生又及时地提出了“一切服从抗战”的决策和措施。首先是在军情孔亟和日军轰炸情势下承担迫不及待的军用民用物资的艰巨抢运任务。几年之间民生公司牺牲百余名船员，沉毁轮船十数只，同时还要承受战时通货膨胀、物资匮乏的困难。然而民生却又在1938年武汉沦陷威胁到川江下游轮运的时机，先后收购60余艘轮船，还能以沿海迁川工厂设备的运输费，转而作为对各个厂矿企业的投资。结果使船队进一步扩大，横向投资企业进一步

增加。特别为满足战时抢运及后方工业燃料的需要，单是民生投资的煤矿就达14个。连同机器冶炼、纺织、保险等各种企业，届至1945年不下51个，投资额折合战前币值320余万元。

尽管如此，民生的轮运业由于日益繁重的公差与军运收入远不能弥补因物价上涨而造成的巨额成本负担，自1939年起就连年亏折。既然连年亏赔，何以公司规模还能不断扩大？《民生公司史》由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并提出民生业务经营中具备一般企业经营所没有的特点。例如1939年民生税负只占总收入的1%，有时甚至收入与税负成反比：收入增多，税负反而降低。又如折旧率之高，亦属罕见，有时竟超过30%。增提折旧率的目的不单是为了“扩大再生产”，还在于借此减少收入以影响利润，进而减少所取得税以及股红、股息的分配。事实上单靠增提折旧是不够的，为应付种种难以招架的战时负担，民生仍然不得不转而举借公司债，并向政府请求低利息或无息借款。这在恶性通货膨胀的年代里，无异无偿补贴。《民生公司史》就这样对大量资料进行分析与论证，终于解开民生何以一方面账面亏损，一方面又能扩大投资之“谜”。这种寓论于史的分析是精辟的，论证也是有说服力的。

抗战胜利后的民生(1946~1949年)，由于它借以存在、发展的国家政治、经济都处于前途末路、风雨飘摇之中，也跟着面临崩溃边缘。《民生公司史》把这3年多的“困难时期”与前此的8年“壮大时期”所作的对比研究，对战时条件的变化与民生衰败的必然性的论证尤为生动、具体。

二、一部总结民生公司经营管理成功经验的企业史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对民生经营管理成功的经营进行探讨、研究与总结，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质是“企业文化”的反映。所谓“企业文化”，它的主要内容是：塑造企业全体职工认同的价值观，

加强企业对职工的凝聚力，由此逐渐形成企业精神、企业风格、企业目标、企业意识等相互关联的企业价值体系。这样才能激励和鞭策职工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活力。“企业文化”这个概念从50年代起发源于美国，80年代初风行世界，直到1986—1987年间才在国内引起重视。其实在半个世纪以前民生公司推行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实际上可谓“企业文化”倡导的先驱。只不过是《民生公司史》没有使用这个辞汇，而使用“民生精神”而已。

“民生精神”实际是民生公司在不同阶段创造性地推行一系列经营管理措施的概括。民生公司的创办者卢作孚首先强调的是企业与国家命运的一致性，职工个人与企业、从而职工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依赖性。特别在30年代以后国家面临存亡关头，他更把轮运业提到“立国要素”的高度。通过轮业与列强进行“海洋竞争”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轮业为中心扩大横向投资，发展各种实业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目。这种抱负显然既是鼓舞人心的理想，又是形成职工群体意识的条件。职工怀有对国家、社会的志趣，也必然会引发对本职工作的兴趣。

我们所说的群体意识，即《民生公司史》所说的“集团生活思想”，即“民生精神”的核心。它有着极为广泛的内涵。首先要有一个领导层的群体意识。它是以领导者联系职工群众为前提的。在这里，民生公司管理体制中的集中与民主制度堪称行之有效的建置。重要的是，旨在祛除经营管理中来自“家庭、邻里”封建与宗法关系的干扰，作为“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道德标准而被提了出来。这一反封建意识纳入管理体制之中，对广大职工无异是一剂清醒的兴奋剂。这是新的群体意识形成过程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标志。这对开展集团活动，保证群体纪律、激发群众热烈情感，是一个颇为关键的举措。

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何以民生自创办之日起就特别重视职工的思想行为与管理，何以不断坚持职工的各种培训制度，甚至每

年从预算中拨出一笔占纯利3—5%的“文化基金”作为专项支出。当然，群体意识突出的表现还在于根据卢作孚的“理想社会”的原则制订的琳琅满目的福利制度上。民生公司的职工不单是“干活吃饭”的“经济人”，而是兼有社会心理、人际关系需求的“社会人”。职工向公司承担任务，公司也向职工承担责任。卢作孚说：“我们创造公司也正是扩大我们的生活依赖关系，每一个人都依赖着这一个事业，凡你所需要的生活费用、住宅、医药、娱乐、教育都由事业供给，一直到老。而每一个人的努力，亦一直到老为着这桩事业。”“为职工谋取福利，不仅为当前谋福利，并须为谋未来福利，不仅为谋职工个人福利，并须为谋家庭福利。”

时至抗战胜利以后，在恶性通货膨胀、经济面临崩溃、社会风气日益败坏的社会环境中，“集团生活精神”、艰苦朴素作风荡然无存。保持20年的“民生精神”再也难于维持了。

显然，民生之取得迅速发展，为战时经济作出可观的贡献，绝非偶然。《民生公司史》对之所作的多层次的深刻分析研究，颇能发人深省。惜乎在分阶段的分析之后，缺少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是为美中不足。

三、一部反映卢作孚经济思想及其成就的企业史

《民生公司史》的另一个特色是对卢作孚经济思想的深入研究及对卢作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作为一家民族资本轮运企业，民生公司堪称是一个典型。在它存在的25年间，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尤其在抗战期间沿海厂矿内迁运输与后方的经济发展，民生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然而在民生的贡献中，卢作孚的成就独多。但他的成就又远不限于民生。他以毕生精力投注于包括民生轮船公司在内的诸如染织厂、造纸厂、机器制造、煤矿、保险银行以及养蜂厂等一系列经

济事业。虽然他所处的社会的性质、历史的条件使他难以达到他所向往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但却能给封闭的、落后的四川地区在某些方面提供了近代化的图景。就这方面讲,卢作孚算得上是中国近代的一位爱国的,成就卓著的民族企业家。

毋庸讳言,卢作孚又明显地具有与一般民族企业家迥异的气质与特点。从他的经历看,他还是一位有远见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小学毕业后,曾经作过中学数学教员,五四运动时期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任过四川“川报”主笔。他不仅创办过医院及中国西部科学院,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张罗社会救济与乡村教育。泸州图书馆与通俗教育馆的成立,都有他的心血。或许是出于意趣相投,他与当时的开明进步人士肖楚女、蔡元培、恽代英等都时有过从。这样的经历与生活氛围,使他有可能扩大经济视野与经济建设的宏大抱负。《民生公司史》通过精辟的、多层次的分析,找出在民生的经营管理体制中所反映的卢作孚思想的某些特点。例如他创办民生等企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他特别强调职工的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在他的心目中,事业的成败在于人,因而必须全面提高职工素质。“事业即学校”,这是民生经营的主导思想。在科技的倡导方面,他甚至“将航行技术悬为公开讨论之问题,使提高并普及研究兴趣,俾仅凭自力和记忆之旧法得以改进,而扩大造就之范围。”他的民主办厂思想在民生股权的分配上也有突出表现。统计数字表明,包括工商业者、民生职工、学校团体、职员等在内的小股东、股额在全部股东股额的比率,历年逐步增长。1937年小股东、股额竟占全部股东额的40%与30%。这种调动四川地方及民生职工积极性的相当民主的经营管理方式肯定是民生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民生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

《民生公司史》对卢作孚思想的具有深度的研究中,内容相当丰富,似应设置专章概括之,总结之,以引起广大读者及社会

的重视。

最后，还应提到，《民生公司史》是一部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立论严谨的企业史专著，同时它还是一部以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全书、弘扬爱国主义的教材。总之，这是一部好书，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宋士堂）

（作者聂宝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近代台湾商业的发展

——《台湾商业史》评介

徐秀丽

台湾商业的起源与发展,有着不同于大陆的特点,它既具有中国商业史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对台湾商业史的研究,只局限于一些专题文章和资料,没有系统性的专著。1990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福才同志的《台湾商业史》打破了这一局面,它为我们展示了台湾商业史尤其是台湾近代商业史的全貌。

《台湾商业史》论述了台湾商业从起源到1945年的发展全过程。我国大陆的商业起源很早,台湾则由于孤悬海外,商业的萌芽很晚。宋代大陆渔民、商人踏上台湾之前,台湾尚处于原始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大陆渔民登上台湾岛后,与土著居民开始了小规模的交易;元明时期,随着两岸间交往的逐渐增加,台湾商业也有了相应的扩展。1624年,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在重商主义的背景下展开掠夺性贸易,同时,为更多地攫取台湾资源,在台组织垦殖,发展粮糖生产,台湾商业得到初步发展,台湾岛内商品流通和与大陆间的贸易都相应扩大,台湾还成为当时中国与日本、南洋各地通商的转贩地。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三代在台经营了20多年,台湾岛得到进一步开发,市场有所扩大,商业有较大发展,但由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及郑氏政权所处的军事环境,两岸间贸易则不如前期。

《台湾商业史》虽然是一本通史,但重点在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尤其是在近代。统一使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与大陆融为一体,开发和建设步伐加快,商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作者指出,清代台湾商业流通的进一步扩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市场的商品种类的增多和数量的增加;地区间商品流通有了很大的发展,台湾与大陆沿海贸易关系的加强;商业市镇增加,大量街市、市集出现;人口和贸易流通量增加;岛内流通区域进一步扩大。商品流通的扩展,促进了商业组织的完善,乾嘉以后,台湾商界出现了“郊行”这一同业组织。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台湾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以后,与中国大陆一样,台湾经济逐渐走上了半殖民地道路,外国资本不仅控制了台湾的进出口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台湾主要物产茶、糖、樟脑、硫磺等的生产,商业虽呈繁荣景象,但已丧失了独立性。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一时期,台湾成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其商业打上了殖民地的深刻烙印。尤其是在日本占领的后期,为服务于军国主义大规模侵略扩张的需要,日本在台湾采取经济统制、物资统制、配给制度、专卖制度以及兴办官营企业等强制性措施,进一步控制了台湾的商业贸易。为了更有利于掠夺,日本在台进行了一些近代化建设,工农业生产和近代金融、交通运输、能源、通讯设施等均有所发展,为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使台湾商业也逐渐走向近代化。

作为第一本系统论述台湾商业史的著作,该书以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为其特色。在时间上,它上溯台湾商业的源头,下迄抗日战争结束,跨度近一千年,其中又以近代为重点。在内容上,既论述了台湾岛内商业的产生发展,也论述了台湾与大陆间商业的发生发展,以及岛内商业与两岸间商业的关系;既抓住了商业的发展这条主线,又始终把与商业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作为本书应有之义;既考察了各个时期的交易品种、市场、交通运输条件,又考察了商人和商人组织、商业经营方式、政府对市场的经营管理及商业政策;既有宏观的概

括及理论分析，又有细致入微的具体描述。

作为一本分析性的学术著作，《台湾商业史》对一些问题的剖析颇有独到之处。例如，在分析清代初中期台湾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原因时，作者指出，这首先在于台湾不同于大陆的独特社会经济结构。台湾的自然经济特征不如大陆那样明显，“并没有形成一种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而是一种以糖、粮生产为主，手工业等日常用品依赖大陆的半开放型经济”。这是因为，清初台湾居民大都从大陆迁徙而去，由于政府的禁止和横渡海峡的困难，渡台多为单身青壮年，合家搬迁很少。这种情况使得台湾的广大地区不可能普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而只得以单个或二、三个单身劳力作为生产单位，从而不易形成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本格局。而且，清初台湾尚处垦辟阶段，一个劳动力大致得垦种几十亩土地，不可能象大陆农民那样，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生产，而把精力集中在土地上，同时，由于人均耕地面积广阔，他们的农业所获自给有余，可以此换取大陆出产的日常生活用品。在这种经济结构下，人们出售农产品及其加工物，买回日用手工业品，清代初中期台湾的商品经济相当活跃。此外，这时台湾商品经济的发达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原因，一是众多青壮劳动力的移台，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商人的社会地位较高；三是台湾的主要输出商品（米、糖等）在国内市场上占有明显优势，推动了台湾农作物的商品化过程。这一分析有理有据，入情入理，读后使人对这一问题有了明晰的了解。

《台湾商业史》是作者积15年的心血写成的，是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也是一部资料精详，描述准确，分析入理的力作。

（责任编辑：侯宜杰）

（作者徐秀丽，1962年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7—1989年台湾、香港 中国近代史论著索引

论 文 篇

一、总 论

近代中国的统一与分裂 吕芳上 历史月刊 5 1988年6月

二、晚 清 史

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之社会思想及其意义 陈正国 史苑 46 1988年4月

太平天国意识形态政策试析 王庆成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
1988年

中法战争前后清廷对台北之防务设施 (刘铭传抚台时期) 徐丽明 德育学报 3
1987年10月

兴中会广州起义之评价 罗云家 民主宪政 59卷12期 1988年4月

关于“惠州之役”记事的商榷——检讨中日两国史料的差异 彭泽周 大陆杂志 77
卷6期 1988年12月

帝党确有密谋：也论戊戌政变 汪荣祖 历史月刊 3 1988年4月

所谓“帝党确有密谋”的面面观——答汪荣祖先生 高阳 历史月刊 6 1988年
7月

谈戊戌政变——与高阳、汪荣祖二先生商榷 黄彰健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戊戌密谋再议——答高、黄两先生 汪荣祖 历史月刊 8 1988年9月

再谈戊戌政变——答汪荣祖先生 黄彰建 大陆杂志 77卷5期 1988年11月

戊戌变法的历史地位及其意义 刘孔伏 潘良炽 九州学刊 3卷1期 1988年12月

国父领导的广州“三二九”之役 符涤泉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1卷3期 1988年
3月

黄花岗之役阳历日期 王天昌 书和人 591 1988年3月

三、民 国 史

导发辛亥革命的客观背景之分析 李炳南 近代中国 67 1988年10月

辛亥武昌起义的三个组织 冯镜 革命思想 65卷5期 1988年11月

- 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葛庆柱 革命思想 65卷5期 1988年11月
- 法国诗人眼中的民初中国：贝荷斯〔Saint John Perse〕的中国书简 梁其姿节译 当代 25 1988年5月
- 五四运动的时代显影 周玉山 湖南文献 16卷3期 1988年7月
- 古史辨运动与五四反儒学思潮 彭明辉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20 1988年5月
-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五四与内战时期学生运动之比较 陈瑞玲 史化 18 1988年8月
- 感慨话陆沉之52—57 国共分合胜败殊途 1—6 王禹廷 传记文学 52卷6期——53卷5期 1988年6月—11月
- 李烈钧乡贤为首推翻袁氏帝制再造民国的史实考证 周重韶 江西文献 133 1988年7月
- 护国讨袁与久原借款 伊原泽周 珠海学报 15 1987年10月
- 五四运动与中共之成立 周玉山 东亚季刊 19卷3期 1988年1月
- 国父“联俄容共”政策背景之研究 颜喜乐 兰女学报 1 1988年4月
- 国父联俄容共政策之背景研究 刘义民 源远学报 1 1988年11月
- 民国十四年汪精卫的争权 李国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7(上) 1988年6月
- 六二三广州沙基惨案始末 陈智涵 广东文献 18卷3期 1988年9月
- 汀泗桥战役研究 张昭然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透视龙潭之战：北伐龙潭大捷内幕(上、下) 费云文 中外杂志 44卷2—3期 1988年8—9月
- 北定中原的胜利契机 张明凯 国魂 512 1988年7月
- 东征北伐到统一 何应钦原著 中外杂志 44卷2期 1988年8月
- 北伐统一中的重重险阻 张明凯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对“北伐统一”一段历史的综合观察 秦孝仪 近代中国 66 1988年8月
- 九一八事变后有关抵抗与不抵抗问题之争议 蒋永敬口述 吴秀玲整理 历史教学 1卷1期 1988年7月
- 略结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总帐 田雨时 传记文学 53卷3期 1988年9月
- 闽变之研究 李守孔 珠海学报 16 1988年10月
- 两广六一事变处理经过 陈诚口述 柳克述笔记 传记文学 53卷3期 1988年9月
- 日本发动卢沟桥战争的真相 陈在俊口述 吴秀玲整理 历史教学 1卷1期 1988年7月
- 中华民族的抗战精神 周世辅 革命思想 65卷1期 1988年7月
- 抗战时期的政治建设 郎裕宪 历史教学 1卷2期 1988年9月
- 抗战基地纵横谈 乐恕人 中外杂志 44卷2期 1988年8月

- 海明威笔下的战时中国 林静华 当代 25 1988年5月
- 汪精卫‘举一个例’所涉抗战“机密”之真相 蒋永敬 珠海学报 16 1988年10月
- 俞儿庄血战记 王仲廉口述 黄润生执笔 中外杂志 43卷4期 1988年4月
- 山东省第八区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昌潍战斗经过 山东文献 13卷4期 1988年3月
- 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上) 藤原彰作 陈鹏仁摘译 历史教学 1卷1期 1988年7月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军救援香港之回忆 张泽深 广东文献 18卷2期 1988年6月
- 反攻滇西缅北时——松山战役之回顾 郭嘉泰 云南文献 17 1987年12月
- 从美国军事密档看中共对抗战策略的运用 周树人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1 1987年8月
- 抗战时期国共关于边区与共军问题之商谈 蔡国裕 近代中国 67 1988年10月
- 抗战时期的经济与财政 陆民仁 历史教学 1卷2期 1988年9月
- 抗战时期日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王聿均口述 吴秀玲整理 历史教学 1卷1期 1987年7月
- 抗战时期的文化与教育 王寿南 历史教学 1卷2期 1988年9月
- 抗日战争的回忆 黄杰 湖南文献 16卷3期 1988年7月
- 我国抗日战争贡献之评价 李馨宁 国教天地 76 1988年6月
- 孟良崮一战泣鬼神：张灵甫与国军主力之一的覆没 马志贤 中外杂志 43卷6期 1988年6月

四、中 外 关 系

- 抗战时期的外交 王曾才 历史教学 1卷2期 1988年9月
- 明治35年日本中央政界的“台湾问题” 吴密察 东海大学历史学报 9 1988年7月
- 日俄战后的日本对“满”政策 陈丰祥 历史学报(师大) 16 1988年6月
- 论汉口、惠州两役与日本 彭泽周 大陆杂志 77卷4期 1988年10月
- 从华盛顿会议撤侨案看日本侵华模式 徐雪霞 台南师院学报 21 1988年3月
- 半世纪以来的中日关系与亚洲变局：从七七抗战、九三受降到与日复交和断交 日本研究 283 1988年7月
- 以德报怨(31—37)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时的对华政策 小谷豪治郎著 黄朝茂译 日本研究 279—283 1988年3月—7月
- 北伐、统一与日本 陈鹏仁 中华文化复兴月刊 21卷10期 1988年10月
- 日本侵华主流势力：“陆军军阀”的形成及其内斗 上 陈在俊 历史教学 1卷3期 1988年11月
- “诣阙朝贡”？英国首次派遣使臣来华所引起的问题 上、下 刘家驹 故宫文物月刊 6卷7—8期 1988年10—11月

- 美国对中山先生建国目标的立场 Thomas W. Ganschow著 陈立文译 中山
社会科学译粹 3卷2期 1988年4月
- 1910年代至1920年代美国对中国反外情绪之洞察与研究 王成勉 现代中国军事史
评论 2 1987年10月
- 美国对“二十一条”事件的反应 邵宗海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2 1987年
10月
- 美国与北伐前后关税自主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交涉 王纲领 珠海学报 16 1988年
10月
- 抗战初期美国驻华武官对中外关系的报告 阎沁恒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1
1987年8月
- 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军援 苏启明 近代中国 64 1988年4月
- 美国军事情报密档及美国外交关系文书中对蒋中正先生的报告：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
的看法 杨日旭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1 1987年8月
-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 上、下 常觉福 中华杂志 26卷2—3期 1988年2—3月
- 史迪威将军担任驻华武官时期对地方军系与中共之观察 邵宗海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
论 1 1987年8月
- 魏德迈将军任职中国战区始末 林秀美 近代中国 67 1988年10月
- 马歇尔使华时期美军陆战队在华行止之研究 叶伟济 近代中国 64 1988年4月
- 蒋夫人访美演讲之宣传功能 吴训义 珠海学报 16 1988年10月
- 论外蒙古与中俄关系 王英勇 文史学报 18 1988年3月
- 第三国际对中国五四运动之影响 林荣裕 苏俄问题研究 28卷9期 1987年9月
- 宋子文史达林中苏条约谈判记实及续(1—2) 蒋永敬 传记文学 53卷4—6期
1988年10—12月
- 德国与我国抗战前南方内陆工业区发展及其背景之分析 傅宝真 逢甲学报 21
1988年11月
- 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1929—1938) Martin Bernd著 孙若怡译 思与言 26
卷4期 1988年11月
- 对《德国顾问团在中国》任务研究的认识 傅宝真 近代中国 67—68 1988年10
月、12月
- 抗战前及初期之驻华德国军事顾问 8 傅宝真 近代中国 64 1988年4月
- 抗战初期德使陶德曼调停初探 蔡德金 杨立宪 传记文学 53卷4期 1988年10月
- 九一八事变(1931)前中英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交涉 李恩涵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 17(上) 1988年6月
- 抗战初期孙科洽商法援经过 黄天迈 传记文学 52卷5期 1988年5月

中国促使朝鲜门户开放之经过 缪奇虎 东吴政治社会学报 11 1987年12月
长征六千里(1—9):中国战场上的韩国光复军 金俊焯原著 王俊、陈祝三译 历史月刊 1—9 1988年2—10月

辛亥革命对东南亚的影响 周佳荣 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 1 1987年1月

浅谈滇缅关系 阎本华 云南文献 17 1987年12月

蒋公访印与印度独立 杨允元 珠海学报 16 1988年10月

五、地方史

从教案问题看西力对内蒙社会的冲击(1861—1909) 黄丽生 历史学报(师大) 16 1988年6月

清末民初外蒙与中国的关系 周树人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2 1987年10月

光复外蒙与统一中国 高宗仁 中国边政 103 1988年9月

满洲与山东(1927年) 臼井胜美著 陈鹏仁译 日本研究 287—288 1988年11—12月

鲁东“丁部”抗日始末 车玉轩口述 李容之笔记 山东文献 13卷4期 1988年3月

昌潍述往:抗战前后昌潍政情之片断 赵显庭 山东文献 13卷4期 1988年3月

海宁在八年抗战中之血泪史实 程森士 浙江月刊 20卷5—9期 1988年5—9月

浙江省抗战时期之农业推广 李守藩 浙江月刊 20卷5期 1988年5月

乙未割台与日本赠送清文武官兵始末 王世庆 台湾风物 38卷2期 1987年6月

光绪乙未台湾抗日运动的性质与影响 黄秀政 思与言 26卷1期 1988年5月

日据初期台湾义民之游击抗日 游醒民 台南文化 24 1987年12月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抚垦署” 藤井志津枝 历史学报(师大) 16 1988年6月

梧棲港开发史研究:清代至日据时期 戴宝村 东海大学历史学报 9 1988年7月

日据前期基隆港市崛起与变迁之背景考察 江灿腾 台北文献 82 1987年12月

日据时期台湾港市发展与区域都市化之研究 李莉文 台湾文献 39卷1期 1988年3月

日据时期台中市之都市化 温振华 思与言 26卷1期 1988年5月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化运动中反传统思想初探 蔡渊聚 思与言 26卷1期 1988年5月

日据时期台湾书房教育之再检讨 吴文星 思与言 26卷1期 1988年5月

台湾同胞参加抗日战争 吕芳上 历史教学 1卷2期 1988年9月

国民政府关于“收复台湾”之设计 郑梓 东海大学历史学报 9 1988年7月

战后台湾省制之变革 郑梓 思与言 26卷1期 1988年5月

白头警官话当年:“二二八事件”二万死伤的谎言 陈应彭 中外杂志 43卷4期 1988年4月

广西参与抗战经纬 朱法源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1 1987年8月

云南在抗战中的任务 谭家禄 云南文献 18 1988年12月

英印侵略西藏与西藏“独立运动” 吴天威 传记文学 52卷2期 1988年2月

六、传记、人物研究

合 传

略谈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生卒年的一些问题 游学华 历史月刊 8 1988年9月

商人〔郑观应、经元善〕与经世 刘广京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6 1988年9月

中国同盟会鲁籍会员之初步调查 李云汉 山东文献 13卷3期 1987年12月

日据初期台北地区的富豪 吴文星 历史月刊 6 1988年7月

辜显荣与丘逢甲 黄荣洛 三台杂志 16 1988年2月

唐才常与谭嗣同的交谊与事功 陈善伟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
1988年

黄花岗烈士的革命精神 林淑珠 训育研究 26卷4期 1988年3月

黄花岗烈士福建党人录〔林觉民、林尹民、林文〕 上 林逸泉 书和人 590
1988年3月

黄花岗烈士福建党人录〔方声洞、陈与燊、陈可钧、陈更新、刘钟群、刘锋 冯超骥〕
下 林逸泉 书和人 591 1988年3月

梁启超与胡适：两代知识分子的亲和与排拒 上、下 张朋园 传记文学 53卷4—5
期 1988年10—11月

近百年来主宰我国三个不同政体命运的三个江西人〔张勋、李烈钧、张国焘〕（续）
周仲超 江西文献 131—132 1988年2月

舒尔曼与孙逸仙（1921—1925） R.C.Deangelis著 张忠正译 中山社会科学译
粹 3卷1期 1988年1月

西安事变两主角：蒋介石与张学良（1—4） 刘心皇 传记文学 53卷2—4期、6期
1988年8—10月、12月

抗战期间蒋汪关系及所谓曲线救国问题 蒋德全 传记文学 53卷2期 1988年8月

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 毕万闻 历史月刊 9 1988年10月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黄仁宇 历史月刊 8 1988年9月

孙立人与张学良 海天 古今艺文 14卷3期 1988年5月

张学良与张大千的友谊 似燕 大成 174 1988年5月

南天四杰〔陈济棠、张发奎、薛岳、余汉谋〕 杜如明 广东文献 18卷2期 1988年6月

新竹县志中未记载的抗日英雄——钟统、夏阿贤、蔡旺 黄荣洛 三台杂志 18
1988年8月

张灵甫与王耀武 马志贤 中外杂志 43卷2期 1988年2月

最近逝世的四位国军高级将领——李运成、李棠、李扬敬、李鸿 于翔麟 传记文学
53卷4期 1988年10月

蔡元培与刘海粟 文林 艺术家 26卷5期 1988年4月

敬悼毛子水与陶希圣两先生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于右任与张大千 李承翹 大成 180 1988年11月

我的父亲张善子先生和我的八叔张大千先生 (上、中、下) 张心素 大成

173—175 1988年4—6月

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 丁骥 中外杂志 44卷1期 1988年7月

钱昌照与刘廷芳 唐德刚 传记文学 53卷5期 1988年11月

海峡两岸谈郁达夫与王映霞 李远荣 大成 177 1988年8月

民国以来对国术有重大贡献之人士〔张子岷、陈公哲、陈峻峰、何芸樵、马子贞、唐

范生〕周剑南 中华国术 4卷2期 1987年10月

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 马逢华 传记文学 52卷6期 1988年6月

分 传

(按传主姓氏笔画排)

三 画

记高等教育功臣马继援 吴俊升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四 画

王云五传 高明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博士之父：王云五 曾济群 幼狮月刊 423 1988年3月

追怀王世杰先生 廖硕石 传记文学 52卷1期 1988年1月

王宠惠传 郑彦棻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半生戎马记 王青亭 山东文献 13卷3期—14卷3期 1987年12月—1988年12月

孔祥熙院长二三事 蔡孟坚 传记文学 53卷5期 1988年11月

五 画

叶公超才华横溢 卢伟林 广东文献 18卷2期 1988年6月

怀叶公超先生并为他说话 廖硕石 传记文学 53卷5期 1988年11月

澄清叶公超先生去国他就之说 赵世洵 传记文学 53卷6期 1988年12月

也为叶公超先生去职疑案说几句话 刘盖章 传记文学 53卷6期 1988年12月

最近逝世的老作家叶圣陶 郑仁佳 传记文学 52卷5—6期 1988年5—6月

六 画

刘坤一与清季国运 陈寿恒 湖南文献 16卷1期 1988年1月

刘国运上将传略 谢力中 湖南文献 16卷1期 1988年1月

艺术大师刘海粟传(1—3) 柯文辉 艺术家 26卷5—6期、27卷2期 1988年4—7月

中山先生决志倾覆清廷探源 庄政 三民主义学报(师大) 12 1988年8月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民约论》 林启彦 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 1

1987年1月

- 孙中山先生与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李守孔 珠海学报 15 1987年10月
常胜将军孙立人 宋以敏 古今艺文 14卷2期 1988年2月
孙科与近代中国 陈鹤龄 广东文献 18卷4期 1988年12月
抗战前后朱家骅对教育的贡献 王聿均 珠海学报 16 1988年10月
伍廷芳传 王开节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七 画

- 文肃公沈幼丹先生葆楨传略 下 叶英 台南文化 23 1987年10月
文肃公沈幼丹先生葆楨传略补遗 叶英 台南文化 24 1987年12月
沈葆楨对台湾之贡献 杜玉祥 台中师院学报 2 1988年12
史学家沈云龙先生生平(上、下) 关国焯 传记文学 52卷1—2期 1988年1—2月
记沈贤庐先生 阮毅成 传记文学 52卷3期 1988年3月
沈鸿烈对东北江海防务之贡献 谭柏龄 湖北文献 86 1988年1月
人寿室忆往录之47: 宋教仁轶事以外 郑逸梅 大成 175 1988年6月
宋耀如襄赞革命大业 谢燕鸣 广东文献 18卷3—4期 1988年9月、12月
被日军杀害的驻菲总领事杨光注事略 赵子瑜 传记文学 52卷5期 1988年5月
李方桂先生纪念文辑 山西文献 31 1988年1月
陆军上将李品仙先生行述 周天固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关于李莲英的传说 高阳 大成 178 1988年9月
李烈钧与北伐政局 洪喜美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李鸿章事业发轫的基础——自强思想的形成 苏梅芳 历史学报(成大) 14
1988年3月
李鸿章对于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贡献 王家俭 历史学报(师大) 16 1988年6月
李提摩太献身中国 齐闻韶 山西文献 32 1988年7月
张之洞与海南(1884—1889) 上 苏云峰 广东文献 18卷1—2期 1988年3月、6月
张大千敦煌传奇 饒景榕 中外杂志 43卷4期 1988年4月
怀念张大千先生 李霖灿 中外杂志 44卷2期 1988年8月
随侍我父大千居士敦煌行 张心智 大成 178 1988年9月
张冲(1900—1980) 林正言 传记文学 52卷5期 1988年5月
张自忠传 张李敏慧传 何志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张发奎与抗日战争(上、中、下) 缪培基 中外杂志 44卷1—3期 1988年7—9月
张君勱传奇 上、下 顾绍昌 中外杂志 44卷4—5期 1988年10—11月
为民主宪政献身的张君勱 薛化元 历史月刊 11 1988年12月
张学良三位一体 唐德刚 中外杂志 43卷2期 1988年2月

- 张学良进关秘录(10—11) 刘心皇辑注 王铁汉校订 传记文学 52卷1期, 3期
1988年1月, 3月
- 张謇传 李泳湘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 张謇先生与南通学院 司琦 近代中国 64 1988年4月
- 长沙起义前陈天华的革命思想 郭凤明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 后世忠邪自有评: 从陈公洽主闽主台谈到二二八事件 叶明勋 传记文学 52卷5期
1988年5月
- 陈仪枪杀张超的前前后后 余钟民原作 张文奇提供 传记文学 52卷4期 1988年4月
- 陈仪迫汤〔恩伯〕投共始末 毛森 传记文学 52卷4期 1988年4月
- 一代完人的生与死: 为二伯父陈布雷作见证 陈约文 中外杂志 44卷4期 1988年10月
- 陈布雷传 王恢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陈果夫传 曹圣芬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 陈寅恪的世界 狄介先 中外杂志 44卷4期 1988年10月
- 汪伪第一夫人陈璧君 赵志邦 传记文学 52卷5期 1988年5月
- 邵元冲传 曾霁虹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 抗战期间吴化文与山东省政府 刘道元 山东文献 13卷3期 1987年12月
- 吴稚晖先生之革命热力与治事毅力 汤承业 法商学报 22 1988年1月
- 邹鲁的晚年 陈哲三 逢甲学报 20 1987年11月
- 邹鲁与国立中山大学 黄福庆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7(上) 1988年6月
- 何应钦传之2—4 倪搏九 中外杂志 43卷1、3、5期 1988年1—5月
- 何应钦孤军破敌 张明凯 中外杂志 44卷6期 1988年12月
- 何应钦传奇(1—3) 王成圣 中外杂志 44卷1—3期 1988年7—9月
- 何应钦秘录 蒋治平 中外杂志 43卷6期 1988年6月
- 何应钦将军印象记(上、下) 鲁平原著 传记文学 52卷3—4期 1988年3、4月
- 护宪卫国炳耀千秋 何宜武 中外杂志 43卷1期 1988年1月
- 何敬公的风范 张志韩 中外杂志 43卷1期 1988年1月
- 何成济传 何志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余清芳抗日革命案口供之分析 廖风德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 6 1988年9月

八 画

- 林琴南传奇 王党源 中外杂志 44卷3期 1988年9月
- 卫道勇士林琴南(下) 袁宙宗 中外杂志 43卷1期 1988年1月
- 罗香林先生年谱初编 罗敬之 史学创汇 15 1987年7月

九 画

- 胡汉民传 王宏志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 胡汉民先生的勋业 卢伟林 广东文献 18卷1期 1988年3月
- 胡汉民书生报国 卢伟林 中外杂志 44卷4期 1988年10月
- 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14—23) 文戈庄 浙江月刊 20卷1—12期 1988年1—12月
- 以史料为经、文学为纬的胡适全传(5—8) 常茵 古今艺文 14卷2—1期 15卷1期 1988年2、5、8、11月
- 胡适与中国国民党(1—2) 吴相湘 传记文学 52卷5—6期 1988年5、6月
- 胡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关国暄 传记文学 52卷6期 1988年6月
- 胡适之先生给我的十四封信(续完) 吴大猷 传记文学 52卷1期 1988年1月
- 胡适先生的最后声光 骆志伊 书和人 603 1988年9月
- 秋瑾政治人格的形成、发展与特质之研究 杨碧玉 复兴岗学报 39 1988年6月

十 画

- 梁启超文化思想评析 顾上飞 九州学刊 2卷1期 1987年秋
- 管领一代风骚：敬悼梁实秋先生 马逢华 传记文学 52卷1期 1988年1月
- 相期无负平生：永怀梁实秋教授 刘真 中外杂志 43卷1期 1988年1月
- 悼念梁实秋先生 吴奚真 传记文学 52卷2期 1988年2月
- 梁漱溟先生之生平略述 周绍贤 哲学与文化 15卷8期 1988年8月
- 是儒家还是佛家？访梁漱溟先生 王宗昱 文星 115 1988年1月
- 中国“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上、下) 郑仁佳 传记文学 53卷2—3期 1988年8—9月
- 梁漱溟特立独行 王重则 中外杂志 44卷4期 1988年10月
- 怀践履笃实的梁漱溟先生：兼论何谓儒学与儒者 曾昭旭 鹅湖 14卷1期 1988年7月
- 梁漱溟与乡村建设运动 赵庆河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 梁漱溟和他所处的时代 周阳山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 表里如一始终不二的梁漱溟先生 蔡仁厚 国文天地 4卷3期 1988年8月
-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 牟宗三主讲 保淳整理 鹅湖 14卷1期 1988年7月
- 敬悼吾师梁漱溟先生 刘绍唐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 悼念先师梁漱溟先生 孟宪蕴 山东文献 14卷2期 1988年9月
- 值得感念的岁月 梁漱溟遗作 梁培宽记录整理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 咸丰年间郭嵩焘的江南之旅 汪荣祖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 唐绍仪传 王开节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唐继尧传 何志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唐继尧与护国之役 杨维真 云南文献 18 1988年12月
- 夏献纶治台政绩(1873—1879) 汤照勇 东海大学历史学报 9 1988年7月 史联杂志 12 1988年7月

美国驻华代办看武昌起义时的袁世凯 阎沁恒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2 1987年10月
袁世凯给端方的一封信：瞿鸿机与丁未政潮 林熙 大成 174 1988年5月
顾祝同将军与战时江苏学院 夏思祖 近代中国 65 1988年6月
故陆军一级上将顾祝同先生行述 谈龙滨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陶希圣与食货杂志 黄宽重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通贯礼与律的社会史学：陶希圣先生学述 杜正胜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悼念我师陶希圣先生 何兹全 传记文学 53卷2期 1988年8月
徐永昌将军《求己斋日记》（7—11） 徐永昌遗著 赵正楷校注 传记文学 52卷
1—5期 1988年1—5月
徐树铮传 王恢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十一画

章炳麟在辛亥革命前后之政治立场 钱秀琴 史苑 45 1987年7月
康有为苦学记 康保延 中外杂志 43卷4期 1988年4月
武昌起义与黄克强 中国宪政 23卷9期 1988年9月
黄克强先生的出生入死精神 狄介先 湖南文献 16卷3期 1988年7月 中国宪政
23卷10期 1988年10月
黄百韬传 李猷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抗日名将黄国书 陈鹤龄 中外杂志 43卷5期 1988年5月
记黄季陆先生 阮毅成 传记文学 52卷4期 1988年4月
萨孟武先生事略 陶希圣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十二画

蒋廷黻传 王宏志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蒋作宾传 何志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蒋经国传 关国焯执笔 传记文学 52卷2期 1988年2月
经国先生与战后中俄东北交涉 李云汉 近代中国 63 1988年2月
经国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郑竹园 宪政思潮 81 1988年3月
蒋经国“总统”大事年表 民主宪政 59卷10—11期 1988年3月
经国先生大事年表 海华杂志 4卷1期 1988年2月
经国先生的生活、性格与政治思想 马起华 宪政思潮 81 1988年3月
蒋复璁与图书馆事业 3—10 蒋复璁口述 林淑兰笔记 东方杂志 21卷10—12期
22卷2—6期 1988年4—5月、8—12月
彭家珍传 华仲磨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 梁漱溟遗作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思考：傅斯年“西学为用”的五四文学观 李汉亭 当代 25

1988年5月

十三画

统治中国半世纪 断送清祚三百年：慈禧太后 廖隆盛 国文天地 3卷10期 1988年3月

慈禧太后与伊藤博文：戊戌政变真相之揭发 高阳 历史月刊 1 1988年2月

溥仪之政治生涯 王正己 政治评论 46卷11期 1988年11月

我跟随了溥仪二十八年 王简斋 大成 175 1988年6月

十四画

调和国共 敬悼先贤：华侨烈士廖仲恺的人品和遭遇 唐德刚 文星 1988年2月

蔡元培先生传略 陈三井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 沈庆扬 高市文教 34 1988年6月

蔡元培与中国教育学术的现代化 黄乃隆 文史学报 18 1988年3月

谩议轩昂升日月：蔡元培与学术自由 陶英惠 历史月刊 5 1988年6月

蔡元培自写年谱（1868—1900年） 陶英惠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6 1988年9月

丹心照千古：蔡公时遭日寇活剐记 丁慰慈 中外杂志 43卷6期 1988年6月

蔡公时烈士——外交史上第一人 丁慰慈 实践 781 1988年7月

外交史上第一人〔蔡公时〕 丁慰慈 江西文献 134 1988年10月

北伐期中死事最为惨烈的九江蔡公时先生 周仲超 江西文献 134 1988年10月

民初国务总理熊希龄先生传 李守孔 湖南文献 16卷2期 1988年4月

熊希龄的生平 李守孔 中外杂志 44卷3期 1988年9月

十五画以上

溥仪之父醇亲王的后半生 谢夏捷 大成 175 1988年6月

革命党人的典型——戴季陶先生 秦孝仪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纪念戴季陶老师 郑彦棻 中外杂志 44卷3期 1988年9月

戴传贤传 谢鸿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戴传贤先生传略 贾景德遗著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戴传贤先生行述 戴家秀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戴传贤先生的德业与事功 王更生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行事高洁 尽瘁国是：中国国民党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长戴传贤先生 方鹏程 中央月刊 21卷6期 1988年6月

戴传贤先生，我的亲伯 蒋纬国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民国奇人戴传贤 上 周谷 中外杂志 44卷6期 1988年12月

戴传贤 何志浩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戴笠传的风波 乔家才 中外杂志 44卷2期 1988年8月

戴笠的生活片段(3) 黄天迈 中外杂志 43卷1期 1988年1月

七、书评

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 钟叔河的《走向世界》 张晓生 国文天地 4卷1期
1988年6月

简介《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费正清编〕 阮中仁 历史月刊 1 1988年2月

书评: 《太平天国的神权思想》〔卢瑞钟著〕 江灿腾 书和人 856 1988年1月

《清季外交史料》作者质疑 冯明珠 故宫文物月刊 6卷6期 1988年9月

评《九一八事变》〔易显石等著〕 李云汉 历史教学 1卷1期 1988年7月

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简介 冯明珠 故宫学术季刊 5卷2期
1987年冬

冈斗基著: 《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研究——以康有为为中心的1898年改革运动》 藤井
友子著 高明士译 食货月刊 16卷11—12期

关于赛瓦公案的真相: 从曾朴的《孽海花》说到夏衍的《赛金花》 魏绍昌原著 传
记文学 52卷3期 1988年3月

简介中华民国两种出版品: 《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与《对日抗战时期史料初编》
D.S. Detwiler著 张靖远译 近代中国 64 1988年4月

评费正清、费维恺著《剑桥中国史》第13册“民国”分册 何汉威 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8 1987年

韩国近刊中国史专书选介 高明士辑 书目季刊 22卷1期 1988年8月

评《中国现代革命史》〔何干之著〕 张玉法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评介丁〔守和〕、殷〔叙彝〕合著: 《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达
嘉 历史月刊 4 1988年5月

评林振华《反革命在中国: 苏维埃时期江西的国民党》 陈永发 当代 26 1988年
6月

《张学良进关秘录》余音 刘心皇 传记文学 52卷4期 1988年4月

评李云汉著《卢沟桥事变》 苏启明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5 1988年3月

《卢沟桥事变》的引言和后记 李云汉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评《德国侵略山东史》〔王守中著〕 张玉法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6 1988年9月

沈云龙先生遗稿: “二二八”事变的追忆 沈云龙 历史月刊 3 1988年4月

《民国人物小传》第10册出版前言 传记文学 53卷6期 1988年12月

《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序言 萧赞育 传记文学 53卷4期 1988年
10月

补释《陈仪迫汤〔恩伯〕投共始末》 毛森 传记文学 53卷1期 1988年7月

史家《陈寅恪传》〔汪荣祖著〕读后 刘承符 菩提树 36卷5期 1988年4月

李士珍与戴笠：乔家才《是谁害死戴笠》读后 张鹏程 中外杂志 44卷5期 1988年11月

《张大千传奇》序 乐恕人 中外杂志 43卷4期 1988年4月

为学·艺事·政治家：先烈先贤传记丛刊《叶公超传》撰后感想 张腾蛟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八、史料、档案、目录

- 中法战争的法方档案与法文著作 陈三井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5 1988年3月
- 日本前海军省所保存有关辛亥革命的资料 陈鹏仁 近代中国 63 1988年2月
- 故宫档案与台湾史研究之三：以台湾总兵为例 简介故宫所藏传包传稿资料 冯明珠 史联杂志 11 1987年12月
- 国民革命军北伐史料选辑 程玉凤 程玉凰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关于密报陈炯明叛乱密谋事件之史料选辑 李少华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北伐日本档案选译 洪桂已译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 “六一事变”后蒋介石李宗仁等往来函电选 传记文学 53卷4期 1988年10月
- “六一事变”前龙云与两广及中央来往函电选 传记文学 53卷4期 1988年10月
- 西安事变回忆录 陈诚口述 柳克述笔记 传记文学 53卷6期 1988年12月
- 七七事变后军政部长官邸会报记录 1—2 传记文学 53卷5—6期 1988年11—12月
- 七七事变至平津沦陷中央与华北军政负责人往返密电选（上、下） 传记文学 53卷 2—3期 1988年8—9月
- 先总统蒋公抗战方策手稿辑（31—36） 近代中国 63—68 1988年2—12月
- 从《先总统蒋公抗战方策手稿》体认抗战胜利之道 吴伯辉 历史教学 1卷1期 1988年7月
- 魏德迈将军任职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档案选录 近代中国 67 1988年10月
- 陈诚失落的回忆资料 上、中、下 陈诚遗稿 王天成提供 传记文学 53卷 4—6期 1988年10—12月
- 关于陈诚的回忆资料（书简） 吴相湘 传记文学 53卷5期 1988年11月
- 汪精卫叛国日记（1—2） 传记文学 52卷5—6期 1988年5—6月
- 汪精卫叛国日记的发现 传记文学 52卷5期 1988年5月
- 雷震回忆录专辑 当代 29 1988年9月
- 雷震回忆录专辑续篇 当代 30 1988年10月
- 从雷震回忆录被焚谈现代史料保存问题 张玉法 历史月刊 8 1988年9月
- 革命回忆录 陆耀文遗著 广东文献 18卷2期 1988年6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报纸简介 2 蓝旭男 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 5 1988年3月

国史馆现藏国家档案分类编案目录 国史馆馆刊 4 1988年6月

《美国军事情报：中国之部（1911—1941）》档案目录重编（1）：1911—1921 朱

泫源 现代中国军事史评论 2 1987年10月

《美国军事情报》：中国之部（1911—1941）》档案目录编辑 商榷 朱泫源 现代

中国军事史评论 2 1987年10月

九、史学、动态

晚清知识分子引介西洋史的若干问题：以梁启超史学思想为中心 林正珍 历史学
报（师大） 16 1988年6月

近代中国研究的开山先驱：蒋廷黻博士 苏春生 反攻 458 1988年6月

郭廷以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 吕实强 历史月刊 6 1988年7月

风气新开百代师：陶希圣先生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杜正胜 黄宽重访谈 王健文整
理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吕实强 历史月刊 2 1988年3月

修撰中华民国史之管见 徐文珊 国史馆馆刊 3 1987年12月

民国七十六年民国史研究概况 林能士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20 1988年5月

记“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 陈祥云 历史月刊 9 1988年10月

记北伐统一60周年学术研讨会 苏启明 历史月刊 8 1988年9月

“北伐统一6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结论与意义 高纯淑记录、整理 近代中国
66 1988年8月

“蔡元培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记实 胡有瑞整理 近代中国 68 1988年
12月

“戴传贤先生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纪实 胡有瑞整理 近代中国 68 1988年12月

蒋经国先生与现代中国〔座谈会〕 韦政通主持 中国论坛 25卷8期 1988年1月

不冤封侯但冤诗：“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 刘健明 历史月刊
7 1988年8月

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教授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刘健明 当代 30 1988年10月

简介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 孙准植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20 1988年5月

日本的台湾史研究 吴密察 30 1988年10月

（郭兴仁）

书 目 篇

一、总 论

中国近代史 黎光明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7 244页

近代中国的变局 郭廷以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456页

六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 1988

二、政治

- 捻乱及清代之活捻 柯上达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8 426页
- 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 林恩显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365页
- 日据时代台湾人反抗史 杨碧川 台北 稻乡出版社 1988
- 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 张云樵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 666页
- 曾国藩的幕僚群 姜穆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7
- 辛亥革命起因之分析 李炳南 台北 正中书局 1987 240页
- 19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 蔡国裕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492页
- 西安事变珍史 姚立夫等 台北 跃升文化事业公司 1988
- 张作霖与日本 陈鹏仁编译 台湾 水牛图书出版公司 1988 223页
- 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抗日 李敖 台北 全能出版社 136页
- 华侨抗日支队(1942—1945) 梁上苑 蔡建华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0 267页
- 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 迟景德 台北国史馆 1987 304页
- 和谈覆辙在中国,又,知难行易在美国 张九如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 太原保卫战琐记 丁玉山 台北 1988 602页
- 二二八事件真相 风云出本社编 台北 风云出版社 1987 198页
- 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与政治发展理论之研究 彭坚汶 台北 时英出版社, 1987 458页
- 革命民主政党全论 程全生 台北 正中书局印行 1987
- 国父民权主义新论 侯统照 台中 1988 334页
- 中国妇女史论文集 第二辑 李又宁 张玉法编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8.5 608页
- 勤工俭学的发展 陈三井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1988 228页
- 南洋华人简史 王赓武 台北 水牛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再版 208页
- 从政治发展看中国政党试验 本社编 台北 风云出版社 147页
- 中华民国建国史:第二篇民初时期(1—4) 第三篇统一与建设(1—3) 教育部主编 台北 国立编译馆 1987.3—1989.1 7册
- 中国国民党与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 台北 中国国民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 1988 500页
- 中国国民党奋斗史 张凤岐 台北 黎明文化公司 1985 214页
- 谁主沉浮:国民党七十年权力结构变迁 第一、二、三集 李达编著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8 3册
- 国民党研究 李敖 台北 李敖出版社 1988 308页

国民党研究续集 李敖 台北 李敖出版社 1988 310页

国民党军统内幕 编辑小组编 台北 海外出版社 277页

蒋经国建立台湾特务系统秘辛 孙家麟 台北 150页

台湾情治系统 李达编著 香港 广角镜 1988 184页

三、军 事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 张秉均 台北 1977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役述评 张秉均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
1978 3册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一、二、三） 张秉均 “国防
部”史政编译局编译 1986 3册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剿匪”战役述评 张秉均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
译局编印，1983 2册

中国大空战 王苏红 王玉彬 香港 绿洲 出版公司 1988 215页

青年远征军志略 郭绍仪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7 346页

中共军方将领，第一集 李国强等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8 185页

台湾军事强人，第三集 李达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8 185页

经国先生与国军 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编辑出版 台北 1988 255页

四、经 济

中国经济发展论 鲁凡之 台北 南方丛书出版社 1988 346页

中国民国财经名人录 工商时报编辑部编印 台北 1989年版 636页

经济档案函目汇编：第一册 1903—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编目室
编辑出版 台北 1987 193页

台湾财经大员：第一、二集 李达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8 2册

台湾财团秘史：第1—16集 李达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8 16册

五、文 化

清代学术史研究 胡楚生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8 356页

中国新闻事业研究论集 朱传誉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381页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 黄福庆 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8

抗战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1937） 蔡行涛 台北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8

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峻厉 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 台北 中华图书出版
社 1988 628页

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 薛化元 台北 弘夕馆出版社 1987 245页

康有为思想研究 肖公权 汪荣祖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622页

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 林保淳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5 126页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张灏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158页

胡适著作与世纪之争 黄国钟 台北 海国法律事务所 1987 275页
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 陈少廷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7

六、地方史、民族史

京华感旧录：风土篇 周简段 香港 南粤出版社 1987 317页
新疆风景七十年（1—12册） 张大军 台北 南溪出版社 1980
海南文献资料简介 王会均编著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3 248页
近代台湾的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 黄康显 香港 香港大学 1987
台湾殖民时代台湾摄影纪事（1895—1945） 何铭主编 台北 武陵出版社 1988
166页

台湾政治运动史 连温卿 台北 稻乡出版社 1988
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 王诗琅译 台北稻乡出版社 1988 547页
台湾史研究会论文集：第一集 台湾史研究会主编 台北 台湾史研究会出版 1988
台湾史迹丛编 林文龙 台中 国彰出版社 1987 三册
台湾人的历史与意识 陈芳明 高雄 敦理出版社 1988 237页
无花果：台湾七十年的回想 吴濁流 台北前卫出版社 1988 255页
台湾近代史事与人物 陈三井 台北 台湾商务 1988, 7 280页
台湾近代名人志：第三、四册 张炎宪等 台北 自立晚报 1987, 二册
台湾五大家族（上、下册） 司马啸青 台北 自立晚报 1987 二册
台湾风云名人录（第七至十九集） 李达 香港 广角镜 1987~1989 13册
陈诚、陈履安势力在台湾 孙丽芳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8 185页
台籍当今红人 李睦编 台北 群伦出版社 1988 207页
台湾的客家人 陈运栋 台北 台原出版社 1989
港督列传 锦润著 香港 博益出版公司 1983（初版） 1987（四版） 219页
香港历史：图片 香港大道文化有限公司编辑部编辑、出版 1988 236页
海上仙洲——金门 杨树清 台北 锦冠出版社 1988 241页
澳门史略 元邦建 袁桂秀编 香港 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8 330页

七、中外关系

中国外交机关历任首长衔名年表（增订本） 外交部档案资料处编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8 120页
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 汪向荣 台北 百川书局 1988 167页
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 张存武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418页

- 美国雅加达密约与中国 郭荣赵 台北 水牛图书出版事业公司 1988 190页
 中美关系的轨迹 王景弘 台北 联经 1987 2册
 美利坚在中国 M·沙勒著 郭济祖译 台北 南方丛书出版社 1987 357页

八、人物传、回忆录

- 民国人物小传 第九册 刘绍堂主编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7 549页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年谱 王蒂源 台北著者 1988 192页
 石达开 任明实 台北 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1 468页
 袁世凯传 霍必烈 台北 有成书业公司 1988
 小朝廷时代的傅仪 单士元编著 香港 南粤出版社 1988 88页
 梁启超、辜鸿铭、章炳麟 杜英穆著 台北 名望出版社 1988 204页
 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第1—4册)吴天任编著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4册
 孙中山别传 本社编 台北 风云出版社 1988 215页
 国父在日本 陈鹏仁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7
 青年之神：邹容传 翟君石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7 222页
 鲁迅传 曹聚仁 香港 东西文化事业出版公司 1988
 盖棺定论谈鲁迅 霍必烈 台北 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8 231页
 中共第一强人——邓小平 舒扬等 台北 洞察出版社 1988 158页
 邓小平评传(1904—1959)革命时期 第一卷 寒山碧 香港 东西文化事业公司
 1988 366页
 赵紫阳私生活 舒阳 香港 科华图书出版公司 1988
 李鹏传：第一集 李国强等编著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9 186页
 蒋介石别传 本社编 台北 风云出版社 1988 207页
 李敖论蒋介石：第1—5集，李敖 台北 全能出版社 1987 5册
 蒋介石与张学良 李敖编著 台北 郑南容发行 266页
 孔祥熙如何发迹 风云丛书海外出版社编辑小组编印 1988 247页
 顾维钧其人其事 袁道丰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8 366页
 民国吴礼卿先生忠信年谱 刁抱石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8 280页
 张学良研究 李敖 台北 李敖出版社 1988 373页
 张学良外记 王益知 香港 南粤出版社 1989
 胡适与鲁迅 周质平 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公司 1988 181页
 潘伯宁静：陈布雷传 陈约文 台北 近代中国杂志社 1987 122页
 雷震研究 李敖 台北 李敖出版社 1988 342页
 人生七十 吴尊贤 台北 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 1987
 企业巨龙：丙辰龙风云志 司马啸青 台北 文经出版社 1988 234页

曾虚白自传(上集) 曾虚白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352页
胡秋原传 张漱茵 台北 皇冠出版社 1988 二册
杨亮功先生年谱 蒋永敬、李云汉等编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631页
民族战士邱清泉 邱子静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7
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第1—4册 王寿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四册
百战黄沙:黄百韬传 郭嗣汾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7 290页
风云丛书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 风云丛书海外出版社编辑小组编印 台南 1988
335页

宋美龄与台湾 李达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8 185页
蒋家外戚列传 李达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8 184页
蒋经国的生前与身后 台湾民主杂志社编印 台北 1988 189页
十年风木 蒋经国 台北 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5 250页
论定蒋经国 李敖 台北 李敖出版社 1989
蒋经国半生光荣半生哀 本社编 台北 海外出版社 268页
用血泪凝聚长城的蒋故总统经国先生 李元平著 台北 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8
蒋经国先生哀思录(第一、二、三编) 蒋总统经国先生哀思录编纂小组编 台湾
蒋总统经国先生哀思录编纂小组 1988 三册
蒋经国家庭恩怨 周华生 王泰栋 香港 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1988 157页
蒋经国别传 风云丛书 海外出版社编辑 出版 台南 1988 266页
风云书系:蒋经国与方良 陈思泽编著 台北 群伦出版社 1988 269页
蒋经国评传 林朝和 台北 天元出版社 1988 258页
李登辉传 李达 香港 广角镜出版社 1988 185页
李登辉评传 许策 香港 顺焕有限公司 247页
李登辉的班底(第一、二集) 李达 香港广角镜出版社 1988 二册
徐悲鸿 李荣胜 香港新雅文化事业公司 1988 83页
中国暗杀大王 沈美娟 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 1989 169页

九、资料、工具书及其他

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 陈恭禄 台北 弘文馆出版社 1987 353页
革命文献:第106—109辑 卢沟桥事变史料(上、下册)、日军在华暴行——南京大
屠杀(上、下册)秦孝仪主编 台北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6 4册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 中共活动真相(一、二、三、
四)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编印 1980 四册
中国现代史辞典:人物部分 秦孝仪主编 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 1985 622页
中华民国内阁名人录 彭怀真等 台北 洞察出版社 1988 295页

中国当代名人录：第三至十二集 李国强等 香港 广角镜 1986 10册

(中文编目组)

(此书目主要收集1988—1989年之间的图书，也偶尔收有1988年以前出版的图书。)

《抗日战争研究》订阅办法

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辑的学术刊物——《抗日战争研究》，将于1991年下半年创刊发行。本刊是季刊，大32开本，每期254页，定价2.50元。1991年至1992年已开始征订，1991年发两期，共5元；1992年发四期，共10元。订购者请将款寄至：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发行组，邮政编码：100006，联系电话：555131——207，银行帐号为：北京王府井分理处（工商银行）661018—90。

近代史研究

JINDAISHI YANJIU

4

1991

《现代史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任：王子和

委员：王子和 王明光 康心如 王竹溪

陈学远 王仲良 俞中良 白日才

曹天麟 梁南溟 曹石麟 曹永成

侯文炯（按姓氏笔画排列）

现代史研究

1981年第1期

| | | | |
|-------|--------------|-------|-----------|
| 主办单位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国内总发行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 编辑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国外总发行 | 上海外文书店 |
| 主 编 | 王子和 | 国外邮发符 | 72-100100 |
| 副 编 | 曹天麟 | | |
| 国家登记证 | 出准字第 0111 号 | | |
| | （国内邮发）3-1001 | 国外代号 | 300004 |
| 出 版 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定 价 | 0.50元 |
| 发 行 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国内邮发符 | 72-100100 |

国内定价 0.50元